缅怀刘少奇

后　　记

1988 年 11 月 24 日是刘少奇 90 周年诞辰，为了学习他，研究他，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回忆文集。

文章作者主要是刘少奇的战友和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这些文章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刘少奇的经历、贡献和作风，也表达了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

这本文集汇辑了 41 篇文章，其中 18 篇是作者特意为本书撰写的；其余各篇虽曾发表过，但在收入本书时都经作者重新校阅或作了修改补充。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何静修、黄峥、周以谟、马云飞。

《缅怀刘少奇》编辑组

怀念刘少奇

怀念少奇同志

杨尚昆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 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不可膺灭的贡献。在这篇文章里，我难以表达出他的不朽业绩，只能借片段的回忆，表达我对敬爱的少奇同志的深切怀念。

一

我同少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 1930 年夏在莫斯科。他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领导上派我和殷鉴同志帮助少奇同志工作。在这次大会上，少奇同志当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作为我国驻职工国际首席代表留下工作，到 1931 年秋才回国。那时，他已经是知名的共产党人、但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面前却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他头脑冷静，思想敏锐；他很健谈，讲话有声有色，既富有理论色彩，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少奇同志在职工国际工作期间，有两件事对我教育很深。

一件事，是少奇同志反对衣黄鱼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联共派驻职工国际的领导人不顾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并提出了决议案。少奇伺志不赞成，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企图在里面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赤色工会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分争取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待条件成熟时，才可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是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执委会表决这个决议案时，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另一个决议案。这就冒犯了职工国际领导人，说他的决议案是“反提纲”、“反决议”。这种提法是狠吓人的，因为这是当时联共批判托洛茨基的语言。

另一件事，是少奇同志反对职工国标领导人歧视外国代表。职工国际执委会中，有许多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职工国际办事机构瞧不起他们，歧视他们。比如发文件，只发给俄文本，既不帮助他们翻译，又不准他们带译员。在一次会议上，这些代表提出意见，职工国际领导人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盛气凌人地训斥这些代表。少奇同志支持了代表们的合理要求，严肃地批评了这位领导人。

就因为这两件事，职工国际领导人给少奇同志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且一直戴到国内，以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同志不明真相，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据此攻击少奇同志，这也是后来使少奇同志的许多正确主张没有彼采纳的原因之一。

少奇同志对扣给他的“帽子”，一直胸怀坦然，从不放在心上。这显示了少奇同志具有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压力，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二

少奇同志很早从事工人运动和长期做白区工作，是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我同他在这方面的接触，主要是在 1931 年到 1932 年。1931 年春，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那时，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非常恶劣。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加上一些人的分裂活动，使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惨重的破坏。就连工作基础好的法租界电车公司、英租界的彩印工会、内外棉“十三厂”、海员总工会等有名的工会组织也部垮掉了，“全总”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机关。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想方设法把那些彼破坏了的工会组织恢复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少奇同志回到了上海，担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和来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少奇同志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既反对取消主义者在困难面前投降，又坚决抵制“左”倾盲动主义的种种错误。为实现这个方针，少奇同志主张公开工作和秘　密工作既要严格分开，又要巧妙地联系起来。他反对那种鄙弃一切合法手段，甚至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混淆起来的做法，因为这会导致两项工作都遭破坏。王明上台后，他们号召在黄色工会里公开组织赤色反对派，少奇同志对我讲，这是自己把“红帽子”戴上孤立自己的愚蠢做法。当时从职工国际传来德国人写的《罢工如作战》的小册子，介绍德、法等国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的经验，少奇同志反对机械地照搬欧洲工会的经验，使这本书没有印发。

少奇同志主张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积极领导工人群众争取切身利益的日常斗争，以争取群众，积聚力量。他反对不顾群众经济利益去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盲目地要求“斗争！斗争！”“一·二八”事件后，日寇占领上海的闸北地区，日办 13 个纺织厂成千上万的工人无家可归，大批涌入英租界，举行反日罢工，成了“难民”。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上街募捐，买米做成稀饭，救济这批工人，团结了群众，扩大了革命影响。少奇同志对这一行动很称赞，并要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汇报。著名爱国领袖宋庆龄为声援工人群众的反日罢工，送宋两千块银元，却引起当时党中央的一　扬争论。有严重“左”倾情绪的同志不同意接受这笔捐款。当时的中央“左”得很呵！少奇同志坚决顶住了这种错误意见，支持我们全部接受这笔捐款。国民党同日寇妥协，在上海停战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几万罢工工人要不要复工？又争论得很激烈。一些人认为不能复工，复工就是“投降”，一些同志主张复工。少奇同志明确指出，应该复工，这是关系到几万职工的生活问题，犹豫不得。他果断地支持我们做出复工的决定，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

少奇同志讲究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他认为，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要避免和敌人决战，以准备将来实行革命的进攻；要从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和迫切要求出发，选择发动斗争的时机，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更大范围的战斗。他反对“一切不合作”的关门主义，主张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下层群众。

少奇同志的这些正确主张，曾多次向党中央提出过。“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的党中央，不仅拒绝了他的主张，反而以此为理由，批评他，打击他，甚至撤销他的职务，诬称他是“右倾机会主义”。

历史是公正的。1935 年“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少奇同志上述主张的正确性。可是，在 1987 年 5 月党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座谈会上，讨论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时，那个顽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还指着少奇同志的鼻子骂他是“老右”。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同志称赞这封信写得很好，是对党的自区工作的正确总结。在后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又肯定和表扬了少奇同志在自区工作中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

三

1937 年 7 月，党中央决定派我去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这时候，平、津已经失守，北方局迁到太原。我到太原时，少奇同志早已在那里了。

我记得，在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期间，党中央政治局就决定派少奇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奔赴抗日前线的平、津，肩负领导华北的斗争、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他到华北时，民族革命的新浪潮已经开始到来，但国民党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党遭到严重的破坏。偌大一个华北，只剩下一个河北省委组织和若干城市、农村中的一点点地方组织，以及几十个中下级干部，而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严重地统治着这些组织和干部。“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他们在战略上否定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策略上否定不利条件下的防御和退却。

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以后，就立刻投入了紧张而繁重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党的建设方面，他着力肃清“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恢复了各地方党的组织，加强了平、津二市的党组织，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河南工委，华北地区党员人数增加到五千多。他还派出少数领导干部到华中、华南，恢复党的组织。他积极组织营救了一批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干部出狱，派往山西等地开展工作。他还同曾在抗日同盟军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恢复了联系。在统一战线方面，他以“K.V.”、陶尚行、胡服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阐明党的政策和观点，引起了很大反响，使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他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同华北各实力派、社会名流和学者等接洽，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和可能抗日的力量；他与国民党军队中某些爱国的高级将领联系，发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注意做国民党二十九军将领的工作，促使其同情抗日。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少奇等同志和各级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华北各界救国会、学生教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相继组织起来了，城市工人、市民、学生的未威游行、罢工罢课、抵制日货等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还有大批学生下乡宣传，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由华北一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国各救国团体的代表会，成立了以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知名人士为理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中心的“民先队”则发展到全国各地大中城市。这就汇合成了华北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浪潮，为党和八路军以后在华北的独立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当时北方局先是在太原，后来又转移到晋南临汾。这一段时间，我和少奇同志朝夕相处，亲眼看到他是怎样有声有色地领导华北人民抗战的。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少奇同志不失时机地指出：华北今后反对日寇的主要斗争形式，应该由“七七事变”前的非武装斗争迅速转变为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华北党组织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广泛地组织、领导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就是要武装自己、武装人民，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抗战。但是，当时有少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方针。他们认为，华北不致全部沦陷，没有必要在华北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一是做不到，二是会刺激国民党，引起统一战线的“大破裂”；至于建立根据地和民主政权，那更是“不能允许的行动”。他们主张“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战。还有的同志不善于随着形势的转变而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习惯于秘密工作的方式，满足于一点一滴的做法。这时，少奇同志表现了既有驾驭革命形势的魄力，又有掌握全局、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能力。他批判了“一切经过”、“一切服从”、自己把自己手足捆绑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又告诫人们，当着客观形势不利于前进时，就要善于等待，积蓄力量，不可盲动和冒险；当着形势飞速发展和革命高涨时，就应该抓住大好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朝着一定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

太原失陷前，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到太原作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代表，对阎锡山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做统战工作。少奇同志与恩来同志一起，着眼全局，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把华北划分为开展游击战争的若干区域，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并派出大批领导干部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活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还与乌兰夫同志取得联系，在内蒙古大青山一带恢复了党的组织。短短时间内，先后开辟和建立了晋察冀，太行、太岳、晋西北、晋中、冀鲁豫、冀东、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几百支游击队在各地组织起来了，八路军迅速地扩大到拥有几十万人枪的集团军。各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善了人民生活。我们还以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的名义，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学兵队，先后训练了上千名军政干部，并输送了一批优秀青年去延安学习。那时，少奇同志工作异常繁重，身体又不好，但他顽强地挤出时间，亲自编写教材。为学员讲课。《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本著名小册子，就是他在临汾为党员训练班编写的。

在华北大部分地区，我们采取的是独立自主、直接前进的方式。在山西，我们则主要采取与新派合作的方式。少奇同志对山西的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日寇对山西的进攻，使山西军阀阎锡山无后退之地，不得不“守土抗战”。他手下虽然有新派、旧派之分，但他支持新派抗战是可能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是一个封建军阀，在历史上同日本帝国主义有联系，抗战是有限度　的、是暂时的。如果进步的新派势力超出了他所能允许的范围，他就会采取镇压的手段。因此，少奇同志认为山西的抗战，要利用阎锡山的招牌，通过新派和“牺牲救国同盟会”来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我们派遣了大批共产党员作为发展“牺盟会”的骨干，创建了新军（“决死队”）、工人自卫队，又同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一起创建了新一军。这几支武装力量对外打的是阎锡山的招牌，使阎自己觉得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向别人夸

海口，但实际上它们的各级负责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是我党直接掌握的。在少奇同志指导下，我们利用阎锡山的招牌，在某些事情上向他让步，但不是“一切经过”、“一切服从”阎锡山，而是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领导抗日斗争。这样，就使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在山西和华北等地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在华北人民抗日战争迅猛发展的同时，华中人民抗日斗争却未能很好地开展起来，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华中，右倾机会主义者王明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示，仅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不发一枪，望风而逃，抛弃中原、江南大片土地和亿万人民。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敢领导和组织这些地区的人民进行抗日，甚至连国民党军队从上海、南京、徐州、武汉溃退时抛下的几十万枝枪，他们也不敢捡起来武装自己。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任命少奇同志为中原局书记。少奇同志南下时，我们同行到河南的渑池，然后才分手。

少奇同志到华中以后，认真调查研究，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并借以教育干部。他分析了华中面临的困难和有利的条件，明确提出了华中地区今后抗战的任务和方针。少奇同志作了多次报告，广大干部精神为之大振，明确了方向，提高了完成新任务的勇气。少奇同志亲自作了军事部署，调配干部到各地开辟工作，派遣李先念、彭雪枫等同志到湖北、豫皖苏、大别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皖南事变以后，他又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在他和陈毅等同志的领导下，扭转了华中地区的被动局页。经过三年多的英勇奋战，粉碎了敌伪军的“扫荡”，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大大发展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建立了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发展华中”的任务。

无论在华北，还是在华中，少奇同志都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四

少奇同志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为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费尽了心血。

早在党成立初期，他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时，就重视教育和培训积极分子，注意发展党员。1925 年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有九百多名党员，安源就有党员三百多名。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少奇同志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针对抗日战争以来王明等人闹分散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提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由少奇同志执笔、张浩同志和我参加，为全会起草了体现民主集中制的较详细的党内法规，即《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全会通过的这个文件，对于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增强党的故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之后，少奇同志还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即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专著。他为捍

卫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纯洁性，为确立党内生活准则，为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的建树。毛泽东同志多次称赞《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很有益的书，认为对党员同党的关系、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意识上的修养等问题，讲得很透彻。当时在延安的新老干部人手一册，大家认真学习，常用它对照检查自己。这本书和《论党内斗争》，被毛泽东同志选定为干部整风必读文件，对各解放区的干部整风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论党》中，少奇同志就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并科学地论证了我们党必须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怯，对中国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概括。

解放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少奇同志特别重视执政党的建设。还在战火纷飞的 1939 年，他就告诫党员：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人民感谢和拥护我们的情况下，更应该提高警惕，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的革命品质。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重蹈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和他们的政权在胜利后蜕化变质的覆辙。建国不久，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少奇同志作了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页斗争”的结论，强调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比过去更高的条件，必须对所有党员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会后，在全国进行了一次整党，广大党员按照党中央和少奇同志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照当时提出的共产党员“八项标准”，认真检查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这对于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起了很大的作用。1956 年党的八大召开，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一起，为大会准备了《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着重阐述了执政党如何执行群众路线，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官僚主义；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个人专权：如何维护团结和统一，反对分裂；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好群众、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今天，面对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所造成的严重破坏，我们更感到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挫折，少奇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着手纠正党在农村和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在 1962 年 1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工作经验教训时，他代表党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并尖锐地指出：我们不仅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也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是同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同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少奇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再一次着重讨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会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任务，不是比过去更轻，而是更重了。党的建设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法宝之一。党要管党，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施以严格的监督。执政党必须认真地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保证党和国家不变色的根本制度。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上述正确意见，未能切实贯彻执行，这就给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以可乘之机。他们横行 10 年，给党和国家带来一场灾难，正是从肆意践踏民主集中制开始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严重教训。

少奇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择东思想分析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他在党的建设、白区工作、工人运动、建立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杭日游击战争等方面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原则，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实和丰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少奇同志注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勤于调查研究，努力保持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密切联系。他身为国家主席，日理万机，仍然带头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亲自作调查研究，直接听取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和要求。1961 年四五月间，他去湖南调查， 44 天中有 32 天住在农村。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一个普通农舍里，他就住了 18 天，开了 11 个座谈会，并亲自到社员家里问寒问暖，同老党员、老贫农促膝谈心。他看到了广大社员深受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之害，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调查报告，提出了关心农民疾苦、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见。同年七八月间，他又不辞劳苦，不顾雨淋路滑，跋山涉水，深入大、小兴安岭，察看森林资源和林业工人生活的情况。由于他注意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因而对国家建设提出了不少符合客观情况的意见和主张。

少奇同志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严于律己。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身体力行，首先做到。他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儿十年如一日。1937 年 10 月，太原失陷，我们撤退到临汾刘村。这时，少奇同志胃病复发，吃不下饭，更加消瘦了。我们到北方局时，中央交给他几万元法币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如数移交给我保管。他没有向组织上要求照顾，坚持按中央规定，每月只领五元钱的津贴，每天买些红、白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进城以后，少奇同志对家属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经常让孩子们参加体力劳动，从不准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王光美同志随少奇同志出国，准备服装，少奇同志叫她到办公厅来请示我，是严格按外交部的规定办的。他家里的生活也很俭朴，平时吃饭，少奇同志的菜稍好些，孩子们吃一般伙食标准。后来，他全家干脆在食堂包伙吃饭。少奇同志晚上吃夜餐都是自己掏钱。有一次，他发现公家为他报销了夜餐费，便诚恳地对中南海行政处的同志说：“我长期习惯夜间办公，和一般同志的情况不同，夜餐费不该让公家出。”他坚决要行政处的同志把衣餐费的单于开出来，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了。少奇同志长期身居高位，但依然保持了公私分明，廉洁奉公的人民勤务员的本色。

少奇同志作风民主，严守纪律。他一贯地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中，严格服从集体领导和组织决定。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从不搞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有事总是同领导班子里的同志商量，乐意同别人交换意见。他对某项工作提出意见，总是事前经过充分酝酿，往往能得到大家的赞成。他原则性强，严肃认真，有时批评起某些同志来显得很“厉害”，然而这些同志也并不觉得他不民主。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他都不讲；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他都不做。有意见，他总是当面讲，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和少奇同志长期在一起工作，彼此比较熟悉，来往也多，但他从来不对我议论别的领导同志。有些对一般干部不该讲的事，他也不给王光美同志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讲。

毛主席在一段时间里退居第二线，委托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凡是重大事情，少奇同志都请示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少奇同志常常这

样说：“我们这次讨论，把意见拿出来了，由我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同意了，我们就开始执行，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下一次再讨论。”他从不擅权、自作主张，十分尊重毛泽东同志。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炮轰”、围攻和一片“打倒”声中，陈毅同志仍然理直气壮地说：“刘少奇同志是我的好老师。”陈老总讲的是实话，概括得好！我同少奇同志接触三十多年，深感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少奇同志横遭迫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党和国家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少奇同志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贵品德，为实现四化这一壮丽的事业，多尽一分力，多发一分热。

少奇同志为之献身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永生的！

1980 年 8 月作

1987 年 7 月改

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王首道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党为人民艰苦奋斗一生，对我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我在长期的工作经历中，得到过他许多亲切的指导和教诲，对他是很景仰的。他的战斗业绩，他的优秀品德，在我心中闪耀光辉，永不磨灭。

一

1925 年我刚在长沙参加共青团，就已经知道少奇同志早年献身革命，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1922 年 9 月，少奇同志由毛泽东同志派至安源工作。他与李立三同志一起，领导和组织了安源工人运动。在“二七”惨案后各地工人运动受到很大摧残的情况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巍然独存，被誉为“硕果仅存”。邓中夏同志称赞它是“组织最好的工会”，称赞少奇同志是工人阶级的“最勇敢的一位战士”。1927 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事件，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5 月，在党的五大的会议上，少奇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坚决批判了陈狈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当时，我见报载：少奇同志赴国际太平洋劳动大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讲演，愤怒痛斥蒋介石的无耻背叛和血腥屠杀，表示要不屈不挠地“向前奋斗”。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上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后，我又听说少奇同志留在白区，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地坚持斗争。至此，我和他虽然一直没有见过面，但对他早已是很仰慕的了。

1932 年，我在中央苏区任湘赣省委书记，首次见到了少奇同志。当时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相继大摘“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使白区工作几乎损失殆尽。王明等人来苏区后，又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我知道少奇同志在白区一直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被王明等人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投降主义”，受到批判、打击，甚至撤了职。当时我很年轻，去他所在的苏区职工会汇报工作。他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我请他对湘赣区的职工会工作给以指导。他十分和蔼、亲切地对我说：一句话，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苏区职工运动不能套白区的办法，应当以动员工人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心工作。当我问到自区工作的情况时，他皱了一下眉，坚毅地说：搞革命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讲斗争策略，不做秘密工作，不积蓄力量、荫蔽精干，把我们多少好同志都送到敌人屠刀下，怎么会不吃大亏？叫人多么痛心！他还说，我从 1928 年起，在党内，在共产国际，都反对过这种搞法，至今不变。他又赞佩地说：毛泽东同志领导苏区红军，执行“保存有生力量”，打仗“赚钱就干，折本不来”的方针是对的，所以红军力量越斗越强。白区工作没有这样做，所以越斗革命力量越弱。当时，我在工作中已感受到王明路线的压力，想到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我们创建湘赣苏区，总是指导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斗争方针和策略，使根据地日益扩展，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因此，我觉得少奇同志的卓见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高压下，少奇同志坚持正确主张，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方针，这是多么

难能可贵！在这次谈话后，我和少奇同志在苏区有多次接触。我看到他虽受打击，但毫不气馁消极，依然到处奔走，孜孜不倦地动员、组织工人支援反“围剿”斗争，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动员工人参加红军，组织成立了由工人组成的中央警卫师等等，我觉得在他身上有着十分坚强的党性，有着消耗不尽的革命精力。

自此以后，我一直看到，少奇同志总是紧紧地和毛泽东同志站在一起，坚决捍卫和执行正确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

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这挽救党、挽救革命的关键时刻，少奇同志坚决支持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张国秦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夫头，少奇同志坚决追随毛泽东同志，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

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后，我在较长的时间里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少奇同志常往返于延安与外地，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常是不畏艰险，到最因难的地方去，为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而不懈地工作和战斗。1935 年冬，党中央派他任北方局书记。当时华北地区经过多年严重的白色恐怖，党组织绝大部分已被破坏，只保存了河北省委、若干基层组织和几十名干部，而且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局面很困难。记得有的同志对少奇同志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哪。少奇同志充满信心，回答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改变白区工作的局面。他赴北方局后，很快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他写下《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首先在党内批判、清除“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他领导在秘密工作中大力恢复和发展了各地的党组织与外围组织，使华北的党员很快地发展至五千余人。他领导北方局将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化，大力动员群众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使杭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茶地蓬勃开展起来。“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标志着华北自区工作获得了空前的成绩。当时他总结历史经验，写了《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阐述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明确地提出应当系统地批判、清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抗日战争一爆发，少寄同志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在写给他的信中所作的“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重要指示，在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大溃退的动乱局面里，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了工作的大转变，及时迅速地组织革命力量转向农村，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广大的华北敌后根据地。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成了华北民心所向的、华北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少奇同志在华北一直忠实、积极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卓越的成就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方针的正确，并且以此积极投入了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从“左”倾一下跳到右倾，鼓吹“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向志提出的“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对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王明是反对的。当时我们在中央机关，知道王明把持长江局，和党中央、毛主席“闹摩擦”很厉害。在这场斗争中，记得少奇同志向我们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

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1938年11月，在击败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少奇同志尖锐指出："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全会的结论中肯定地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对。"我们当时看到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互相支持，共同斗争，是很感人的。六中全会以后，少奇同志立即由党中央派赴华中局任书记，和陈毅同志一起，对项英、袁国乎在东南局和新四军奉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行为坚决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所领导的新四军，在皖东、苏南和鄂中、淮北部分，深入敌后，不断发展，与项、袁直接领导的皖南部分因循迟疑，徘徊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皖南事变"一发生，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受命执掌全军，力挽危局，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少奇同志亲自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对项、袁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系统、深入地作了批判和清算。少奇同志为在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根据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方针，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大江南北，战斗在东海、黄海之滨，使新四军成为插在敌人心腹部位的一支劲旅；广阔的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扩大，不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943年，少奇同志又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整风运动中，他和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领导全党，对我党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总批判、总清算。他那犀利、深刻的批判，帮助人们提高了对王明路线实质的认识。当时王明很顽固，仍然吹嘘他那本作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纲领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标榜自己是执行所谓"国际路线"。少奇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本"罪恶的小册子"，是"穿上国际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外衣来进行欺骗"。少奇同志又在一次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讲话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戳穿了王明"国际路线"的内幕。原来，王明所谓的"国际路线"，只不过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个叫米大的人，扶持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领导权，让他大搞宗派活动，一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少奇同志还在一些会上多次谆谆教诲我们：一定要跟随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代表着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方向。在我党诞生22周年之际，少奇同志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并且指出：总结党的历史，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的环节和部门中去。"为了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少奇同志真是竭尽心血，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5月，我正在三五九旅南征途上，处在转战大江南北的斗争中，听到了关于党的六大会议的传达，无比激动和振奋。在这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上，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热情讴歌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我回顾历史，想到我们党诞生以来，历经艰难曲折，在战胜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才有了自己的领袖，有了一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紧密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有了这个坚实的核心领导，我们一定能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朱德同志等我党卓越的领导人，作为我党正确路线的共同制定者，作为毛泽东同志的

主要助手而载入

了党的光荣史册，是当之无愧的，也是林彪、“四人帮”歪曲、抹煞不了的。

我每当学习《毛泽东选剿》，看到书中有关肯定少奇同志的内容时，总是回想起往日熟悉的情景：少奇同志紧紧跟随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少奇伺志也有高度的评价。例如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由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定稿的。它肯定了少奇同志关于自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称他是“自区工作的模范”。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却攻击说这个评价是错误的，擅自推翻党在历史上正确地作出的重要决议。康生还重新捡起王明用来打击少奇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等三顶帽子，诬蔑少奇同志关于自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他们把少声同志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行动说成是“右”的，恰恰说明他们搞的是极左，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王明路线。

二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把它称为取得我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少奇同志长期领导党务工作，是毛泽车同志抓党的建设的好助手。为了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了培育千百万好的党员、他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部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并且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党的建设方面，他是有很大贡献的。记得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作讲演、写文章，发表了一系列阐发毛泽东同志建党思想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等，都是较有影响的名篇。其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我的印象最深。 1939 年 7 月，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期间，我在马列学院聆听他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听众都反映讲得内容丰富，有针对住，深入浅出，很受教益。讲演后，少奇同志撰写成的文稿由有关同志送呈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阅后，对文稿曾作了“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重要批示。8 月份，延安《解放》半月刊就开始连载这个讲演，各根据地纷纷翻印，广为传播。1942 年整风学习运动一开始，我们中央直属系统学委会制定的学习 22 个文件的学习计划中，就列入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同年 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走动的指示》中，就附发了中直系统的这个学习计划。《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批判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结晶，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报告的重要辅助文件。在整风学习中，它帮助了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加强党性锻炼，是一个很好的整风文献。少奇同志当时根关怀我们的学习，常和我们一起学习、讨论和谈心。他的亲切教诲，也使我加深了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理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开宗明义地要求大家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少奇同志有一次热诚地对我们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习毛泽东，不学王明。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他就有了真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有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的金钥匙。王明只是披了马列主义外衣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唱来好听，用了不灵。少奇同

志就是学习毛泽东的模范，他总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地学习马列主义，因而经常在解决重要问题上有独到之见。例如 1941 年 7 月，他在华中党校讲演了《论党内斗争》，党中央后来让延安新华社发电将全文转发给各根据地，按语指出它“理论地、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一个重大问题”，要求全党同志在整风学习中注意研读。这篇著作后来叉收入了延安解放社编的《整风文献》。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论述了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粗暴过火斗争。对这点，我感受特别深。早在湘赣苏区工作时，我和张启龙等同志都吃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头，曾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打成“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受到残酷迫害。六属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邀我们受害的儿个同志谈话，代表中央为我们平了反，我感到无比　亲切温暖。到整风期间，时隔几年了，少奇同志又找我谈心，了解当时一些冤案的具体情况，细问是否江有遗留的问题。他对所有受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都是十分同情和关怀的。他亲切地对我说：大家把党比做“伟大的母亲”，我们一定要把“母亲”的温暖和爱护送到每个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的心坎上。当我向他谈到湘赣区苏维埃主席袁德主、省委常委刘其凡等一批负责同志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无辜地秘密杀害的情况时，他悲愤而深沉他说：这是王明路线的又一罪恶！为了懂得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我们党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后再不许目无法纪，乱抓乱杀，再不许动辄乱开斗争会了。他真挚地对我说：首道同志，你我都受过打击，吃过苦头，应当看做是一种锻炼，这样，我们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就绝不搞王明他们那一套，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少奇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襟，使我难以忘怀。

多年来，广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热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甚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看到烈士的衣兜里也珍藏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血迹所染红。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本党的入门教科书，包含了马列主义真理，而真理是谁也扼杀不了的，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少奇同志这些革命论著，1961 年就指示要整理编选少奇同志的文章。1962 年修订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正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部分。康生当时主持了这项工作，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脸色突变，颠倒黑自，带头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状张挞伐，对 1962 年的修订再版也横加诬蔑。这说明，他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专家。

三

在建立新中国以后的 17 年中，少奇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密切配合，负责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担当着繁重的责任。他不辞辛劳，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地勤奋工作，使毛泽东同志能陷出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更重要的问题，解放以后，我较长时期在交通部和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工作，在和少奇同志较多的接触中，我印象最深、最受教育的是：少奇同志堰称是实事求是的模范，他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努力把各项事情办好。

少奇同志及时认真研究我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协助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历史转变关头，我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八大，少奇同志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在起草报告的这程中，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的意见作了认真的修改。毛泽东同志说他修改得很好，并亲笔在样稿的扉页上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题图，又在下边书写了报告人“刘少奇”三个大字。我们在八大聆听了少奇同志的报告，觉得很切合实际，有说服力，思想豁然明朗：我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称赞说，这个报告“是个很好的提纲”。现在，当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经历了一些曲折和挫折，经历了林彪、“四人帮”打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灾难，我们看到八大政治报告至今仍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更觉得少奇同志那种科学精神之可贵。

少奇同志对经济建设抓得很紧，具体指导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抓得十分细致扎实。他那种实于家的领导作风，深深铂刻在我脑中，至今历历在日。早在 195z 年，当我国社会上各项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时，少奇同志念念不忘船民，亲自写信给我，督促抓紧做好沿海和内河民仍的民主改革工作，以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他还亲自提名让中央组织部为我们调配有关于部。1956 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写了《论十大关系》，少奇同志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吃透精神，用来指导工作，把交通运输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各项事业都在发展，出现了运输能力与运输量不相适应的矛盾，运输战线面临着紧张局面。就在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亲自听取我们汇报，给予指导，少奇同志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具体帮助我们解决矛盾。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发展交通业和轻工业，说“交通和轻工业如不能适应，有一天我们会挨骂的”。少奇同志深入浅出地对我说：首道同志啊，你过去抓过枪杆子，现在让你抓国家建设中血液循环系统的总开关，一条条运输线就象人体的毛细血管，要是堵塞不通，升高血压也过不去。这形象的比喻，顿时增强了我的责仕感，使我们明确了交通事业的工作方向，当时各种运输的运价定得太高，影响了工农业产品交流，束缚了生产力。少奇同志指示要坚决把运价降低下来，不能只打财政算盘，并且抓住这个事实教育我们：运输业一定要为各部门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服务，各部门之间都要合作好，否则，就会违背了客观的基本经济法则，就是犯了大错误。他指出，为了迅速提高运输能力，尽快改变我国交通工业基础薄弱、工具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低的现状，就一定要抓紧学习，坚决采用外国先进技术，迎头赶上去。他并且一一和我们具体研究部署新建铁路干线，改造公路水运，建设民航和专业航空事业等等。他高瞻远瞩、信心百倍地说：我们要立下雄心壮志，一定要国内自己造飞机，自己造远洋海轮，发展远洋运输，总有一天把中国的旗帜打出去。他脚踏实地、细致入微地指示：对人力车、兽力车，独轮车、木帆船的技术改造，也尔可忽视啊，铁木轮改为胶皮轮也是一个进步，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现有民间运输工具的作用。他十分重视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专业干部队伍，强调说：

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包括解放前留下来的人员，他们百分之九十九在政治上是可靠的，要吸收专家参加部的领导，让他们挺起胸膛讲话是有好处的，要制定长远规划，以各种形式办学，大量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他说：要抓两条，一是把外行变为内行，一是把内行变为红色专家，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的亲自指导，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改进交通运输工作，而且使我们对于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必须掌握客观经济规律，有了比较深切的理解。少奇同志一直很关怀交通运输业，后来几次亲自代中央拟文，转发我们的报告，请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今天，看到我国铁路干线交叉纵横，公路水运四通八达，海运航空贯通全球，我总不能忘记，这里也倾注着少奇同志的心血。我总想到，我们搞经济建设，多么需要既勇于创新，又扎实前进的实干精神。

少奇同志一贯热烈拥护毛泽东思想，主张采取科学的态度，理论结合实际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记得在 1964 年，正当林彪鼓噪所谓“活学活用”，大搞生搬硬套片言只语的形式主义之际，我看到少奇同志给某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亲切谈心式的信，十分感人而又发人深省。信中恳切地指出了这位同志有过一次只摘引毛泽东同志讲话和上级文件而“讲空话”的错误，又循循善诱他讲清道理，教育他要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信中指出：不生搬硬套，工作才有创造，这就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懂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不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而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倾听他们反映的真实情况；要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凡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的，都应当学习。毛浑东同志看到这封信后，立即在批示中给少奇同志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这短短数语，是对这封信的很高评价，也是对少奇同志的科学态度，对少奇同志亲切帮助于部的领导作风的热情肯定。毛泽东同志还亲笔为信中一段内容作了一些修改。这段可视为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共同写作的精辟内容。其大意是：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再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一直到行通了为止。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今天，我重温少奇饲志的这封信，依然觉得亲切、深刻，是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当时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一起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述，又是多么启人心智，多么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学习。

少奇同志多次讲过，不自以为是，有错必改，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具有的态度。只要大公无私，就能胸怀坦白，有勇气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少奇同志在不少问题上，模范地表现了这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畏无私的气概。1958 年以后，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出现了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加上其它种种原因，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

重挫折，遇到了暂时困难。少奇同志在 1962 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地承担责任，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指出：要实事求是地向群众讲清楚，造成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各地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总结和纠正。他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改正缺点和错误，坏事就能变成好事，用不着悲观丧气，跌了跤子就爬起来，看清道路再前进。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肯定了少奇同志的报告，并且也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回顾当年，我们党正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以实事求是对待缺点锗误的态度和顽强战胜团难的革命精神，引导我国人民以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渡过了难关的。这表明我们党是伟大、正确、光荣的党，中国人民是英勇无畏的人民。

历史上任何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生中都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错误，个别的、一时的失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周总理说过，对革命领导人必须全面地、正确地作出评价，坚决反对把个别的、一时的并且已经改正、抛弃了的错误夸大为总体的、系统的错误。他还赞扬过少奇同志对自己个别的。一时的失误采取了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态度。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过，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有最大的革命勇敢，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虚怀若谷地听取其他同志向他提出的意见，很快改正、抛弃了自己个别、一时的失误，甚至在中央的会议上主动诚恳地作自我批评。我们听了，都很佩服，很受教育。有时，有的问题本来应当由中央或其他同志承担责任，他也常常主动分担责任。例如，1946 年 2 月 1 日，他在延安作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有“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的提法。在这之前，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些文件中已经有过这样的提法。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少奇同志也很快同党中央一起改变了上述估计，毛泽东同志也以自我批评精神，代表中央总结过经验教训。少奇同志到 1954 年，还主动对此事做过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曾经很谦虚他说，他自己并不是没有“过”，把“坏”的就写在少奇同志的账上，这是不公平的。毛释东同志和少奇同志当时这种互相爱护、争担责任的高尚风格，是多么感人肺腑啊！和这种高风亮节成为鲜明对照，林彪、“四人帮”这伙惯于文过饰非的家伙的嘴脸，又是显得多么卑琐！他们利用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蓄意对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则是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他们妄图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并统统打倒，用心又何其险恶！

在“文化大革命”中，少奇同志虽然饱受中伤和诬蔑，不幸过早地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是紧随毛主席的，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功德垂青史，昭示于天地人间。他的革命精神，会在党和人民中间重生。

1980 年 3 月作

1987 年 7 月改

逝者和生者的欣慰

邓力群

面前是刚刚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少奇同志严肃恳切的神情，略带湖南口音的、缓慢而清晰的话语，与编辑这本书有关的往事，一一涌在了眼前。

那是 1960 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定以后，毛泽东同志建议编辑出版少奇同志的选集。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少奇向志总是表示，党的领导人中间，除《毛泽东选集》之外，不要再编个人的选集了，可以考虑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文集，其中收中央可以公开发表的文件，也收毛泽东同志之外其他领导人的一些讲话、文章，比如恩来等同志的一些讲话、文章。此事延宕多年，终未实现。毛泽东同志再次建议编辑出版少奇同志选集之后，这年冬天，中央书记处采纳这一建议并为此专门作了决定。少奇同志组织观念很强，尊重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时也只　好表示同意了。

第一件工作，是从少奇同志文稿档案大约三百万字中，选出一个可用文稿的目录。卷帙浩繁，年代久远，考虑当时背景已属不易，适应当前情况更费斟酌：终于有了一个选目，而少奇同志却离京南下，第二次往湖南调查去了。编辑小组几个人专门列长沙向他汇报。他耐心听取编辑小组的意见，提出还可以删去一些什么篇目、增加一些什么篇目，反复表示：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　中于研究当前情况和解决当前问题，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不过既然书记处已经作了决定，工作照常进行　就是了。

1961 年 5、6 月间，少奇同志从长沙回到北京，编辑小组同志第二次向他汇报。汇报中说到，现在看来，有些文章中的个别提法需要作必要的修改。比如 1943 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区别真假、两派马克思主义者，是很重要的，但是又把陈独秀、彭述之和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把李立三路线，把内战时期的几次“左”倾错误，统统概括为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孟什维主义用于陈独秀是可以的，用于内战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用于王明，就同 1945 年六属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王　明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提法不一致了。少奇同志说，看来的确需要修改，索性题目也改成《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文章内容，除了上边说到的，恐怕还有些地方需要作相应的修改，让我们再斟酌一下。编辑小组同志又提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理论修养的部分讲得不够充实，是不是需要作点补充。少奇同志也同意了。他还指出，对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这个提法，也要进行恰当的修改。

在谈话中，少奇同志再次表示，他要集中精力抓当前的工作，确实没有心情重读过去的文章。他同时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过去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经过这么多年了，现在党内外、国内外人们还记得起、愿意看、能看得下去，觉得对自己还有帮助的，主要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什么呢？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在党的建设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着重是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少从每个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共

产主义道德品质，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这些路线、方针、攻策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贯重视制定各个时期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重视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根据多年对党内主活的观察，对党员种种表现的观察，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总结。

在编辑小组遵照少奇同志意见继续工作的期间，他又到东北林区调查了一次。他说，林区工作很重要，但是历来很少有中央领导同志去那里深入了解情况。从林区回来，由于旅途劳顿，中央批准他到广东短期休息。编辑小组希望利用他休息的时间，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对文稿进行一次系统修改，也得到了他的同意。此时正值中央要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编辑小组来到广东，他却已经匆匆返回北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这样，编辑小组就在广州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初步完成《刘少奇选集》（上卷）的校正、修改、补充工作。下一步就是送他审阅了。

党内外同志得知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少奇同志选集的消息，都很高兴。七千人大会期间，很多同志指出，“大跃进”中有的党员犯错误，在党和群众关系的问题上出乱子、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党性，放松了思想意识的修养和理论修养。考虑到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仍然笨其重要。因此建议，如果选集不能很快出版，请少奇同志先把有关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讲话、文章一篇篇审定，公开发表、出版，配合大会精神的传达和贯彻。少奇同志的注意力，还是在解决当前工作中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示，要从头到尾看过去的文章，一下子转不过来，但是听到到会同志的强烈反应，也还是同意陆续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和《论党》。他过去就说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 年初次发表的时候，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引证毛泽东同志关于党员修养、党性汲炼方回的意见。其实，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经验，首先是由毛泽东同志很好地总结了的。这次，他又特别强调，要编辑小组一定充分引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稿子进去，他前后看了多次，对编辑小组作了补充的理论修养部分不大满意，觉得只引用了列宁的话和外国党的经验，没有阐述我们党怎样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创造的许多新鲜经验。他自己动笔写了书面要点，把编辑小组的同志找去，由他口授，笔录了一大段话。这臣经过整理，又由他反复修改，已经写入现在稿子的第四节，就是新版单行本第 24 页第 16 行到第 28 页第 4 行的四个自然段。少奇同志结合我党斗争的历史和党内一些同志的具体情况，深刻地、循循眷诱地阐述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革命坚决、斗争勇敢，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品质，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如果没有马克思

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修养，要在革命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上，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要在情况复杂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在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都能够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都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他分析了当时党内对待抗问民族统一故线的“左”的或右的两种错误态度，认为都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辨别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显著例证。

少奇同志对全文进行过三次修改，然后交代编辑小组把稿子报送书记处审查批准。书记处同志同意后，少奇同志又改了几处，表示没有什么要改的了，可以交给主持人再最后看一遍、定稿。1962 年 3 月 1 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

这年秋天，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接着是八属十中全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党在这段工作中的教训，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结论。党中央当时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论断，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少奇同志也是有责任的。但是有一个历史事实却应该为后人所知道，就是党内一些同志，包括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的少奇同志，不隐讳地表示了一种忧虑：现在提出阶级斗争，经济调整怎么办？阶级斗争和经济调整怎样相结合？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大家都去搞阶级斗争，经济调整的工作没人做了？毛泽东同志在十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考虑和接受了这些意见，表示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讨论阶级斗争，批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右的倾向，可是这个问题在全会上讨论就行了，不要向下传达。要接受 1959 年的教训。1960 年在中央全会上批评彭德怀同志，如果不往下传达，层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中断纠“左”的过程。所以，这次全会讨论了就行了，回去不要层层向下传达，以免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经济调整工作用原来计划进行。

七千人大会以后，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一直在主持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使我国国民经济逐步开始好转。到 1965 年，调整仕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此期间，少奇同志曾提出不少切中时弊、具有远见、经受匪了实践检验的重要意见。与此同时，少奇同志还参加了农村四清的指导。1964 年下半年，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他比毛泽东同志的估计还要严重。毛泽东同志批评过他，他接受了批评。但是在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随声附和，表示了明显的保留态度。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谁能想到，《刘少奇选集》（上卷）的编辑出版工作，由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开始，而开始即等于结束。编辑小组同志把其他稿子陆续整理出来清他审阅，他总是说，放下吧，有空一定看。一篇、两篇、三篇，都是如此。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少奇同志受迫害、被囚禁、被剥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选集编辑出版工作非但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反而成为林彪、江青强加的一条罪状了。如果不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没有党的

三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五中全会为少奇同志平反和重新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决定，历史的真相岂不是要继续受到蒙蔽么？

现在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情况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比当时更加科学和完善，然而作者却不幸去世，再也不可能亲自对文稿进行修改和审定了。少奇同志历来处事严谨，一丝不苟，倘若在世，一定会充分考虑历史的进程，对已经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完善的地方进行修改、补充，选集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以至结构、文字，将无疑比现在的本子更好些。这次重编，为节约篇幅，去掉了内容大部分重复的几篇，考虑到《论党》已经出版单行本，只节选了其中三个部分；增选了一些电报、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要电报；凡少奇同志生前发表过或已有手稿的，均保持原貌，只做少量文甸和史实的校正。这样，象《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只在题解中说明孟什维主义系泛指左右倾机会主义，题目和行文就不再改动了。

尽管如此，由于党中央的领导，由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勤奋扎实的工作，这本书还是集中了少奇同志建国前最好的讲话、文章，确切地反映了他对党、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尤其是在党的建设、自区工作、工人运动等问题上，他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多创见。《刘少奇选集》（上卷）记录了建国前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总绪了党的丰富斗争经验，尽管今天看来个别地方有些不足，但是，总的说来，无损千作者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业绩。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正直的

人，都可以从中获得精神的营养。

从 1960 年开始着手编辑，到 1982 年正式出版《刘少奇选集》（上卷），居然经过了二十二年。其间变故叠起，曲曲折折，文稿、它的作者以及参加编辑小组的人，都在党、国家和人民的灾难、斗争及胜利中，经过了一次一次的考验。编辑小组的成员中，负责白区工作、国际问题文稿的姚臻同志，负责全书注释工作的王宗一同志，和少奇同志一样，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而死，使我们在事成之日的今天，每一念及，悲痛不能自禁。至于当时在理论上、政治上骗取了少奇同志信任并被委以主持选集编辑工作重任的人，则已经露出了原形，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人们对于少奇同志，对于收进本书的文稿，经历了一个认识、再认识的过程，少奇同志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的贡献，也经历了一个得到爱戴、尊敬和承认，受污辱和受批判，终于又得到爱戴，尊敬和承认的过程。历史无情，好事多磨，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党和人民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工作的深刻变化和伟大成果，不也凝结着少奇同志的心愿，融人了少奇同志的心血吗？这本书终于能够完成编辑工作并正式出版，是对于逝者的安慰；它的留存，叉表明少奇同志仍然活在我们心中，这就尤其使生者感到欣慰了。

少奇同志说得好：“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　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刊益，都要把党的利益腰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因为他没

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错误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仰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他这样要求和教育党内的同志，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我们学习的表率，即使是功勋卓著，居于领导地位，已经年过花甲，想的仍然是党的当前工作、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而不是整理个人的文集。他不耻于作恳切的自我批评，随时改正自已的缺点错误，在蒙受历史上罕见的、长期的委屈和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也决不沉迷于个人的恩怨，决不放弃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初衷。他不是专门著书立说、咬文嚼字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战斗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自己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我们有一些同志可以讲、可以写成套的大话和原则，要人家这样做、那样做，但是却不大想自己是不是也准备做，是不是能做得好，不大想若干年后如果有人拿自己的话和自己的行动比较，将何言以对。鲁迅先生曾经批评有的读书人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几，虽有“高论”，能说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住，将来想到时会脸红。”少奇同志和这种人相反。他的一生，他的每一言行，都经得起最严格的检查。他无需愧对党和人民，无需愧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写下的每一行字。

高风亮节，长存人间。经过半个多世纪艰难复杂斗争严峻考验，少奇同志在政治上、理论上的贡献，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作

为我们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已经在历史上

的的确确地站住了。他和他的著作，将永远激励我们奋进。我们要学习少奇同志的文章，尤其要学习他的为人，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以此表示对他的最珍贵的纪念。

1982 年 1 月作

怀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

薛暮桥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光辉形象永远铭记在全国人民心中。

白区工作的模范

我初次见到刘少奇同志，是在 1941 年 2 月皖南事变以后。那时，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已在苏北盐城建立了新四军新的军部。皖南事变以前，我奉原军部之命，与宋裕和、汤光辉同志率领一千几百名军部文职人员撤离皖南，穿过国民党军队防区，行军几百里，经我军苏南根据地，再穿过日军严密封锁的铁路和长江到达苏北。当我们在苏北登陆时，正值日军扫荡东台，陈毅同志亲率大军进行反扫荡战斗。我在战火纷飞的海安附近见到陈毅同志，他向我询问了苏南根据地的情况，并拿出一封信来，叫我到盐城当面送给刘少奇同志。我到盐城后立即去见少奇同志，他亲切地询问了我们从皖南到苏北的艰苦旅程，并向我介绍了新四军现在的情况，最后决定派我到抗大五这年夏季，日军扫荡盐城，我随五分校在盐城、东台以东海边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反扫荡战争。战争结束后，抗大五分校回到军部所在地阜宁附近。这段时期，少奇同志常到华中党校去作报告，讲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问题。

少奇同志在一个多月中作报告十几次，我每次都去旁听。在此以前，我虽然读过斯大林的关于战略和策略的文章，但那只是一般理论，象少奇同志这样结合中国实际来讲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对我和其它听讲的同志来说，都是第一次，因而感受很深。记得少奇同志把中国革命分成三个战略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时期，第二阶段是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第三阶段是西安事变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少奇同志详细分析了第二战略阶段的形势，指出，在白区，党应当采取同在苏区完全不同的策略。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我衣自区工作多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在我脑子里引起了许多疑团。听了少奇同志的报告，我提高了认识，这些疑团都解除了。1945 年 4 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如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一样，是一个模范。我认为这个评价，少奇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此后不久，全党开始整风学习，我被编入有 200 人参加的高级学习班。高级学习班除学习党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外，还印发了二十几个内部文件，其中有少奇同志写的《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三篇文章。少奇同志在这些文章中所讲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实例，都是我在白区工作时耳闻目见的，但过去并不知道这是战略策略的错误，少寄同志的分析使我茅塞顿开。少奇同志说，白区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那些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利用工厂法、工会法上那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要求实现，并就此揭破国民党的欺骗。这一点使我深受启发。

从 1934 年到 1937 年，我和钱俊瑞、孙冶方等同志在上海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中国农村》月刊，曾经批判当时很有影响的各派乡村改良主义运动。西安事变后，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发起联合各派乡村工作者组织杭日统一战线，把许多改良主义团体中的进步青年吸收到我们的旗帜下来。我们还曾经利用国民党土地法中有关减租、减息的条文，号召减租、减息。我们明知国民党是不会准许减租、减息的，但这可以动员农民，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当时我们在白区不能号召土地革命而只能利用“二五减租”口号，这究竟是不是“改良主义”，自己也是有顾虑的。读了少奇同志的文件，我就禁不住写了一封长信，一方简报告我们对农村改良主义团体的批评和联合，另方面认为在没有条件进行土地革命并且不准宣传土地革命的自区，可以利用土地法中的条文，动员农民要求减租减息，进行合法斗争。当时少奇同志已经奉中央命令准备去延安，没有时间同我面谈，但仍抽出很宝贵的时间写了约有三千字的一封长信来答复我的问题。

少奇同志在复信中肯定我们在白区对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批评和团结是正确的，他指示说：我们应当动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员参加到改良主义团体中去，成为他们中间一个较有远见的派别，在他们的内部去影响他们，起推动作用，而且可以经过改良主义团体去组织农民。在反动统治时期应当加入改良主义团体，而不应当与群众性的改良主义团体对抗。对改良主义团体中的上层分子，只要他们同情抗日，也应当争取他们。

求没收地主的土地时，“二五减租”的口号是反革命的，会使群众迷失方向。在群众还不可能起来要求没收地主土地的自区，“二五减租”口号可以用来发动群众，引导群众走向土地革命。当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进行革命进攻的地区，我们应当利用“二五减租”的口号来团结和教育群众，建立公开或秘密的联系，这是把它当作策略口号来利用。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我们党不能不放弃土地革命的战略要求时候，“二五减租”就成为日前的战略口号之一，而不是以前的策略性质了。他说，必须把这些问题彻底弄清楚，才能算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少奇同志分别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把“二五减租”口号提到战略策略的高度来认识，对我是根深刻的教育。

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探索和指导

1948 年我被调到当时在阜平西柏坡的党中央机关工作，又能同少奇同志经常见面。当时少奇同志正在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问题。1949 年 2 月 8 日，我在西柏坡听到少奇同志所作《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还要几年才能彻底完成，因此现在革命的性质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要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内发展，但要加以限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但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有斗争，资产阶级是为资本主义而斗争，无产阶级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他还指出，将来对资本家一般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说，无产阶级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减少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的破坏

性，增加其建设性。没有这种监督，资产阶级不会为国家服务。少奇同志的这次讲话，和同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少奇同志在这次讲话中，特别详细他讲了合作社问题，这是从我国当时还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实际出发的。他说，有的同志问，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何者重要，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何者重要。不要这样提问题，两者都重要。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应当互相结合，建立同盟。我们今天要同资本家竞争，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用什么办法领导市场，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通过供销合作社，用商业办法战胜资本家。当时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能够经常见面，谈话的机会也比较多。少奇同志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特别重视中国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谁能够领导几亿小生产者，而供销合作社是组织和团结小生产者最好的工具。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对付汪洋大海的小生产者，这比对付资产阶级还困难得多。所以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特别重视商业。列宁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却通过广泛建立供销合作社而顺利地解决了。供销合作社通过商业把小生产者（手工业者特别是为数更多的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割断他们原来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能够战胜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极重要的保证。在少奇同志启发下，我在 1949 年春曾经写了一篇《论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送给少奇同志审阅。由于北京解放，我们都忙于迁往北京，这篇文章一直埋藏在少奇同志的文稿档案中三十多年。直到 1987 年春才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发现并送给我。这篇文章使我重新回忆起当时少奇同志对我的教导，并加深了对刘少奇同志的经济思想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供销合作社在全国范围迅速发展，1950 年 7 月，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我和当时的合作局长孟用潜同志到少奇同志处去汇报会议情况，并请他来作报告，少奇同志欣然允诺，于 7 月 25 日到会作了报告。在报告中，他重申了供销合作社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当时许多供销合作社还没有走上正轨，合作社的方针还不明确。他还指出，供销合作社应当是半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之上，这一点不同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另一方面又取消了对劳动人民的中间剥削，因此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他说，供销合作社应当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构，这样才能成为国营经济与个体经济之间的桥梁，并把象汪洋大海那样的个体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少奇同志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 年上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些人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纷纷向海外逃跑；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工人大量失业。当时许多干部怕立场不隐，不敢同资本家接触，少数干部甚至用类似在乡村中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有些工厂的工人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资本家出于无奈，有求必应，准备关厂。在这样情况下，这年四五月间，少奇同志到天津去同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谈话，宣传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宣布我们党不但不会没收民族工商业，而且要保护他们，使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并欢迎私营工商业能够继续发展，私营工商业发展起来，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将要得到国家的鼓励。同时又同工人群

众谈话，劝说他们同资本家合作，说你们虽然受资本家剥削，但在目前情况下，被剥削比失业好。新中国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必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才能避免剥削。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谈话，很快传到北京，此后又传到上海，对稳定工商业资本家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回北京后，又召集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谈了上述意见，希望大家本此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作宣传。我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认为他的讲话很及时，对恢复生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时谁都没有想到，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以“鼓吹剥削有功”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当时党中央认为我国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说我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话说：“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这当然不是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党中央的共同意见，现在看来仍是完全正确的。1949 年我国国营工业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只占 26.3%，国营零售商业到 1950 年也只占 23.2%，我们还必须广泛利用私营工商业来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收私营工厂，由于工人阶级不会管理，使工业生产严重衰退，后来不得不提出租让制，吸引国内外资本家来经营停工的国营工厂，但收效很小。我国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私营工商业不但没有衰退，且有相当大的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 1956 年，原来私营工业的产值比 1949 年增加将近一倍，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显然是十分有利的。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超过了私营工商业。私营工商业有相当大一部分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变化，1953 年，党中央才公开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并于 1954 年经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讨论，载入了我国第一部宪法。中央原来估计，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才能完成，结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完成了。现在看来，有些方面是过于急了一点。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少奇同志提出要保留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让他们来“钻社会主义经济的空子”，满足国营经济不可能满足的社会需要。空子钻得大了，国营经济就来填补，让私营企业再去钻新的空子。少奇同志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可惜没有被采纳，“文化大革命”中还被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贡献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6 年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也是正确的，可惜的是，后来党在经济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失误，1958 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同时又由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

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以致 1959、1960、1961 这三年，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继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1959 年春天，毛主席自己曾批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并对人民公社制度作了若干修改，取消强迫农民到公共食堂吃饭的办法。这年 7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庐山会议，前期重点仍然是批判“左”的错误，但到后期，毛主席突然把重点转向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接着在全党展开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许多敢讲真话的同志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使一度稍有收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重新泛滥起来，使原来就遭遇困难的国民经济更加困难，并且日益严重。

196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中间有很多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严重减产？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吃不饱，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少奇同志的这些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七千人，这是建国以来我党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毛主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中央组织了一个有十儿人参加的班子起草文件，决定发给大家讨论。报告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虽然作了一些检讨，但为了避免给“三面红旗”“抹黑”，对困难的原因仍然说是主要由于三年自然灾害。这种说法引起了与会干部的不满。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 21 人的起草委员会，写出了书面报告第二稿。会上株印发书面报告外，少奇同志又作了口头讲话。口头讲话对形势的估计比书西报告更接近于实际情况，例如书面报告上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圃报告上没有作判断。”口头讲话则说，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成绩和缺点哪个是主要的，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到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少奇同志除了指出经验不够外，还指出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某些方面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讲话，在今天看起来仍有不足之处。但在当时，已经使毛主席感到不快。林彪看出了这一点，他最后一个在大会上发言，说所有的困难，都是因为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发生的，以此来博取毛主席的欢心，加剧了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少奇同志听取了财政部和其它有关部门的汇报，发现经济困难实际上比会上讲的还要严重。1961 年工农业产量都远没有完成调减后的计划，钢产量计划虽然已从 1960 年的 1800 多万吨调减到 1400 万吨，而实际只完成了 800 多万吨。1962 年 2 月，少奇同志在中南海西梭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上，陈云同志讲了困难的严重性，指出，不下决心彻底调整计划将会更困难。少奇同志十分赞同陈云同志的意见，要他对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讲一讲。3 月 26 日，陈

云同志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题为乏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讲了农业严重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钞票发得大多、城乡人民生活下降等几个问题。他指出，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 年的粮食产量同 1957 年比大约减少 800 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也减产很多。他估计今后几年每年只可能增加 200 亿斤粮食，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大约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他建议把从 1961 年开始的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五年才是发展阶段。陈云同志讲了许多同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对扭转经济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少奇同志很尊重陈云同志，亲自到陈云同志家里去请他出来挽救经济危局。他说，中央已经决定改组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主持，负责重新调整经济计划。中央财经小组在 1958 年就已成立，过去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并无实权，这次要由中央财经小组来提出调整计划的建议。我作为中央财经小组的秘书，参加了这个建议的起草工作。这个建议按照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的指示，除大幅度调减了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外，建议把“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数以万计的小高炉和大部分“小土群”工厂实行“关、停、并、转”，节省出煤炭和其它原材料来保证大工厂的正常生产。建议让一大批盲目发展的地方建设项目下马，下马的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免浪费人力物力。这个报告在当时很可能被认为违反“总路线”、“大跃进”的“毛主席路线”，风险是很大的。由于得到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的大力支持，经当年 5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由少奇同志批发全党贯彻执行。

1962 年 5 月，户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会上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城市里要下放两千万人，工业要继续往下减，基本建设要原地踏步。……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对困难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缩短工业战线，是为加强农业战线。只有这样的步骤，才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步骤。”在少奇同志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使国民经济后来得以较快地恢复和发展。

勤于学习勇于改革

少奇同志是很重视理论学习的，他自己就熟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著作。1941 年整风运动中，他在《答宋亮同志》这封信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比较迟，又因党要参加激烈的革命斗争，不能抽出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理论研究，几次失败都是路线指导上的错误所造成的，因此学习理论十分必要。

在 1959 年夏天举行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年 11 月，少奇同志到海南岛去休养，他决定利用这一个月假期认真读书。他要我和王学文同志到海南岛去一同学习；参加学

习的还有陶铸、林李明、林树兰、王光美等同志，我们上午读书，下午逐章讨论。讨论时先由我和王学文同志讲一讲本章的要点和我们的看法，接着大家讨论。少奇同志在讨论时常常阐述他自己的观点。他结合马列著作，比较苏联革命和我国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我感到少奇同志不愧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时，庐山会议开过不久，反右倾斗争正在全国展开。我由于写了《一年来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正在国家经委党组作检讨，所以初未学习时心中忐忑不安。而少奇同志高瞻远瞩，畅谈从资本主义经过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并没有受庐山会议上“左”的思潮的影响。

同年 12 月，毛主席也和邓力群、胡绳等同志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久，李富春同志在上海组织国务院各工业部长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学习同一本书。我奉富春同志之命，到上海去传达少奇同志在海南岛学习时的发言（现在这个传达稿保留在中央党校）。1963 年 2 月，周总理又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会，参加的有国务院十几个部的部长和华南各省委的第一书记，会上除印发了少奇同志海南岛学习会的传达稿外，还由胡绳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学习中的发言。毛主席批评这本教科书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许多同志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急于过渡的过“左”思想影响，在不同程度上轻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少奇同志刚强调重视客观规律。他说：“苏联教科书是一本好书，但有缺点。苏联的同志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去看别的国家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当警惕。把自己的经验看成是普遍真理，而把别人的经验看成是特殊情况，这样的看法是片页的。”

少奇同志不赞成把社会主义当做一个固定不变的历史时期，而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并把这个过渡分为若干小的过渡。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应当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必然要保留许多从资本主义社会遗胃下来的东西，如商品货币关系。他指出：即使在两种所有制发展到一种所有制（全社会公有制）以后，只要分工和按劳分配存在，商品就不会消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各国营企业之间相互交换的产品已经不是商品，少奇同志认为它是“特种商品”，在计划分配外还可以进行市场交换。

少奇同志在谈到速度和比例关系时候说，高速度必须按比例，有人要百废俱兴，结果什么都满足不了。过去几年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并不错，但工业搞得多了一些，重工业的比重也大了一些，失去了合理的比例关系。不多又为什么要下马？因此现在要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搞重工业的方针。少奇同志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以钢为纲”的“大跃进”时期，是难能可贵的。我当时就是由于提了类似的意见项在国家经委党组检讨，听了少奇同志的这些话，我忐忑不安的心情也开始平静下来了。

少奇同志平易近人，在学习中从来不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页是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有一点好的意见就予以赞扬。第一天发言时，我还有点拘束，第二天起就畅所欲言了。

在读书会上，少奇同志敞开思想探讨理论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注意解放思想。1961 年货币发行过多，生产下降，自由市场物价猛升。少奇同志邀李先念、姚依林、王磊同志和我去讨论物价问题。他说，物价上升的主

要原因是货币发行量超过市场流通需要，现在货币超过流通需要大约一倍，由于国营商业价格固定不变，多余的货币都去冲击城乡自由市场，因此自由市场的价格不是高一倍而是高七八倍。国营商业能否提价一倍，使货币流通需要增加，自由市场价格下落？讨论结果，大家认为，国营商业提价一倍，职工的工资和农产品的计划收购价格也必须提高一倍，这样叉需要增发货币，势必引起物价和货币的轮番上涨。少奇同志说农民的农产品除计划征购部分外部高价出售，而国家出售的工业品是低价，这是不等价交换。他建议，国家向农民征购多少农产品，就低价卖给多少工业品，其余部分的工业品向农民高价出售，“低对低，高对高”。后来，国家采取这个办法多回笼了许多货币。在城市中，国家的许多种商品实行定量供应，同时敞开供应若干种高价商品，也回笼了大量的货币，终于促使城乡自由市场价格下降。

1962 年春的一天我正在向少奇同志报告物价问题的时候，邓子恢同志来了，他向少奇同志报告说，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建议广泛推广。当时毛主席正在推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不可能同意包产到户，少奇同志说可以先在安徽试行，待有明显效果后再向其它地区推广。子恢同志说，安徽省委已经作出了“包产到户是方向往错误”的决定。少奇向志说安徽可以继续试验包产到户，要办公厅的同志通知安徽省委取消那个决定。这年 8 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就被当做“复辟资本主义”而被取消了。和包产到户一道被批评的“三自”是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当时陈云同志是主张扩大自留地的，少奇同志是主张扩大城乡自由市场的。在这以前、城市中的自由市场大多数被取缔，乡村中也受到严格限制，1961 年，全国除北京外，所有大小城市都开放自由市场，北戴河会议后又不得不加强对城乡自由市场的管制。

1960 年初，国家经委向少奇同志汇报物资分配问题。汇报中说，我国的生产资料根据苏联专家建议实行计划分配制度，分配计划决定后，按计划把各种生产资料分配到中央各主管部门，通过订货会议，再由中央各部门分配给各省市的厅局，然后分配到各企业，基本上是按条条分头组织订货，以致许多物资分散积压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的小仓库中，不能互相交换，造成很大的浪费。少奇同志指示要改革生产资料分配制度，由国家经委设立物资总局，在总局统一领导下建立各级物资供应机构，把小仓库的物资集中到大仓库来，实行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原则。同年 4 月，少奇同志详细审阅修改了国家经委起草的改革物资分配制度的决定（草案），于 5 月 18 日批发各地执行。1962 年和 1964 年，少奇同志又两次指示国家经委：进一步改革物资分配制度：1964 年，他建议把物资总局改为物资部，设立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实行计划分配和市场交换相结合，并口头指示要把构资部逐步变成“第二个商业部”。这项改革正在逐步推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改革措施被视为修正主义，遭到批判，物资分配制度又退回到老路上去了。现在我们进行物资管理制度的改革，仍然是走少奇同志所指示的道路。

关于改革劳动制度的问题，少奇同志从 1957 年起就不断提出意见。1964 年，他再次提出：“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这种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他还提出，季节性生产的工厂可以用季节工，有工作就来，没有工作就回家。根据少奇同志的指

示，劳动部规定此后新招收工人试行合同工制度，废除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制度。当时称为“新人新制度，旧人旧制度”。这个新制度也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被取消了。从 1980 年起，上海等地有少数行业又开始实行合同工制度。1983 年 12 月，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度的通知》，到 1985 年年底，全国已招收合同制工人 332 万人。1986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到 1987 年底，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招收合同制职工已达 691 万人。事实证明：实行这个规定，我国的劳动制度就可以走上新的轨道了。遗憾的是，少奇同志这个有重要意义的建议，推迟了二十几年才得以推行。少奇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不但坚持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而且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抵制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在白区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由于他具有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在抗日战争前期就较早地对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作出科学的总结。解放后，他在制定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主张保持一点私营经济。在大跃进中，开始他虽然顶不住一片狂热，但后来较快地发现了问题，在 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会”和 1961 年 5 月、1962 年 5 月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比较实事求是地批评了“大跃进”的错误。“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和周恩来、陈云同志共同出来挽救“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危局，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少奇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7 年 5 月

卓绝的贡献学习的典范

李波人

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是在豫皖苏边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六支队(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时间是 1939 年 11 月初。部队驻在安徽省涡阳县北 40 里新兴集。

我们这个部队，是根据 1938 年 5 月徐州失守后，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向华中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建立起来的。部队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出发时只有 300 多人，到豫皖苏边区，不列 1 年时间，就发展到上万人。面对着日本侵略军和汉好武装的进攻，背后还有国民党流亡政权和反共武装的捣乱，全军上下和全体人民同仇敌忾，抗日热情十分高涨。虽然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是我军著名的青年将领，但是部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新的，战士是新的，党员、党组织是新的。在党内、军内部还没有形成一套能够协调内部、统一动作的工作方法，有多少同志因为不懂政策，不懂纪律，不会工作而苦闷。

正在这种情况下，象一阵春风似的传来了少奇同志来到的消息。“ 胡服（少奇同志的化名）来了！”在干部中纷纷议论着。支 队党委开了欢迎大会，彭雪枫同志介绍少奇同志和大家见面。少奇同志给我们作了长篇讲话。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华中地区的抗战形势，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加强军事训练，加强政治工作，多打胜仗，巩固部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少奇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袖，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有了毛主席的领导，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一定能够胜利。

少奇同志那穿着灰粗布军衣的修长身材，严肃而生动的谈锋，分析判断客观事态的严密逻辑，党的事业必胜、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心，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少奇同志当时的形象和欢迎会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少奇同志在新兴集同我们住了半个月左右。他经常彻夜和支队党委的同志们研究抗日战争的形势，豫皖苏边区敌、伪、顽、我的斗争形势，对于党的建设、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培养干部、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雪枫同志会心地笑着对我说，少奇同志这一来，许多根本性问题都解决了。的确，淮北区党委建立起来了，县政权更加充实了，各种群众组织陆续建立起来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也成立了，豫皖苏边区的面貌为之一新。

组织纪律的修养

少奇同志曾多次给干部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给我们讲组织纪律的修养。演讲的题目，是《自由与必然，强迫与愿意的统一》，是针对当时广大青年干部的思想问题讲的。少奇同志首先用通俗的语言，严密的逻辑，辩证地论证了党组织是怎样的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论证了为什么党必须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一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

说，人的行动都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当人们对于决定他的行动的客观条件没有正确认识的时候，他的行动虽然是自愿的，但又是被迫的，处于被动状态，往往犯错误。当人们正确认识了客观条件的时候，他的行动就主动了，自由了，错误就少了。少奇同志通俗地解释说，工人作工，农民种田，我们参加抗日战争以及做各种工作，都是被迫的，但又是自愿的。大家参加抗日，是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大家到新四军来受共产党的领导，又是自愿的。难道是谁强迫你们找共产党、新四军的吗？这就是强迫与自愿的统一。接着，少奇同志又说，各种工作都是需要人做的，党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当然要考虑到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征求个人意见。但是，当着某一件工作急需要人做的时候，就往往直接命令你去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不服从的话，党就给你纪律处分。那么，怎样去解决个人愿望与组织决定之间的矛盾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切具体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务的水平”。在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个人应当首先考虑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民族解放事业的需要。这样，你就会努力学习，做好这项工作。当你掌握了这种工作的规律的时候，你就自由了，就会做出成绩，从而热爱这一工作，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贡献。恩格斯说：“自由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农民有种田的自由，因为他掌握了作物生长的规律；会游泳的人有游水的自由，因为他掌握了水的规律，共产党有抗战的自由，因为毛泽东同志把握了抗日战争的规律。

少奇同志在料峭的寒凤里，给我们讲了一整天。讲话的时候，不时回头转向主席台上坐着的领导同志，用商量的口气问他们：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呢？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有的时候，甚至问起坐在桌边做记录的同志来了。

由于少奇同志是经过调查研究，针对我们的思想问题讲的，态度那么诚恳，悟气那么亲切，大家反映“真解决问题”。1954 年七届四中全会后，有人曾建议少奇同志把这稿子重新审改校阅，和“思想意识的修养”部分合并印行，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一部更完备的党员必读的书。他漠然地回答：“哪有那个时间。”是啊！少奇同志，时间对于你来说，永远是太少了啊！

亲切的教诲严格的要求

1953 年 3 月，我调到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工作，是多么高兴啊！

少奇同志一向关心干部，对于我们这批新来的人，也不例外。1953 年 5、6 月间的一天，少奇同志召集我们全体成员讲话。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少奇同志要求我们要“坐得住”，“靠得住”。少奇同志解释说，“坐得住”就是安心工作，安心在中央机关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靠得住”，就是要遵守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他说，你们听到的多，看到的多，不许随便乱讲。凡是中央没有公开发表或者下达的决定，不许乱传，凡不是中央规定你们工作范围内的事，不许擅自去办。你们有意见，可以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提出，可以向我反映，也可以在内部讨论，但就是不许乱传。少奇同志谆谆告诫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中央服务，不要打算在中央机关为自己搞出点什么名堂来。如果企图利用党给你们的工作条件为自己捞名誉地位，那是要摔跤子的。中央给你们最好的工作条件，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或爱

好钻研一门科学，搞出成就，党的事业范围很大，各行各业部需要一批有马列主义修养，有真才实学的专门家。

少奇同志讲话的神态，仍然象我初次见到他那时一样，既严肃，又亲切，语气是那么肯定。他对我们乍到中央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寄予多大的希望啊。

少奇同志对我们出去参加会议，进行调查，定了一条规矩：参加会议只许听，不许发表意见，人家征求意见，也不要表态。但是，部门领导同志找你个别谈话，你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因为在这种场合他是你的上级，你们是上下级关系。出去调查。要有提纲，可以找干部、群众谈话，提问题，请人家答复。但是，不许对所在地方的工作指手划脚。有意见，可以报告中央，也可以向他们的上级领导汇报自己的看法。

1954 年秋，少奇同志指示我们办《情况简报》，要求我们用最朴素的语言如实地反映情况，不许掺亲自己的任何主观评论。他说，你们的任务是向中央反映客观情况，为中央分析判断问题提供依据，如果你们掺杂自己的意见，那就搞乱了客观事实，中央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了。

“四清”运动时，少奇同志对我们参加四清办公室工作的同志，要求更严了。他规定我们只有接受工作团的报告、听取汇报的任务，没有回答任何问题的权利。所有工作团提出的问题，一律由他本人回答。有的同志提出，是否可以出去看看工作团怎么搞法。少奇同志说，不要出去。工作团都是由中央部长、省委书记带队，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工作。你们是指挥部的说，说了一句什么话，有人就可能认为代表一种什么倾向，影响他们独立思考。

缜密细致的工作作风

少奇同志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更严格。我在他那里工作时，是帮助他看中央部门和地方送来的一般文件，选出重要的打上标记请他看。可是，他并不相信我们的选择，每天还是看完全部文件。他特别注意看群众来信和报社的情况反映，对于有调查有分析的材料更为注意。

1955 年 3 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告：湖南省人民法院检查了某县法院错误地把“蛊婆”能放“蛊毒”致人病死这样一种迷信落后的说法，当作犯罪事实，错判了几起冤案，并且已经全部平反，少奇同志要我代中央拟一个批语转发全国。我看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湖南省人民法院党组的报告，觉得他们写得有事实，有分析，以为中央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只写了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用这个材料教育政法干部，不要相信落后迷信的东西这么几句。少奇同志看了我拟的批语，一下子全部勾掉，另外写了长篇批语，把这件事提到改善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作风的高度。少奇同志的批示最后说：“中央责成各级法院党组，参照湖南省人民法院这个检查报告的经验，发动全体司法人员对自己的审判工作，进行深刻的检查，反对官僚主义逼供信的审判作风，提倡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判作风，惜以避免错判案件的继续发生。”

少奇同志非常注意听取不同意见，甚至反面意见。他常说，领导干部要善于听闲话。有些闲话经过分析原因，可以及时改进工作，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对于下面所说的案件的处理，就是少奇同志重视反面意见的一个例子，也是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一矛盾，并且严格区别其不同处理方法的例子。

事情的经过是：湖南省某电厂的一个青年女工，1960 年 6 月接到家乡来信，说父母都患浮肿病。她当即回家看望，发现农村缺粮情况很严重，认为是人民公社制度造成的，党中央、毛主席不知道。于是，她写了“打倒人民公社”等 12 张标语，到国务院北门外张贴，并告诉警卫战士，标语是她贴的。警卫人员当即把她送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处理。她交代了这种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并且说，她知道贴这样的标语是要犯法的。但目的是为了使毛主席、党中央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显然，这个女工是采取她明知是犯法的方式，向中央反映情况。可是，当时公安部主要负责人谢富治却认为她是现行反革命，定要严办。这个女工被送回原籍后，当地判了她 5 年徒刑。后来，湖南省政法领导机关经过复查，撤销了原来的判决，并与她原工作单位协商，仍留下她工作。少奇同志接到复查报告，立即批示把这个材料印发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并建议由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和这个女工谈一次话：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反映情况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艰苦朴素遵守纪律

少奇同志的生活一向是很朴素的，江青一伙大肆造谣污蔑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生活如何奢华，完全是胡说八道。1963 年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出国访问，专门做了衣服，确实不错。可那是按外交部的规定办的啊！出国之前，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同志到他们家看了他们在国内会客的衣服，发现没有一件合乎规格的，只好统统另做。包括全部随行人员，每人都做了衣服。江育还几次对王光美同志说，咱们是个大国，应做几件象样一点的衣服，不能太寒酸等等。事隔不过几年，江青竟然倒打一耙，说什么她如何劝王光美同志不要这样那样，而玉光美不听之类的活来了，真是两面三刀。

1959 年底为少奇同志“作寿”的事，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少奇同志名为休息，实际上是在海南岛椰林村同一些同志共读政治经济学，研究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少奇同志生日的前几天，炊事员郝苗同志和随行人员商议给他改善一下伙食，被当地同志知道了。在回京途中，路经琼海县那天，正好是少奇同志的主日。吃晚饭时，省里同行的干部送来一块生日蛋糕。少奇同志一向反对作寿，在家时我们并不为他做生日，因此他很不满意这种做法。但由于地方同志出于好心，少奇同志也没有过多地批评。蛋糕由下面的同志分吃了。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帮凶造谣说陶铸同志给他送了“直径 1 公尺那么大的寿桃糕，专机运往海南岛，指定歌舞团前去奏乐，并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出席祝贺”，这纯粹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的诬陷。

1960 年，少奇同志到苏联参加 81 国共产党会议，作为代表团团长，按规定发给他 5000 卢布零用费，他没有用 1 个戈比，全部交给了我国驻苏大使馆。他从不接受馈赠。外宾赠送的礼品，都交给故宫博物院作为筹办礼品馆的陈列品。到外地视察，他总是吃住在停在偏僻岔道上的专列火车上，以免妨碍交通和避免地方同志的招待。地方同志有馈赠，他总是严肃地交代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调查研究独立思考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少奇同志的基本工作方法。

解放后的 17 年间，少奇同志每年差不多都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工厂、矿区、林区、农村、城市街道居民中间进行调查。每一次发现重要问题，都立即写出意见，用电报或者派专人报告党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调查时，非常深入，往往亲自到工厂车间里，矿山作业面，学校师生中找各行各业的人查间交谈。他曾经指出，调查的目的有三个：一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二是了解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三是发现脑子里还没有考虑过的新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说过，调查就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世界。

少奇向志经过调查发现和解决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他的许多见解，已为党中央所采纳，成为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指导实际工作的方针政策。有些观点，现在仍然十分新鲜，闪耀着马列主义的光辉。

1955 年正在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他曾经指出，劳动者关心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的客观法则。对于不同技术水平、不同贡献的劳动者，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用物质利益去督促他们的劳动，使劳动者从自己的物质生活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要因为从私营变为国营，实行固定工资制度，就不关心劳动成果了，搞得干好于坏一个样。国营企业也应当做到使劳动者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

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开始是由少奇同志听了一些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提出了几大关系的初步意见，毛泽东同志认为很重要，亲自参加听取汇报，经过讨论之后形成的。少奇同志经常说，要多多独立思考。凡能独立思考的，就不会栽跟头，照抄照搬的一定要栽跟头。《论十大关系》，就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和特点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范例。1957 年 2 月，少奇同志到河南新乡地委调查，发现农业合作社办得太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地委实行了包工包产到生产队、固定 3 年不变、超产奖励的政策。少奇同志当即肯定这个办法好。他说，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谁的活好谁的活坏，谁吃亏谁占便宜，农民能看见。这样，几百户的大集体所有制没有变，分配制度变为二三十户的，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能巩固集体所有制。根本问题是小农经济的生产工具基本没有变，耕作分配单位分小点，适当分权，有点自治，适合于历史习惯和管理水平，适合生产工具，适合生产力。将来机械化了，就不同了。少奇同志说：“不是有人争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面了么？办太大的社，就是生产关系跑到前面了。”

少奇同志善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应用马列主义原理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0 年 5 月作

1987 年 8 月改

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

肖劲光

刘少奇同志早年投身革命，为寻求革命、救国的道路奔走操劳。此后，他把毕主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我与少奇同志相识很早。1920 年夏天，我和任弼时、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六人经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俄勤工俭学。到上海后，我们在霍飞路渔阳里 6 号外国语学社学习。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杨明斋，他是海参嵘华侨的负责人。这个地方当时是毛泽东同志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工读辅助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的一个机关所在地。它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楼上是机关办公的地方，楼下是俄文班学习的地方。我们到上海后，斗识了少奇同志。他比我们先到上海，也和我们一起学俄文。我和弼时同志到俄文班不久，就加入了工读辅助团。少奇同志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衣着朴素，举止端庄，态度严肃，从不开玩笑。他为人正直、富有革命理想，办起事来很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从此，我们相处在一起，从上海到苏联，又先后回国，到达安源，共同经历了两年多的风风雨雨。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革命者有了希望，看到了光明。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等在组织了第一回批留法勤工俭学之后， 1920 年就改为组织留俄勤工俭学。少奇同志和我们十多个青年，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聚集在上海学习俄文，准备出国。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并不很了解，只知道在那里工农当家作了主人，劳昔大众彻底得到了解放，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苏联政府关于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对华宣言，也于 1920 年初传来中国。这一切都极大地吸引着我们。到俄国去，学习革命的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这就是当时少奇同志和我们的共同想法。由于目的明确，我们学习俄文都很用功。

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们一起学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作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在前面举旗竿的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除学习俄文外，每星期天还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请人来演讲。我记得常来讲课的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望道。他主要讲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本马列书籍，书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的大胡子像。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那时，我们这帮娃娃住在法租界，敌人对我们并不太注意。因为我们的革命活动才刚刚开始，也还没有直接地、尖锐地触及到他们，所以当时在法租界里敌我之间的斗争还不十分尖锐。法国警察当局也知道我们在渔阳里的情况，并不太管我们。我们几个人住在法租界菜市路的一个亭子间里，下面就是安南巡捕的一个岗亭，他们也不太理睬我们。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少奇、弼时和我一起由工读辅助团转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们是第一

批人团的。关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间，我只记得是冬天，究竟是 1920 年冬还是 1921 年初，记不清楚了。后来我问过少奇和弼时同志，他们都说是 1920 年冬。

我们在上海学了八个月的俄文和一些马列书籍。1921 年初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1920 年 5 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通过杨明斋（杨明斋与第三国际和苏联在海参崴的党组织都有联系），介绍到俄国去。我和少奇、弼时等十多个青年当时都很兴奋。我们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装；一起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去海参威。当时海参威还是在日本占领之下，而伯力已经由苏联红军控制。海参崴与伯力之间有一条伊曼河是分界线。河这边是“白”区，河那边是“红”区。到了海参鼠，少奇同志等几个负责人与海参崴大学教授伊凡诺夫接上了头，并安排了去伯力的行程。我们在一个小旅店里住了几天。天很冷，少奇同志和我们都挤着睡在一起。那时海参崴正发生鼠疫，凡是住旅店的进出都检查得很严。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的总领事馆对我们很注意。他们知道我们的姓名，从哪儿来的，误认为我们是孙中山派到俄国去的代表，抓了我们几个人去审问。被抓的有少奇、吴芳等同志。这几个同志都是我们的负责人，年纪也都比较大一些。听说在审问时，敌人摆出一副崴风凛凛的阵势，西边站着刀枪手，就象唱京戏那样。领事馆的人问少奇同志是干什么的？少奇同志沉着地回答说：是做裁缝的。因为当时南方人跑到北方来大多是做苦工或者是做裁缝、理发等手工艺活的。少奇同志是湖南人，讲湖南话，他们也听不太懂。不管怎么问，少奇同志始终讲是学手艺的。审问没有结果，威胁一顿，就把少奇同志等放了。回来以后，少奇同志进了审问的情景，讲时神态自若。他那勇敢机智、临危不惧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虽然放我们走了，但并不死心，又通知驻伯力的领事馆注意我们。所以我们到了伯力后，领事馆就派人跟着我们。但是伯力已经是红军的天下，他们鞭长莫及了。我们到伯力后，一切都由红军接待，吃住都有人负责，就象到了家。在这个自由的新天地里，我们到处都感到亲切，感到呼吸舒畅。大家用不着装扮了，不用躲躲闪闪了，也不用装做互不认识了。少奇同志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我们大家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看到、感到的一切，在国内、在路上那种担惊受怕的情绪一下消失了，开始体会到解放了的滋味。

从海参崴到伯力是分散成若干个小组走的，当时我和弼时同志一路。在伯力住了几天，集中了 10 个人左右，然后继续前往莫斯科。由伯力到黑河，分为两路，一路乘船，一路乘火车。我和少奇同志乘船，弼时、罗觉等同志坐火车。从怕力到黑河这条航线也不太安全，因为船在黑龙江上行走，有时走中国水域，有时走俄国水域。走中国水域时，有时会遇到鸣枪停航检查，但苏联船上的人对这一套都很熟悉了，有办法对付他们。一路上，少奇同志和平时一样很少讲话，遇事非常冷静沉着。我感到，在他的身上蕴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到了黑河，仍由红军接待。黑河的红军司令是一位老太太。中国侨民也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武装支队，打仗很勇敢，红军很信任他们，对我们印象也很好。没有几天，水旱两路人员集中后，我们又继续向莫斯科前进了。

从黑河到莫斯科我们都乘火车，由于缺乏燃料，火车开开停停，在路上我们大约花费了 3 个月的时间。一路上，我们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后苏联人

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情景。少奇同志是我们的一个组长，对这一段历程的见闻，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到过他的感受。当时苏联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匪暴乱，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是，战争的严重创伤和敌人破坏的严重恶果却仍历历在目。工厂、矿山被破坏停产，农村被洗劫一空，粮食歉收，物资极度缺乏。一路上到处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饿处于普遍的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火车没有煤，要烧木柴，走一段就要停下来修铁路，边走边修，还要不断地和白匪的破坏作斗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坐的是一辆装货的闷罐车。火车停下来之后，少奇同志与我们一起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在这样艰苦的旅途中，他始终精神振奋，并不时地鼓励大家。

1921 年，我们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正逢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被分配到会议代表们住的一个旅馆里，与代表们同吃同住。有时代表大会开大会时，也发票给我们去旁听。少奇同志和我们都轮流去参加。我去过一二次。在听报告时，我们看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坐在主席台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被分配到刚刚成立起来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是 1921 年 5 月成立的,它的全称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是一所政治性的学校，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是远东各国来的学生，其中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学生。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少奇同志和我们都在中国班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国际工人运动史和俄文。记得学习的课程有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共产党宣言》和有关工会运动的小册子等。我记得，当时共产国际对工会中的工团主义批判得很厉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学习中也批判工团主义。1922 年 1 月在莫斯科举行东方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少奇同志和我们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一些人一起，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担负大会的翻译和文书工作。

在那之前，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年冬天，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同志和彭述之、罗觉、卜士奇、吴芳等首先由团转党，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尔后少奇同志等几个党员和我们这些团员一起组成旅俄支部。旅俄支部成立后，任弼时同志和我先后于 1922 年由团转党，团员转党时，要有两人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按当时的规定，开支部大会时党团员都参加，通过党员时，党团员都举手。旅俄支部是东方大学总支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少奇同志是旅俄支部早期负责人之一，是支部委员。此外，还有罗觉、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也是支部委员，在东方大学总支下面还有俄罗斯东方少数民族的支部、日本支部、朝鲜支部等。

我们在苏联学习这一段生活是很艰苦的，同时还有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捣乱破坏。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在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做工。凡是站岗的，每星期发给半斤到一斤黑面包。面包质量很差，有的上面部长了绿霉，有的里面有一段绳子，把绳子扯出来，面包中间就成了一个大洞。我们这些外国学生都享受红军的待遇。在苏联，当时红军待遇是全国最高的，那时列宁也只是享受红军一样的待遇。红军的待遇每天也只有一块象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土豆煮的，有时放

一点咸鱼。开饭时一人一勺，一勺子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有时碰到一点稠的，算是很幸运了。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层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有时肚子饿得实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铺上等饭吃，越等越饿。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献的。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的，不管脚大脚小，一人一双，皮鞋重得很，穿起来大一截子，鞋尖向上翘起。冬天穿一种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的衣服，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有一颗红五星。晚上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那时年轻也不太怕冷，红军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人的生活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大学教授的报酬主要是面包。教授们背个兜兜，每星期六拿发给的面包票去领一块象牛屎一样的黑面包，放在兜兜里背回家，这就是一个星期的报酬，也没有什么钱。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中有那么几个人受不住那个苦，想退学。少奇同志却始终表现得很坚定，对自己要求严格，纪律性很强，有明确的革命事业心，能团结我们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坚持学下去。所以，我们学习得很好，团结得很好。

在东方大学有一次过年，学校组织晚会，在校学习的苏联东方民族和外国学主都要演出一个节目。少奇同志和我们几个人一起自编自演了一出反映中国的军阀、资本家如何镇压工人罢工的戏。少奇同志扮演工人，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扮演军阀、资本家和群众。大家一边排练，一边热烈讨论。当时对如何表现中国工人，大家各抒己见，少奇同志和大家一起讨论、争辩。他的演技虽然不怎么高明，可是态度十分认真，对每个动作都反复排练，尽力把人物形象刻划好。在日常相处的时候，少奇同志虽然看上去比较严肃，但有时讲起话来也很风趣。记得有一次谈到恋爱、婚姻问题的时候，少奇同志说：“外国人‘暴露’，中国人‘隐蔽’，实际上，中国人的感情并不是没有外国人深。”这些事离开现在已几十年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想起这些事，更增添了我对少奇同志的怀念，令人不胜感慨。

随着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些同志回国参加工作，所以第三国际就陆续从东方大学调一些同志回国。少奇同志是最早调离东方大学回国的，大约是在 1922 年春天。少奇同志回国后搞工人运动，不久就到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我在 1924 年夏天回国后也到了安源，又和少奇同志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宣传游艺股工作，少奇同志是俱乐部主任。他工作很忙，经常下矿井到工人中去搞调查研究，代表工人与资本家进行谈判；有时找安源矿务局商讨如何改进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等问题，维护工人的利益。他善于钻研问题，想得很深、很全面，往往能把一些看来平常的问题提高到政策、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当时资本家与帝国主义之间也有矛盾。为了防止外资乘虚而入，少奇同志既坚持斗争的原则性，又讲究斗争策略的灵活性，从而也就更好地做到了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些做法和毛主席当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时有不少工会相继遭到破坏，而安源工会却搞得有声有色，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中心之一，被称为小“莫斯科”。在少奇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开始我们只是在工人中做工作，后来逐渐扩大到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争取农民对工会的支持。每逢星期天，我们往往组织青年工人去农村搞宣传，演出一些自编自

演的节目，使得工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少奇同志深得工人的信任和爱戴，威信越来越高。

追忆往事，怀念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我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深感中国革命来之不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80 年 3 月作
1987 年 11 月改

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薄一波

“七七事变”前夕，国难当头，华北危急，我们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刘少奇同志在这个紧要时刻，代表党中央，来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大力纠正了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领导各级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发展统一战线，建立新军，胜利地进行了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

我们当年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永远也不能忘记在那一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为我们党和我们民族建立的不同“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

刘少奇同志是在 1936 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已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炫线的新

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少奇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自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冒险进攻，1936 年 3 月 31 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很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是先进分子脱离广大青年采取的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有地消耗掉了。

少奇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彼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同志，在北乎市委工作的李葆华、黄敬同志，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少奇同志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他写道：“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还说：“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华、胡眼的笔名，在《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少奇同志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五千多名。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

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于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

从 1936 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少奇同志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北方局的这一段工作，评价很高。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在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工作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志还被关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狱中的党支部，组织我们学习了 1935 年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又学习了少奇同志的文章。大家注视着华北和全国出现的新形势，看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斗争和多次挫折之后，重又展现出广阔天地和胜利曙光！

二

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于是，北方局把当时可能抽调的干部都陆续派往华北各省、市。我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1936 年 8 月下旬，我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我，拿着阎的电报，邀我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我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

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同志来告诉我：“胡服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又告诉我，少奇同志还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9 月，我来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百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根深的老军阀，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对山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深地体会到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随后，我见了阎锡山，表示回山西帮助搞抗日救亡工作，还要同远方朋友商量商量。阎锡山完全意识到我是要向党组织请示去的，表示理解。我返回北平作了汇报，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

阎锡山是一个老好巨猾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他在山西经营了 20 多年，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 35 家大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当时，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统治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随着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有同蒋介石的矛盾。在反共这点上，虽然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阎和蒋的矛盾也激化了。

这时，在阎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借用我党的力量。1936 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共产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联共可能还是一条出路。在他的头脑里，联共和反共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后和分量轻重的问题。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应付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

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是，他表示愿意抗战和同我们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北方局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他、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少奇同志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经过分析研究，北方局认为在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同我一起，第一批去太原。临行前，徐冰同志传达了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到了太原，我们就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

我们提出：第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我们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对于我们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当时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接过了阎锡山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名义上阎锡山还是“会长”，实际上领导权很快转到我们手里。我们把它适当加以改组，加强进步因素，扩大群众基础，通过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们按照少奇同志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制定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迅速把工作开展起来，在工厂（包括兵工厂）、学校（包括军事学校）和农村，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为了迅速培养干部，我们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的和全国各地来到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收进来，加以培养训练。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应当提到，经过培训的牺盟会特派员，都是比较优秀的党员，派往各县工作，同时担负着党组织交给的建党任务。

牺盟会工作的迅速开展，引起了顽固分子的惊慌。阎锡山的亲信、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带领反共团军官七八十人，向阎锡山请愿，要求解散牺盟会，驱逐共产党。阎锡山对他们说：你们目光短浅，看不到前途。

在少奇同志提出的正确策略原则指导下，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在阎锡山的眼里，我们是共产党员，但又不是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而是他请来帮助做抗日救亡工作的，用的是他的形式、他的口号，戴的是“山西帽子”，搞起来的组织还是他的。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利用合法形式和“官办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抗日救亡的力量。

三

伟大的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少奇同志和北方局先后来到太原，直接加强了对山西党的工作的领导。

少奇同志来到后,立刻向我们传达了 1937 年 8 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他指示我们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他向我们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但是，一定要看到，现在抗战开始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是准备杭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杭战。因此，在我们的策略上应当有所改变。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故线，放手发动群众。“ 左 ”倾关门主义还是要反对的，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防右上。当形势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但当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就不要再等待，就要大胆地前进。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续下去。他批评我们当时的做法还不够放手，还有包办群众运动的味道。少奇同志后来还一再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迁就主义的“ 一切经过 ”。他说过：”如果所谓“ 一切经过 ”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 经过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并且强调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由于少奇同志的正确指导，使得山西的统战工作，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迷失方向，并且很快开创了新的局面。

少奇同志还给牺盟总会的负责干部包括非党干部公开作了一次报告，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形势，要求牺盟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他还亲自起草了《山西农会章程》，用牺盟会的名义发布，使党和一切进步团体都能利用这个章程，合法地去发动农民群众。

在这期间，我多次听过少奇同志的讲话，深受教益。山西的工作所以少走了一些弯路，这同少奇同志的及时帮助和指导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都有过一些偏差，比如：开始时，我有过不愿搞上层统战工作的关门主义思想，局面初步打开后。我们又没有及时打破阎锡山的框框放手去开展工作，这都是经过少奇同志指出后才得到纠正的。后来，他又纠正过我的一次“ 左 ”的行动。当时国民党复兴社在太原办的《华闻晚报》，久为群众所不满，雁北失守时谎报军情，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让群众把它捣毁了。少奇同志得知后，严肃批评我说：这是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群众的“ 左 ”并不可怕，也不难纠正；但是，作为领导者，如果认为只有用这种“ 左 ”的指导方针、“ 左 ”的行动才能发动群众。那就是错误的。

少奇同志在太原还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见了面，谈了话。他着重地向梁说了下面一段话：牺盟会是共产党帮助发展起来的。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谁的墙脚的问题。我们之间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在统一战线中，阎先生是会发展的，共产党当然也要发展，限制我们的发展那是不行的。少奇同志朋确、有力的谈话，缓和

了阎锡山的疑虑，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

1937 年秋，雁北失守，太原深受威胁。正在这个时候，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日。这对山西以至整个华北地区抗日军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为骨干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使敌后根据地很快就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八路军在挺进。山西旧军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却一触即溃，阎锡山虽然枪毙了他的军长李服膺，也未能阻止溃败之势。这时，阎对旧军已逐渐失去信心。于是，就来找我们帮他的忙。根据党中央历来指示的精神，我对阎锡山说：看起来仅仅依靠旧军是不行了，有必要赶快组织一支新军。阎锡山也有组织新军的想法。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我先搞一个团，试试看，我当即向少奇同志报告了这件事，他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一个团也要搞。并决定由牛荫冠同志接替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

一支实际上受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很快就诞生了。1937 年 8 月 1 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军不断壮大。决死队发展到四个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又发展了三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不算牺盟会在各地的游击队，有正式番号、列入正式建制的有五十个团，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当时的旧军。

少奇同志当时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两条：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十万。当时党内也有少数伺志反对这个方针，认为根本不应当提出让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认为扩大部队到十万，一来不可能，二来会破裂统一战线。但是，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为了独立自主坚持华北敌后的抗战，必须这样做。那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山西，他在一封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且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年。这个方针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9 月下旬，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省牺盟会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会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党中央对党在牺盟会工作的指示。根据报告的精神，大会修改了牺盟会工作纲领，强调全民总动员，反对片面抗战；把我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结合山西抗战的新形势，写进牺盟会新的工作纲领中。

11 月 8 日，太原失守。第二年春天，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向南进攻，攻占临汾，直进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山西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都已沦陷。牺盟会和决死队在党的领导下，撤出城市和铁路线，退到两侧，留在敌后，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扩大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都是由我们推荐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其他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全省 105 个县，有 70 个县长是共产党人。

1938 年秋末冬初，少奇同志调离北方局。在少奇同志领导下，经过两年

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有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有了新军，有了根据地，形成了一支新的强大力量。那时人们把它叫做山西新派。这支力量，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建树。

山西新派的成功，是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坚持和灵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取得的极大成功。他在《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的打击旧派，那么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

1940 年 3 月，北方局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牺盟会在我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组织不仅是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到政府与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机构的改革，创立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与发展山西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

党中央对少奇同志领导党在山西的工作，给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山西的群众斗争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少奇同志在对山西工作的指导上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失误的。他后来在总结六年敌后工作时，就说到：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的政策上及个别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这种情况，我们是有过直接感受的。例如， 1938 年初，北方局曾主张把中央关于“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的规定，不正确地报到山西新军中来，一度要解散决死队中的党组织，造成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好在这一失误很快就由他自己纠正了。

四

少奇同志在离开华北的时候对我们说过：要经常想到现在同我们合作的是阎锡山。我们既要积极争取他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防备他在形势逆转时可能反水，要准备两手。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者，不能忘记！少奇同志这些话，帮助我们经受了以后到来的考验。

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吉县。他想到自己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山西，大部地区已沦人敌手，旧军溃不成军；新军是壮大了，但“它不是我们的”。他意识到自己设计的、借共产党之力“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于是，他开始大踏步地走下坡路，策划收口新军，重整旧军。1938 年 8 月，在吉县召开的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上，他说：“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八路军扩大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煽动他的军政官员起来“奋斗求生”，公开反共。

当时，一股反共投降的逆流，在全国范围内酝酿着、发展着。1939 年 1 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共政策。“东方慕尼黑”在加紧密谋策划。阎锡山很快嗅出来：天要变了。他说：“天快下雨了，我们赶快准备‘雨伞’。”阎锡山说的准备“雨伞”，就是要打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首先是打击决死队和牺盟会，为他扫清投降道路上的障碍。

为了部署反共，1939 年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他的总部召开了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在会上，他空喊“抗战到底”，同时喋喋不休地说：不能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却不存在了。他提出：重庆军令部来电，规定文官不能兼任军职，要山西执行这个命令。当时，我决死队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的政治委员，分别兼任第三、第六、第五行政专署的专员，不准文官兼任军职，这就是说要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解除我们的军权、我们坚决不同意，僵持了三个月，没有结果。各地牺盟会、决死队和有关专署，在党的指示下，接连打电报给阎锡山，要求让我们回去。最后，阎锡山慑于新派的力量，不得不让我们国去了。他夺回军权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秋林会议后，党组织派雷任民同志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汇报时，刘少奇同志要我们积极准备，坚决反击。毛泽东同志说：阎老西准备“雨伞”，你们也准备嘛！又说：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彭德怀同志亲自到决死一纵队驻地，召开“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具体部署。我们随即紧急动员，采取坚决措施，确掌新军和地方武装，确保抗日政权，准备自卫还击。

这一年，国民党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愈演愈烈，到处闹磨擦，闹惨案，年底达到了高潮。在这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充当了蒋介石的急先锋。12 月初，他“命令”决死第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让旧军十九军和六十一军紧跟背后“配合”，想两面夹击，消灭我二纵队。二纵队负责人韩钧同志，给阎回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绝执行。阎据此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二纵队奋起自卫还击，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山西新旧军冲突，也叫“十二月政变”。

“十二月政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动的一次最大进攻。战斗一打响，我决死二纵队坚决还击，其他新军部队纷纷打电报给阎锡山，一致表示坚决站在二纵队一边，“拥护阎司令长官严惩顽因反共的旧军官”。我八路军严阵以待，象巨人一样站在那里，阎锡山也不得不顾忌这个威慑力量。最后，决死队以胜利者的资格结束了这场战斗。应当指出：在这次事变中，个别新军部队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反逆流斗争的指示，主要是没有坚决清除不可靠的旧军官，确实掌握好部队，因而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

决死队在自卫还击取得胜利之后，我驻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政治保卫队第二〇七旅，转移到晋西北，与决死队第四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暂编第一师胜利会合。我驻晋西南、晋南的政治保卫队第二一二旅、二一三旅，与驻阳城地区的决死三纵队一部，转移到太岳地区，与决死队第一纵队胜利会合。新军各部队，后来分别加入了由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和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一二九师的战斗序列。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派肖劲光和王若飞同志到秋林镇来同阎锡山谈判，迫使他答应旧军不再进攻新军，在同蒲路以西双方以汾离公路为界，划分了驻防地区。可是，阎锡山还时常寻衅。5 月，周恩来同志写信给阎锡山，说山西发生的“新旧之争”，是“亲痛仇快”的事，“必有好人播弄其间”，劝说他悬崖勒马，抗战到底，后来，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没有轻举妄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

“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通过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党同阎锡山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山西的斗争时写道："我们没有白白的帮助阎锡山（实际上即帮助他的新派），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

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

"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中所执行的路线，无疑问是正确的。是灵活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没有在自己的工作中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清楚的、确定的、及时的决定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并且是能干的动员了组织了全党全军及数百万群众朝着我们指定的方向前进了。"

刘少奇同志领导华北白区斗争的胜利实践，又一次证明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诽谤诬陷，终究遮不住少奇同志的革命的光辉。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是我党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又一伟大胜利。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创造的宝贵经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芋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指导和激励着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光荣而豪迈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明天。

少奇同志在北方局

郭明秋

1936 年春天，我和林枫同志同在地下党天津市委工作。林枫同志担任市委书记，我是市委的工作人员，同时还在女工夜校教课。

一天傍晚，我从夜校口来，见到家里有一个陌生的客人，正起身准备告辞。这是一个近 40 岁的中年人，端正的脸盘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穿一件洗熨得干净平整的绸子大衫，脚上是半新的圆口布鞋，神情严肃而又从容不迫。林枫同志指着我向客人介绍说：“ 这是小郭。 ”客人间我到哪里去了，林枫同志告诉他，我刚从女工夜校教课回来。客人略一沉吟，随即果断地说：“ 这可不行！在现在的环境下，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要绝对分开。过去就是因为把这两种工作混在一起，所以经常遭到破坏。以后她不要再去教书了。 ”说罢，他的目光象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然后撩起长衫的下摆，沉稳地走下楼梯。

我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位客人就是刘少奇同志。但当时林枫同志并没有向我透露他的真实姓名，只说那位客人是中央派来的代表老戴。并且告诉我，他（林枫同志）已经调离市委，给老戴当秘书。从那以后，我离开女工夜校，完全转入了北方局的秘密工作。

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华北腹地，国 家行将变色。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建立广泛的民族革一命统一战线，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这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少奇同志肩负党中央的重托，担任了中共驻北方局代表。

新的形势要求党的工作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然而，实行这个转变，不但是困难的，甚至也是痛苦的。因为“ 左 ”倾路线在白区已经持续统治了将近 10 年。在一些党员以及党组织的一些领导成员的头脑里，“ 左 ”倾路线时常占上凤，在我们白区工作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对群众和革命的同盟者采取排斥的态度；指挥一两个条件较好的工厂或学校单独地举行罢工或者示威游行；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顾条件和环境，开纪念会，散传单，闹罢工；不顾群众觉悟的程度，以群众不能接受的口号和斗争方式去进行斗争；由于怕被人说成是右倾而不敢到黄色工会中去作群众工作，急于把黄色工会变成赤色工会；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去反对主要的敌人，而是要同时打倒一切敌人。再有，就是少奇同志当面向我们指出的，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混在一起，以至既破坏了秘密工作，又妨害了公开工作。这类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的长期继续和重复，给自区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这种状况不仅在平津，而且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各大城市也存在着。少奇同志初到天津时，就是面临着这样一种严重的局面。怎样把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自区工作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排除长期以来“ 左 ”倾路线的影响，是摆在少奇同志面前的首要任务。

起初，少奇同志和林枫同志谈话，我是不能参加的。每次少奇同志来，我就到外面去放哨，少奇同志走后，我还要出去巡视一会。过了不久，有一次少奇同志对林枫同志说：“ 以后凡是我们讨论政策性问题和思想性问题时，小郭可以参加。 ”作为一个刚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人，能够直接听中央派来的领导同志的谈话，我当然是很高兴的。当时是 5 月份，正值华北日军大量

增兵，进占北宁铁路沿线，屠杀了数百名被迫为其修建军营的中国工人，将尸体抛进海河。华北的危亡形势和海河浮尸的惨状，激起了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少奇同志经过周密考虑，决定发动天津和北平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游行，什么时候不能游行，在白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少奇同志来天津之前，我们平津地区的一部分党员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是不明确的，吃过不少次亏。这次是否适宜举行示威，少奇同志曾经作过十分周密的考虑。他很讲究斗争艺术，善于把革命的原则性和斗争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少奇同志来后就谈到过不久以前北平学生一次抬棺游行的教训。北平一位爱国学生郭清因宣传抗日救国被捕，惨死狱中。为此，北平学生于 3 月 31 日举行了抬棺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 50 多人被捕。少奇同志说，那次抬棺游行是错误他，错在党组织无视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未能准确地掌握广大群众的情绪。参加游行的又只有共产党员和少数进步学生。这样冒险游行的结果，必然是损失了自己的力量，给后来的工作增加困难。至于这次游行，少奇同志指出，现在日本增兵华北，平津地区受到直接威胁，事关生死存亡，所以我们有把握动员各界群众厦对敌人；反动当局虽然一贯镇庄爱国学生运动，但是日军增兵华北也威胁着他们的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游行，既可以达到示威和发动广大群众的目的，又不至于使党的组织受到破坏。

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和北平的学生分别在 5 月 28 日和 6 月 13 日成功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成游行。这一重大行动的胜利，使平津地区的人民群众体会到了地下党的坚强领导。事后我才知道，为确保游行的胜利，少奇同志曾派人对当时驻在平津的二十九军官兵，包括二十九军的上层人士进行了许多统战工作。

有关白区工作的方针、策略、方法问题，我曾听少奇同志讲过多次。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志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谈到过去天津市委如何反对立三路线。少奇同志仔细地听着。待那位同志说完，他站起来，语重心长他说：“你们的那套作法还是没有摆脱立三路线。你刚才不是说人越搞越少吗？我们白区就是吃的这个亏。”少奇同志还说，过去类似这样的教训是很多、很痛苦的。那时，我们的同志不明白农村包围城市，城市配合农村的道理，不清楚白区城市工作的目的，以为白区工作的目的就是向统治阶级实行革命的进攻和决斗，总是考虑在自己所在的那个城市一举推翻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从性急发展到冒险盲动，一而再，再而三，以致每次行动都被反动派各个击破。不懂得积蓄力量，好不容易在群众中交了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些力量，一个飞行集会或是别的一个什么冒险行动，就把这点力量都损失掉了。再搞，就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样无休止地重复下去，力量永远也积蓄不起来。讲到这里，少奇同志加重语气说：“我们有多少共产党员让敌人这样去抓，去杀呢？”

凡是听过少奇同志谈话的人，都感到他的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有切身的经验教训，又有对平津地区具体情况的分析。少奇同志曾把他的这些策略思想写成《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文章，用“K·V”的化名发表在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上，系统地列举了“左”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表现和危害，详尽地阐述了他所主张的自区域市工作的方针，后来党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这一方针概括

为“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少奇同志的这些文章，对统治自区多年的“左”倾路线，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清理，在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互相传颂：“咱们党来了一个高明的人。”

那时，我也不知道K·v就是少奇同志，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自从少奇同志来天津以后，天津的形势迅速改观了，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发动群众更加深入和广泛，斗争开始稳步发展。

9 月的一天，少奇同志交给我一个密码本，并且教我如何用法。从那以后，我给少奇同志当了指译译电员。那时，负责发报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林恺同志。每次，都是少奇同志把发报的内容交林枫同志带给我，我翻成密码后再由林枫同志交给林恺。收报也是这个手续。记得当年经我手翻译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张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这是少奇同志在白区用的名字。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3 日清晨，我正在厨房生炉子，听到街上一片叫卖号外的声音。听说卖国贼蒋介石被活捉了，我高兴得扔下炉子就去告诉林枫同志。从那以后，林枫同志每天都忙着出去搜集各方面的反映。自我当译电员后，少奇同志一般是不到我家来看电报的，这一次他亲自来了，但是中央没有来电报。林枫同志向少奇同志汇报搜来的各方面情。听说蒋介石被清捉以后，广大群众其中包括进步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还存我们的党员，都要求把蒋介石杀掉。大家都觉得，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了 10 年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都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这口可不能放了他，误认为只要杀掉蒋介石，就可以改变国民党统治的局面。我急切地望着少奇同志，没想到，少奇同志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沉思了半贻，只说了一句“还得看看”，就走了。

没过几天，革命群众的舆论日甚一日，并且带着埋怨和责备的口吻：西安事变这么大的事，不仅在全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可是中共北方党怎么就不说一句话呢？林枫同志把群众的意见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少奇同志沉着他说：“我们现在受一点责备有什么要紧？要沉住气，一定要等中央的电报。中央知道全局，等中央发来了指示，我们再说话。如果我们现在忙于表态，看起来挺有主张，万一我们说的和中央的指示不一致，我们又得纠偏，那就制造了混乱。与其乱了再纠偏，莫如我们现在暂时多受一点责备。”

又过了几天，中央终于来了电报。中央的方针和我们这些年轻人原来的想法相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来，我们从别的渠道得知，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炸平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这一下可把我们搞糊涂了。我们希望杀蒋介石，怎么何应钦也要杀蒋介石？少奇同志给我们解释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是很复杂的，派系之间的利害冲突非常尖锐。何应钦要杀蒋介石，是为了和汪精卫勾结起来搞亲日政权。而日本帝国主义则是想利用西安事变煽动中国内战，加速中国的灭亡。少奇同志说，从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我们不赞成杀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国民党里还是有影。响的，当我们的力量还小的时候，要争取国民党的军队抗战。现在已经把他扣起来了，就得逼着他接受抗日和民主的条件，况且眼下要杀他的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何应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有可能接受我们的条件。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少奇同志的分析和判断。西安事变，按照我党的意图和平解决了。在那大动荡的日子里，少奇同志领导下的北方党组织坚定不移地稳定了乎津地区的局势，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各界各派的力量，说服和教育了人民群众，有力地支持了西安事变向着全国团结抗战的方向发展。少奇同志临变不乱的镇静神情，至今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西安事变后，北方局从天津搬到北平，那时已是 1937 年初。我和林枫同志在砖塔胡同四眼井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租了三间房子，在没有给少奇同志安排好安全可靠的住处之前，他就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让少奇同志住在最好的一间，过堂屋作吃饭和会客的地方。同院的，只有一个房东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女孩。时值隆冬，我生起了暖烘烘的火炉。谁能想到，这三间安静的小北屋，竟是我们党的北方局机关呢？

在天津的时候，虽然我经常见到少奇同志，但那时他总是坐下就谈工作，一句寒暄话都没有。现在，少奇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了，他仍然是那么少言寡语，除了谈工作，几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

在那段时间里，少奇同志日夜都在忙着写东西。晚上灯光昏暗，有时还要用煤油灯。少奇同志穿着单薄的棉衣，写累了，就站起身，来回走动着，沉思着，那双穿旧了的圆口布鞋在地上发出轻轻的声响，一支烟吸完了，又点起一支，经常工作到夜深。林枫同志曾感动地对我说：“老戴这人有个特点，他特别用功。”

那时，我们是靠着党的经费过着清苦的生活。林枫同志把朋友接济的一点钱交给我，嘱咐我要想方设法照顾好少奇同志的身体。少奇同志有胃病，加上失眠，他吃的少，睡的也少。有一次中午，我特意给少奇同志做了一盆软软的米饭和一盘烂烂的腐乳蒸肉，少奇同志比往常多吃了一小碗饭。但是他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这上面，吃过饭，他又去工作了。就是在那种身体状况下，少奇同志连续写下了《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等文件，全面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1937 年 4 月，少奇同志离开北平去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少奇同志走后，我们仍然通过电台和他保持联系。有一天，林枫同志从外面带回一本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他高兴地对我说：“你看看书里的照片，就知道咱们的老戴是谁了。”我们和少奇同志一起工作、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直到少奇同志安全抵达延安，林枫同志才用这种方法告诉了我少奇同志的真实姓名。从照片上，我还认出了秘密路过天津时曾在我们家住过的王稼祥同志。

少奇同志去延安后，华北形势逐渐紧张，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向中国大举进击，我们和少奇同志之间的电台联络也中断了。不久，当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彭真同志来信说，北方局去延安开会的干部不再回平津，通知北方党的同志到太原集中。彭真同志的信是用商人口气写的，我们明白了：北方局已设在太原，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都在那里。

接到通知后，党组织迅速安排共产党员、民先队员、进步学生和教职员及各界的抗日分子陆续撤离平津，到太原向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靠拢。八九月间，我们到达太原。

当时，八路军的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已经开往山西抗日前线。少奇同志领导下的北方局把组织和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从秘密转入公开，工作重点也从在白区时的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转为向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输送

力量。大批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从敌占区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或抗日游击队，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

在太原，我们又见到了少奇同志。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林枫同志担任山西省临时工委副书记。我和几个带孩子的女同志，遵照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的嘱咐去延安。

在白区，我们和少奇同志仅仅相处了一年多时间。然而我亲眼看到，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少奇同志以他无私无畏的精神，以他特有的冷静和坚定，使得北方局的工作从路线上根本扭转过来，使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少奇同志对党的白区工作所作的贡献，和他对整个革命工作所作的巨大贡献一样，应当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1980 年 3 月作

少奇同志与新四军

叶飞

刘少奇同志是在发展壮大新四军的关键时刻来到华中的。他于 193s 年 10 月奉党中央命令组织中原局，于 1939 年 11 月初到达豫皖苏边区， 11 月间到达皖东。

这段时间国内和华中的形势，少奇同志后来在 1942 年 2 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报告中作过这样的分析：武汉沦陷以后，日寇基本上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而加强了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诱降活动。国民党内出现了投降逆流，副总裁、亲日派首领狂精卫及其追随者公开投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反共”的具体政策，在 1939 年 12 月到 1940 年 3 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华中地区，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没有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没有准备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甚至反对建立根据地。又由于新四军副军长、军分委书记项英同志执行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迅速将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和干部向敌后发展，使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的实际地位减弱，同华北和八路军的联系被隔断，陷于敌伪顽夹击的危境。少奇同志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来华中，贯彻党中央关于解决苏北问题、独立自主地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少奇同志到皖东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发动了反共进攻。1940 年 3 月，国民党顽固派首先向我新四军驻津涌铁路西的江北指挥部及四支队司令部发起进攻，我军四、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集中赴路西作战。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乘我路东部队西调之机，调集 10 个团万余兵力，向 我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一一半塔集及其附近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围攻。

3 月 22 日，即顽军因攻半塔集的第二天，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急电挺进纵队火速从江都大桥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前往塔援。我率挺纵增援部队 2 个团千 23 日出发，28 日赶到半塔集东南，打开缺口。张云逸、罗炳辉同志率领五支队、苏皖支队由路西增援半塔集。我东西两路大军出击，将韩德勤部队击溃，驰赶到淮河以北。

战斗结束后，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带我去见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当时化名胡服，是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这是我第一次和少奇同志见面。我和邓子恢同志到了少奇同志房间，他立即开始和我作了重要谈话。这次谈话约一两个钟头，在场的就是少奇同志、子恢同志和我三人。少奇同志谈话有个特点，开门见山，观点鲜明，没有模棱两可，所以能够使对方很快领会他谈后的主旨所在。

少奇同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项英在皖南的错误；另一个是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把新四军和八路军联成一片。少奇同志说，他来到华中，就是执行这个任务的。

少奇同志指出，项英同志在东南局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顽固派一味退让妥协，不敢斗争，遵循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新四军力量小，强调华中特殊。项英认为，江南敌后交通便利，不利于大部队活动，因此，他不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放手到江南、

江北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只在国民党划定的范围年活动，不敢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更不敢和顽固派坚决进行反磨擦斗争。少奇同志说：“统一战线既然包含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磨擦，只有坚决反磨擦，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他指出：项英坚持错误，抵抗中央的正确路线，已经给新四军带来很大的危险，如果不及时改变，危险更大。少奇同志说：“现在根据地不巩固，新四军军部就在顽固派的眼皮底下，没有回旋余地，不晓得那一天可能会被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掉。项英同志的错误造成新四军现在这个危险的局面，对我们很不利。中央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向北发展，到江北去，项英同志就是不行动，说什么长江被敌人封锁，大部队不好过。”

少奇同志为了使我了解情况，拿出了党中央与东南局项英来往的电报给我看。党中央的电报除连续催促项英率部北上外，还预作警告：“在华中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被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毅靠拢，再向苏北转移。”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项英同志还派袁国平同志去上饶与顾祝同谈判，屈从于顽固派要“叶、张两部南下”的无理要求。项英几次电报中央，提出“在某种情况下，叶飞部可允南调”；“坚请叶张部南调，以加强皖南力量”。1940 年 5 月 4 日中央在发给东南局的指示（即第二个“五四”指示）中，针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明确指出：“他们要叶、张西部南下，我们则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少奇同志在当时就坚决反对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他在 4 月 24 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方如果同意叶飞部南调，还有什么理由去苏北？”

在少奇同志和我谈话之前，我只知道项芙同志反对陈毅同志派我带领新四军第六团以“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殓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地区作战，但不明自这是怎么一回事。少奇同志这么一讲，就把问题点破了，再一看电报，恍然大情，豁然开朗。

少奇同志说：“陈毅同志不执行项英同志那一套，不照他的办，想办法向东、向北发展。陈毅同志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是有斗争的，是与项英不同的。”关于陈毅同志在苏甫的活动，少奇同志在 1942 年 2 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有明确的评价：“我军在苏南活动最久，且在陈毅同志领导之下，自始即正确的执行了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与发展抗日武装部队的方针。因此，我军在苏南有很大的发展，并在不断的打击日寇的战斗中，在群众中建立了很好的威信；部分的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又由下而上的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少奇同志又说：“现在中央还在争取教育项英，所以对他的错误，目前还不在党内公布，争取项英同志到江北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

接着，少奇同志谈到：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苏北问题，发展华中，开辟苏北，这不光是新四军的任务，而是全党的任务。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

少奇同志指出，现在解决苏北问题比较麻烦，因为华中的情况与华北，山东的情况不同。他说：“抗战初期，华北的国民党军队逃跑一空，八路军是奉命挺进敌后作战，所以，北方局能够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我们党和八路军迅速在华北占了主导地位。国土是我们从敌伪手里夺口来的。那时，国民党很蠢，他们还不懂得我军能够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

徐州会战时，蒋介石还请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帮他扯日军的后腿，他当然是想借日寇来消灭我军。结果，我军堂而皇之地建立了山东根据地。所以，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开辟根据地都是合法的。国民党是哑巴吃黄连，没法说昔。这样的文章好做。”

少奇同志说：“现在华中的情况不同了。国民党接受了教训，苏、浙、皖、赣是它的命脉地区，比华北也更重视，所以它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 10 万大军。他们在那里光收税，不抗日，也不让新四军进来抗日。他们还与日伪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时常有点暗中勾搭，日寇因为兵力不足，想借韩德勤之手为他反共，因而也很少对韩顽施加压力。韩德勤还竖起了‘孤悬敌后’的节孝牌坊。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形势呢？一个是我们自己反而“蠢”了。即上页说的项英犯的错误；一个是国民党接受教训，“聪明”了。少奇同志说，国民党的策略变化了，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总结了教训，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对我们限制得很厉害，不让我们到广大敌后活动，不让我们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说：“现在蒋介石‘聪明’了，我们反百‘蠢’了，强调新四军的特殊性，规规矩矩地受约束，不敢独立自主，不敢扩大根据地。当然，这个错误不是项英个人的，他是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怎样去改变这个局面呢？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没有联成一片。少奇同志说，“中央已经决定，要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冲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就不能打成一片，就不能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苏北问题怎么解决？只能从韩德勤手里夺过来，但是这个文章不好做。就是说，我们不能主动去打他。做得不好，我们在政治上被动，得不到全国各界的同情。”

接着，少奇同志又充满信心他说：“文章还是可以做的。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了一个反动的愚蠢的政策：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现在重心是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起而自卫，消灭他们。文章应该这样做。”

这个文章怎么做？少奇同志把军用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页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可是，我们没有理由主动到苏北打韩德勤。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衅由彼开，我军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把韩德勤搞掉。”

少奇同志找我谈话，就是要我负担起这个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开始，我有点犹豫，不敢一下承担这个任务。我考虑，我的部队只有两个团，我军其它的主力还在江南，而韩德勤有十几万人，我们孤军坚守大久了没有把握。所以，我向少奇同志提出，兵力太少，守一个星期可以，一个星期以后怎么办没有把握。少奇同志断然悦：“只要你坚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内是你的责任，一个星期之后拢不是你的责任。那时候，八路军

和新四军江南部队的增援就可以到了。就象这次半塔集保卫战一样，守一个星期增援便来了。”这一讲，我的信心增强了。我过去没有打过这样孤守待援的保卫战，进了半塔集，仔细看过地形，了解过兵力部署和战斗过程，取得了半塔集保卫战的经验，心里有点数。少奇同志讲得这么清楚，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少奇同志看我那么痛快地接受任务，很高兴。最后，少奇同志交代我：政治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才能打，不能主动去打人家，要让人家打你们，你们坚守待援。如果你们主动去打人家，那没有理，八路军不好来增援。一定要顽固派来进攻，我们被迫自卫，政治上才站得住。少奇同志指出，既要从韩德勤手里把苏北夺过来，又不能主动去进攻人家，文章难做就在这里。这个分寸，少奇同志讲得很清楚。

接受了任务，我向少奇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回去怎么办？过去的做法不对，可那是项英同志指示的，在江南也是这样执行的。现在要改变，就得说那是错误的。可是项英同志的错误又暂不公布，回去怎么讲呢？少奇同志说，你这问题提得好。他告诉我：“你回去以后，从检查你们自己活动地区来提问题。介绍这次到皖东来的所见所闻，说皖东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县长是新四军委任的，出布告明令减租减息，放手发动群众，然后对照你们自己活动的地区做得对不对。总之，是要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不要去牵涉皖南，更不要去牵涉江南。”我回去后就是这样做的，后来就发生了郭村保卫战。

郭村保卫战击退了李长江的反共进攻，争取了李明扬的中立，造成了我军东进抗日的有利态势。随后， 1940 年 10 月韩德勤大举进攻黄桥，两军决战，苏北我军歼灭了韩德勤部主力。所以说：没有半培集保卫战，就没有郭村战斗，没有郭村战斗就没有黄桥决战。这时，少奇同志认为苏北局面已经打开，于是于 11 月间亲率中原局机关移至苏北，与陈毅同志会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后来又根据中央决定东南局合并予中原局，成立华中局。

1941 年 1 月皖哺事变爆发时，我们在盐城参加干部会议。噩耗传来，人人义愤填膺。就在这个会议上，少奇同志痛斥了反共亲日派的严重罪行，也指出了“皖南党内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严重原则锗误。”在 1942 年 2 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报告中，他又客观地分析了皖南军部和项英同志在皖南三年的成绩和问题。他说：“在军部进入皖南的最初一个时期，是客观条件最利我军发展的时期，因此，在皖南对部队的发展，及对部队的整训，是有成绩的，在地方工作上亦有显著的成绩。但是它的发展还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在建军中亦未明白提出建设党军的口号，而只提出建设所谓统一战线的军队。又在执行北移命令中，则为亲日派所暗算，以致大部损失。”

为什么彼亲日派所暗算呢？少奇同志指出下列主要原因。“一、由于皖南个别党的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最初就犯了类似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过分的将就大资产阶级，不与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动摇作斗争；过分的相信大资产阶级，以致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在党内部队内进行思想上组织上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二、违背党中央的战略方向，违背中头的指示，没有积极向敌后发展，对敌后抗战信心不够，株守皖甫，以致造成亲日派包围的恶劣形势。”“三、过早的提出精兵口号，没有充分发展部队；反对建立根据地，认为这在华中敌后是不可能的，强调华中的特殊性，拒绝华北的宝贵经验。”“四、在北移中军事上的布置与指挥基本上是错误的。”

少奇同志号召大家：“从皖南事变的损失中，我们同志特别是负责同志应学得严重教训。”

少奇同志再一次对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正确路线作了深刻阐述。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采取武装进攻与武装占领的方式 来灭亡中国,逼迫中国的政府、中国各党派及各阶层人士联合一致走上武装抗日的新阶段”，“在这种局势下，任何政党只有当他在抗日战场上、在抗日的武装斗争中表现了自己的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并在国际与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党当然也不能例外。”接着，他问道：“游击战争到哪里去打呢？是到敌人后方去？还是坐在国民党的后方？”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虽然这是一种很困难的斗争，也是很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共产党人是能够负担起来的。”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陈毅同志代军长，少奇同志任政委。至此，以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根据地已经形成，奠定了华中敌后长期抗战的基础，并为下一阶段解放战争准备了条件。

少奇同志于 1942 年春离开华中去延安。他在华中和新四军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华中根据地的创建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正如陈毅同志在“七大”发言所说：“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南下，到华中执行毛主席的主张……对全局解决了重大的问题。”

1988 年 2 月

少奇同志在苏皖杭日敌后

张爱萍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广泛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华中受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抵制，因此，不仅整个华中的抗日工作不是从积极地深入敌后打算，就是新四军的几支抗日游击部队，除一部深入苏南、苏北和皖东北敌后外，其余还徘徊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伪的边缘区，依赖国民党，而不积极地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同志带着党中央的正确指示，来到了华中。经过他的领导和具体组织，纠正了错误的王明路线，把党中央的方针路线贯彻到新四军部队和长江南北的广大敌后地区。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以少奇同志为首的华中局的领导，对在华中地区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更有重要意义。他根据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从属地位的科学分析，具体地运用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解决了抗日战争中的反顽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等等关键性的问题，使我党在华中的根据地得以创立和巩固，不仅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对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当然是少奇同志对党的重大贡献。我们这些曾经坚持华中革命斗争的同志，都有这种亲身的体验。

十月红旗飞江淮

1939 年秋末，党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针对当时存在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敢深入敌后的错误路线，坚决果断地向敌后进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亲自领导新四军四、五支队，挺进到淮南津浦路东，一举消灭顽军秦庆霖等部，首先建立了淮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与此同时，中原局决定我率淮北六支队一部挺进津浦路东敌后，同八路军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一部，在苏皖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先后歼灭了淮北的伪顽马馨亭、王光夏、许志远等部，从而击溃了顽军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和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的主力，使苏皖边区在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运河以西的淮南淮北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0 年，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一、二支队从江南挺进江北敌后，争取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中立，把主要矛头指向顽固反共派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黄桥决战，歼顽万余，乘胜猛追，先后解放海安、东台、兴化等县。与此同时，黄克诚同志遵照党中央指示，率八路军一部兼程南下，与淮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会合东进，与陈毅同志南北呼应，横扫千军，先后歼灭了盘踞淮海和盐阜的顽军主力，解放涟水、阜宁、盐城等地，与陈毅同志北上大军胜利会师，随即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党中央任命叶挺同志任总指挥，陈毅同志任副总指挥，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员。在盐城庆祝这次空前胜利的会师大会上，群情欢腾，斗志昂扬。陈毅同志兴奋异常，走笔赋诗：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我亦曾试步陈老总原韵奉和，以纪念当时的盛况和心境：

“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敌后旧属归。
南援北进江淮会，兄弟共举红旗飞。”

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以后，更加猛虎添翼，继续乘胜向敌伪和韩顽发动进攻，不断扩大战果，在华中局统一领导下，建立起南临长江，北抵陇海路，东濒黄海，西至津浦路东、西的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为了巩固敌后根据地，以少奇同志为首的华中局，还决定：部队分散剿匪，彻底消灭顽伪残部；放手发动群众，成立抗日群众组织，开展减租减息；扩大统一战线，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少奇同志亲自做上层统战工作，并针对根据地与敌伪顽斗争犬牙文错的复杂形势，明确提出在边缘地区搞两面政权的策略，以隐蔽的巧妙方式，把我们力量伸展到敌人据点中去，打入敌人心脏，随时掌握敌人动态，在那里写下了许许多多紧张而又灵活，沉着而又机智，扣人心弦的斗争故事，不断扩大和巩固了我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反共高潮形势下，我陇海路以南及长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新四军。陈毅同志代军长，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员。共编七个师，各师下辖三个旅和所在区的地方部队，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更加壮大起来了。

下面，我想着重叙述少奇同志在 1940 年初夏到淮北抗日敌后，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两个月中，自己感受最深的几个片断。

淮河北岸迎亲人

初夏的淮北平原，一望无际的麦苗间杂着高粱叶，微风吹拂着麦浪，散发出阵阵的麦花香。淮河缓缓东流，两岸一片葱绿。正是这样一个景色迷人的一天下午，淮河北岸突然热闹起来。从新四军第四纵队驻地——泗县的洛岗，一直到淮河岸边，几十里路上，人群熙熙攘攘。这里有坚持敌后抗日的人民，有清洁、整齐、威风凛凛的战士，也有党政军各级干部。人们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怀着殷切的希望和喜悦的心情等候着，不时地顺着大路朝东南方向张望。有些人到处打探：“你见过胡眼同志吗？”“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同志么！”“胡服同志几点钟可以到？”“快了，

马上就要到了。”

人们这种喜悦、激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块淮河以北，津浦路东，陇海路南，运河以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久前才从对敌伪顽的斗争中创建起来，迫切地需要中央领导同志来直接领导与具体指示。就在这样的时候，党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到了新四军第五支队驻地的盱眙城。从盱眙到我们淮北，只隔一条淮河。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们电请少奇同志亲自来淮北指示工作。少奇同志已决定今天到来。这个不平常的消息鼓舞着每一个同志。我的心情也十分激动。记得还是五年前长征经过湖南的时候，一天行军后，少奇同志来到我们师政治部，他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对

工作详细、深透的询问和指示，使我久久不忘。自从那时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页了。在这漫长、艰苦的五年里，不知少奇同志有些什么变化呢？我自然是渴望能看见他。

久久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顿时，淮河边上人声欢腾，少奇同志在掌声和口号声中走下了渡船。跟在他后面的是中原局机关的工作同志。我紧握着少奇同志的手，目不转睛的端详着。啊！他的两鬓已有儿根灰白的头发了，慈祥而严肃的脸庞也更消瘦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发了白的灰军装，象从前一样的整洁、朴素。他轻挽着马疆，微笑着，谦逊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洛岗村这时更加沸腾起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军政干部拴下汗溜溜的战马，纷纷向少奇同志住处赶去。

少奇同志从延安来到华中以后，夜以继日的工作，长时间的操劳影响了他的健康，如今又带者战争风尘来到淮北。我们劝他先休息一下再说。可是他一会也不肯休息，一定要我们立即汇报工作情况，和我们大家研究工作。汇报开始了，从上灯时分直到深夜，蜡烛换了一根又一根，少奇同志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香烟，全神贯注地听取汇报，发表意见。我们几次请他去休息。他都不答应。眼看天快亮了，他还不肯去休息。后来我们只好说大家也要去休息了，少奇同志这才会意地向众人笑笑，招招手，去睡觉了。但是没睡上儿小时，他就起身了。于是汇报又继续了一天。少奇同志对各种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明确的指示，但他总是说：“这是我的看法，请你们去研究。”我们怀着最大的满足，脸上挂着笑容，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少奇同志的指示。

时刻关怀着部队

在敌后分割、动荡的战争年月里，能见到中央的领导同志是不容易的，谁都想见见少奇同志，聆听他的指示。我们决定第二天召开全体军政干部大会，请少奇同志作报告。突然泗县、五河的敌伪军在这一天拂晓，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情况很紧急，全军立即投入反“扫荡”的战斗，报告会只好停止。出动“扫荡”的敌伪军受到游击队阻击，泗县城的两路敌人，在黄昏前，其主力一部仅占领了上塘集、马公店，五河城的鬼子也同时进占了郑集。根据情况判断，敌人第二天一定会向我合击。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少奇同志和中原局机关的安全。我们决定趁敌人一时摸不清情况，连夜转移，打算从上塘集和郑集这两股敌人之间穿过，绕到敌人后边，然后再绕到滩河边上，跳出合击圈。行程约六七十里。我们将上述敌情及我军的行动计划向少奇同志报告后，他说：“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好，就这样办好了。我对情况不如你们清楚。”

夜行军开始了，少奇同志骑着我们送给他的一匹四只白蹄的枣梨色马，和中原局的同志们随纵队司令部行进着。这是一个们天的夜晚，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走了不久，下起雨来了。雨虽不十分大，却很讨厌。淮北平原的泥土路，浇上一点小雨，就更加油滑难行。人们不时的摔跤，有的人被粘泥拔掉了鞋子，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我用衣服蒙罩着手电筒的亮光看看表，小针已指向下一点多钟。我们已穿到敌人的侧后，脱离了敌人的合围圈，部队就在原地休息下来。我们正在路旁村庄的一个小茅棚里，听各路侦察员的敌情报告和研究情况时，少奇同志走进来了。他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淋湿，雨水从军帽沿滴下来。他听了我的报告后，沉思了一会说：“是的，下雨，

路很难走，我看你们部队很疲劳了。”略停一会，又皇着我说：“既然已经基本上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你看是不是可以住下来呢？在战斗中，也应尽可能地保持部队的体力，照顾同志们的健康呵！”最后又补充一句：“当然，情况是你们比我清楚。”我心里想，是可以住下来的，即使发生了万一，我们是战斗部队，不过打一天仗，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少奇同志和中原局机关在这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怎么办呢？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事。于是我坚定地回答：“在此宿营是可以的，不过再前进十多里更好些。”我们又继续按原定计划往前走，又走了一个多钟点，部队到达距滩河约二十里的地方住了下来。

“有理、有利，就坚决打垮他”

翌日，敌人果然合击洛岗一带，扑了一个空。我们为避开敌人“打回马枪”，决定当夜向北渡过滩河，转移到青阳镇东北 20 余里的新行圩子、朱湖等我根据地的边缘地区。

夜行军又开始了。少奇同志仍然随我们一道行军。那天晚上无风无雨，行军速度较快，大家边走边说，情绪十分高昂。我们经过青阳，越过滩河，在到达许圩子时，接到侦察队的报告：顽军江苏省保安队第一纵队司令王光夏，趁日寇从西面对我进行“扫荡”之际，率四个团倾巢出动，从东面配合日寇向我进攻，于黄昏前占领我朱湖、新行圩子及其以北地区。大家非常气愤。王光夏在韩德勤的指使下，表面上打着抗战的旗子，实际上和日寇暗中勾结，背信弃义和我们闹摩擦。只因为我们坚决打鬼子，人民群众信任我们，才没敢明目张胆地打我们，这次却完全丢掉他的抗日假面具，公开配合鬼子向我们进攻。这一来使我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南面是洪泽湖，北面是日寇的据点，西面是向我“扫荡”的日寇，而前面又是王光夏顽军的堵击。我们纵队几个领导同志商议，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打垮王光夏的进攻。为了站稳阵地，更有利于我组织防御和展开进攻，当时除令第一团趁王光夏部队立足未稳之际，夺回朱湖、新行圩子外，并去向少奇同志请示。

当我走进少奇同志的住室时，他正背着手，在屋里踱步和刘彬同志谈论着什么。我把当前的敌情和我们的困难处境向他作了汇报。少奇同志一面听着，一面看着地图，脸色仍然那样开朗、平静。等我讲完后，他微微点了点头说：“是很困难呵，你看该怎么办好呢？”我说：“看来，不反击是不行了。王光夏经常和我们闹摩擦，这家伙这次竟公开对我们进行武装进攻，是狠狠给他回击的时候了！”

少奇同志很赞成地说：“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我们在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顽固分子却趁机向我们进攻，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卫了，因此，打他，我们是有理由的。这一点也一定要给干部，特别是战士讲清楚。”他接着问：“你们部队同王光夏的力量对比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军有三个主力团，一个独立团，另外还有几支小游击队。其中两个团战斗力较强，打败过日本鬼子，也打垮过顽固分子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派来闹摩擦的马馨亭两个团的进攻。这次由于要以一部分力量牵制日寇，要歼灭王光夏四个团是有困难的，但是打垮他，赶出我们根据地是可能的。”

“那就是说，我们又有利了，是不是？”少奇同志很明快地对我说。

“是这样！”我肯定地回答。

接着，少奇同志又问了部队的政治情绪和有关作战等问题，然后安详地说：“现在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的。……我们既然有理又有利，就坚决地打垮顽固分子的进攻！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在部队里进行深入的动员。”说着，他把我送到门口，我愉快地向他告别。几天来的接触，使我深深地感到少奇同志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谦和严肃的态度，对问题总是深思熟虑，而当他要作什么决定的时候，总是先以征询下级意见的态度由你自己去作出决定，把他的决定变成执行者自己的决定。他这种凡事和群众商量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把全部粮食，马上送到前方去！”

经过一天的战斗，我们从顽军手里夺回了朱湖和新行圩子及其附近大小20余个村庄。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各机关和中原局机关也移住新行圩子。

记得是我们同王光夏部战斗的第五天夜晚，顽军西个团被我们打垮，并被驱逐到根据地的边缘上——界头、曹庙一线，同我们对峙起来。“扫荡”我们的鬼子，经我主力一部和游击队在车门山阻击后，已退回泗县城。根据地基本上恢复了，形势暂时缓和下来。我从前方指挥所来向少奇同志报告情况并陈述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在谈话中，感觉有些饿了，肚子咕咕地直叫唤。我忍不住悄声问刘彬同志：“能不能给搞点东西吃？”

这话被少奇同志听到了，他关心地问：“怎么，这样晚还没有吃饭？”于是，少奇同志就问起部队的供给情况。我在谈话中就将根据地初创，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和这三四天中部队几乎断食等实际情况作了汇报。少奇同志听后，很不安地说：“怎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倒天天吃的是白面、大米呢！”

原来是为了照顾少奇同志的胃病和身体健康，同时，中原局机关的人数也不多，所以，我们专门弄了些面和米，给他和中原局工作同志吃点稀饭和馒头。看到他这种不安和自责的情形，我后悔当时不该把这个真情汇报。正想解释，少奇同志对刘彬同志说：“快查查我们还有多少粮食，把全部粮食，马上送到前方去！前方部队没有饭吃，怎么能够打胜仗呢！我们在后方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连忙向他说明：“部队虽然米面吃得少些，但象玉米面、绿豆、大麦、糁子还是有得吃的。”他不等我说完，就说：“我们在后方的人，才该吃杂粮。”我又继续解释，说明现在大的战斗已基本上结束，可以拿出一些部队去筹粮，少奇同志有胃病，不应该同我们一样来个“平均主义”，等等。但他不象同我们研究工作一样，对我的解释，一句也不听似的，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我们在后方的人是可以饿肚子的，前方部队是不好饿肚子的。”

当时，我们大家对于少奇同志这种一切为了前方胜利的精神深为感动，这使我联想起几天前雨夜行军中照顾部队体力的事，更加强了我们不仅从大的方面，也要从小的方面关怀部队的观念。当我们政治部将少奇同志指示把粮食送到前方的事传达到部队中后，指战员大为感动，纷纷表示决心：歼灭敌人来回答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的关怀。

“保存了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为了狠狠地教训这些“反共摩擦专家”，彻底粉碎王光夏的进攻，完全恢复我根据地，少奇同志又决定在我们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组织当时在淮北津浦铁路东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的一部，与我们共同行动。在少奇同志的统一指挥下，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在运河以西洪泽湖以北地区，歼灭了王光夏两个多团，把残部赶回运河以东，完全恢复了我们原有的根据地。

在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中，少奇同志从理论到实践解决了“不打第一枪”的问题。他向我们指出，我军向敌后挺进，是为了消灭敌寇、伪军，收复失地，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然而，首先遇到的却是顽军向我们进攻，搞摩擦，而我们则是被迫自卫反击。这绝不是我们打第一枪。因此，我们不必顾虑，百应该坚决地放胆地挺进敌后。整个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也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我回到司令部，到少奇同志那里汇报战斗情况。他对伤亡情况和政治情绪很关切，尤其对干部的伤亡情况夏关切。我说，打这种顽固分于是不会有大伤亡的。当他知道我们部队营以上干部没有伤亡，战士伤亡也不大的时候，才放心地谈了同敌人斗力、斗智的问题，大意是说：伤亡不大，这很好，我们是打游击战，不仅要学会歼灭敌人，还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不然，自己都没有了，拿什么去消灭敌人呢？游击战更要把同敌人斗力和斗智结合起来，只同敌人斗力是不够的。

在闲谈中，我讲起了战斗中自己碰到的一件趣事：战斗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们把掩护王光夏败退的一个多营顽军，包围在山子头内。这是一个围墙高、壕沟宽，利于守而不利于进攻的围子。我们便决定黄昏攻击。为准备进攻，我和几个团长进行现场侦察。我爬到山子头围墙边一个矮草堆上，利用一个堆麦草秆的草房棚子的遮蔽进行观察，当我观察后扭转身向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忽然背上象挨了一拳似的，把我从矮草堆上撞下来。我还以为是谁开玩笑，后来才发现是挨了敌人从围内打出来的一枪，子弹穿过草棚上的一条横梁飞到我的背上，把羊皮短袄（是淮北区党委金明同志他们送来的）打了一个洞，我的背上只受了一点轻伤，子弹头落在衬衣里。

这本来是闲谈的，少奇同志却非要看看我的伤口不行。他亲自察看了伤口，一定要叫医生来给我上药。我说这算不了什么。说真的，我当时一面感到党的温暖，也一面感到难为情，这怎能算得是负伤呢！少奇同志还指着那件短羊皮袄说：“皮袄倒给你保了险！”刘彬同志也插上一句：“俗话说，六月里穿大皮袄’是你的洪福大啊！”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少奇同志严肃而含蓄地对我说：“人家要你当指挥员嘛，哪里是叫你去当一个侦察兵！在一次战斗里，指挥员的伤亡对战斗胜败的影响是不同子一个战士的。羊皮袄是不能经常保险的！”

为记述这次战斗，战后，我“打”了一点“油”：

反敌伪顽夹击

淮上天方晴，洪泽水翻腾。

敌伪西“扫荡”，韩顽东侵凌。

三军紧携手，两面打敌人。

英雄歼国贼，席卷运河滨。

很久以来，我们时常被一个问题苦恼着：就是感到敌后的环境紧张，战斗频繁，工作杂乱，抽不出时间学习。人们经常说：“什么时候能抽点空学习学习就好了。”但是有一天，我发现这样的想法是错了。

事情是这样的：反顽战斗后不久，少奇同志就亲到苏皖纵队视察工作去了。一天晚上，我们部队到达离苏皖纵队比较近的地方宿营。深夜，我独自一人骑着马到了少奇同志住的村子。我一面转弯抹角向前走，一面看看表，已是深夜下一点多钟了，心里想：少奇同志已经早休息了，此刻去，会不会耽误他的休息呢？正在进退两难，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看见村中间的一个大院落里，有隐约的灯光，我本能地朝着灯光走去。在大门口询问值班的警卫员，知道少奇同志正在这里。灯光在漆黑的深夜里，显得分外明亮，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轻轻推开了房门。少奇同志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一支烟，正对着那闪闪跳动的烛光，聚精会神地读书呢！文件和电报堆在桌旁。我顺眼看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

“这晚了，还没有休息呀！”我首先打招呼。他把书放在桌上，抬头望望我说：“还早呢！”接着就精神奕奕地同我谈了约莫两个钟头。当我告辞出来的时候，离天明已不远了。我回头望望摇曳的烛光和映在窗户上的少奇同志的身影，心里深深感动。我们经常强调客观原因抓不紧学习的论调不驳自倒了，难道少奇同志工作不比我们更忙些更紧张些吗？环境不是也一样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刻苦地坚持学习呢？

对干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少奇同志非常重视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丰富干部的文化生活。华中局成立后，他指示地下党组织从上海买来大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文艺书籍，发到各旅去。如《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以及苏联国内战争年代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和高尔基的《童年》、《母亲》等等，大家如获至宝，争相传阅，这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食粮啊！少奇同志还特别重视办好党校，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党员的思想教育和自我修养。各师、团的干部大部到党校轮训过。凡是到华中局汇报工作的同志，少奇同志都要他们到党校听课。他还经常亲自给党校学员讲课。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就听过他讲的关于党员组织纪律性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战略与策略等。少奇同志关于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的许多重要报告，对我们许多同志的成长，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这一次，少奇同志在淮北虽然只待了两个月，但在这紧张繁忙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给干部作报告，经常我党政军干部们个别谈话，对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进行具体指示。他总是想办法启发诱导，从理论上提高干部的认识，打通干部的思想，或从具体问题谈到原则理论，然后才着手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如在这次解决根据地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时，他就是非常耐心、细致地反复向我们阐明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及这一方针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深远意义。他经常对干部阐述毛泽东思想对我党、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他运用我党的历史事实，反复地阐明、对比，来证明只有毛泽东思

想才能够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就是全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领袖，我们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少奇同志还谆谆告诫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群众路线和工作作风；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唯物论辩证法，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解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意义。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少奇同志正谈到否定之否定时，桌上送来一盘蚕豆。他一边吃饭，一边夹起一粒蚕豆，用它从下种到发芽、生长到结果实的全部生长过程来解释否定之否定这一法则。他对一些理论问题，总是

谈的又通俗又深刻。

少奇同志非常重视党员的政治思想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他经常同我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内斗争问题。当时部队在敌后分散的环境里，我们那时都还年轻、幼稚，政治水平很低，个人的修养更差，不懂得怎样进行党内斗争和对待自己的同志，不大懂得识大体，顾全局，因此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党内团结与斗争以及个人修养安方面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就在所难免了。他反复解释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通过他的开导和启发，给我们淮北地区党政军民干部以极大的教育，特别是给我教育帮助更大，留给我的怀念也更深。

少奇同志离开淮北不久，当我们从《抗敌报》上读到他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庆祝党诞生十九周年大会上作的《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时，我们都觉得它的每一句话，似乎也都是对着淮北地区和我们自己的情形讲的。这个报告对当时敌后和全党的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它成为以后整风中的重要文件之一。

1980 年 4 月作

1987 年 11 月改

东进，东进，再东进！——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淮北敌后

刘瑞龙

一、东出潼关——由西安到竹沟

1939 年 9 月，我正在陕西泾阳县附近西北青年救国会主办的安吴堡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工作。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的挑衅变本加厉。我打算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不久，中央来电，嘱我把工作安排后即去西安，随刘少奇同志到华中敌后工作。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右倾错误路线后，撤销党的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1939 年 1 月，刘少奇同志曾去河南确山县的竹沟安排了中原局的工作。这次是他由延安重回竹沟，随即前往华中敌后。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东进敌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排除干扰，克服困难，领导华中（长江以北）全党，迅速展开了敌后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我们由西安动身时，除刘少奇同志、徐海东同志和少奇同志的秘书刘彬同志外，还有从延安派出同去中原敌后的约几十人的干部队。海东同志以八路军高级军官身分，应付沿途国民党军队的盘问，行程比较顺利。

我们头一天到洛阳，就住到八路军办事处，少奇同志听了当时担任处长兼豫西特委书记的刘子久同志的汇报。在汇报中，子久同志提出，如局面恶化时，打算把办事处警卫排拉出去打游击。少奇同志不同意这个打算，认为在当时局面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打游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也难持久。豫西党的任务是巩固为主，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了身分的干部和党员，分别撤回延安或者派往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去工作或学习。无疑，少奇同志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不同形势下实事求是地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天，我们从洛阳出发到舞阳县休息，第三天就到了中原局所在地——竹沟镇。

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遵照党中央指示进入华中敌后之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自从 1938 年 10 月武汉、广州失守以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便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寇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反人民，投降分裂活动日益加紧，多方制造摩擦。针对这种局势，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坚决反对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间势力，发展进步势力，猛烈扩大军队，迅速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力争整个华北直到江南打成一片，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争取时局的好转，克服投降危险，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党中央、毛主席着重指出，党在坚决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时，必须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决不轻言退让，才能巩固革命的根据地，打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切阴谋。

少奇同志在竹沟停留期间，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和中原局的主要干部

朱理治、陈少敏、曹荻秋等同志，还有其他同志，一起分析了当时华中的抗战局势，研究了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方针的具体部署。当时华中我军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我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东进北上方针，开展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争，创建了江南敌后游击根据地，并以一部挺进到扬州、泰州和天长、六合地区。第四、五支队初创了皖东敌后游击根据地。第六支队开创了豫皖苏游击根据地，配合八路军一部开展了皖东北、邳睢铜地区的工作。豫南、鄂北地区我党我军也有很大发展。这都是少奇同志到华中后进行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华中敌后还有广大地区需要我们去开辟，已创立的游击根据地也需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否则，我军处在敌伪顽分割包围中，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当时项英同志执行王明右倾路线，不敢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对国民党抱幻想，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步步退让，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失去警惕，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他所直接领导的皖南军部及直属部队，处境更加危险。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许多同志，一开始就和项英同志执行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东进敌后的方针。事实上，自陈粟挺进江南，成立江南指挥部以后，即和中央直接电报联系，直接受命于中央了。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到华中，加强华中党的领导，继续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全力东进、直到海边的方针，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战局面，尤其重要。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盘据苏北，勾结敌伪，残害人民，如我八路军、新四军高举抗日大旗，南北对进，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做，有利于我党我军应付当时和以后华中地区艰巨复杂的斗争，这是关系全局成败的。

少奇同志在会议间隙，拿了两份文件给我看。一份是党中央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指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他赞扬这个文件考虑周到，要我注意仔细学习其中所提到的区分根据地基本区、边沿区、敌占区不同条件下发动群众的不同要求和不同的斗争形式、不同方法等。这使我初次了解到敌后根据地群众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另一份是少奇同志过去发表过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文章，他说文章中提出的意见，有些在今后工作中还可以参考。并且要我根据文件精神，准备一个有关“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意见”，在干部座谈会上提出讨论。此外，少奇同志把当时集中在竹沟的大批干部分配到鄂豫边和豫皖苏边等地区，加强各地的斗争力量。

二、东进豫皖苏——由竹沟到新兴集

少奇同志在竹沟工作结束后，即于 10 月上旬动身，向豫皖苏前进。一路上除了少奇、海东、刘彬等同志外，干部队又增添了一部分同志。出发前，竹沟留守处经过地方统战关系，作了途中安全的安排。少奇同志要我协助刘彬同志照料一下干部队，注意关心干部队员的生活，每天派几个队员打前站，安排住宿，了解敌、友、我情况。我们确定经过确山、汝南、项城、沈丘，向豫东、皖北前进。这时豫南已是深秋，一路上最显眼的，就是在国民党横征暴敛、租课交逼下，农民屋败衣破，农村满目凋敝，沿途看到从黄泛区逃出来讨饭的很多。农民新收的玉米棒子和红辣椒串，零落地挂在村边树上晾晒。

这一路上，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少奇同志利用时间深入调查研究和教育干部的精神，他和干部耐心谈话、促膝谈心、探讨问题的精神。

少奇同志很关心东进敌后的走向和路线问题。他知道我过去曾在江苏省委工作过，到过苏北、皖北的一些地方；他总是问我，由中原向东，走哪条路比较方便。我只按淮河南北一般设想说了。他不满足我漫不经心的答复，进一步要我比较几条路线的准易利弊，还询问沿途所经地区的社会阶级关系、物产、交通、民情、风俗、过去白区工作基础等方面的情况。从这些言谈中，使我深切领会到党中央、毛主席东进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也使我深切感到少奇同志的眼光已经扫向东海边了，已经在细致地筹划东进方案了。少奇同志要我继续研究这方面的新情况，准备回到这些地区去工作。

少奇同志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问题。他询问我读过哪些书，有哪些心得。从《反杜林论》谈到《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谈到李达同志写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同志编的《哲学选辑》，他说这两本都是好书。他赞扬毛泽东同志不但本人学习很好，并且十分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够格的党员，要力求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他指着干部队里几位刚从马列学院出来的同志说，他们就是毛主席要我带出来传播马列主义种子的。他特别指出，我们队伍里，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人满足于表面承认与口头宣传，不愿去实践，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言行不一。另一种人相反，学习马恩列斯理论的本质、精神和方法，把中心转移到社会生活变革上来，把马列主义作为处事、处人、处己的准绳。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代表，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精神。

少奇同志一略上话题十分广泛。在将近两周的行程中，他谈论了若干重大问题。

当少奇同志谈到毛泽东同志在我党的领导地位问题时，十分推崇毛主席。他说，我们党历尽千辛万苦，在危难中找到了毛泽东同志作为自己的领袖，是中国革命能够胜利的保证。毛主席是我们党正确路线的代表。

少奇同志几次谈到人的两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他说，由社会生产中不同地位所形成的阶级性，是人的本质特性，不同的阶级产生不同的党性。人从自然来，改造自然，又改造自身。我们要有意识地在革命实践中加强锻炼和修养，努力学习，提高党性，克服从旧社会带来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达到无产阶级党性的标准。

有一次，在谈到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时，少奇同志着重地说：在同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时候，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这一面旗帜，我们一定要抓，抓了对斗争有利。

少奇同志在品评党内过去一些领导人物时说：陈独秀这个人，大革命后期犯了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又犯了很大的错误，但在党的路线正确的时候，他这个人，在处理党内的人和事时，还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认为对一个人的评价，还是要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少奇同志曾和我谈到在六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评价。毛主席说，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本质是很好的。张国焘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只能由张国焘负责。少奇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表现很好。这一席话，使我再次感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爱护和温暖。

少奇同志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我人谈这个地方的历史和现状。他告诉

我们，毛主席过去打开一个县城，总喜欢找本当地县志看看。

一天晚上，少奇同志、海东同志、刘彬同志和我们干部队员一起坐在村边草堆上。少奇同志指着天空的星斗，向我们谈着天文学方面的事情，从牛郎织女谈到银河系，以及地球和星球的距离。他说，这不是普通尺寸所能衡量的，许多恒星要以亿万光年来计算。今天你看到这个星还在发光，但是，它本身可能早已消失了，你看见的，可能还是它在若干光年以前发出的光。他就此谈到学理论，不仅要学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还要学点自然科学。

我们到了豫皖边境界首镇以后，就看到了黄泛区混浊的泥水，冲着颍河流下来。我们到了太和县以东地区，就开始在黄泛区中跋涉。过了张村铺，才踏上了干燥的土地。11 月初，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的所在地——豫皖苏边区涡阳县北乡新兴集。

新四军第六支队，是 1938 年 9 月由彭雪枫同志率领 300 多人由竹沟出发，随后和原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组成的豫东第三支队的一部分，以及肖望东同志率领的先遣大队合编组成的。由于积极对敌作战，开展地方工作，发展了部队，开辟了豫皖苏游击根据地。

我们到新兴集后，当时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兼新四军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了六支队和像皖苏边区工作情况，吴芝圃同志作了补充。少奇同志听了汇报后，着重地指出第六支队的发展和游击区的扩大，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进军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毛主席所说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杭日民主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他耐心地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华中、坚决东进的战略意图和方针政策。他在六支队干部会议上，一再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当时，豫皖苏边群众工作还停留在一般宣传号召阶段，针对这种情况，他指出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积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和改造政权。他说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少奇同志对于豫皖苏根据地的方针、任务还作了具体指示。他要求首先创造永城、夏邑、肖县、宿县四县连成一片的根据地，与此同时，还要建立睢相太和商（丘）亳（县）鹿（邑）柘（城）两块小根据地，以便尔后连成一片。还要求巩固扩大部队，加强军队建设。准备在一二个月后向津浦路东发展。少奇同志嘱咐后，就和海东、刘彬同志去淮南游击根据地了。

当时少奇同志指定我参加豫皖苏区党委的工作，担任副书记。我从 1939 年 12 月到 1940 年 2 月，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和彭雪枫同志、吴芝圃同志一道，拟定了当时的工作要点。我们在永城县发动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及合理负担的试点，调查了当地农村上地租佃、借贷、主雇关系、农民生活情况，初步拟定了一个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要点。以后我又到肖县了解当地政权和武装的情况，和肖县县委研究整顿的方案。

三、稳定皖东北抗日民主局面

1940 年 3 月初，中原局、少奇同志决定调我去皖东北地区工作。中原局和少奇同志本人这时仍驻淮南。这时，淮甫我军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下，击退了桂顽李品仙部和苏北顽军韩德勤的进攻，建立了皖东抗日民主政权。

皖东北的抗战局面，是由几个方面的力量发展起来的。苏鲁豫皖特委利

用统战关系组成的人民抗日义勇队，是这个地区最早的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冬到1939年期间，党的山东分局派遣干部到苏北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将当地的地方武装组成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苏皖特委。以后又继续派干部组织皖东北特委。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进入灵璧、泗县境内活动。党的鄂豫皖省委派遣部分干部随国民党安徽第六区专员盛子瑾来皖东北，恢复地方政权，实行抗战。1939年7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派干部率部队东来，与八路军联系后，进一步与盛子瑾建立统战关系，建立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接着成立苏皖区党委，统一领导皖东北、苏北、邳睢铜、淮海、盐阜等地区的党的工作。区党委决心利用良好的统战条件，放手发展党领导的抗日进步力量，我党我军在皖东北逐步取得有利地位。

上述情况，引起了桂系顽因派李品仙对盛子瑾的疑忌，派顽军马馨亭东来，企图取代盛。我军各部采取联盛打马方针，在张爱萍同志指挥下，大柏圩一仗歼灭马部。桂顽安徽省政府撤销盛子瑾职务，并下令通缉。盛又见我党我军力量增强，发展个人势力无望，于是企图率嫡系部队他去，并骗扣我党干部作为掩护；他渡淮南逃后，为我军缴械，并礼送出境。皖东北我党我军当即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此，皖东北进入我党我军独立自主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

为了加强皖东北根据地军政工作的领导，少奇同志于1940年3月28日来信指示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刘瑞龙、江华、张爱萍、金明等同志为委员，以刘瑞龙为书记。少奇同志信中规定苏皖地区党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总的任务是，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河、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地区）成为我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汉奸的根据地，并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统一的抗日军队，统一的民众团体，坚持抗战。为达到这个任务，必须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半年内达到3万人枪以上。此外，坚决建立廉洁的（每月薪水20元以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自卫军、农工青妇救国会，发动群众革命积极性，解决部队给养及其他斗争任务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

刘少奇同志特别指示我们，为了能够顺利地进行上述工作，首先必须打破苏皖地区一切汉奸、投降派、顽固派、反共派对我们的阻碍。要坚决地大胆地扫荡苏皖地区一切汉奸、投降派、顽固派、反共派的势力。事先，少奇同志指示我们“打汉奸，必须是真正的汉奸，在敌伪组织中公开负责的大汉奸，才可逮捕惩办罚款。暗藏的敌探要逮捕。此外，顺民不是汉奸，不要逮捕罚款。”“对反共顽固分子，他们如果积极反对我军，当然就要肃清他们的势力（只是消灭他们的力量）。但要力争中间力量，要力求中立他们，不要采取过分激烈的办法。”他们之中有人即令反对我们，但还没有向我们进攻，我们都不要轻易打他们。朋友越多越好，敌人则越少越好。可以减少一些敌人，必须力求减少。”在扫荡反共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应当广泛地开展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争取中间势力，开展广大的群众运动，对一切人，只要，（1）不与日寇汉奸勾结反对抗日；（2）不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军队；（3）服从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政府即一律保护其生命财产不受侵犯。要坚决打击日寇伪军，提高我党我军的威信。少奇同志要求我们争取时间完成任务，要大刀阔斧地、迅速地、又是经过慎重考虑地、不是鲁莽地去解决斗争过程中已经成熟的各种任务。军政委员会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确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为了加快展开苏皖地区抗日反顽斗争的局面，帮助和指导军政委员会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少奇同志于 4 月下旬北渡淮河来到皖东北。正当我们开始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时，敌伪和顽固分子也同时对我发动进攻。5 月初，泗县敌伪奔袭我四总队驻地罗冈地区，因我事先得报转移，敌伪扑空。我军在胡桥战斗中，给由泗县出犯的敌伪狠狠打击，敌伪缩回泗城。苏北顽周派韩德勤乘机派遣顽军常备七旅王光夏部及其他部队，进犯我皖东北根据地腹地，一时地方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少奇同志亲自指挥八路军南进支队、苏支一大队和新四军六支四总队各团进行自卫反击。近 13 天的战斗，将王光夏顽军部队逐回泗阳、宿迁等县运河以东地区。从此皖东北根据地渐趋稳定。

在反对敌伪扫荡和自卫反击作战期间，皖东北麦已黄熟，陆续登场。少奇同志找我和区党委书记金明同志研究，指示我们要抓紧时机，发动群众保卫麦收，实行减租。区党委立即组织工作队，调查租佃关系，研究制定减租办法，发动群众组织农救会、工青妇各救国会、自卫队等等。

少奇同志要我们召集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和地方的党政干部会议，为我们专门作了题为《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他说：“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不仅是变敌后为前线，准备反攻的前进阵地与力量，支持与鼓舞全民族，还有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准备民主共和国基础的意义。”他在分析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和形势之后指出：“地形是无限制的，在敌后、山区可以，平原同样可以建立根据地。”报告对下列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精辟生动的解释，大大增强了广大干部建立和发展苏皖根据地的信心。

关于武装，“正规部队、地方武装、人民自卫军，一切行动军事化，适应游击战争的活动环境。部队要建立统一的指挥与建制。必须武装群众，人民自卫军必须在党的掌握之下。”“对汉奸武装、反民主武装、地主武装、民枪要采取不同的办法。要具体的解决我军各部队的军火、医院、粮食、经费等问题。”

关于政权，少奇同志详尽地阐明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产生方法、任务，施政方针，政权组织机构中的民主集中制，党如何领导政权并与党外人士共事以及政府与各方面的关系等。对于抗日民主政权的财政、经济、农工、锄奸、文化教育、外事等方面的政策，也作了说明。

在谈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众运动时，少奇同志要求我们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参加民主政治，参加抗日军队和政权建设，改善群众生活。他说，群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群众不是木头和机器。因此，他要求我们学习群众运动的三个原则：要尊重和发动群众的自动性去组织群众；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组织群众；要采取多种形式去组织群众。

少奇同志特别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的，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日寇想通过地主阶级统治农村，特别是利用大地主与地主当权派作为汉奸维持会的社会基础。国民党也是通过地主当权派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与我们争夺敌后政权。因此我们必须放手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削弱地主封建剥削，组织农民，武装农民，确立基本农民群众在农村的政治优势，孤立和打击地主当权派，争取中小地主、开明士绅，来铲除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农村统治的社会基础。”

少奇同志在谈话中，十分不满王明右倾路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做法。他说，例如他们在大别山区，专门替国民党撑门面、招兵、收钱粮、当苦力，

就是不发展自己的力量，结果，国民党不要我们时，就把我们一脚踢出大别山。他批驳了项英同志那种错误地反对招兵买马的观点。他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是人民的，人民承认它，这是最合法的。人民拥护我们，我们就能存在。少奇同志说，我看能招兵买马不错，能招到兵，能买到马就不错。他说，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我们还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少奇同志要我们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忽视自己独立力量的发展，不要丧失自己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独立性。他说，发展力量就是抓武装，抓政权，抓发动群众，抓财政经济，抓发展党，抓培养干部，这是我们的“六大宝”。“六大宝”的总体，就是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少奇同志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以后，又着重指出当时我们在地方工作上首要任务是进行减租减息，发动和组织群众。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原来只做一般宣传工作的工作团，这时才开始深入农村。

四、发民苏北与淮北根据地

少奇同志始终关心着苏北。1940 年 4 月中旬，他到罗冈来十天前就通知我们，还要详细地了解苏北的情况。他说，关于苏北的情况，我至今还不很清楚。请你们找详知苏北情况的同志，最好是亲身到过苏北的同志，即本地人，将阜宁、盐城、东台、宝应、两淮以南的同志找来。到你处等我，以备询问。少奇同志有一个脾气，一件重要事情没有弄清，总是放不下，总是要把它搞清楚。

六、七月间，我新四军渡江北上部队进至泰县郭村时，击退了数倍于我的顽军；在东进至泰兴县的黄桥镇时，在陈毅、粟裕同志指挥下，将进攻我军的韩德勤主力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大部歼灭。从此我新四军北上部队得以在苏北立足生根。

8 月，黄克诚同志率领八路军五纵队由津浦路西来皖东北。

9 月，东去淮海，在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 8 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苏皖区党委的同志和我随后也东去淮海，参加淮海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我们遵照少奇同志在皖东北的指示和毛主席为党中央写的《论政策》的指示，在淮海区党委统一部署下，积极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和整顿地方武装。10 月，新四军和八路军在盐城会师。从此打开了苏北、淮北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这时，少奇同志由淮南去盐城途经淮海，我和金明同志向他汇报了淮海区的工作，他嘱咐我们要抓紧时机巩固抗日阵地，肃清残匪和残顽，整顿武装和政权，加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和根据地的

各项建设工作。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共军向我淮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进攻。1 月 20 日，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任命新四军新的领导人的命令，任命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张云逸同志为副军长，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重建军部于盐城。豫皖苏边区由原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南下八路军一部组成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在路西进行了 3 个月的反顽斗争。

在这同时，我新四军三师部队由张爱萍同志指挥恢复了淮北津浦路东的

根据地。

4 月下旬，少奇同志通知我去盐城汇报淮海区的工作。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听了汇报后，告诉我四师在路西的反顽斗争中遭受暂时挫折，全部将转移到皖东北地区。全国大势，反共高潮已经下降，局势可能暂时好转。除江南反共军、淮南李品仙军已停止行动外，反共军汤恩伯、李仙洲等部队妄图东犯我根据地，由汪、蒋汇合的反共逆流严重冲击着华中根据地。我们必须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东进。要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同敌伪及反共军进行长期斗争。他着重指出：目前我党华中敌后的主要任务仍为建立与巩固根据地，群众工作为目前中心一环，必须抓紧来作。要在半年内，即从麦收到秋收期间，在我根据地内，至少组织 300 万以上的群众到各种团体和自卫队中去。少奇同志把盐城群众工作中不少新的经验作了总结。我听了他的报告，他嘱咐我们注意学习这些经验。

5 月 3 日，少奇同志就当前形势、根据地建设、抗日反顽斗争以及群众工作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写成长信，委托我向黄克诚、金明、张爱萍、韦国清、康志强等同志传达。

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党内的团结，同志之间的团结，并且最善于做团结的工作。他在同我们谈话或者写信给我们的时候，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我刚到皖东北工作的时候，由于我军各部来自不同方面，存在若干不协调的问题，少奇同志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跟同志们谈问题，非常耐心，以理服人，平等待人，而不是以中原局书记的口吻强加于人。少奇同志和我们谈话，经常讲到同志之间相处，应该是无话不谈，推诚相见，应该讲的话就一定要讲。不论对群众或者对干部，利用空闲时间，经常谈谈心，吹吹牛，摆摆龙门阵，是交流思想、互相了解、互相帮助的最好方法。

少奇同志曾写信特别指示我们要加强党内团结。他说：在处理同志间的相互关系时，应该提倡有原则的坚持与妥协。不负责任的批评要停止，无原则的为了个人目的拉这个人反对那个人，是错误的。一切损害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要受到处罚。团结战胜一切，团结即是力量。

关于部队党和地方党的团结，他在军部写的指示信中又告诫我们说：“为了任务的顺利完成与工作的顺利进行，部队的负责同志应与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好好团结起来。部队党与地方党的团结，是主要责成部队党的。重遇事商量，共同讨论，互相尊重，为一致的目标而奋斗。一切不尊重、不配合、各行其是的现象，均须避免，然后才能完成任务。否则在工作上的损失是不可计算的。”

从 1941 年 5 月初我与少奇同志在盐城分手到他离开华中局，一直到全国解放，我们就再没有见面了。但是，一个月后，他在盐城参议会的著名讲话，以及在这前后他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群众运动、党的建设等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和精湛著作，深刻地教育着我们参加敌后抗日斗争的这一代人，对当时的斗争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1942 年初，少奇同志经山东返回延安，他行前召开了华中局扩大会议，总结了华中敌后工作，部署了发展任务。还关心地函告华中局的领导同志要与山东取得联系。解放战争中，华东我军依凭山东，进取东南，证明了少奇同志的远见。

少奇同志进入华中敌后，与陈毅同志紧密协同，进一步坚决正确地贯彻

了党中央、毛主席发展华中的路线和方针，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发展华中任务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扭转了当时新四军面临的困难局面，造成了生气勃勃的主动进攻的迅速发展的局页。我过去只知道少奇同志曾在白区和苏区工作，有丰富的群众运动经验，这次和少奇同志一路到华中，并且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才使我深刻领会到他是我们党内有理论修养，重调查研究，有远见卓识，密切联系群众，有自我批评精神，有高度领导艺术，有细致组织才能，自奉俭朴的一位可敬的领导者。少奇同志在以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全部经历，进一步证明了他不愧为我们党的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的伟大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0 年 5 月作

1987 年 7 月改

在少奇同志指导下——华中根据地宣传教育工作回忆片断

王阑西

在我参加革命的 50 多年中，少奇同志是给我直接教育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党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多年。至今，他对工作所作的精辟的指示和浓重的湖南口音，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际。

少奇同志一向重视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的工作期间，尽管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他一直把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放在党的工作的重要位置。他特别强调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宣传工作要走在一切工作的前面，有了思想上的认识和觉悟，然后才能有行动。抗日宣传是抗日组织行动的第一步，有了这一步，才能进行抗日的实际行动。在 1939 年 2 月中的一次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会议上，他在讲“二七”大罢工斗争时就讲了这个问题。以后在加强区党委机关报《小消息》报的工作时又强调了这个观点，使中共鄂豫边区委下属各级领导加强了对《小消息》报的宣传工作。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他亲自到区党委宣传部了解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要求干部们重视宣传工作，抓好宣传工作的各个环节。

1939 年 11 月，在津浦路西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少奇同志和我谈工作的时候，他要我迅速筹备出版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江北版）。他指示，这个报纸很重要，要宣传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要通过《抗敌报》，把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看法和抗敌的具体任务、政策跟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变成广大群众抗日战争的自觉自愿行动。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这份报纸当时只能出油印版，但报纸出版后，仍然在群众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这个地区原是国民党的控制地区，群众对抗日的形势很不了解，在看到我们报纸后，抗日的认识和支持我们的抗日行动很快提高了，不仅对抗战有了要求，而且对国民党反动派所作的反共宣传也逐渐地认识清楚了。这个地区以后成为抗日根据地。随着中原局向津浦路东的转移，《抗敌报》也在津浦路东一带扩大了宣传影响。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1940 年 10 月，八路军一部和新四军在苏北会师，苏北盐阜、淮海地区和苏中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也在盐城建立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少奇同志为了加强对华中地区党的政策的宣传工作，又决定将《抗敌报》改为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机关报《江淮日报》，以统一华中地区的宣传工作。少奇同志亲自兼任社长。在以后的几年中，《江淮日报》担负了宣传华中局的政策、方针的任务。在华中局的领导下，在江淮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中，在对敌斗争、群众运动、统一战线、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及教育、地方工作建设等方面，《江淮日报》发挥了它的宣传力量，成为各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十分重要的读物。这时，少奇同志要求更高了，他要求《江淮日报》要面向一亿人口，要使报纸直接成为对敌伪顽斗争的武器，要对敌伪顽的反动言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当 1941 年 1 月，震撼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时，《江淮日报》及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当党中央发表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的时候，《江淮日报》又逐条发表专论，针对地方上的谣言据理力驳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树立了革命舆论。

1940 年 6 月 30 日，在党诞生 19 周年的前一日，少奇同志在新四军江北

政治部举行的 1000 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上，作了《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这个报告由我和甘柏记录，报告整理好以后，少奇同志又用了两天时间作了仔细修改，发表在七月上旬的《抗敌报》上，同时印行了单行本。这是在华中地区建党宣传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的一次讲话。这个讲话的记录发表后，成为华中地区党内一个十分重要的学习文件。

为了充分动员和发挥上层人士的抗日积极性，1941 年 6 月在盐城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的重要报告，阐明了我党的基本政策，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反共谰言。这次讲话，不但对广大抗日群众以极大的教育，同时也是对盐阜地区上层人士的一次很有针对性的教育。很多原来对我们尚有疑虑的参议员在听了报告后都解除了顾虑，大大增强了各抗日阶层的团结。报告记录在《江淮日报》上发表以后，比在会上反映更为强烈，报社编辑部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有的来信表示要求参加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还进一步驳斥了所听到的各种谰言。

少奇同志对教育工作也是非常重视的，在抗日战争的这几年中，少奇同志抓教育工作的三件事，给我很大启发和教育。

第一件事是在 1939 年初。那时，他到刚成立的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宣传部了解工作。在听了汇报后，他提出在学习中央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战争的指示的同时，要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重要著作，还提出区党委的负责同志要学习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编辑的《哲学选辑》，一般干部要学习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他强调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提倡学习要面向实际，干什么学什么，从实践中学习，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在和干部谈话中，他经常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启发大家怎样进行理论学习，并且结合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事例来引导干部采取正确的学习方法。

少奇同志还提倡，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干部中，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哲学。他亲自带头作为什么学哲学的报告，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哲学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指导作用和怎样进行学习。以后又具体指定区党委书记朱理治、历史学家范文澜等人和我，分别就哲学的党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唯物主义与革命辩证法等问题，作专题报告，并指定一些同志为学习辅导员。这样组织起来之后，干部学哲学的学习活动就发动起来了。在这次学习中，干部都大大提高了学习情绪，大部分同志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都能把学到的理论用于实践，尝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甜头。少奇同志提倡的这种学风，随着干部的交流而不断向各地传播开去，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很好的风气。

第二件事是在 1940 年 11 月。当中共盐阜区党委讨论群众工作时，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群众教育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当时，群众的觉悟程度还不高，还不懂得剥削与被剥削的道理，反而听信地主、资本家的鬼话，认为农民、工人都是地主、资本家养活的。针对这种情况，少奇同志指出，这就是对农民、工人最现实的教育问题，必须向群众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是农民、工人养活地主、资本家，而不是地主、资本家养活农民、工人。这样内容的教育就能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少奇同志号召要把这个观点摆在一切地区教育工作的首位，以此来驳斥地主、资本家的反动宣传。少奇同志

用“谁养活谁”的道理来启发和教育群众的做法，就是马列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论点的最通俗宣传，也就最容易得到基本群众的理解。

第三件事是 1942 年 12 月，少奇同志在盐城县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我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都亲自参加了会议。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教育工作对抗日战争十分重要，对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加重要，教育工作不发展是不可能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可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的。不发展教育，科学文化都不能发展，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少奇同志的讲话博得了到会的中学、大学校长、教师代表一阵阵的掌声，他们从这次会议和少奇同志的讲话中认识到共产党是要发展教育的，消除了国民党宣传共产党不要教育文化的诬蔑。少奇同志对教育工作的关怀，对发展华中地区抗日斗争和巩固根据地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教育工作本身，也是有力的推动。

少奇同志在强调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对文化艺术教育、出版通讯工作等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抗日战争的几年中，华中地区在少奇同志等领导的关怀和帮助下，先后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江淮出版社、江淮通讯社（后改为新华社华中分社），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委、华中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中华青年记者协会等机构和群众组织。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封锁下，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华中地区的抗日热情和各种文化活动，都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这同少奇同志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历史将永远记下少奇同志的这一功绩。

1988 年 3 月

共产党人的典范

刘澜涛

一

我很早就知道少奇同志的名字，但直接和他接触则是在 1944 年冬季。当时我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党中央报告晋察冀中央局的工作。到了延安，我去向少奇同志汇报。初次同他见面，开始我还有点拘束，感到他很严肃。没有多久，我就被他的热情、诚恳所感动。他对同志袒怀相见，肝胆相照，谈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就不再拘谨了。这次汇报，他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我深为我党有这样的领袖人物而由衷地高兴。

在延安和少奇同志接触中，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对毛泽东同志非常敬重。他从不宣扬自己，总是把我们党的业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而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拥护是出自内心的。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同志，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他作出了贡献。在延安，他拥护毛泽东同志，后来也一直是这样。1947 年他到晋察冀边区来，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开始，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近在咫尺，我们朝夕相处；建国后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在华北局工作，经常去向他请示汇报； 1953 年中央指定我列席政治局会议，八大后我调中央书记处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多，听到他无数次的讲话，他对毛泽东同志总是很尊敬的。甚至到了 1966 年 8 月，他到一所高等学校去，有人开会对他“批判”，我参加了这次会，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他的讲话，当时他仍然热情地拥护毛泽东同志，不以个人的进退荣辱改变初衷。他从来不以为自己屈居人下，相反地，他总感到自己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贡献不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的献身精神，曾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文化大革命”中，万恶的林彪、“四人帮”诬蔑少奇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是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而制造的无耻谎言。事实上在我们党内，首先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正是少奇同志。遵义会议以后，正确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组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还有影响，许多党员思想不纯，作风不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严重存在。为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统一全党思想，进行了延安整风，后来，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明确地、全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他对毛泽东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它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少奇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精辟论述，写入了七大的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这是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又使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在全党受到公认。他是代表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给予正确评价的。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全党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才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伟

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少奇同志的一项重大功绩。这些铁的事实，最有力地驳斥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对少奇同志的诽谤和诬蔑。

少奇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是把他作为党的杰出领袖来拥护，而不是作为神来信奉的。他从来不相信世间有超人的圣人。他肯定革命领袖的重要作用，又认为任何领袖和英雄，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只能做一部分的工作，尽一部分的责任。共产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长期集体创造的事业，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他反对夸张领袖的作用和把领袖神化的做法。他忠于毛泽东思想，同时又科学地解释毛泽东思想。虽然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我们全党的集体创造，全党智慧的结晶，但在他的谈话中，已隐约包含有这样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他遭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有人说他早在 1947 年在晋察冀边区时，就反对毛泽东同志。这是对事实的蓄意歪曲。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边区群众写了“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饮水不忘掘井人”等标语。我们晋察冀边区下级党组织某些文件中，也出现这样的词句。少奇同志说：人民贴出这样的标语，是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们党内的文件有这样的词句，也是表现了干部朴素的阶级感情，这是很可贵的。但是应当认识，救星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党。那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少奇同志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提高了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从和少奇同志多年接触中感到，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有高度的党性原则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三十多年前他能这样解释问题，是他高度原则性的表现，也是他真正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表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事实说明，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把毛泽东同志神化，损害了毛泽东同志崇高形象和歪曲了毛泽东思想的林彪、“四人帮”这伙反革命分子。

二

少奇同志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原则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他非常尊重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非常尊重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注意党的团结和统一。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对重大事情的决定，都尊重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他指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最高原则。”他确实是身体力行，说到做到的。他的组织纪律性强，处处都表现出来。党中央正在讨论而还没有作出决定的事情，他从不随便对别人说。他从不背后议论张三长李四短，对同志有意见，就摆到桌面上谈。他爱憎分明，既坚持原则，又善于灵活处理问题，在党内斗争中，他对于怙恶不悛、坚持错误的反党头子，是疾恶如仇的，但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则热情教育，耐心帮助。他谆谆教导广大党员对同志要团结，即使是对犯了原则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愿意改正，就应平心静气地帮助他，不是非给他打击处分不可。他要求党员和干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特别反对那种把非本质问题当作原则分歧硬要把某些同志当作机会主义的“靶子”来打的做法。他告诫共产党员不要有斗争的嗜好，不要捕风捉影地乱斗一阵。在处理党内斗争中。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对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意识修养问题，作了十分深刻和全面的阐发，对党员的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自己所说的话，自己首先实行，而不是只对人不对己。古话说，文如其人，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少奇

同志思想意识和作风的真实写照。少奇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是我们党的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样一个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却受到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的恶毒攻击。康生本来是《刘少奇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62 年，也是他主张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撕下了他几十年的假面具，捏造事实诬陷少奇同志，第一个叫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黑《修养》”，充分暴露了他的阴谋家、两面派的反革命嘴脸。

少奇同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忘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革命事业，他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他是建党初期著名的职工运动领袖，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他挺身而出，不避斧钺，在第一线和工人群众一起，同反动军阀、官僚、买办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取得了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国职工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是后来知道这些情况的，对他十分敬仰。1936 年春，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包括彭真同志等），巩固和发展了党所领导的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以北平为中心，掀起了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不仅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于发展、壮大我们党的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结合，也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他领导这场斗争，巧妙地运用合法斗争的形式，既达到了我们的政治目的，自己又没有受到损失，这在白区斗争中是不容易做到的，是他具有高度的领导水平的结果。党中央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肯定了少奇同志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少奇同志再一个突出特点，是他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在革命斗争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总是坚定不移，百折不回；一旦发现错误，能够迅速纠正。他绝不是那种从来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的人，更不会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是在不断接受经验教训中前进的。这方面他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1947 年，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到晋察冀边区组织中央工委，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在整党中，河北省平山县在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时，采取了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的会议的方式，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曾被毛泽东同志肯定为“平山经验”。这一经验是在少奇同志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他却把成绩也归于晋察冀中央局的同志。在土改中出现了问题，他则主动承担责任。当时我们对土改的重大意义是认识的，但是缺乏实际经验。起先在一小部分地区作典型试验，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政策界限也不十分清楚，少奇同志来讲了话，着重讲了有关土改的政策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晋察冀边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讲话中也有过头的地方。后来，我们在河北阜平等地作试点，工作一铺开，不到半个月，发生了问题，许多地方没等工作组进村，群众就自动搞起来，来势很猛。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对地主乱斗乱杀，违反了党的政策。发现这一情况后，我很快向他报告，他明确地指出：第一要紧急煞车；第二不要责备下面干部，由他承担责任。他一再说，工作中出了毛病，大家很紧张，不能光是指责。他这么一说，干部感到压力轻了。他并且帮助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这年夏秋，中央在晋察冀边区召开全国土地

工作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会议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下，由少奇同志主持的。会上他把边区土改的经验提高到政策上来总结，认真地、坦率地接受土改中的教训。这件事对晋察冀边区的干部教育很大。

三

少奇同志经常告诫我们，在党内，在人民中，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是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他身居高位，生活上却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亲自遇到的几件事情，三十多年了还是记忆犹新。

1947 年春天他和朱德同志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来时，我到山西五台迎接他们。这一带都是山路，很不好走。在五台和阜平交界的地方，经过一座木桥，少奇同志的乘马失了前蹄，竟使他跌到河里。当时我很紧张。幸亏桥不高，河水也不太深，他没受伤，但大衣已湿透了。地方的同志送一件新大衣请他穿上，临走时他还是穿起那件半干半湿的大衣。同志们一再劝他更换，他坚决不肯。部队和地方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很感动地说：中央领导同志真是处处给我们做榜样！

少奇同志有胃病。1947 年夏秋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时，他胃病发作得很厉害，大热天还用暖水袋紧贴在肚子上。同志们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给他稍微改善一点伙食。他总是不肯。他说，边区经济困难，不能为他另做饭菜。这使周围的同志既感动又难过。

少奇同志自己艰苦朴素，同时也很注意对干部进行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的教育。他和朱德同志到晋察冀边区时，我们在中央局所在地旱平县城南庄召开了欢迎会，有干部、部队、党员、群众和民兵代表参加，会上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边区干部、群众看到中央领导同志到来，都非常高兴，所以这次会开得既隆重又热烈，但会场布置却很简单。会是在树林里开的，只向老乡借几张桌子、条凳，没有别的陈设。与平时不同的是多了一块用新红布写的欢迎大会的横幅。就为着这块新红布，会后少奇同志对我们说：中央的同志来了，你们的心情和我们一样，都很高兴。但现在是战争年代，物资困难，为什么要用新红布写字呢？他接着说：一斤米，一寸布，一文钱，都要用于战争，不应随便浪费。少奇同志这些话深深地刻印在我脑海中，几十年后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另有一次，他到阜平温泉洗澡治病，这里房子很差，后勤的同志给做了个布帘。少奇同志看到后，对陪着他来的同志说：老百姓哪家有门帘？把门关上不就行了吗？做这个门帘浪费了。这两件事情都不大，但他并没有忽略，可见他随时随地注意节约，反对浪费。有的人认为，铺张浪费，追求享受不是政治问题，没有什么了不得，这种思想是极为有害的。生活问题往往是一个人世界观的反映，道德面貌的反映。少奇同志这样的伟大的政治家如此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不认真对待呢？

少奇同志在处境极为艰险的时候，仍然充满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信任。他曾经说过：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样，历史总是要还它的本来面目的。时隔十余年，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对这位伟大的革命者的堆如雪山的谎言，终被真理的阳光彻底融化。人民如实地重新写了少奇同志的历史。少奇同志在人民心目中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秃产阶级革命家。我们要永远学习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学习他耗

尽毕生心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学习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以具体行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繁荣昌盛，富强发达，以纪念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敬爱的少奇同志。

1980 年 5 月作
1987 年 7 月改

难忘的教诲

于光远

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年轻党员，对少奇同志怀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他们知道，是少奇同志纠正了当时年轻党员中由于幼稚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白区工作中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某些过火的行动，是少奇同志给他们的斗争以直接的正确的指导，使运动得到健康的发展。他们从发表的文章中看到少奇同志对“一二·九”运动所作的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限于青年运动的发展，“一二·九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起着与红军长征和革命根据地斗争相配合的作用，这两件事标志着中国反动时期的结束和新的革命时期的到来。他们也感到少奇同志一直在关怀着这一代干部。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由少奇同志提名，把在“一二·九”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李昌同志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作为这次大会的代表，我认识到这不仅表示他对某一位同志的看法，主要地是表示他对这一代青年干部历史贡献的又一次肯定。

这些，只是从少奇同志和“一二·九”运动的关系来说的情感。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年轻党员对少奇同志的崇敬，从根本上说，当然因为他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因为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党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因为他给我们后来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

我入党比较迟。1937 年抗日战争的前夕我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工作时，才听说刘少奇这个名字。民先总队部党团（现在叫党组）是北方局领导的，但我没有见到过少奇同志。党的白区工作十分注意党的领导人的安全，每个党员能够接触的是直接领导自己的上级负责人，没有必要，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一般说来是见不着的。就是直接领导民先总队部党团的彭真同志，抗战前我在北乎工作时也没有见过。1937 年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我和赵德尊同志离开北平到保定，以民先总队部名义与全国各地民先地方队部和海外队部联系，继续开展工作。7 月底北平沦陷，我从北乎越过日寇占领的西郊，到了保定，才第一次见到彭真同志。抗战前在北平的时候，我就知道少奇同志是北方局的最高领导，知道 K.v.是少奇同志的笔名。以后又读到他用华云、陶尚行等笔名写的其他文章。这样的文章，得到一篇我就反复地阅读，感到每一篇文章都对斗争的客观形势以及我们斗争的目标、斗争的策略等讲得非常深刻、非常透彻，也很具体、很实在，使得我相信自己是处在一个坚强有力的人的领导之下，心里非常踏实。离开北平以后，在保定，彭真同志指示我去太原，要我在太原组织民先全国临时总队部。后来李昌等同志从北平列太原，民先总队部正式迁到太原，我被北方局和民先总队部派往武汉继续做民先总队部工作。在抗战开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中，在精神上我感到仍是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的，因而我一直有上面说的那样的心情。

我有幸和少奇同志见面直接听取他的教诲，是在 1947 年。这年年初我参加了一个只有 10 多个人组成的“中央土改工作团”。我们在晋绥保德县新畦村搞了一期土改之后，到了河北平山县，选择了滹沱河边的一个大村贾峪，进行土改试点。1947 年 3 月，中央决定以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解决土改政策不彻底、党

内不纯与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指导各解放区土改迅速地健康地发展，是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一项中心任务。中央工委的所在地是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少奇同志就住在这个村庄。贾峪村与西柏坡村非常近，中间只隔一个东柏坡村。从贾峪村到西柏坡村，步行要不了半小时。由于这个地理条件，更由于我们在贾峪村的工作带有为全国土地会议作准备的性质，我就有比较多的机会见到少奇同志，听到他的工作指示。接着我又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个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这个会开得很长，从 7 月 17 日到 9 月开了将近两个月。在会上少奇同志多次发言和插话。听他的讲话，常常唤起我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阅读 K.v.文章时的印象。

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我继续在贾峪村按用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进行土改。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其他同志也在西柏坡附近其他村庄工作。中央工委把贾峪等村作为研究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试点。少奇同志经常注意这些村庄的土地情况。10 月 19 日，少奇同志在西柏坡住房里接见了“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全体成员。我们这个工作团的成员提出不少问题。对每一个问题，少奇同志都作了详细的答复。我对这次长篇谈话作了记录。在这次谈话中，他不仅对平分土地的政策作了进一步透彻的说明，而且对以后实行人民代表制度讲了许多具体的设想。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农村中的经济制度，也发表了他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这次谈话对于研究少奇同志的思想，是一个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材料。

我想对这次谈话中讲的一个问题作一些介绍。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一些特点。

在那次谈话前，我在贾峪的工作中了解到，对土地法大纲中提出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干部和群众思想不那么通，要求给地主、富农少分土地的思想很强烈。在那次会议上我向少奇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向他请示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少奇同志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说：“平好，不好反驳，不好反对，毛病最少。群众一定要保持某种不绝对平，则也可以允许。但如果有争论，仍以‘平’来解决问题。在平分土地时，要给地主富农留得同样一份土地。”这段话经过他一解释，我就觉得充满着辩证的思维。他说：“南庄（西柏坡南的一个村）地主百分之八十是抗属于属。如果我们的老子饿饭，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当权的政党，对和尚、尼姑、婊子都要负责，对地主、富农也要负责。给地主、富农分一份土地，不是照顾地主、富农，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要坚持法令解决问题，不能说应该不平一些。因为我们是做领导工作的，如果我们说可以不平一点，可以不按法令办，那就变动大了。”这些话，讲的是原则。但是少奇同志是非常讲求实际的。他接着说，如果“老百姓硬是不赞成平，实在要少分一些地给地主富农，可以依百姓的决定，但是我们应该声明，我们的方针是‘平’，‘不平’是你们的主张，不是我们的主张。因为我在这里，我可以替你们负一点责任，但这是你们做的，不是我们做的”。这就是“群众一定要保持某种不绝对平”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能勉强群众接受我们党的主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少奇同志是十分重视农民利益的，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他还从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来看党坚持平分土地政策的好处。他说：如果这个村是“贫雇农当权”，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坚持“平”这个原则，“不必主张不平，地富仍然会少分到地，贫雇农仍然会多分到土地，如果地富及其走狗当权，我们不坚持法令，允许一些不‘平’，那就一

定是地富多分”。他还说，“即使在贫雇农当权的地方，我们也不要提可以不平，因为这样做，破坏了法令的严肃性”。

还有一件事，我想特别讲一下，因为它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上一次谈话后不久，当我们中央土改工作团即将离开平山继续向东往冀中渤海等地的时候，我考虑到，按照党的工作方法，我们这工作团虽然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而且在团员中有不少是革命历史很长、地位较高的老同志，象我这样年轻的同志只有四个人（其中一位是毛岸英，他比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年轻同志又小几岁），但是到地方去工作，仍然要在当地党组织，比如在地委、县委领导下进行某一个村、某一个乡的土改工作，因此可能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它发出的指示不正确，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我就约另外一位年轻同志去西柏坡，闯进少奇同志的住所，提出了一个“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一次，少奇同志对我们悦的话虽然不多，可是我记得非常牢固。我觉得所讲的那个道理对我很有用处。少奇同志听我把问题提出来之后，略为思考了一下说：“你们不要一般地、抽象地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用处。国民党的法律，从表面上看，对地主和农民也还是‘平等’的，但是县政府在办案时，如果地主告状，他们就雷厉风行，没有官僚主义，如果农民告状，他们就搞官僚主义。这样地主就会感到这个县政府、这个衙门是自己的。现在我们搞了一个《土地法大纲》。在这个《土地法大纲》面前，地主农民也是‘平等’的。地主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土地法大纲》到我们县政府告农民的状。在地主到我们的县政府来告状时，我们就可以搞点官僚主义，而农民来告状时，我们的政府就一定要雷厉风行。这样，农民就会感到我们的县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我觉得这一段话讲得很精彩。接着他还讲了一段给我留下印象更深刻、记得更牢固、在以后工作中对自己更有意义的话：“你们在中央土改工作团做了半年来工作，又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中央精神你们是很了解的。你们也有自己的脑子，可以去分析、去判断你去的那个地方的党组织的某些指示是不是官僚主义的。你们应该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知道哪些指示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是官僚主义的。如果你作出了这样的判断，那么你们就不应该把这些指示当作党的指示，而应该视作官僚主义的‘指示’。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以向地委、县委讲自己的意思，提自己的建议。但是你们也要有精神准备，尽管你们反对，也不能把人家的官僚主义的指示反对掉。而且，你们也不好老提意见嘛！老提意见也不一定合适，即便如此，你们也要注意不能把他们的指示奉为神明、坚决去贯彻它。你们如何去处理才得当，这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地去处理。而且要做好，也许不那么容易，要看你们的本事。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决不要把官僚主义的指示奉为神明去贯彻。如果你们那样去做，你们自己就成为官僚主义者了。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作为嘛。”这一段话我一直记在心头，不敢去做那种把官僚主义的指示奉为神明的官僚主义者。可惜的是，那时我没有做记录，他讲得比我记得的还要多些，但是上面那些我是记得非常清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和改革相适应，我们的思想 作风、工作作风要有很大的转变。现在，那种对工作不负责任，只要是上面来的“指示”，尽管明显地与中央精神不符合、是官僚主义的东西，也机械地执行的现象是很盛行的，因而使官僚主义得不到抵制。看到这种情况时，我常常想到少奇同志的这一

席话。

1988 年 3 月作

少奇同志和铁道游击队

杜季伟 刘金山 王志胜

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1942 年深秋的一天，我们铁道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护送一批干部过津浦铁路。当天夜里，他们便来到我们预定的宿营点小北庄。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次过路的干部都是谁，直到第二天上午，才知道刘少奇同志也在这批干部中，他是经过这里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

一听说这批干部中有刘少奇同志，队员们沸腾起来了。大家在议论着：能见见这位深受战士和人民尊敬和爱戴的首长，够多好啊！但又一想，刘少奇同志昨天夜里跋涉了近百里路程，一夜没睡觉，今天晚上还要过铁路，自天应该让他好好休息才对，怎么能再去打搅他呢？

但是，刘少奇同志非常了解我们的心思。下午，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少奇同志要见见我们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大家一听，别提多高兴了。我们三人便和负责护送的十几个队员，一起到了少奇同志的住处。

刘少奇同志笑容满面地同我们一一亲切握手。他一边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询问我们的名字和生活情况，我们一一回答着，屋子里的气氛十分轻松活跃。我们把铁道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向刘少奇同志做了汇报，他认真听着。听完以后，他表扬了我们的斗争成绩，同时也指出了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他强调说：“群众是我们开展游击活动的基础，基础打不好，就立不住脚。立不住脚，又怎么谈得上狠狠地打击敌人呢？你们说对不对呀？”我们都知道，刘少奇同志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在如何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方面，是有着很高的领导艺术的，我们用心聆听他的讲话。他又说：“你们在敌占区是不是可以建立一批‘基点村’？所谓‘基点村’，一是要把村里的群众基础打好，使群众都拥护我们：二是村里要有坚强的骨干，要注意发展党员；三是能掌握住与敌伪通气挂钩的人。这样的村子越多，我们的活动范围就越大，我们的基础就越牢。”最后，他又向大家讲了世界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讲了我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他说：“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就要过去了，战略反攻就要开始。现在，就好比是黎明前的黑暗，天越黑，离天亮就越近。只要我们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团结奋战，就一定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一个美好、幸福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刘少奇同志的话字字句句铿锵有力，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感到心里亮堂多了，眼界开阔多了。大家似乎从他那坚毅的表情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经过千百次艰苦奋斗即将获得伟大胜利的光辉。

第二天晚上，雾气弥漫，夜色沉沉，月牙儿昏暗地挂在西天，铁路两旁的敌碉堡里闪着鬼火一样的灯光。我们十几个队员连同过路干部一行二十几个同志，悄悄地离开了庄子，按照预先精心选择的过路点——在沙沟到临城（即现在的薛城）之间的干沙河处，穿越铁路线，直奔微山湖。当我们走到离铁路还有三四百米时，突然从北面闪过来一道白光，鬼子的一辆摩托卡巡逻车从临城方向驶过来了。车上的探照灯的强烈光束在我们头上扫来扫去，一挺轻机枪漫无目标地嗒嗒地扫射着。我们赶快沿着沙柯边隐蔽下来，以防万一。

“这是敌人在虚张声势。”刘少奇同志低声但却十分坚定有力他说，“别

看鬼子表页上那么嚣张、猖狂；其实是在为自己壮胆，这正说明他们内心十分空虚、害怕。”

巡逻车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瞎打了一阵机枪，又突突突地向沙沟方向开去了。铁路两边又恢复了平静。

我们赶忙以战斗的姿态，护卫着刘少奇同志，沿着干沙河，一溜小跑，从涵洞穿过了铁路。接着离开千沙河，避开大道，插向小路，直向微山湖边挺进。

我们一口气又走出七八里路，再没有发现敌情，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这时，刘少寄同志又把我们三人叫到他跟前，一边走一边对我们说：“现在，鬼子控制了铁路交通线，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妄图割断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延安同山东、华中根据地的联系目前只有这一个口子，你们要用一切努力，保住这条交通线。今后，铁道游击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护送东西过往的干部。”

当我们说到有的队员感到执行这样的任务不如打仗扒车过瘾时，刘少奇同志说：“要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明确护送干部这个任务完成好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比你们开展军事斗争对革命的贡献更大。”

我们同刘少奇同志一边走一边谈，不一会使来到微山湖边的蒋集镇，等候冀鲁豫军区黄河大队的同志前来接应。这时，联络站交通员报告说，附近的几个敌据点又增加了鬼子。我们考虑到刘少奇同志的安全，决定住在微山湖里的船上过一昼夜，等天黑后再到湖西去。少奇同志同意了这个安排。我们便弄来三条小般，队长、政委同少奇同志乘一条船，其他伺志分乘另外两条船，一起划进湖里的隐蔽地方。

第三天晚上，我们正准备送少奇同志去湖西，不料发生敌情，鬼子在湖西一带疯狂扫荡，封锁严密，上级指示暂不要通过。这样，我们便在湖上同刘少奇同志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十多天。

在微山湖的这些天里，因为有敌人扫荡、封锁，生活极端艰苦，有时几顿吃不上饭。刘少奇同志和我们一样地吃野生的藕片充饥。有一次，我们专门为他煮了小米饭，他怎么也不肯一个人吃，硬要我们和他一起吃。到了夜里，小船舱里住不下那么多人，我们便睡在舱面上，让少奇同志睡在伸不开腿的船舱内。少奇同志极其关怀我们，亲自把他的一件大衣、一条毯子盖在我们的身上。他那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使我们永难忘怀。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少奇同志依然不知疲倦地工作，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还多次给我们讲全国、山东的抗战形势，讲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战术思想；有时还向掩护我们的渔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刘少奇同志对铁道游击队的成长、壮大非常关心，在湖上同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多次给我们作指示。我们记得最深的是，有一次少奇同志叫我们三条船靠拢一起，他坐在船头上，详细地指示我们如何扩大、巩固根据地，如何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他说：“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我看要注意三条：一条，既要有力地打击敌人，又不要过于暴露自己，做到出其不意，掌握主动。另一条，对伪组织上层分子，如伪保长、伪乡长等，要把打与拉结合起来。坏的不打不行，但光打不拉也不行，在敌占区斗争要讲策略。百一条，铁道游击队要重视游击区的建设。”讲到这里，刘少奇同志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蜘蛛在网上为什么能蹲得住，就因为它拉了网，这网就是它的根据地，小飞虫撞上来，一触网就粘住了。我们打游击，也要学蜘蛛拉网，

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有人、有粮，就能在群众中站住脚。”刘少奇同志这些亲切的教导，成了我们胜利斗争时武器。当时，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伪化严重，斗争十分艰苦，周旋余地不大，活动很困难。我们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讲究斗争策略，重视游击区建设，首先改变过去对伪组织上层分子光打不拉的做法，做好争取工作。斗争证明，这样做，一些伪保长、伪乡长被争取过来后，表面上仍是鬼子的人，实际上成了为我们办事的人，一有敌情，他们就向我们报告，使我们游击队的活动自如，打击鬼子更加有力，弄得鬼子非常被动，处处挨打。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革命斗争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铁道游击队的谆谆教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永远怀念刘少奇同志：

1980 年 3 月作
1988 年 2 月改

回忆少奇同志对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

曾克林

1945 年，当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后，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为了创建一个和平、民主的新社会，毅然到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当时，少奇同志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就在这年的 9 月，我从东北乘飞机到延安，向少奇同志和党中央作了一次难忘的汇报。几十年过去了，少奇同志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1945 年 8 月，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在我抗日军民 8 年的英勇抗战和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象春风一样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时，八路军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我军迅速行动，去接受日伪军投降。同时，命令原在冀热辽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立即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器，接管东北城市，维持社会治安。李运昌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冀东丰润县左家坞附近大王屯开会研究，决定分几路向东北进军。十三军分区向承德方向，十五军分区向赤峰方向。我和唐凯同志奉命带领第十六军分区的部队从冀东出发，向沈阳进军。一路上，我们接管了绥中，打下了山海夫，解放了锦州，沿途共接管了 13 个县、两个市。接着，进驻了沈阳。

当时，沈阳的局面很复杂，伪满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先遣军”，伪省长当了维持会会长，反动武装蠢蠢欲动，汉奸、土匪十分猖獗。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我们及时组织了沈阳市卫戍司令部，由我担任司令员，同时，组织新政府，由焦若愚同志任市长。及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初步控制了局面。

但是，我们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也是第一次接管这么大的城市，面前重重困难，我们深深感到力不胜任。因此，几个领导同志聚在一起，总是谈着，党中央何时派人前来？关里的主力部队何时到达？我们曾数次用电台同晋察冀军区和延安联系，但因功率低，都没联系上。为了早一天得到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冀热辽军区前委决定让我去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

9 月 14 日，我从沈阳北陵机场乘苏军飞机出发， 15 日上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当我回到离别了 8 年的党中央所在地时，就象孩子投身于母亲的温暖怀抱，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幸福。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陆后，杨尚昆、伍修权同志迎接我，并安排了食宿。接着，汽车把我送到王家坪，并在那里吃了午饭。

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彭真同志带我到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彭德怀、叶剑英、任弼时、陈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高兴地站起来同我握手。少奇同志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可亲。当年在长征路上，我在中央警卫营工作时多次受到少奇同志的亲切教诲，今天再次见到少奇同志，感到格外亲切。我连忙走过去，向他敬了个礼，少奇同志微笑着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接着，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少奇同志首先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收缴日伪武器，扩大人

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维持治安，肃清土匪，建立根据地，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加强全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到来。少奇同志接着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你淡谈东北情况，越详细越好。当时，我就向少奇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我带领的部队进军东北，沿途接管各城市和进驻沈阳的经过，以及部队发展壮大的情况。在我汇报过程中，少奇同志一边抽着烟，一边静静地听，眉宇间不时流露出喜悦的表情。在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少奇同志几次插话，他指着地图说：东北是战略要地，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邻蒙古，有山区，有大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少奇同志还说：东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国民党一定不死心，会派大量军队争夺东北。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力争这个战略地区。少奇同志作着有力的手势说：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的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讲到这里，少奇同志的目光中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他指出：杭日战争开始时，毛主席就预料，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现在抗战胜利了，只要我们继续战斗下去，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少奇同志还表扬我们冀热辽军区的部队行动快，进展迅速。在我汇报结束后，中央负责同志又提出好多问题来问我。他们特别询问了东北人民的生活。少奇同志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当了亡国奴，他们的生活苦呀！朱总司令也说：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压迫，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党和人民军队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

当天晚上，我和少奇同志等中央首长一起吃了饭，席间，彭总对我说：你们首先进入东北，是有功的，希望你们以后多搞点武器和大炮。过去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没有大炮，敌人就欺侮我们。今后我们有了大炮，力量大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就守不住了。临走时，我还把随身带的手枪、子弹及里远镜留给叶总作纪念。

第二天一早，彭真同志告诉我，他和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同志马上要和我一起乘飞机到东北去。他还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已作出新的战略决策：为了加强东北的力量，完成控制东北的任务，中央决定将原来计划派到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改派到东北去，并从各解放区抽调 10 万主力部队和几万干部到东北，同时还将派 20 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加强东北的领导工作。听到党中央这一重大决定，我非常高兴和激动。

当我们回到沈阳的时候，冀热辽军区李运昌司令员和东北抗联的周保中、冯仲云等负责同志已经来了。我把情况向李运昌同志和唐凯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了都很高兴。不久，中央又陆续派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肖劲光、程子华、谭政、李立三、林枫、陶铸、刘亚楼等领导同志加强东北领导。黄克诚、吕正操、肖华、邓华、万毅等领导同志率领的主力部队也到达东北。从此，我们在党中央和彭真同志为首的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展开了接管工作。北至齐齐哈尔、佳木斯、哈尔滨，南到安东、营口、旅大，

东至抚顺、吉林，西到承德、赤峰、锦州、山海关，到处都有八路军部队。同时，我们根据七大精神和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开展反好清算、减租减息运动，消灭土匪、敌伪残余势力，建立东北全区和各地民生政权。东北人民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大批失业的产业工人踊跃参军，加上出关部队作骨干，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仅我们冀热辽军区出关的部队就扩大发展到 10 余万人,组建了 12 个旅。到 1945 年底，各解放区的出关部队（包括抗联部队）已发展到 40 余万人，东北的形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歼灭了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彻底解放了全东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回忆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情景，缅怀少奇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对东北局势作出的战略决策，我深深感到：少奇同志不仅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当年少奇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论述，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展望，是多么英明正确！

1980 年 5 月作

1987 年 12 月改

“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回忆刘少奇同志的一次演讲

黄　钢

刘少奇同志 1945 年 10 月工日在延安枣园短短的一篇演说，就象是不可泯灭的一面铜雕，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那时候，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见刘少奇同志。这是 1945 年日本投降启不久，9 月底，地点是延安枣园毛主席住的窑洞邻近的那一间宽敞的大厅中。

过去，我们来这里参加晚会，听过报告，恩来同志从大后方重庆飞返延安时，在这里召见过我们（延安）“枣园文工团”的文艺战士。现在，我们中共中央警卫团按照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新编成了一个干部团，马上要出发到东北战场上，去参加收复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战斗去了。这是在出发的前夕，少奇同志特来给我们致词、送别。

还在这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东北后，我冀热辽军区奉延安总部之命，挺进东北直接配合苏军作战。随即，分别解放了热河全省，接收了承德、赤峰，攻克了山海关，接管了锦州、沈阳。9 月中旬，党中央在听取了由沈阳飞赴延安的曾克林同志的汇报后，在少奇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伟大战略决策。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从各解放区抽调 10 万主力部队和 2 万名干部（包括 21 名中央委员）开赴东北，开创东北地区的新局面。

这就是说，自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短短的半个月内，我党我军的战略形势和战略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少奇同志就是在这种战略转折的关头，来枣园大厅里为我们这些奔赴东北的战士们送行——

当我们三百多人都在枣园这个自己亲手建起的大厅内集合、席地而坐之后，少奇同志侧着身子，从大厅的一扇旁门里走出来（他穿着延安自制的深色的干部眼），由身穿褐黄色呢子军服的朱德总司令陪着他。很快就宣布讲话的时候，会场上静悄悄的——那时候，在一般情况下，还不作兴后来盛行的那种领导人入场时掀起迎接的掌声。

少奇同志的送别辞，开场的话语，很简短，只是说：同志们听从中央的决定，要到东北去了，要我来讲几句话。说到这里，他的话音停顿了，好象少奇同志自己在那里思索起来……

“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少奇同志稍停之后，向大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同时作了一个提问时启发式的手势：轻轻地、缓慢地、把他的右手自下而上地抬起了一些。接着，他又问道——

“恩格斯是干什么的呢？”这一问句的提出，距离前一句，有一个不小的间距；在这间距中，少奇同志的思索，好象更加深沉了：他把手臂重复地引向了前方。

少奇同志向道：“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呢广这时节，他有力地摔出了右臂，把手面挥向上空。然后自己回答说：

“他们，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

继续说下去，少奇同志眼中的光芒更锐利了，改变了他进场则那种温静的神态；他的整个脸容是炽烈而坚定的。我坐在地板上警卫干部团第一排的位置，看见少奇同志惯常爱戴的鸭舌帽前沿下，已经渗出了汗珠。9 月末 10

月初，这在延安，已经是趋向秋凉的季候了；看来，现在已经敞开了他那黑色呢质干部服上装的少奇同志，这番讲话，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富有深情的。他接着说——

“按照马克思学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他们自己最后才能解放。你们这次到东北去，同时是自己解放自己！”

我们这些即将出发远行的指战员都知道，少奇同志这番话，所指的首先是要我们从国民党政府反共的反动“军令”下面解放出来：蒋介石当时曾“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我们到各个敌占区去接受日伪的投降，这种荒谬的限制，已遭到我党和朱德总司令的痛斥。

少奇同志说：“你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去重新画地图；用你们自己的两只手，去插上我们新解放区的旗帜！”这是少奇同志讲到我们将要从延安开始的长途跋涉，讲到我军指战员是用两条腿走路而同蒋介石军队的飞机坦克装甲车竞争时间时赠给我们的警句。以后，我们在千里行军的长途中，几乎每天都想起和重复这两句精炼传神的话语——它对我们，成了铭刻心头的战斗动员令。

少奇同志又继续提出了问题：“你们到了东北，要靠什么呢？你们没有美式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和汽车，暂时还没有铁道线和火车；你们就是有一条——这一条他们手里就没有：就是要紧紧地依靠马克思主义，紧密地依靠东北当地的人民。只要你们永远牢牢地记着，马克思是干什么的，那，同志们，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大厅里立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少奇同志这一席短短的临别赠言，不过只有五分钟，可是，它却叫我们全团的干部们都热血沸腾了！

“祝你们一路顺风，到东北旗开得胜！”刘少奇同志最后结束了他这篇极其简短的演说。

席地而坐的我团指战员，此刻都霍然地站立起来，高唱出《国际歌》，高唱起《八路军进行曲》。这时候，朱德总司令和少奇同志，也同我们一起肃立，高唱着这两支我党我军所独有（而又被千百万国际无产者和我国革命群众所传诵）的歌曲——这些动人心魄的歌曲呵，她是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是我们行动和理想的“宪章”，是我们必将取得胜利而又不可战胜的凯歌！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整队步行出发了。这天出发时，我们整个警卫干部团，只有屈指可数的很少几支破烂长短枪。

此后不过 3 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就在新创建的东北解放区战场上，经过了全体军民的努力奋战，经过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正确领导和指挥，终于赢得了全歼侵入该区的强敌和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的胜利。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少奇同志说过的箴言：“要用自己的两条腿，去重新画地图，用自己的两只手去插上我们自己的旗帜！”这两句话，用于今天，也就是鼓励我们仍然必须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一切着眼于群众无穷无尽创造力的正确方针，去绘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还记得少奇同志深情的面容和坚定的语调，记得他语重心长的嘱咐：只要你们永远牢记马克思是干什么的，那，同志们，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1980 年 6 月作

1987 年 10 月改

刘少奇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

李维汉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的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中，他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样是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合作者。不论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还是在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斗争中，他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少奇同志毕生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执行和捍卫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并且紧密结合实践，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的思想、政策和组织问题作了理论的阐明。他的许多重要的讲话、报告和著作，成为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文献。

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的残酷迫害。他们一伙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强加给少奇同志，诬蔑他“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制造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出了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对于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宝。少奇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明确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是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斗争中一个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是总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斗争。”他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不断研究和总结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经验，对我们作过不少重要指示。建国以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我们党经过统一战线，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胜利完成了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改造这个阶级的人们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伟大事业，这不论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个伟大胜利的取得，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执行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大家知道，恩来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贡献了最大的力量，而少奇同志在这一方面的指导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

1949 年，我们党在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基础上，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过渡时期的头几年，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一方面坚持镇反、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三大革命斗争，一方面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头等重要任务。能不能胜利地实现这些任务，是关系到能不能巩固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根本问题。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一起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的规定，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由于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达到了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在内的空前广泛规模，并且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更加巩固了。这个伟大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不仅是夺取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重要武器，也是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价之宝。1949 年 9 月 21 日，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 ”“ 这种团结的基础十分巩固，团结的规模十分广大，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指出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入总结了中国人民在最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经验，“ 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 ”，是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 坚固的政治基础 ”。强调指出：“ 不独今天实现新民主主义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就是到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一样地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

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有些同志产生了骄傲情绪，错误地认为“ 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还要什么统一战线呢？ ”有的甚至表示严重抵触，看到政协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原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参加，发出“ 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的怪论。少奇同志在这次政协会后召开砌党员大会上，针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指出：“ 要不要统一战线，不决定于胜利不胜利，而决定于中国的国情。中国今天无产阶级很小，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非无产阶级，全国人口四万万五千多万，百共产党员只是三百万，工业不发达，生产量不大。这些条件决定了党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必须联合农民，联合各民主阶级，联合一切愿意跟我们走的人，其中包括过去跟我们打过仗现在觉悟过来脱离了反革命阵营的分子。 ”又说，党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 是长期的，……又是全国性的，不是中央搞一搞，各地可以不搞了。 ”他以《红拂记》中虬髯公见李世民觉悟程度比他高便打消了夺天下的念头的故事，生动他说明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有高度的原则往和很高的觉悟水平的道理，说“ 统一战线决不是牺牲或降低我们的政治原则，而是把他们（指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思想提高到我们的纲领水平 ”，要求全党同志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从思想上完全明确起来，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以民主协商的精神，搞好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少奇同志的这篇讲话，对统一全党的认识，发展和加强建国以后的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全国解放前夕和建国以后的头儿年，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当时城市工作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方针问题，也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全国解放前夕，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和压迫，由于国民党反人民战争的严重破坏，我国的国民经济十分落后，现代工业非常薄弱，私人资本主义在我国现代工业中占了第二位，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

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七届二中全会还明确规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并要“从各方西，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1949 年 4 月，少奇同志受中央委托去天津视察工作。当时有一部分同志不能正确理解二中全会的精神，进入城市以后，不把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不去联合愿意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而强调和资本家作斗争，支持工人的过高要求，盲目排挤私营企业，企图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是当时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严重障碍。少奇同志在天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什对这种“左”的倾向和资产阶级的疑惧心理，根据二中全会的精神，反复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政策。他多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城市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实现这个任务的路线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我们站在一道，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二、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如果作为斗争对象，即犯路线错误，是薯中央的路线不符合的。三、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只有斗争而不联合，是犯“左”倾错误，只有联合而不斗争，则犯右倾的错误。但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联合上，斗争是为了联合，把自己的朋友作为敌人来打击，是错误的。四、在城市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为达此目的，要照顾四面八方，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五、对资本主义要加以限制，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就是限制，税收、市场、价格，都是限制。如果有些资本家只图私利，不愿同我们合作，耍搅乱市场，不服从国家协西，不顾人民利益，则予以经济上的打击。六、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实行。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是和平转变。由以上所述，可见少奇同志多次讲话的基本内容是完全符合二中全会精神的。虽然他在个别场合有些话说得不够准确，但总的说来，少奇同志的天津之行，纠正了当时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对于全面贯彻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少奇同志还针对当时资本家不敢大胆经营的顾虑，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了历史分析，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中国，他们在生产上是进步的。他们这种剥削对发展生产是有功劳的，是有进步的。”“四人帮”由此制造出一个所谓“剥削有功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要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任何剥削制度。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比封建地主经济是一种进步，是一种新兴的先进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列

宁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指出：“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曾回答为什么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马列主义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进步作用和它的历史功绩。在经济落后的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和束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独立的发展，它留给人民共和国的遗产确是太少。少奇同志在阐述了二中全会在一定时期内允许有限制地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的同时，为了鼓励资本家的积极性，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发展生产有功劳，这有什么错误呢？很显然，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所谓“剥削有功论”，不只是对少奇同志的论述进行以词害意的歪曲诬蔑，实际上更是一个毒辣的阴谋，一方面是为了把少奇同志打成“党内头号的走资派”，而后以整“走资派”的罪名打倒一大批忠实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另一方面是为了彻底否定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毁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反资本主义的英雄，实际作的是在中国复辟封建法西斩主义。

林彪、“四人帮”还抓住少奇同志在建国初期讲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话，大做文章，攻击少奇同志“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永远保存资本主义。”这同样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陷害。

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和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作出的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的性质是什么呢？《共同纲领》总纲第一条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都明确规定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我们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建国以后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实行社会主义。建国以后的头三年，我们还必须首先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必须立即着手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并且利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当时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立即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少奇同志正是从我国这个现实条件出发，主张在现阶段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个别措词尽管不适当，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1949 年少奇同志在中国人员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答了为什么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的问题时说：“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它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可见少奇同志对革命的前途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说他“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革命是不断发展的，又是分为阶段的。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变、部分质变逐步发展到整个质变，呈现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包含不断的量变和部分质变，为整个质变准备条件。同样地，一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发展，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渐变的过程。在过渡时期的头几年，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这当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斗争，没有消长变化。不是的。党的路线是要逐步地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地改造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但在社会主义改造未完成以前，五种经济成分在互相斗争的条件下共存于统一体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资本主义消灭的于干净净，马上就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有害的。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需要有良好的革命秩序，才能团结人民顺利达到预定的目标。林彪、“四人帮”反对革命秩序，煽动无政府主义，把我们党、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统统搞乱，至今，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残余，仍然是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主要因素。这个教训实在太沉痛了。

1953 年，在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之后，我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但是用什么方法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马列主义著作并没有给予现成的答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关于无产价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的思想，运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思想，制定了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法。这个方针，已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少奇同志参与了这个方针的制订并参加了对实践的指导。

二

1953 年 5 月，中央统战部经过调查研究，草拟了一个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送中央，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指出公私合营是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适当的方式。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这个报告，提到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的结果，肯定了这个报告。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在这次讨论中形成。并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拟定的。讨论中。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资产阶级分子最后都要改造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改造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当年 7 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请少奇同志到会讲话，他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讨论精神，对于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要采用和平改造的方法作了理论的阐明。他分析了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

级的两面性，指出在我国具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用和平的赎　买的方法，也就是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来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说：“从消灭我国现存的剥削阶级来讲，这种统一战线的方法，即和平过渡的方法，可能是主要的方法。”他指出，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党的这种统一战线工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必不可少的形式。”他对党内存在着的怕麻烦、图清静的错误思想进行说服，说搞统一战线“是找麻烦，但又是省麻烦。经过这种统一战线工作，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人物不造社会主义的反，相反地他们服从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省了大麻烦。说做这种统一战线工作是找麻烦，只有一部分真理，没有全部真理。”少奇同志这篇讲话，以马列主义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思想，武装了广大做统战工作的干部，鼓舞了他们参加和主管对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以后，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以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对我国用和平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经验，作了全面总结，批判了在对资改造问题上“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批判了那种把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看成“阶级调和”的“左”的论调。他说：“我　们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是采取了‘阶级调和’的政策呢？当然不是。这种怀疑是完全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误解或曲解。实际上，我们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极其坚定的政策，同‘阶级调和’政策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林彪、“四人帮”攻击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是什么“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这种貌似革命、实为反革命的极左论调，早就遭到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批驳。1955 年曾有一个自称上海工人的人给党中央写信，否定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接受改造的可能，主张用没收的手段对待民族资本家，咒驾党的政策是“可恨的赎买　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是向工人阶级挑战。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比这封信不知超过多少倍。历史证明，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恰恰是林彪、“四人帮”这一伙凶恶的敌人。

三

我们党一贯坚持消灭资产阶级、改造人的方针。毛泽东同　志曾反复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消灭资产阶级不是讲把人灭掉，而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过来。在我国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的。在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过程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大量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大大促进了企业的改造，在企业改造完成以后，继续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坚持“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方针和开“神仙会”的方法，进一步推动资产阶级分子通过工作、劳动和学习，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逐步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实践完全证明，消灭阶级、改造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少奇同志是完全支持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的。

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八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地分析了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提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可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他还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要“采取教育的方法，逐步地改造资本家，使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20 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早已证实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这个论述符合于马列主义的下述观点：只有一切剥削阶级和其他属于过渡阶级的劳动人民部改造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能实现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根据这个观点和这个论述，1957 年和 1958 年，我们向资产阶级工商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各民主党派，提出“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统帅，以劳动和实践为基础，以企业和工作践也已证明，这个要求和建议是符合于毛泽东思想的。

1957 年 12 月，少奇同志邀集参加统战部长会议的部分同志谈话，提出用统一战线的办法，把资产阶级的多数人化过来，说“资产阶级已没有什么生产资料，没有工厂了，且多数依靠国家依靠工人阶级吃饭。当然还拿定息，但已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再过五、六年，定息也不给了，就不好再讲资产阶级。”1960 年 2 月，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对待工作，把他们化掉”，“到 1962 年取消定息还有三年，这三年内要好好做工作，采取积极态度，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为了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劳动者，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对资本家进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他要我们编写一本供工商界学习的历史唯物主义课本，要我们继续办好工商界训练班，抓好工商界家属的工作。

林彪、“四人帮”和康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之后，提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这是人为地制造阶级、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反动理论基础。按照他们这一反动理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阶级斗争的总趋势不是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而是愈来愈尖锐；资产阶级分子不但改造不好，而且越来越反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不但永远消灭不了，而且党内还产生了“资产阶级”。这就便于他们到处煽动“造反”、“斗争”，把反革命矛头指向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是反对他们这种“理论”，谁就犯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大罪，就要被扣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罪名。所以，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只不过是他们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打着“批修”的幌子，打倒刘少奇同志，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根政治棍棒，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国民经济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经济困难期间，原属资产阶级的人们的思想状况是：一端是极少数人，采取各种方式大挖社会主义墙脚；另一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是少数；多数中间状态的人，思想动荡不安，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产生怀疑，特别害怕党内

整风反右会延伸到党外，再来一次 1957 年的斗争。1960 年春，民建、工商联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们的这种思想动态。不少代表心情紧张，口袋里装着发言稿，准备在大会上一拥护、二检讨，争取过关。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我们建议两会领导人采取开“神仙会”的方式，实行“三自方针”和“三不主义”，彻底敞开思想，分清是非，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在他们的会议期间，我作了《靠拢共产党，改造世界观，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少奇同志接见了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针对工商界的思想顾虑，亲自做政治思想工作，提出要“顾一头、包一头”，即要工商界“顾一头”（顾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一头）、国家“包一头”（包工商界物质生活福利的一头），说“工商业者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者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这个政策本来是党一贯坚持的赎买政策在新的情况下的具体化，却被林彪、“四人帮”攻击为向资产阶级投降。

在统一战线中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在教育提高同盟者的同时，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若是损害了同盟者的利益，人家是不会同你合作，领导权就会成为空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对他们安排使用、教育改造、包下来、包到底，化了一定的代价，包括给以一定数量的定息、高薪、政治安排、工作安排，以及其他物质生活上的照顾，结果是顺利地改造了企业、改造了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少奇同志讲“顾一头、包一头”，正是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资产阶级分子安心工作、安心改造，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怎么能说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呢？林彪、“四人帮”恣意破坏党的赎买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击迫害民族资产阶级人们，查抄他们的存款，扣减高薪，使我国的宪法和政策的威信在国内外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们的这种极左做法，寸是破坏无产阶　级的根本利益，适合国内外反动派的需要。

少奇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伟大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深切怀念。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总结、前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在革命斗争中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看他的主流和大方向是否正确。少奇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一些错误，但他毕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的：“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我们要学习少奇同志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留下的理论财富，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发展和巩固

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成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是我们对少奇同志最好的纪念！

1980 年 3 月

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康永和顾大椿

刘少奇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他又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关怀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人群众和工会干部的衷心爱戴。这里，仅就少奇同志领导和发展我国工人运动的光辉业绩，作一些回顾，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

初用工人运动的典范

中国现代工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首先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掀起了 1922 年到 1923 年的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并在 1924 年至 1927 ”年间，发动和组织全国工人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少奇同志就是这个时期从工人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著名的工人领袖之一。他在那个时期的革命实践，为我国初期随工人运动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少奇同志从 1922 年开始从事工人运动起,就表现了他作为工人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胆识和才干，表现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英勇奋斗的芋命精神。1922 年 9 月，他由党的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派去安源，同李立三同志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安源潞矿工人大罢工。安源煤矿是当时南方最大的产业之一，有职工 13000 余人，是党的湘区委员会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1921 年冬，毛泽东同志曾经亲自去安源进行了调查，随即派李立三同志前去开展工作。李立三同志通过举办工人夜校，启发安源工人的觉悟，逐渐团结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于 1922 年“ 五一 ”节正式成立了安源煤矿和铁路工人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同时发展了党、团组织。9 月初，正当安源工人酝酿罢工的时候，少奇同志到达安源。他和李立三同志一起，认真估计了这次罢工的形势，领导群众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的酝酿、准备。罢工开始后，敌人从赣西镇守使署调来大批军队，宣布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企图镇压这次罢工。当时，李立三同志受到敌人威胁，不能经常公开出面活动，少奇同志担任俱乐部的全权代表，负责前台指挥，以及与各方面的联系、谈判。他把全体罢工工人组织起来，并且组织了工人监察队和侦探队，严密地监视敌人，维护罢工纪律和社会秩序。他注意利用合法形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同时注意保护各界人民的正常生活，广泛争取社会各方面的同情，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路矿两局的负责人。他曾只身前往敌人的戒严司令部谈判，在敌人扬言要将他就地“ 正法 ”的威胁面前，大义凛然，毫不畏惧。正是由于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万余罢工工人团结一致地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斗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在罢工的第五天，就和工人俱乐部签订了 13 条协定，几乎答应了罢工工人的全部要求，在敌人重兵把守的矿区，领导万余工人的罢工，没有一个人伤亡，就迅速取得完全胜利，这在初期工运历史上是一个少有的范例。

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推动了两湖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 年 12 月，汉阳钢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工人联合起来，建立了汉冶萍总工会。1923 年 9 月以后，少奇同志接替立三同志担任了安源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和汉冶萍总工会主任的职务。1925 年 3 月，少奇同志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前往广州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去上海组织全总办事处，兼任上海市总工会总务主任，同李立三、刘华等同志领导上海几十万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大罢工，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少奇同志在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的反帝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总工会在 1925 年底的一个电文中曾经讲到，少奇同志当时“ 废寝忘餐从事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忱，举国同钦 ”。

上海反帝大罢工结束后，少奇同志因积劳成疾，回湖南养病，不幸于 12 月间为军阀赵恒惕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驻上海办事处，立即致电全国各工会，并发出紧急通告，号召各地工会抗议军阀暴行，进行“ 一致营救 ”。中华全国总工会曾于 12 月 22 日和 26 日两次致电赵恒惕，表示抗议。在各地工会纷纷抗议和声援下，经过多方营救，军阀赵恒惕“ 慑于民众威力 ”，不得不在 1926 年 1 月 16 日将刘少奇同志释放。少奇同志出狱后，于 2 月 19 日到达广州，省港各工会闻讯，纷纷派出代表前往慰问。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3 月 3 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邓中夏、李启汉、苏兆征等同志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少奇同志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精神，指出他是“ 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他在广州期间，代替已经卧病数月的全总委员长林伟民同志，负责主持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并和邓中夏等同志一起，领导省港工人坚持反帝斗争，支持广东政府的各项革命措施，为北伐　战争作了准备。

1926 年冬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少奇同志赶到武汉，为全总机关北迁进行准备，同时参加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担任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组织部长。他在武汉期间，领导工人群众进行了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特别是 1927 年 1 月，他领导武汉工人收回英国租界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创举，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少奇同志一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就强调把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同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联系起来，“ 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 ”在安源罢工胜利后，他指出这种胜利只是做了“ 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 ”，必须在这个基础上，“ 以过去奋斗的经验切实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阶级在现在及将来的社会上的地位、工团终极的目的，与达致这个目的的方法 ”，“ 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 ”。1926 年 5 月，少奇同志代表全总向三次劳大所作的《一年来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还阐明了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他在这个报告中指出：一年来，“ 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 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也即是国民革命的对象 ”。“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是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久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时，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 ”。“ 中

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根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建立联合战线，并应促进小资产阶级之左倾，以补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各处的工人应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指示奋斗方法，并须顾及农民的利益，以确定自己的奋斗方式”。显然，少奇同志在这里提出的革命路线，和以除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根本不同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在安源和其他各地领导的工人斗争，都有明确的政治方向，都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积蓄了革命力量。

我国初期的工人运动，如同邓中夏同志所指出的；曾经有过两个重大缺点：一是当时各地建立的工会，一般“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二是当时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一般“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少奇同志一开始就很重视，并且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安源大罢工以后，他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以十人团为基础，选举了十代表、百代表和总代表，建立健全了各级代表会议和工作机构，把 13000 多工人严密地组织起来。俱乐部还加强了对工，入的教育，工人补习学校由罢工前的一所增加到七所，经常参加学习的达两千多人。为使工人免受中间剥削，俱乐部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共有三个分社，资金由 10000 元增加到 50000 多元。少奇同志当时指出：“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必须注意“小的基本组织”，“否则工会一经封闭，群众的团结也必随之涣散”。安源工人俱乐部在“二七”惨案后的工人运动低潮期间还能够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加强了工会基层组织的建设。这个经验，对后来各地工运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少奇同志在武汉期间，就曾针对当时工会发展大快，组织极不健全的情况，运用他在安源的经验，大力进行了工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工作，并为此编写了《工会基本组织》、《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等三个小册子。这几个小册子，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工会建设的专门著作，在我国工运史上有重要意义。尤其可贵的是，少奇同志从安源开始就很往意在工人中发展党团组织。在他的领导下，到 1925 年 5 月，安源的党组织共有 15 个支部，党员由罢工前的 10 余人发展到 300 余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1923 年冬，他曾亲自担任校长，办起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他们中有些被派去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和农民运玫讲习所学习，有些被派去其他地方的工厂、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白区工运正确路线的倡导者

1927 年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以大城市和产业中心为主要支撑点，在全国建立了空前残暴的反革命统治，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民族民主革命，发动了工农武装暴动，逐步走上了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以农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从这时开始，直到全国解放以前，中国工人运动一直是在根据地和敌人统治地区（即白区）同时进行的。少奇同志在领导特别是在解决自区工人运动和其他革命工作的方针和策略问题上，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革命的主要阵地是农村根据地，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党在白区城市的工作虽然也很重要，但在战略上是处于辅助和配合地位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指出的：白区工作应当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但是，在 1927 年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党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对这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特别是由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先后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党在自区工作上长期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其主要表现是：在敌人统治力量强大、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摧残的城市，拒绝采取退却和防御的方针，不去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而是坚持所谓“进攻路线”，不断号召群众举行示威、总同盟罢工和暴动，消耗和断送革命力量；拒绝利用公开合法形式和敌人内部矛盾，去争取群众和暂时的同盟者，而把自己关在秘密组织的小圈子里，严重脱离群众，陷于孤立。这些错误，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严重破坏，最后弄到几乎全部垮台。

对于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党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许多基层的同志进行过抵制。其中，抵制最坚决，并且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和一系列正确主张的，则是少奇同志。1928 年，他就曾对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以及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意见，在党内争论了几个星期。他还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口号的转变》一文，批评了不顾实际情况，提出许多过高过左的口号去强迫群众斗争的错误作法。但是，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被当时党的领导者所接受，反而遭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1930 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职工国际工作。在这期间，他又对白区工运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反对意见，特别是在如何对待黄色工会问题上，同赤色职工国际的一些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结果，他的正确意见仍然遭到了压制和

批评。1931 年秋，他回到上海，担任了党中央职工部长和全总党因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曾按照自己的正确主张，为扭转白区工运屡遭失败的严重状况作了巨大的努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发表了《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入《1931 年职工运动总结》等一系列文章和报告，正确地估计了群众斗争的形势，提出了转变白区群众工作的方针和策略。但是，由于王明路线统治当时的党中央，他的这次努力又被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遭到了更加粗暴的攻击和斗争。

彻底批判自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根本转变党的白区工作，是在 1936 年 3 月少奇同志到达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以后开始的。当时，一方百由于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白区工作有了根本转变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和组织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阶层人民准备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又必须彻底清算“左”倾路线的流毒，根本转变党的白区工作。因此，少奇同志一到天津，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解决这个问题作了巨大的努力。他通过党的会议和检查工作等活动，领导各级党组织开展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斗争，切实纠正“左”的错误。他还在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写了 10 多篇论述白区工作的著作，指导自区工作的转变。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1936 年 4 月写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和《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1937

年 3 月写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同年 5 月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白区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等等。少奇同志的这些论著，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总结了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揭发批判了自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全面解决了自区工作的方针和一系列策略问题。他指出，“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首先在于他们不懂得 1927 年革命失败后白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采取退却和防御的方针，去争取群众，蓄积雄厚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他们常常是急性的，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的指挥仅有的一点力量，在形势与条件不利的时候，去和敌人决斗，结果总是遭到敌人的打击，把仅有的一点力量和工作基础断送掉了。其次，他们不懂得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和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发动群众斗争，并且根据斗争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他们常常提出群众还不能了解和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强迫群众接受、强迫群众斗争；而且每次斗争都要机械地坚持到底，拒绝在条件发生不利于斗争的变化时暂时结束斗争，以致常常使群众斗争遭到失败，党和群众遭到打击。第三，他们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和敌人营垒中可能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他们常常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拒绝对可能的同盟者作任何让步和妥协，要打倒一切敌人，但实际什么也打不倒，只是把今天还可能和我们合作的力量推到敌人营垒去，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力量。第四，他们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他们拒绝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去进行群欢工作，反而要把工人群众中一切公开的灰色组织都变成赤色工会，把本来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拿到党的秘密组织来进行。结果，既使党的群众工作只限于赤色工会这个秘密的小圈子范围，又使党的组织无法严格保守秘密，以致经常遭到敌人的破坏。少奇同志在抗战前夕写的关于白区工作的上述一些著作，是我党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们不仅对转变当时党的白区工作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而且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胜利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是由于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的方针、策略问题上的杰出贡献，所以 1945 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他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新中国工运的卓越领导人

1949 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打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中国工人运动长期以来直接间接配合革命战争的时期结束了。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怎样适应这个革命转变，如何继续前进，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少奇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作为全国总工会的名誉主席，热情关怀新中国工运的发展。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工运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解决了工人运动的许多紧迫问题，

对新中国工人运动的胜利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全国解放前夕和建国初期，少奇同志曾经不断阐明了随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来的工运方针的根本转变。1948 年春，他就在西柏坡和周恩来、朱德同志向赴哈尔滨开会的六次劳大的代表谈到，现在的工运，有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解放区的工运方针，就是毛主席的那四句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六次劳大正是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指示，根据当时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总的历史任务，确立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工运方针。平津战役胜利后，少奇同志又亲自同天津、唐山、北平的工人、职员、干部、资本家谈话，反复阐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针对当时有的城市接管工作中一度发生的“左”的倾向，强调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是城市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他还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当时城市工作的总路线，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在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后，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工会七大所做的祝词，又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工运方针和任务，强调指出工人运动新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这个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大大富强起来，但这是特别有赖于中国工人阶级作更有组织和更高觉悟斗争的”。

1956 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在这个关键时刻，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祝词，又为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继续前进指明了方向。1956 年出现的全国规模的先进生产者运动，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开展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提议而兴起的。少奇同志的祝词，不仅充分肯定了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巨大作用，而且从理论上深刻地阐述了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深远意义。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主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先进生产者还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先进生产者，也就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领导。千百万劳动者在先进生产者率领下为消除落后面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少奇同志的祝词，给了广大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工会工作者以重要的思想武器，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少奇同志一向重视企业的民主管理，一再指出：发展生产，办好企业，必须吸引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在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接管了一大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把这些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成为工人阶级刻不容缓的任务。为此，少奇同志在 1949 年 5 月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所有工厂，所有铁路，都要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都必须把所有情况告诉工人。工人阶级既是领导阶级，就必须有个领导地位。他要求工会要积极抓好工厂管理民主化，并且指出职工代表会议，也就是工会的组织，哪个厂的职工代表会议，就是哪个厂的工会代表会议。正是根据少奇同志的讲话精神和六次劳大决议，华北职工代表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建立工

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细则，由华北人民政府颁布施行，成为当时各个省市推行工厂管理民主化的指导性文件，对改造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起了重要作用。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其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为此，少奇同志在 1957 年 12 月代表党中央向工会八大的祝词中，又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针对企业实行一长制大大削弱了企业民主管理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指出，在回前的情况下，在企业中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在企业中已经开始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扩大企业民主的有效形式。这种以办好企业为目的的广泛民主，不但不妨碍企业行政领导的集中，而且正是为了加强集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但要保障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而且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少奇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反复提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职工群众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更大的发展以后寸能解决，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不应当只管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忽视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这一点必须向群众说明。但是，在另一方面，片面地强调全国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忽视职工的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也是不对的。目前职工生活中有些问题是必须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其所以没有解决，只是因为企业的领导者、工会和有关主管部门没有积极努力。必须坚决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态度。1957 年春，少奇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论述，还亲自向京广沿线一些城市的工人、学生、干部调查研究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分配问题，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分配关系适合生产力，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要求工会密切同职工群众的关系，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1966 年全总八届六次执委会上，他还尖锐批评工会不反映情况，要求工会起到党同职工群众之间的渠道作用。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整个阶级是最革命的，但是旧社会遗留给这个阶级的精神负担则是沉重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也会不断反映到职工队伍中来，必须不断地向职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一解放，少奇同志在对北平工作的指示中就曾把工人教育作为工会的三项重要工作之一，要求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他指出，只有按照列宁的教导，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革命的工人运动。以后，他还多次谈到提高职工文化、技术水平的重要性，要求工会大力办好职工业余教育，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以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

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就必须建立坚强的工会组织。少奇同志一直强调搞好工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建国初期，他一再指出：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要尽快把全国职工组织起来。在城市中，如果首先把职工组织起来，那就等于组织了人民的大多数。工会工作很重要，要派最强的干部大搞工会工作。他说，北京我提出要彭真同志去做市工会主任，天津市由黄火青同志做工会主任。他还说，工会联系广大群众，就是我们党、政府联系广大群众，这是个基本问题。那种“工会信仰高，厂长怎么办”的想法是错误的。当然，工会也应当对厂长有很大帮助，使厂长感到有了工会就好办事，没有工会就不好办事。加强同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支援他们的革命斗争，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神圣职责。少奇同志对工会的国际活动十分关心，作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并且亲自接见了不少来访的外国工会代表团，对于加强中

国工人阶级同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少奇同志对新中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不断回答了工人运动中的许多紧迫问题，为新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阐明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针和路线，给了广大工会工作者以有力的武器。建国以来，在广大工会工作者中间形成的“以生产为中心，做好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群众工作”这个工运方针的习惯提法，就是根据少奇同志的一系列论述，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论述和工人运动的实践概括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工会从多方面开展了职工群众工作，对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很大作用。30 年来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正反西方面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时候全面贯彻这个方针，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就会蓬勃向上，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这个方针，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就会到处碰壁，以至走向反面。今天，在向四化进军途中，我们重温少奇同志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感到特别亲切。他为我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留下的许多遗言，必将继续鼓舞我们为实现四化的宏伟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师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创建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刘少奇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他的伟大功绩永远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一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去重庆谈判时，绝大部分中央同志到前方各地区去了。毛主席离开延安前，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确定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就是说，中央的工作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了。这段时期，他既要抓好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又要配合好毛主席在重庆同蒋介石集团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沟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我军的互相联系与协同动作，指挥好前线的斗争。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少奇同志一生中为党为革命，工作最繁重、最劳神、最紧张的一个时期。这段时期的重大工作有以下几项：一、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群运的全面工作；二、果断处理我解放区附近地区的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三、坚决回击国民党的一切破坏和挑衅活动，并加强壮大我们的实力；四、依形势和发展要求，坚决迅速调整和积极部署我军主力，争取战略优势；五、大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上改，努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六、尽力做好统战工作，等等。少奇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图，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一件件大事，并且处理得很好。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挑衅活动大大增多了，而我军给予对方的口击和惩罚也异常及时而凌厉，每次都以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而告终。在双方矛盾、冲突旧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曾担心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是否有保障，对这个问题，少奇同志作了非常精辟、明确的解释，他说：“蒋介石只懂得拳头，不懂得道理。韧方对他的打击越坚决、越沉重，在实际行动中越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他越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触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障。”他还说：“这是毛主席临动身前给我的指示和交待，我在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意旨行事。”

毛主席于 1945 年 10 月 11 日从重庆回延安后，键康状况一直不大好，所以，从那时起，直到 1947 年初，仍由少奇同志协助毛主席领导党中央的全面工作。这个阶段是我们革命力量将在全国范围内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大决战的极其重要的准备时期，这个时期我党的全面准备工作做得很好，是和少奇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毋庸置疑，这个时期，少奇同志处理一切重大原则问题，都是同毛主席商量并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和决定办的。许多问题，都是事先请示，或事后向毛主席汇报的。他这种谦虚谨慎、认真负责和对毛主席的尊重与忠诚，以及同毛主席长期来亲密无间的合作的精神确实使人十分感动、十分敬佩。这个时期的形势是复杂而多变的。少奇同志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主席给他的重托，给全党树立了光辉的工作范例。

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双方又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关于停止军事冲突

的协定》）。1946 年 2 月 1 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这之后不久，少奇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中央上述指示的传达报告。在报告中他要大家认清时局的变化，要善于掌握局势的发展和适应形势的变化。同时强调指出，我们要有两手准备，既要学会在和平形势下的工作，即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也要准备对付意外，即当敌人向我们发动军事进攻，或进行突然袭击时，给予坚决的反击。他把应付和平与战争的两手准备工作，总括为：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这是完全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这种部署就是为了全党在日常工作中做好两手准备，特别是为了应付敌人可能发动战争的准备。在备战工作中，他尤其注意调整华东、中原地区我军的部署，以防备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并注意加强华北和东北的军力与干部的配备。1946 年 6 月，国民党以五十万军队分四路重点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地区——宣化店。事件发生后不久，大约 7 月间，毛主席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分析了形势，检查和总结了我党前一段的工作。毛主席指出，不应忽视宣化店事件，因为它事实上意味着全面内战的开始，应该从中吸取严重的教训。少奇同志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分析和估计。此后，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路线，正是按照上述指示精神贯彻的。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大大扭转了《双十协定》发表后在党内产生的某种和平气氛。以后不久少奇同志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说道，应该充分认识和估计到，我们目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占有有利形势。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以全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就是说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个方向上，对付主要敌人。两翼虽有敌人的威胁，但危险不大，因为他们的力量较弱，而又受到牵制。我们的后方是稳固的（只是在东北地区要加紧剿匪、肃清内部敌人），必须认清这个局势，决不可丢失这个良好时机和有利的战略形势。

二

为了适应国内形势的需要，1946 年 5 月，中央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少奇同志认为这项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抓得很紧。当时在干部中出现了这样一些议论：一种是说，目前正在大力动员、组织、练兵、备战、搞后勤、支前、生产，再搞土改实在顾不过来；另一种是说，抗日战争时期有些地方已经进行过上改，就不要再搞了。针对上述议论，少奇同志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作过非常精辟的阐释。他讲话的大意是：现在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形势比已经有了根本不同的变化，必须首先认清这一点。现在实行上改政策，使耕者有其田，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上它是势在必行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大政方针。我们今天的具体环境是解放战争，其基本内容仍然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上改政策，既符合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也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一句话，解放战争是革命战争，它不仅不同于过去中国任何一次军阀战争，也不同于前一阶段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大家知道，过去军阀混战，除了给人民群众带来破坏和痛苦外，没有任何好处，所以群众反对它、厌恶它、痛恨它，更谈不上人民群众对它的支持了。我们的解放战争是革命的正义战争，是为解放广大劳动人民而战，必须解决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紧迫问题，其中包括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我们必须懂得，要保障前方战争胜利进行，就要有可靠的后方供应和有力的支前工作，这主

要是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来完成，因为我们的兵源和物资供应、交通运输、联络、救护、民兵、担架队的组成等等全都依赖农民的支援。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自然就清楚了：我们必须把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解决好，使他们得到主要利益，他们才会跟我们一道走。土改问题解决得越好、越彻底，农民得到的利益越多，他们拥护、支持我们的决心和劲头就越大，从而我们的力量也就越雄厚，越不可被战胜。同时，农民为了捍卫他们的既得利益，就会越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团结在我们周围、拥护我们，积极地支援前方作战，全力以赴地保卫我们各地区的政权，后方就更巩固。这样，我们将有更大的把握获取更多的胜利，而胜利本身也会更加稳固、更加有保障了。坚决做好土改工作，将是我们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是保证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决定性条件之一。这里所谈的仅仅是关于土改工作与当前我们的战斗任务有关的一些问题，至于土地改革在我们整个革命全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和政治意义，以及对革命前程的影响和战略意义，那比我们这里所谈到的问题更重要、更伟大得多了。至于第二种议论，说什么某些地方过去已经进行过土改，就不要再搞了，或因某种情况可以缓搞等等，那都是站不住脚的，况且事实上一些地方虽然搞过土改，但当时做得既不彻底，而后来又发生过种种变化，或者过去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又被地主、豪绅、恶霸夺了回去，那自然更需要加以复查重分，或予以调整的。总之，凡是农民群众要求上改迫切的地区和条件成熟的地方，以及靠近前方的地区，依情况稳妥地进行土改工作，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个道理不必多讲，也可以自明了。

三

少奇同志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七大”一结束，他就依据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完全胜利的新形势，认真地考虑过党的建设工作中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健全、发展和巩固党组织的问题；一是正确处理意见分歧和保持党的团结统一问题。而在解放战争拉开序幕以后，为着提高党的战斗力，少奇同志又特别注意加强党的团结统一。1946 年冬，有一次，少奇同志专门谈了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他说，对一般问题，在日常工作中发生了意见不一致，互相争论，力求辨明是非，这是正常现象。在党内生活中，这种现象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有益的，因为经过辩论、争议以后，认识才能达到真正的一致。对任何问题，在一开始就要求人人的看法绝对一致，那是不可能的。在重大原则

问题上，经过酝酿、讨论研究后，如果仍不能达成一致认识时，这就意味着发生或已形成了意见分歧；如果又难以互相迁就、互不相让、各执一端，而成见又愈来愈深、愈益定型化，这样，问题就更加复杂了、严重了，因为重大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不仅是反映思想认识问题，而且也往往反映出党的组织不纯、不统一、不团结的年涵因素。所以，要解决这样的意见分歧，就不应单从分歧点上去看、去找、去认识，而且还必须从它的产生根源上分析事态发展变化的本质，找到实质性的根本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才会奏效的。表面上的平静并不等于没有不同的意见，也不等于真正的一致。现在全党在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精诚团结、上下一致，集中精力对敌进行着较顺利的斗争，就更不至于有较大的原则性分歧，然而，为了保证党的统一、巩固、团结，就不能不随时注意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并沟通各方百的看法，

使它们互相了解和一致起来，更加有力地表达出党的意志，发挥党的战斗力。如果不能及时地、灵活而妥善地解决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不能统一思想认识，那就不仅会影响团结，而且发展下去，还可能发生分裂。这个道理是容易理解的。党内不容许意见分歧长期存在下去，一致与统一如果长时间达不成，结果就可能引起分裂。这是有历史经验的。这对革命来说，确实是危险的，可悲的，十分有害的。所以，必须时时刻刻注意，防患于未然。只要我们警惕了，注意了，有了精神准备，也就可以做到“有备无患”。分歧与分裂往往是在这样两种情况下可能发生：一是党和革命不论客观环境或主观条件都是处在极端艰难困苦和最危急的关头；一是党和革命处在极其顺利的环境中而且比较轻易地取得了胜利的时刻！如果又有人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想入非非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出现分歧，由分歧而发展到分裂。分裂自然有大有小，有全面与局部之别。分裂虽然不是好事，但也不可怕，因为分裂对党对革命既可带来消极因素，也可造成积极效果。问题在于弄清意见分歧的性质，引起分裂的根本原因，以及分裂带来的利害得失关系如何。例如，俄国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的分裂，对革命事业就带来了好处，使党更加坚强、团结一致，保证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中国的张国焘不也从党里分裂出去了么，但他只是孤家寡人一人而已，并没有丝毫影响到我们党。我国的现实和革命实践要求我们全力以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预防和制止可能的分歧而发展到分裂。因此，处理意见分歧、甚或分裂现象的方针方法，必须是灵活的、妥善的，实事求是和有实效的。目前，我们党内没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也没有出现任何分裂的苗头，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我们却不能丝毫麻痹大意，失去应有的警惕性。

四

1946 年夏，在国民党发动内战以后，少奇同志多次告诫说，如果展开全面内故，那就可能出现类似十年内战时期的那种艰难的局面，国内可能出现非常复杂、恶劣的形势，在自区的党组织又将会完全转入地下状态。但愿历史不会重演，可是我们在思想上、精神上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应该有所准备，必要时也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应付时局了。为此，他多次向一些同志介绍他在自区工作时的斗争经验。

他指出：要时刻抓好革命斗争中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要领导好，发动、组织好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和斗争。为此，首先必须切实了解和掌握好实际情况，伐具体形势，随时随地机动灵活地变换斗争的方式方法、策略战略，千万避免使群众吃亏、吃败仗、遭打击、受挫折，切忌使群众丧失信心：二是要在各种斗争场合，各种运动与活动中，细心发现进步的、勇敢的、较积极较有觉悟的、有正义感的、能联系群众的、较有威望的、有革命要求的先进分子，即那些可成为我们发展对象和骨干力量的人。他也曾举过许多例子，其中一个就是林枫同志，说林枫曾经常替他外出活动，同有关方面联系、传递消息、转达意见，替他应付局面，同外界进行各种周旋，想方设法保证党的工作顺利进行。这样，林枫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对他也给予了极其有力的帮助。他也大力帮助林枫在实际工作中迅速成长，后来成了能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者。少奇同志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向我们传授革命工作经验，谆谆教导我们如何在艰苦的秘密条件下做好革命工作和在恶劣环境

中同好险的敌人作斗争。

少奇同志对干部不仅作原则性的指导，而且切实地、具体地关心干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例如，1946 年 11 月和 12 月当延安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要我去检查一下对赵紫兰、帅孟奇、张秀岩、夏之栩、张越霞、李培之等大姐，以及老弱病残人员的疏散和安置工作，特别指出一定要给他们配备一个勤务员，行路时拨给一两匹牲口，并要我直接关心、过问，认真检查一遍。享后我向他汇报检查结果，说大姐们和病残人员已经基本疏散完毕，也安置好了，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了。少奇同志听到这里，立刻打断了我的话，说：“你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你如果这样想，那就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你只要一有这种思想，就会麻痹大意起来的。这样的思想方法和作风是错误的、危险的，会使你吃苦头的。你应该时时刻刻考虑，并细心察看、检查在某处、某个环节上还可能会出现什么岔子，并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堵塞漏洞，这才是有益的、有意义的。你无论何时，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认为‘没有问题’！事态没有表面化时，并不是不存在问题。”他抓住这个具体问题，对我进行教诲和启示，具有非常重大的实际意义。事情虽然过去已经三四十个年头了，言犹在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我的这番亲切的教诲。

少奇同志对工作、对事、对人历来是考虑周到全面、小心谨慎、一丝不苟和严肃认真的。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认真，并以诚恳切实的态度帮助周围的同志解决困难问题。当身边的工作人员每次向他汇报工作时，他不仅细心听取你的汇报，而且对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要加以了解，推敲和仔细考虑。然后又以商量的口气同你探讨问题的实质、寻求解决办法，最后才作出决定，而决定则是断然的、明确的、坚决的，并且是一定要贯彻执行的。

五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1949 年 5 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运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国访问。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7 月 2 日，少奇同志率领代表团从北京乘火车至大连，然后经朝鲜上空飞抵伯力。以后又在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作了短暂的停留，直到第六天下午才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奥斯特罗失 8 号公寓休息了两天后，第三天的下午，代表团被邀请到斯大林的别墅（在孔策沃附近）。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都站在门前迎接客人。宾主相互握手问候之后，斯大林设宴招待少奇同志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自然。虽然是随意交谈，但也涉及某些重大的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这次宴会将近四个小时。

回到寓所后，少奇同志召集代表团同志，一起回忆这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的内容，分析谈话中涉及的问题哪些是重点，哪些问题斯大林已经明白，哪些问题他还不很了解，然后拟出下一次会谈的要目，并整理出简报。

同斯大林的会谈共有五六次之多。每一次会谈都有令人难忘的重要内容。例如：在第三次会谈中，斯大林热情称颂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表示赞赏。第四次会谈后，苏方还给代表

团放映了一部电影纪录片——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实况。据说，这是苏联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

第五次聚会实际上是一次招待宴会。时间是在 7 月末，地点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在这次宴会上，斯大林讲了一些极不寻常的活，其中最重要的两句是说："我们两党两国兄弟之间的团结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在世，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也应该是团结的！"他祝愿彼此在一切方面永远携手、共同前进，并争取最大的成功与胜利！他指出：世界革命中心逐步东移，将来中国在世界上是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义务的。他说："弟弟应该赶上兄长，学生应该超过先生！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他的老大哥！"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送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些。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斯大林还许下诺言，可以向中国派遣中国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夕，少奇同志又应邀到斯大林居住的孔策沃别墅。斯大林陪同少奇同志参观他自己在园里种植的蕃茄、豆角、谷子等农作物。他指着谷子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的，由我自己栽培，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他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高高兴兴度过了几个钟头。据了解，斯大林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是很不寻常的。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同志是信任和尊重的，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同志的每句话，体会少奇同志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同志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经过多次会谈，少奇同志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如何进行互助合作取得了共同的认识，也就个别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上的协定。根据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双方初步议定，由苏方选派 200 余名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当少奇同志回国时，苏方已选好 80 余名专家，和少奇同志一起来中园。他们到达中国后，首先被安置在东北沈阳临时工作。为了使苏联专家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少奇同志做了一系列细致、具体而周到的工作。他还亲自去探皇专家，了解专家的住宿条件和饮食情况。总之，他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他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十分感人的。苏联专家中也有人感动他说："我们象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你们对我们这样亲热，尤其象刘少奇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关怀我们，并且一直注意我们的生活细节方面的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深受感动。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尽心努力做好工作、完成任务、做出成绩，那我们将问心有愧，也对不起两国的劳动人民。"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少奇同志参观过一些工厂，如轴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刃具量具厂、汽车制造厂等等。参观时，除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培训情况等等之外，还仔细了解了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个方面的职权、职责、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那些日子里，少奇同志还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着重了解经济计划工作、经营管理工作等方页的信况。还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列宁博物馆、列宁图书馆、莫斯科市苏

维埃（即市政府）、历史博物馆、建筑材料陈列馆、煤炭工业展览馆等。此外，他还邀请苏联财经专家给代表团同志们作了有关经济问题的专题报告。总之，少奇同志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选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的史册将永远记载刘少奇同志的不朽功绩。

1987 年月 10 月

刘少奇和宋庆龄的革命友谊

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

1988 年 11 月 24 日是刘少奇同志 90 岁诞辰，同年 1 月 27 日是宋庆龄同志 95 岁诞辰。这两位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合作共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 20 年代起，刘少奇和宋庆龄就互相知晓。刘少奇对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宋庆龄十分数佩。宋庆龄也知道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对刘少奇参与领导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她曾给予大力支持，并就“五卅惨案”发表谈话，高度评价上海学生、工人和市民的爱国热情。为了声援省港大罢工，她向海内外募集 10 余万元巨款，捐赠给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于 1938 年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筹集了大量物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1939 年 5 月，她还专门为新四军伤员开展了“两万条毛毯运动”。皖南事变后，宋庆龄和何香凝等立即联名电斥蒋介石。1941 年 1 月，刘少奇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当他知道曾给予新四军巨大帮助的宋庆龄盼望了解皖南事变真相时，就派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去香港，当面向宋庆龄汇报。宋庆龄见到沈其震后担心地问：“我们这次损失这么大，还有力量吗？”沈其震转述了刘少奇政委和陈毅代军长的话，并说：“请您放心，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延安嘛。”宋庆龄听到这句话开心地笑了，轻声地说：“啊，延安……”在很短时间内，宋庆龄又筹集了一批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到新四军驻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刘少奇和宋庆龄都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 年 10 月 5 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时，刘少奇当选为会长，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副会长。1954 年 9 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当选为副委员长。1959 年 4 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当选为副主席。在近 18 年的合作共事中，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往都十分融洽。

1951 年冬，刘少奇在去南方休养时，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宋庆龄邀请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到她在上海的家里作客，并亲自煮咖啡招待，感谢刘少奇去中山陵。他们谈起了孙中山先生。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

1952 年 10 月，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因事继续在莫斯科留了一段时间。1953 年 1 月，宋庆龄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后，也在莫斯科停留并进行参观访问。刘少奇知道宋庆龄希望见到斯大林，便时刻把此事放在心上。他乘同王稼祥去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马林科夫会谈之便，向期大林提出，请斯大林会见正在莫斯科的宋庆龄和郭沫若。1953 年 1 月 13 日，斯大林会见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宋庆龄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这是斯大林逝世前最

后会见的中国客人。

1957 年 4 月，刘少奇因公到上海。象往常一样，他和王光美去探望宋庆龄。他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共同总结革命经验，促膝谈心。他们谈起孙中山的献身精神，谈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党的正确领导，谈到整风、欢迎给党提意见等等。宋庆龄兴奋地表示：“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同时，她恳切地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很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告诉宋庆龄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当对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早在 1922 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时候，宋庆龄就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后来，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合作，宋庆龄在推动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30 年，宋庆龄在法国时，曾对廖梦醒说：“当共产党员是件好事。”1936 年 4 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回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住在鲁迅家里。冯雪峰与宋庆龄见了面，双方商定派李云做地下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1937 年的一天，宋庆龄低声问李云：“我算不算党员？”共产党早就把宋庆龄看成忠诚的同志，并以有她这样杰出的人物做同志为荣。因此，党组织让李云回答她说：“你同共产党员一样。”30 年过去了，党仍希望她留在党外。她理解党的用意，服从党的决定，也完全懂得这对国家、对党更有利。她再一次把个人的愿望藏在心底，激动、复杂的心情使她的双眼噙满了泪花！以后的许多年里，党一直把她看作是自已的同志。党内文件按时送给她看，一切大事都征求她的意见，和她商量，1957 年 11 月还请她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1981 年 3 月，邓颖超同志去探望她，她阻止邓叫她“副委员长”。当邓颖超称她“庆龄同志”时，她喜悦地频频亲吻邓的双手。1981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一个长期献身革命、忠诚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加入了党的行列，宋庆龄实现了她长期以来的夙愿！

自从 1949 年直接合作共事以后“刘少奇和宋庆龄一直在工作上互相尊重、支持；生活上彼此关心、照顾。1963 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宋庆龄非常关心，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为刘少奇想周到了。她知道刘少奇曾患肩周炎，肠胃也不好，所以特别嘱咐王光美说：“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一定要关冷气，不要吃生冷的东西。”宋庆龄热爱儿童事业。刘少奇知道宋庆龄最爱孩子，就教育自己的孩子热爱宋妈妈，给宋妈妈写信，送自己制作的贺年片、手工和图画等。孩子们应邀去宋庆龄家，宋庆龄总是把孩子们拉到身边，亲切慈爱地问这问那。孩子们给宋妈妈表演节目，还学说大人谈话中的英语单词。那笨拙的发音，逗得宋庆龄高兴地笑了起来。孩子们使宋庆龄在辛勤工作之余，得到一些家庭温暖和欢乐。宋庆龄几乎每年都要给孩子们写一两封信，送笔记本、糖果，称赞他们制作的东西有意义、有趣、漂亮。有一次她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刘少奇四个孩子的小名）：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诬陷和人身摧残，王光美也身陷囹圄。难能可贵的是，宋庆龄在这种情况下仍给刘少奇的孩子们写信，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还送了笔记本和糖果，

给了刘少奇的孩子们以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刘少奇非常敬佩和尊重宋庆龄，给予宋庆龄很高的评价。早在 50 年代初，他曾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他称赞宋庆龄“在历次关键时刻，一向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宋庆龄对刘少奇也十分尊敬，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对刘少奇的尊敬也丝毫未减。现在刘少奇纪念馆展出的一本《宋庆龄选集》，就是 1966 年年底宋庆龄送给刘少奇的，上面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当时，刘少奇已被诬陷为“中国的头号走资派”，但宋庆龄仍把刘少奇看成值得尊敬的老革命家。她曾气愤地对罗叔章说：“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

1980 年 5 月，在王光美去河南迎接刘少奇骨灰的前一天，宋庆龄亲笔写了一封英文信给王光美，还送了一些吃、用的东西。信中称王光美为“我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并说：“一点小礼物却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在刘少奇追悼会上，宋庆龄和王光美紧紧拥抱。这一切无疑都是宋庆龄对刘少奇深切缅怀的至情流露。

邓小平同志在宋庆龄追悼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和她交换意见，他们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推心置腹、亲密无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在刘少奇诞生 90 周年和宋庆龄诞生 95 周年的 1988 年到来之际，我们用这篇短文记下这两位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以此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怀念。

少奇同志派我出使越南

罗贵波

每次我来到中南海，总会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到那个方向——万字廊，行一个军人的注目礼！

在建国初期的第一年，我曾经和居住在这里的刘少奇同志频繁交往。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奠定了一项鲜为人知的开拓性事业的基础……

一

1949 年 10 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军委办公厅主任，我天天在中南海上班。在建国初期那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面临千头万绪，工作十分繁忙。9 月，毛泽东同志刚刚与各界人士聚会怀仁堂。开过了第一届政协会议， 12 月又率代表罚出访苏联。随后，周恩来总理也去了莫斯科。

在这期间，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同志主持。他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0 年 1 月上旬的一天，少奇同志找我谈话。我走出居仁堂，拐进两边红墙耸立的窄巷，穿过万字廊，走进少奇同志居住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这里的墙壁和油漆都已斑剥脱落。王光美同志给我介绍说，这原是清朝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少奇同志住进这里后，把东边厢房作了办公室。由于房间窄小，曾有不少同志建议把这里扩建一下，以适应办公需要，可少奇同志始终没有答应。

北京 1 月的天气相当寒冷，少奇同志的住所温度也不高。他当时着一身黑色旧粗呢中山装，虽然只有 51 岁，两鬓头发已过早灰白，但气色很好，精力充沛。少奇同志谈话言简意赅，条理清楚，给人的印象是庄重而严肃。

少奇同志告诉我：“ 中央经过仔细考虑，并报告了毛主席，都同意让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时间大约三个月左右。 ”他问我：“ 有什么意见？ ”我说：“ 我深感中央对我的信任，但这是一项从未接触过的新工作，任务复杂而繁重，我担心难以胜任。 ”少奇同志说：“ 我们认为你是能够胜任的。 ”接着，他向我简单介绍了越南的形势。他说，胡志明同志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1945 年成立后不久，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占领了越南南方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向越北解放区步步进逼；法国殖民主义者还勾结国民党残余部队和边境土匪，封锁中越边界，经常骚扰我国云南、广西地区边民的安宁，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很大灾难。在国际上，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更没有一个国家对越共提供援助。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境地。少奇同志郑重地说：“ 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少奇同志指示我，去越南的任务是转达两党的意见，沟通两国之间的关系；还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计划的依据。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党中央的工作机构很不健全，还没 有设立中央联络部，有关援越方面的一切事宜都由少奇同志亲自处理。少奇同志考虑我到越南后，必然要与国内许多部门发生工作关系，便亲自帮助我与中南局、

华南分局和广西、云南等省建立了联系，为我赴越工作做了周密的安排。少奇同志还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为我组织了几次活动。首先与路经北京的黄文欢同志（当时化名陈春风）见了面，又与胡志明主席派来的代表李碧山、阮德瑞等同志谈了话，还与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进行了接触。不久又在少奇同志亲自督促下，为我配备了一部电台和八个随行人员，有参谋、秘书、报务员、机要员和警卫员。

临行前，少奇同志又同我谈了一次话。他告诉我，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要由越共中央确定，行动暂时保密，在适当时候回国汇报。接着他叮嘱我：你和随行人员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共领导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他还关心地说，路途漫长，交通不便，蒋军残部和当地土匪还时常骚扰，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最后，少奇同志拿起毛笔，写了封致胡志明主席的介绍信。信上说："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 8 人。"署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刘少奇"。

二

我于 1950 年 1 月 16 日由北京启程赴越南。就在我去越南途中，胡志明同志秘密来到了中国。

少奇同志得知胡志明主席突然来访，非常高兴。早在 20 年代中期，他们二人就在广州相识了。那时。刘少奇同志在广州领导工人运动，胡志明同志在广州创办培训越南革命青年的"特别政治训练班"。胡志明同志邀请了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湃等同志为越南革命青年讲课。少奇同志专讲工人运动，给越南革命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胡志明同志的到来，他虽觉意外，却有久别重逢之感。

根据胡志明主席的意见，我党中央同意这次访问不公开。当时，少奇同志曾经要我返回北京同胡志明主席见面，但因为通讯联络有误，我未能及时接到这份指示。

胡志明主席到北京后，少奇同志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比他年长九岁的老战友。少奇同志把胡志明同志到达北京的情况，打电报向正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的毛主席作了汇报，说："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一个月，赤足步行十六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六十，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少奇同志还报告毛主席，已由朱德、聂荣臻、罗迈（即李维汉）、廖承志等同志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解决胡志明提出的问题。

胡志明同志到达的当晚，少奇同志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设宴招待他。对胡志明要求中国援助的各项计划和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少奇同志边报告毛主席，边给胡志明以满意的答复，对一时难以解决的要求也婉言作了说明。

2 月 3 日，按照胡志明主席希望在苏联见到斯大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愿，少奇同志和尚昆同志同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后，采取了周密的措施，按时把胡志明主席护送到了莫斯科。

刘少奇同志在接待胡志明主席第一次秘密访华过程中，既坚持原则，又尊重对方。这对我后来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产生了 很大影响，我视之为终身学

习的榜样。

三

经过 1 个月又 21 天的辗转跋涉，我们终于在 1950 年 3 月 9 日到达了越南。这时，胡志明主席已在秘密访问苏联后先我回到了越南。在越北山区密林深处一个用竹子、树枝和葵树叶子搭成的草棚，即胡志明主席的“官邸”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越南的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

不久，胡志明同志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期两周。会上，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志清、黎文良、陈登宁等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会议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越南各方面情况，向我国提出了要求军事和财政经济援助、派专业干部来越帮助工作和建立双边贸易关系等问题。我把越方提出的问题详细地向中央做了报告。

在那段时间，我们一行 9 人和十几名华侨青年翻译，工作十分紧张繁忙。热带森林瘴气袭人，条件极为恶劣。老鼠凑热闹，蜈蚣“跳舞”，毒蛇钻进文件箱、棉被里和我们“开玩笑”，晚上硕大的蚊子、飞蛾团团围着每顶蚊帐等待时机发起攻击，稍有松懈就会被咬上一口。我们常常把自己赤身裸体罩在蚊帐里，坐在自制的竹板床上，点着煤油灯，伏案在自制的小竹办公桌上，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这样潮湿的环境里我们最渴望的是阳光。有时刚把被褥、衣服晾在绳子上，转身还没走进草棚，雨点就下来了。当然，更严峻的是还要跟法国殖民圭义者的飞机“捉迷藏”。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我们能顺利地完成党中央交给　　我们的任务，离不开少奇同志及时亲切的指示。1950 年 3 月 13 日，少奇同志给我发来电报，指示我的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抓短期内要解决的问题，搞清楚军事和财经援助的项目，以及交通运输情况；第二步是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越南的整个情况，分析越南形势的发展和战胜法国殖民主义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主力部队的建立，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等情况，以便就这些问题提出建议供中央参考。

这一指示，不但为我指明了工作方针，还使我明确了必须作好长期在越南工作的打算。应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的要求，1950 年 8 月，中央决定派出援越顾问团，任命我为团长。少奇同志来电指示我：“目前中越两党的干部刚刚开始接触，相互之间还不很了解，我们提出的一些意见他们能够采纳多少，甚至不采纳，你也不应去计较。你只要以诚相待就行。而这一切是完全不能性急的。”由于中越两党关系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原来打算的三个月时间显然不够用了。实际上，从少奇同志派我去越南，到 1957 年离任回国，我在越南一直工作了 8 年。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努力按照少奇同志的教导去做。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我们赢得了越方的信任，成为胡志明同志的朋友。我的工作局面打开了。至此，我更深一步体会少奇同志的那一席话：“友谊的基础是信任，信任的前提是了解，而了解却需要有诚恳的态度和坚持不渝的耐心。”

四

从 1950 年到 1951 年 3 月，援越的各项工作，不论是大的原则问题还是

具体工作都是在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每项工作他都是按照党中央的援越方针亲自过问，统筹考虑。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按原国际主义精神，为越南革命斗争提供了武器、弹药、粮食、油料等大量物资援助，并根据越南未来建设和作战的需要，帮助越共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和后备力量。

我在越南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情况基本上摸清了，发现最为紧迫的是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当时越南通往中国的主要路线都在法国殖民军的严密封锁控制下，使援助工作受到极大限制，许多援越物资堆集在我国云南、广西边境地区，不能及时送到越南军民手中。我向少奇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他当即指示我帮助越南方面做好运输物资的组织工作，同时命令总后勤部立即派强有力的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沿途检查和组织运输。但是，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仍然不能将越方最迫切需要的物资及时运到。在这种情况下，越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诸我国协助扫清中越边界老街，高平这两个据点，开辟中越之间交通运输线的主张。

从当时越南的主客观情况来看，打通边界交通线这一战役是一场硬仗，关系十分重大，越南军队在艰苦斗争的环境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很不适应作战的要求，缺乏攻坚战的经验，而且装备匮乏，粮食短缺，人员体质虚弱。他们一再向我国提出：一、要我广西和云南两省提供 2 万人的食宿和训练场地，给这些赤手空拳的战士解决武器、弹药、被服、医药、通讯器材等全部装备；二、要求调军、师级干部各一名担任战役指挥顾问，调团、营干部若干，分任越军团、营的顾问。这些，我都向中央和少奇同志如实汇报了。

尽管由于新中国刚刚诞生，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我们自己也 十分困难，但是我们党在支援越南抗法战争的问题上是始终不渝的。少奇同志一直按照党中央的决策精神，指示军委有关部门和云南、广西等省积极组织力量调拨物资，尽可能满足越方的要求。他指出：“所调武器、弹药必须是合用的，所配干部必须是条件好的，所谓拨的一切军需物资全是无偿的。”一次，在越军作战部队缺粮告急的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求有关的两个省立即调拨。当时有一个省提出，他们的粮食自给尚有困难。少奇同志指出，“越南一些作战部队已发生断粮现象，我们不能见危不救！”他要求这个省克服一切困难，节省出一部分粮食如数运往越南。

为了协助越南打好边界战役，少奇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很快选调了陈赓、韦国清二同志，赴越帮助训练部队和组织指挥边界战役。

在战役准备阶段，越共中央政治局和越人民军总军委在中国同志帮助下，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最初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先打与中国广西接壤的高平；一种是先打与中国云南接壤的老街。后来经过深入讨论，权衡利弊，最后形成了先打高平的意见，并将此意见报告了少奇同志和毛主席。毛主席对越南同志说：“同意你们先打高平的意见，并可与陈赓会页时做最后决定。以后你们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做决定，我们如有意见，只是当作你们参考材料，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1950 年 10 月底，经过越南军民的英勇奋战和中国同志的帮助，边界战役首战告捷。这一胜利打开了边界的交通要道，巩固和扩大了越北解放区，大大鼓舞了越南军民的斗志。从此，中国的援越物资通过边界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形势得到了越来越好的发展。

在这段时间里，应越共中央的要求。少奇同志还为帮助越共训练干部做了大量工作。1950 年初，胡志明主席要求送 21 名学生来中国高级党校学习。少奇同志立即批示马列学院负责安排，并提出可让越南再派 30 名学生来，凑齐一个班。

1950 年 4 月，越共中央要求在中国建立一所军事学校。少奇同志很支持这件事。他除了对建校选址和学生数目提出意见外，还特别指出学校的校长、各部主任、各级队长应由越南同志担任。我向胡主席和越共中央转达了少奇同志的意见，越方即派出黎铁雄同志担任军校校长，陈子平同志担任军校政委。这所学校就是当时建立在云南省的越南军校。

1950 年 10 月，越南要求送一批少年到中国学习。少奇同志先和正在北京的黄文欢同志交换了意见，然后让我把他的意见向越南领导同志转达。少奇同志提出：“越南儿童如果分散到中国各地学校去学习，由于不懂汉语，不识汉字，会给学校和越南儿童带来许多不便。如果由越方在广西办一个学校，校长和教员由越方担任，中国提供房屋、伙食及衣服等，这样可以用越文教课，同时也可学中文。等他们中学课程学完后，再分散到各大学或专科学校学习。”这就是后来在广西桂林办的越南育才学校。这所学校一直办到越南抗战胜利才迁到越南国内。考虑到越南急需后勤管理干部和财政、银行、贸易工作干部，少奇同志提议越南送来的学生至少有一半以上去学以上这些专业。

在这期间，刘少奇同志还明确指示，必须保证越南在中国办学的教材、教员和物资上的一切需要，要求有关部门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保证越南学生得到各方面的良好训练。

1951 年 3 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后，有关援助越南的许多具体工作即由中联部直接办理，但每一项较为重大的决策与工作，仍然是在少奇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我在顾问团工作期间，曾几次回国到少奇同志家汇报工作，听取他的许多重要指示。他在中南海的先后两个住所，我都去过几次。一直到 1954 年我改任驻越大使，我们的工作才改由周恩来同志和国务院领导。1960 年少奇同志访问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在欢迎词中说：“越中情义深，同志加兄弟”，热情地表达了他对少奇同志，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诚挚感情。

在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人民抗法、抗美的正义斗争中，中越两党、两国人民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胡志明主席亲手缔造的。尽管后来两国关系出现了曲折，但在那一段时间里中越友好的事实，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国际主义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将是永存的。我在暮年终于有机会写下少奇同志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心中充满了对少奇同志的缅怀之情。我愿以此作为一份个小的礼物，献给伟大的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刘少奇同志！

1987 年 12 月

党的力量源泉来自人民群众

罗琼

我长期从事妇女群众工作，多次有机会听到少奇同志的教诲。对我启迪最深的，是他创造性地发挥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他精辟地论述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反复教导全党同志，必须信任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此出发，他一贯重视党同妇女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做到男女一起发动，壮大群众队伍。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才能依靠群众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伟大事业中胜利前进！我们的道路正是这样走过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依靠群众，克敌制胜，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我们党依靠群众，实行改革开放，发展了生产力，社会充满了生机活力，建设事业欣欣向荣。今天重温少奇同志的教诲，不仅觉得有深违的理论价值，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次聆听教诲

1942 年底，刘少奇同志从华中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我们这些在延安的新四军战友，心里凝聚着对少奇同志的崇高敬意，纷纷去看望他。我们永远不能忘记，1941 年 1 月，正当皖南新四军几千名战友奔向抗日前线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包围了新四军。几千名忠诚战士，英勇突围，牺牲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枪口下，血染了皖南的大好河山。少奇同志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了新四军军部。经过两年来华中军民艰苦斗争，改变了新四军的困境，发展了新四军，扩大了华中根据地。少奇同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总想向他当商表示敬意，也很想知道华中近况，怀着这样的心情，在 1943 年春的一天上午，我随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走向少奇同志住的窑洞。

当我们走进窑洞时，少奇同志含笑起立，和大家一一握手。同去的几位同志，都曾经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本来就熟悉，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次见面，同志们把我向他作了介绍。少奇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那口子幸免于难，现在很好，想他吗？”我笑着点头，还没有等我答话，一位同志替我说道：“牛郎织女分别已经三年了。”少奇同志关怀地说：“是啊！为了革命，亲人分离在天南地北。”接着他就清大家坐下。谈话间，少奇同志关心地询问了同志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大家无拘无束地说着，慢慢地，我也不觉得拘谨了。少奇同志看清了同志们的来意，感慨地说，皖南事变燃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怒火，你们当然更是愤慨！这两年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认真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主张抗战的人士，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了新四军和地方武装；胜利地进行了反磨擦斗争，加强了团结抗战的力量；坚持了敌后抗战，严重地打击了敌伪。人民看清了新四军真正是自己的子弟兵，纷纷把儿女送来参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取得了胜利。短短一席话，说得大家精神振奋，信心倍增。

少奇同志知道在延安的新四军同志中，有的有亲人在华中工作，他说，我启程时，有些同志托我带了书信，我让一位战士包在一起，一路背着。但是敌人筑了无数道封锁线，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后来不得不把信件、文件先后销毁了。他们的心意，只能由我转达，由我向你们报平安了。你们有什么话要对亲人讲，我可以替你们发电报。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窑洞里洋溢着革命胜利的喜悦、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谈到中午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向少奇同志告别。这次会见时间不算长，但少奇同志关于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克敌制胜的教诲，却久久萦回在我的脑海之中。

三次讲安泰的故事

我知道少奇同志曾经先后三次讲希腊神话中安泰的故事。第一次是 1945 年 4 月。有一天，当我如约把少奇同志对中央妇委同志讲话记录稿送给他审阅时，他接过稿子，要我坐着等。我看他聚精会神地修改、补充，连一个不妥当的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改完之后，他问我：“你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吗？”我说：“看过。”他又问我：“最后一章的《结束语》讲的是什么？”这可把我难住了，茫然不知所答。他没有责备我，而是耐心地对我讲《结束语》中引用的安泰的故事：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他的力量来自抚育他成长的母亲——“地神”，当他接触地面时，力大无穷，而脱离地面时，力量就消失了。有一次，敌人利用这个弱点设法把他诱到半空中，使他脱离了地面，终于把他勒死了。我听着、想着，领悟了少奇同志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以此来比喻说明我们共产党绝不能脱离群众，因为脱离了群众，就失去了战斗力。后来，我重读了《结束语》，深感自己群众观点差，理论水平低，读过这个故事，没有入脑，结果考了零分。我深深地自责自愧，决心加强学习，加强实践，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在 1948 年 10 月间，那正是我们党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的前夕。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时，再次讲到：“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象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同一个月，少奇同志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又一次讲到：“我们共产党什么也不怕，美帝国主义怕不怕呢？我们不怕；蒋介石的飞机、大炮怕不怕呢？我们不怕，从来没有怕过。但是共产党怕一件事，就是怕脱离群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写道，脱离群众，就会象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要在半空中被敌人勒死。”

少奇同志反复地用安泰的故事告诫全党同志，必须充分认识脱离群众的危害，寓意极深。回顾建党 66 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正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今天拥有四千多万党员的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在半个多世纪的征途上，党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到了重重困难，也都是依靠群众一个一个克服的。

少奇同志不仅这样教育党员，而且他自己以身作则，亲自实践，坚持深入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热爱人民群众。1957 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用几个月时间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深入工厂、学校、农村视察，提出改革教育制度、劳动制魔等种种新的设想。

1958 年 7 月，有一次外出视察，他坐到硬席车厢中，同旅客们亲切交谈。1961 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他又用一个半月时间到湖南长沙、宁乡等县农村作调查，同基层干部促膝谈心，到农民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亲自向群众检讨工作中的失误，并向党中央提出纠正“左”的错误的建议。不久，他又深入到小兴安岭、大兴安岭林且，了解林业干部、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同他们商讨发展森林贺源和改革工资、价格、林业管理体制等问题。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亘古未有的特大冤案，煽动“红卫兵”批斗少奇同志。在那险恶的逆境中，少奇同志仍然坚定不移地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他叮嘱自己的子女说：“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当我后来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感动得泪水直流，视线模糊，但是当我擦干眼泪、睁大眼睛时，又仿佛清晰地看到一位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伟人——敬爱的刘少奇同志，巍然屹立在人民中间，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永远感染着党员的心、人民的心。

密切联系妇女 壮大群众队伍

从 1943 年到 1966 年十年动乱前夕，每逢党和园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少奇同志总要同中央妇委、全国妇联的负责同志谈话，听取汇报，指示工作；在中央妇委、全国妇联召开的重要会议上，他多次应邀讲话；在党和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只要讲到党群关系、政府同群众关系时，他总是高度评价妇女群众的力量，关怀妇女群众的利益，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加强领导和支持妇女组织的工作。

少奇同志把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同妇女群众的特殊利益辩证地结合起来，教育全党认识做好妇女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1947 年 9 月，他同中央妇委同志谈话时指出：“妇女工作是党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在完成党的任务上讲，在党的全盘工作上来讲，妇女群众工作必须要做。”1948 年 10 月，他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我们不只是怕脱离男子。最怕脱离妇女群众。妇女群众工作搞不好，很容易脱离群众。”1956 年，少奇同志在“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们能够密切地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上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继续加强党和群众的团结。”紧接着，他又一次阐明：“我们党一贯地关怀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的彻底解放看做我们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我国妇女群众现在在工农业劳动中和其他许多社会职业部门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女干部正在迅速地成长。党应当继续鼓舞妇女群众的上进心，帮助她们克服参加工作的某些特有的困难，帮助她们提高工作的熟练程度，纠正党内外一切歧视妇女的错误思想，并且注意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树立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的新的道德风尚。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组织的民主妇女联合会是广大妇女的群众组织，党应当关心和帮助它的工作，通过它来加强党和妇女群众的联系。”

少奇同志对妇女组织的要求是明确的、严格的。1948 年 10 月，他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指出：“妇女组织应是以宣传、教育、组织、发动全国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经济建设为已任的。”他责成妇联检查自己的工作，

检查妇联会是不是能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得好不好。他说：“妇女联合会的各级负责干部，或者各级妇联会的主任，你们脑筋里边想到的是不是一定要担负这个任务，不担负这个任务就不得了，就要脱离群众，就要在空中被勒死。这个问题想了没有？如果想了想，可能晚上睡不着觉，这个问题这样严重。”他一分为二地评价了过去妇联的工作，他说：“过去妇联会是有很多成绩的，这方面有很多好的例子是值得奖励的。整个来讲，我们在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两年来建立了根据地、解放区，后来又搞了土改，妇女组织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很大进步的。总的来说，封建束缚，特别是束缚妇女的一些封建势力、封建办法，我们不但打破，而且打破得相当彻底。妇女得到很大解放。”另一方页，他又指出：妇女联合会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在担负的妇女工作上，还有缺陷，以后要加强。

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现在农会、工会、青年联合会、纺织合作社等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妇女已经参加了各自的组织，还要不要妇女组织呢？少奇同志明确指出：“这样一个团体（指妇女联合会）我们共产党需要，而且必须要有，如果没有，我们共产党就要脱离群众，首先脱离妇女。”所以他说：“这个因体必须要建立，必须把它组织起来，而且要组织好，使它能够担负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少奇同志多次肯定了我们党必须要有单独的妇女组织，综合他几次讲话，我体会他的用意是：只要妇女本身还有特殊问题，只要男女还没有真正平等，妇女还没有彻底解放，就必须有单独的妇女团体，这个团体应从革命和建设的全局出发，针对妇女群众的觉悟水平、特有的困难，进行妇女群众工作，推动妇女参加革命和建设，争取自身的解放。

至于采取什么形式把妇女组织起来呢？少奇同志说：“妇女群众是多种多样的，有女工，有女学生，有农村里的妇女，有机关里的女职员，有社会上的自由职业者等等……要用各种方法去组织她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任何一种组织形式，看她们要什么，看她们喜欢什么，看用什么组织形式能把她们组织起来，我们就采用什么形式；哪一种形式能引导她们向进步方向走，向革命方向走，我们就采用那种形式。”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在许多形式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组织形式，即“一般的单独的妇女团体，以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革命、参加建设为任务的团体。”即当时的妇女联合会。

妇女联合会过去长期采用个人会员制。由于这个缘故，一个积极的女农民既要参加农会，又要参加妇联会；一个积极的女工既要参加工会，又要参加妇联；一个积极的女青年既要参加自己职业团体，又要参加青联、妇联。这样对妇女来说，会议多、任务重；对工、农、青、妇团体领导来说，不时发生争会员、抢工作对象等类事情。少奇同志总结过去妇女组织的经验教训和在土改时试建妇女代表会的经验，提议妇女组织不要采用个人会员制，可以采取妇女代表会议制。代表会议既可按地区建立，由若干户妇女群众推选代表组成，也可以按职业，由同一职业的若干妇女推选代表组成。由这个代表会选若干人主持日常工作。代表会的任务是把党的政策、法令通过代表传达给妇女群众，又通过代表把妇女群众的呼声反映给领导，群策群力，解决妇女问题。这样，既避免了组织上的重叠，又能集中妇女特有的要求，推动妇女进步，为妇女服务。194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肯定了“妇女代表会议是更广泛地更民主地联系妇女群众的

最好的组织形式，各地各级均应有此种组织。”多年实践证明，凡是这种组织搞得好的地方，就能广泛团结各种有代表性的妇女，密切联系妇女群众，沟通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依靠群众力量，解决妇女特有的问题，减少同其他组织的重复工作。

少奇习志不仅这样教育干部，而且亲自指导实践。1947 年，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第二年他就亲自检查当时各解放区政府发布的婚姻条例，发现其中残囹着封建婚姻制度的影响。他说：“婚姻自由，是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政策。”要求中央妇委的同志学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签发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婚姻条例，并对各解放区的婚姻状况作周密、细致的调查。他亲自领导中央妇委起草婚姻法，为新中国成立后解决千家万户的婚姻问题提供一个法律草案。他对起草过程中的争论（如离婚自由等问题），亲自做结论，支持那些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的正确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将这个草案广泛发给了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征求意见，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自 1950 年 5 月 1 日起公布实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建国以后，在制订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时，少奇同志多次提出要把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发展托儿所、幼儿园，建立妇幼保健机构，节制生育，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等事业纳入党和国家的政策和计划中。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3 年、1957 年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少奇同志参与领导，审批文件，接见代表，指导工作。可以说，建国以后，少奇同时仍然始终关心和指导我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并且作出了重大贡献。

老老实实为妇女群众服务

1945 年 4 月少奇同志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总结了做好妇女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当时这篇讲话不仅成为各级妇委、各级妇联干部的工作指南；而且成为当时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的高级干部的学习文件，他们纷纷向中央妇委索要讲话稿。他们认为这篇讲话对做好群众工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对做好其他工作同样有指导作用。1947 年，在筹备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妇委将少奇同志这篇讲话编入《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文献》一书，在编入前少奇同志又对这篇讲话稿作了修改补充。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几十年，当我重新学习这篇讲话时，深感当前党和国家的形势与仕务，同 1945 年、1947 年相比，虽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谈话中阐明的基本原理、思想、观点、作风，对指导当前妇女群众工作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少奇同志在这篇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求出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以此方针去指导群众斗争，再从群众斗争中去考验这些方针和指示的正确性。”当时他教育中央妇委的同志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作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认清了工作对象，才能进一步了解她们的要求和需要，才能巷她们解决因难，为她们服务。”当时解放区是农村加小城镇，他指示中央妇委“要真正从一个村一个乡开始，了解清楚，着手工作。如果真正了解七八个村，解决了七八个村的问题，那么农村妇女

运动究竟如何搞法，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答案。”再采取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作法，就可以把整个工作提高一步。他一再批评空喊为广大妇女服务，他说：“一下子就要替二万万人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从几个村子、几个妇女着手，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应该建立起来。大喊大叫，装模作样，口号喊得高，样子装得象，但没有为人民做一点实事，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吧！”这种工作态度，工作作风，过去应该如此，当前更应该继承发扬。因为妇女群众的情况现在比过去更加复杂，她们分布在城乡各行各业。农村仍是我国的大头，现在农村妇女不仅务农，而且务工、务商……农、林、牧、副、渔、工、商、服务等许多轮子上，个个轮子有女将。就是同一行业、同一类型家庭出生的妇女，还有年龄不同、爱好不同的差异。城市妇女在各行各业，岗位不同，家庭不同，文化、科学水平不等，年龄不一，要求各异，所以，更需要作深入细致周密的调查研究，分职业、分家庭、分层次、分年龄地进行具体分析，一定时期选定一定的服务对象，了解她们的要求和需要，由点到面，逐步扩大服务面，切切实实解决一些问题，实实在在为她们办事，这样她们才能真心实意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自己的一切。

少奇同志是我国人民衷心拥戴的、国际闻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著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库中的宝贵财富，已经植根在我国十亿人民心中，必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闪闪发光。少奇同志一生热爱人民，人民永远怀念他。

1987 年 9 月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记少奇同志二三事

王光美

1960 年 4 月，少奇同志乘坐一条中型客轮，出三峡，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沿江而下。那天晚上，刚过宜昌，突然碰上难以预料的龙卷风，顿时风吼雨至，浊浪惊空，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发现江上的小船陡然跃起，又被大浪压下去。

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所有的人惊惶失措，小木船上的人叫喊着，落水者一再呼救。轮船上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必须快去救人；多数同志认为，轮般偏离航道有危险，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来救……正在舱内批阅文电的少奇同志知道了这些情况，当机立断地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船员们见少奇同志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奋不顾身投入这场抢险的搏斗。经验丰富的老舵手把稳航向，克服浪涛的推力，让船侧身擦过浅滩；水手们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舱里，少奇同志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灯正在四下扫射，巨涛象矗立的墙壁，咆哮着滚来，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与箭一样射来的雨点，飞溅到窗上。江面上一只只小木船象是飘荡的树叶。少奇同志又命令为小船挡风。轮船横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缆绳牢牢系住……

清晨，风停雨过，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两个落水者下船时激动地握住船长和水手们的手，流下热泪。缆绳解开了，小船也一条条散去，上面的人们望着客轮渐渐远离，不住地挥手致意……

这已是 20 多年前的事了，但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心中。那险风，那恶浪，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神情，好象就在眼前。少奇同志与其他革命老前辈们一样，在危难财刻，总是挺身页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曾接到成千上万封国内外来信，绝大部分是表达他们对少奇同志的怀念，使我极为感动。我深深懂得，这不止是对少奇同志一个人的怀念，而是对老一代革命家，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怀念。在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我感到他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对人民是那样满腔的热爱，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又是那样的深。我耳边经常响起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的确，无论在顺境或身处逆境，少奇同志都是与人民同在的。

“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

全国解放时，少奇同志就极力主张共产党员公开身份，以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保证执政党不脱离群众。他认为，过去在根据地、游击区或自区，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因为不解决就不能生存。现在取得了政权，进了大城市，就容易同群众疏远。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特别的注意。他曾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自己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为了保证党不变质，他主张首先要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每个党员，包括他在内，都要受群众、受组织的监督，丽且应该欢迎别人监督；作为领导干部，

更应该这样。

少奇同志参加制订和执行政策时，都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无论到哪里，他总要向那里的群众请教，作调查研究。即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也从不轻率做出决定，总是反复推敲，权衡利弊，与群众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找到不少他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在找人谈话时听到的情况和意见，其中有各级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的反映，也有普通居民和资本家的反映。50 年代初，他还特地从湖南老家找了几个农民，担任他的通讯员，要他们每年给他写一两封信，如实反映情况，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许隐瞒，只要是为大家、为集体的事，他一定回信。1961 年和以后，在号召群众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时，他几次同干部和群众说过：“ 如果信寄不到，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

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某些方针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他整夜的思考，第二天早晨，就找来有关同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请他们提意见。有几次，我听见他对一些负责干部说：“ 你认为我的意见对，就按照我说的去试试办；你认为我说的不对，就不要去做。你如果去做，不要说是我的主意，免得下面的同志不便提反对意见。当然，如果实践证明我提出的主意错了，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分担责任。 ”经过这样反复的摸索、试验，再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批准，一项政策才决定下来，重要的还订为法律。凡是多年来证明仍为正确的政策，都是这样慎重地订出来的。

1957 年，有些地方出现“ 闹事 ”。春天，少奇同志到各地视察，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工、农、兵、学和知识分子等备方百的群众谈。我记得在河南新乡，有家国营大工厂，因任务缩减，调了一百多工人到五金生产合作社去做钳子。厂领导工作草率，未征得工人同意，采取了压服的办法，引起工人闹事，还定为“ 反革命事件 ”。少奇同志听取汇报时一言未发，到新乡后，他找了有关干部、群众和闹事者代表仔细问了事情的原委，认真研究了各方商的意见，最后，他认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决定推翻原结论。他找来了当地处理这件事的干部，耐心做说服工作，搞通思想，让他们主动去平反；并告诉他们，能勇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只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将来可以更好地进行工作。

少奇同志认为，当于群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或过高要求，也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至于群众合理的要求，如暂时不能满足，也应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说：“ 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 ”

那一段时候，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家属。他认为，闹事的原因是复杂的，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经过两个多月在各省的调查和现场处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他还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不要为手段忘记目的。少奇同志在《论党》中写道：“ 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 ”。他一生信守这个原则，至死不渝。

最近，陈云同志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党是来自人民的，脱离了人民，我们党也就不存在了。

“大家都是侍侯人的”

也是在 1957 年，北京地质学院第一批学生毕业，写信反映了一些思想问题，要求少奇同志给他们讲讲话。少奇同志欣然邀请他们和共青团的一些干部到中南海，谈了三个多小时。他针对学生不愿到野外勘探队去工作的思想问题说：许多学生羡慕老革命，想早生几十年，在枪林弹雨里当英雄，说现在只能爬荒山，找石头，太平淡了。其实，建设也是战斗，地质勘探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侦察兵和游击队，与解放前山上的游击队一样，生活都很苦，但干好了都能当英雄。找到一个矿就是打了个大胜仗，立下个大功。生活中越有奋斗，就越有意义。中国有几亿人，毛主席、朱总司令这些同志带头打游击，吃了几十年苦，打出了个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今天的建设中，别人不想满山“打游击”，你们去，几十年以后，你们肯定能打出个发达得多的新中国。你们吃一点苦，使六亿人事福，高兴不高兴？这次谈话使地质工作人员和学生受到很大鼓舞。

少奇同志不只是鼓励青年人立大志，创伟业，不要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他自己就是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地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场去解决问题。1961 年，他由广州到湖南调查了 44 天后，又奔赴东北，视察大庆油田。因为那时对油田建设是上马还是下马，正举棋不定。少奇同志深入油田第一线，摸清了情况，决定不借力量保大庆。职工们感谢他，他说：“应该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干劲鼓舞了我！”

夏季的兴安岭，森林茂密苍翠，阴霾的天气，即使不下雨，也是云过一身湿，而晴日林间，蒿草荆棘饱含露水，又象个蒸笼。这里是鸟兽蚊虫的世界。少奇同志与大家一样，穿着雨衣雨靴，健步行进在泥泞崎岖的山间小路上。他拿一根树枝，既当拐杖，又用来驱赶嗡嗡缠人的蚊虫。白天，他深入林场，看采伐、集材、归楞等生产操作，观察林场的更新情况，访问工人居民生活区；晚间，在火车上召开工人、干部座谈会，听取汇报并与大家谈心。一天，他突然问这里是否买得到酒。当时国家困难，缺粮少酒，林区交通又不方便，供应极少。少奇同志说，林区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常年处于阴寒潮湿的环境中，必须要保证让工人有足够的酒喝。他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供应，作为急需生活物资优先运到林区。

少奇同志不仅关心和积极解决群众眼前问题和困难，更顾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过去他常讲起，历史上长安、北京等地区都是林区，建了都城，树就全砍光了，现在，有人的地方林都没有了，原始森林能保存下来，就因为没人烟，来了人就剃光头，这样不行。在视察中，他发现森林资源浪费很大，采育比例失调。有一天，在一片松林里，他抬头望着那参天的松衬，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林区领导同志说：“百年之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红松林啊！我们这一代人采光了，下一代人怎么办？后继有人，也要将来有林。”接着他又说：“我国森林资源很久我们这一代人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不仅以后没得用，还要影响气候，我们死后都要受审判的！”“不要享祖宗的福，给子孙造孽！”那次，少奇同志对我国林业的采伐与更新，木材的综合利用，工人生活区的建设，都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建议。以后，党中央又制订了相

应的政策和措施。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视察中，少奇同志踏遍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的几个林区。他虽已 60 多岁，却精神饱满，不顾种种困难，有时一天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对那穿透衣服的蚊叮虫咬也都不在乎。他换下的被汗水、雨露湿透的衣衫，上面还常常有斑斑血点。每次，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是人民交给他的工作。为了工作流汗出血，他心里一定是高兴的。

少奇同志相信群众，不仅仅是事事向干部和群众请教，对群众中先进的东西加以提倡，推广，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也表现在对干部和群众的错误思想直率地提出批评，讲明道理，在一次谈话中，一些售货员、保育员、护士反映说，有许多同志不安心这些行业的工作。少奇同志讲：现在大家都愿意当工人，不愿干你们这些行，认为是侍候人，低人一等。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照这个说法，矿工就是侍候石头，钳工是侍候铁块，车工是侍侯机器，农民又是侍候土地庄稼，科学家成了待候星星、老鼠、试管或书本，这不算低人一等，为什么单单恃候人就低人一等呢？我看还是侍候人比侍候物更不简单，而且更有前途。因为将来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侍候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机器代替，唯独侍侯人不能完全用机器代替。带孩子，照顾病人，教育学生，永远需要人。而且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些职业。这方面的学问也会越来越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出最了不起的成就。他又说：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侍候人的，只不过可能侍候得更多一些。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侍候人的，每个人又都受别人侍候，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看不出能有什么比培养人才，或使别人感到幸福愉快更高尚的事。这一席话，说得大家会心地笑了。既然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唯一的宗旨，有什么理由去挑肥拣瘦呢？

“ 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 ”

少奇同志很欣赏范仲淹说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话。他认为古人能做，难道共产党人还办不到吗？

1959 年 4 月，少奇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选举的当天，他回家时，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来迎接他，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但他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按理，担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元首，高兴一下，笑一笑总是应该的。他担任了国家主席，我为他高兴，因为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但我看见他那种严肃的表情，我没向他祝贺，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平时说：“ 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 ”“ 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当时，农村情况不好，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己开始发生困难，国际上反华暄嚣日益加剧，他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他正在担起多么重的担子呀！又怎么能开怀的笑呢？

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为国为民担忧，四处奔走，体察民情。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1961 年春天，他到湖南长沙、湘潭、宁乡三县搞调查。他已经快 40 年没有回过他的老家了。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可他这次穿的是一套蓝布制服，戴一顶蓝布帽，着一双青布鞋，到了宁乡县委的大院里；大白天同县委负责同志走了个照面都未被认出，错了过去。有位同志发现了我，才又转回来说：“ 刘主席呢？ ”

我指着旁边的少奇同志说：“这不是！”

到了家乡，少奇同志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而是住在原来用作养猪场的饲料房或生产队的房子里，大家都睡木板和草地铺。他在各村随便走访，找干部、社员谈话，鼓励他们讲真话。他说：“讲错了也不要紧。好就说是好，坏就说是坏，实事求是。”

少奇同志从炭子冲老家步行10多里到他姐姐住的赵家冲,遍访了那个屋场所有社员的家庭，看到农民家里油盐罐里，只有盐没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脚搓开路旁一摊已经风干的人粪，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发现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结果。他查问旱情，询问他年青时熟悉的一些水塘头年水位的高低，和过去对比，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他听说有许多社员因为办食堂、盖养猪场而多次搬家，最多的竟搬了七次，很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老话，‘人搬三次穷’。群众连个安定住处也没有，这怎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啊！”

从调查中，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一画打电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一面采取各种办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他重申了社员的房屋所有权，房前屋后的林权，要求当地干部：“在不引起新损失的情况下，要让社员回到土改时确定的住房去。公共食堂能办好就办；不能办好，群众愿意就可以散。一定要保证群众都能吃上饭。”因为群众住房紧张，少奇同志还告诉干部不要保留他的旧居，让群众搬进去住。可是，没有一户社员有搬进来。少奇同志就亲自动员原住户和解放前他家的长工搬回来。说：“你们放心住着，到将来有更好的房子住时，你们再搬走。”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浮肿病院里，那里不但有老人，还有许多青壮年。少奇同志看了，心情十分沉重，几乎要掉下泪来。他公开向干部和社员们讲：“40年没回家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工作没作好，我心里很难受。”“我对不起大家！”他一方面依靠群众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以纠正错误，严厉批评了一些干部，“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上面的意图出发，这是很不好的风气。”同时又专门找了因坚持反“五风”而被撤职的大队干部，表扬了他们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动员他们出来工作。由于当地矛盾复杂，曾整过那些干部的大队书记听说了这件事，就站在大路口上当众大声叫骂：“刘胡子，你竟敢用右倾分子！”公安干部报告了这件事，少奇同志只微微一笑，转身又谈别的正事了。几天后，少奇同志见到那个大队书记，严肃又和蔼地对她说了一句：“我们共产党员是为大家办事的，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名利，是不是？”那个干部的脸立刻红起来。少奇同志还找犯过“五风”错误的干部，指出不能因为受批评就心灰意懒，躺倒不干，要顾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少奇同志又代表中央向群众承认错误，并主动替各级干部承担责任。他检讨说：“教训深刻，刻上碑，以免再犯！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中央责任在我！”

由于过度劳累，少奇同志不久就病倒了。即使在休息期间，他仍念念不忘群众疾苦，捡橡子、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儿中了毒，搞得大家好紧张。医生严厉地批评了厨师郝苗同志，郝苗又自责又委屈，说是首长硬让他做的。这时期，少奇同志极力提倡恢复自留地，适当开放农贸市场，弥补国营和集体经济的不足，想方设法使人民渡过困难。

因为少奇同志亲自作了调查研究，摸清了真实情况，他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总结经验教训，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

感，使他和一些领导同志下定决心：一定要纠正错误，扭转局面，号召全党全民紧紧团结，克服困难。当时，国际上，苏联已中断了一切经援，撕毁合同，又趁我困难强逼还债；美国加紧对我国的封锁；印度挑起边境争端，强占我领土。台湾的蒋介石也疯狂地喊叫反攻大陆。内忧外患，危浪险涛。我看到少奇同志心情沉重，吃饭很少，深夜躺在床上经常久久不能入睡。他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怎能不心焦呢？然而，他总是充满信心和决心，日日夜夜，与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紧张地工作。

1963 年，我国渡过了困难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市场也日渐繁荣。人民开始高兴的时候，少奇同志也高兴了！春节期间，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年一度的集市——厂甸，又活跃起来了。上午，孩子们去逛了回来，吃中饭时谈得可高兴了，什么风车、大糖葫芦呀，棉花糖、面人呀，各种土特产呀，说个没完。少奇同志听得很有兴趣，兴奋地说：“我们也去看看！”

下午，少奇同志和我带上孩子们坐车去了。一过和平门，车于就停下来，步行一段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少奇同志也牵着孩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看看这，摸摸那，象小孩子过年似的。我们一起生活了多年，却很少看见他这样开心。他此时的心情，是每一个曾为人民做过一点好事的人，都能体会到的。看到群众欢乐的表情，少奇同志笑了，出自内心的笑了。

“做人民的好儿女！”

少奇同志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在兄弟姐妹中是最小的一个。九岁时，父亲病故。全家都狠疼爱他，尤其是母亲，对他格外疼爱。而他也一直很敬爱母亲。

1920 年，22 岁的少奇同志离家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莫斯科学习革命经验。母亲舍不得他，怕以后见不着了，不让他走。少奇同志安慰母亲说：“我离开祖国远行，离开母亲，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母亲啊！”1925 年，他被军阀赵恒惕逮捕释放后，母亲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跪下来哀求他：“再别干这种事了，太危险了！”在当时封建礼教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个孝顺的儿子要抗住母亲的下跪，需要多大的革命坚定性啊！少奇同志温厚而坚定地对母亲说：“别的事，我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不行！”以后，少奇同志到了广州，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领导全国工人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曾把母亲接到城里，专门找人给她画了一张像，一直带在身边。这张像，至今我还保留着。

少奇同志是他母亲的爱子，但他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儿子。他最自豪的，就是能做人民的好儿子。他曾说：“对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报酬是人民的信任。”对于这种信任，他感到骄傲，但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从不滥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他把自己看作人民中的一员，也要求亲属这样做。

少奇同志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一直在生活上跟他关系不错。记得解放后她来看我们时，曾笑着对少奇同志说：“别看你当主席，我也是你姐姐，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但在政治上，这个姐姐早年也极力阻拦少奇同志革命，甚至还骂他不孝不悌。这个姐姐嫁在地主家庭，土改以后，要自食其力，颇感困难。不免有抱怨情绪。有一次，她写信给少奇同志：“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少奇同志回了一封信：“我看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打水，在劳动，靠劳动主

活，我感到光荣。如果我姐姐还在继续靠剥削生活，我会感到羞耻的。……”本来，只要少奇同志稍一接手，就可以帮他姐姐很大的忙，但他并不这样做。他积极支持自己的姐姐做一个劳动者。

对自己的子女，少奇同志一直让他们与群众在一起，在斗争的风雨中成长，把他们交给人民。在那出生人死的革命年代里，何宝珍烈士被捕就义，允斌、爱琴、允若（毛毛）三个孩子流落在外，一个当了小长工，一个沦为童养媳，一个做了小学徒和报童，饱饮苦水。1938 年和 1946 年，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武汉、南京先后把他们找回延安。后来，少奇同志说，“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的。只有全国人民的孩子都幸福了，我们的孩子才能幸福！”

三年困难时期，少奇同志坚持让孩子们在学校吃住，他对我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更好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

1967 年初，少奇同志受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的打击迫害，孩子们也横遭株连。过去，少奇同志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听党的话，热爱毛主席，时刻与群众在一起，认真学习，积极投身革命。孩子们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是崇高的，而今竟成了“革命对象”！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们，更不知如何去认识。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的父母不是反革命，一直留在我们身边。因此，压力和打击也就更大些。哪一个做父母的看到孩子为了自己受连累，被围攻、批斗，能不倍感心疼呢？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很难过，走进她们的屋子，象过去一样拉开。书桌抽屉，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日记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天真稚气和美好的幻想，也有悲观失望和受到的无情打击。而这一切，孩子们全未对我们说过。就是在日记里，也没有流露出对父母有任何谴责之意。但孩子毕竟是由于我们而受折磨呀！我看着，想着，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不知道有谁尝过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用手按住胸口，两眼死死盯在这句话上。我拿着平平的日记，刚要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又犹豫起来，该不该让他知道呢？他还不够难受吗？而他又能对孩子们说什么呢？少奇同志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叫到身边，亲切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人民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有过火行动。你们要千方百计地理解群众，决不能有任何对立情绪，要经得住委屈。”“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你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只要你们在人民中好好学习，好好劳动，他们会了解你们，爱护你们的。人民最终会信任你们，人民会做你们的父母！”正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人民把温暖带给了他们，指引、培养了他们，人民确实作了他们的父母！

回顾我们党的光辉战斗历程，党就象一条巨大航船，曾飞速行驶，也曾迷途搁浅，可她终于战胜了一切敌人和困难，把我们载上正确的航道。轮船经常需要检修、保养和爱护，这不仅仅是一些技师、工人的事，也是大家的事，否则在逆流风暴中，会翻船的。早在 1943 年，少奇同志就说过：“共产党永远不怕真理，永远不怕告诉群众以真理。即使这样作对我们暂时不利，

也必须这样作。”只有这样作，我们党才更赢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我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会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走上光明的航程。

1981 年 6 月作

1987 年 12 月改

少奇同志对党校建设的关怀和指导

杨献珍

刘少奇同志自 1948 年到 1957 年，曾直接领导过马列学院即高级党校的工作。这是中央党校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 10 年。在这 10 年里，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一套刻苦学习、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勤俭办校和教职员工为学员服务的优良校风和传统。这一切都是同少奇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他对党校的工作做过很多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总结继承、发扬光大。

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

远在 1948 年 7 月，党中央就决定：“ 为着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 ”“ 马列学院的任务，为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知识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 ”

中央发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处在最激烈的决战关头，形势的胜利发展，解放区的迅速扩大，使得补充干部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而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民主革命已经胜利在望，党的工作重心即将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从战争环境转移到和平环境，为了适应这一转变，也迫切需要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在当时干部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还要把一部分同志从实际工作岗位上抽调出来，到马列学院去专门读书，这样做岂不是与革命形势背道而驰吗？

不，恰恰相反，这正好表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

我们党一向重视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培养教育干部，特别是每当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期，更注意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新时期准备合格的干部。而在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中，办党校是一个重要的方式。

我们党历来就有办好党校的传统。从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办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中央党校；从各个革命根据地，到处于地下斗争状态的白区，我们党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作好准备，所以，当时党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任命少奇同志为院长，充分表现了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同年 9 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讨论了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还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强调指出：“ 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 ”

少奇同志后来在对马列学院第一期、第二期学员的几次讲话中，也都讲到了通过办马列学院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重要意义，他说：“ 学习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对党和人民都很重要。 ”“ 我们党如果没有很多理论干部，就不可能领导这么大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 ”“ 理论是实践的指针，没有理论，工作就是盲目的。无前途的，无生命的。有些人不懂理论，又要站到指挥台上，成吗？不成的；现在还可以，以后就不成了。 ”

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我们的党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党，是以马

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100 多年世界革命的历史和 60 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马列主义是唯一正确的科学。不懂得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是无法正确地领导革命和指挥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遗憾的是，少奇同志在 30 多年前向我们提出的这个忠告，并没有引起全党应有的重视，以致我们今天听起来仍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少奇同志还说：“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马列学院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方法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将来还要办中级党校、初级党校，要以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理论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使全党理论有所提高。”

名副其实的院长

根据中央的决定，我们在 7 月底就紧张地投入了马列学院的筹备工作。在整个筹办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如寻找校址，选调哪些同志到马列学院工作，招生条件怎么掌握，以至招生考试出哪些题目，录取多少学员等等，少奇同志都亲自参加研究确定。8 月中旬，他为我们拟定了第一期招生的试题和要求：“《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自拟一篇，写自己最熟悉的、了解比较深刻的问题。”并且开列了第一学期的课程，初步商定了授课教员的名单。10 月初，我向他汇报了招生考试的成绩和录取的情况。他向我们指出：鉴于培养理论干部的意义重大，应适当增加录取的人数，他又针对学员（包括 3 名来自北平的青年）的特点，提出了学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经过不到 4 个月的筹备，马列学院第一期于 1948 年 11 月 8 日在河北平山县李家沟口开学了。开学不久，1948 年 12 月，少奇同志就来校给第一期学员讲话。后来，第二期学员开学（1950 年 9 月，学校已迁到北京）和第一期学员毕业（1951 年 7 月），他都亲自来校给学员做报告。在这几次报告中，他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目的性到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从国际国内形势到党员个人修养，谆谆教导，语重心长，使学员深受教育。他特别针对学员中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反复阐述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水平对今后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章义，启发学员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有力地提高了大家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有的学员在听报告后座谈说：“少奇同志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院长。”

少奇同志在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将近 5 年的时间内，虽然身负党和国家重任，公务繁忙，但对于党校工作，无论是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思想教育，还是机构变动、人事安排、校舍建筑，他都亲自过间，甚至连开除一个学员学籍的布告，他也作了修改，方退回学校发布。凡是我们有所请示，他总是及时批复，作出明确的指示；我们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他也经常主动向我们提出来。如 1951 年 5 月，他指示马列学院要扩大招生，要我们向有关同志提出临时性的校舍建筑方案。接着，又给我们写信，规定校舍建筑的原则：“建筑标准以在延安或西柏坡时的建筑为原则，稍加一些改良和计划性即可，即以合卫生、不冷、能住人、便宜、迅速为合格，并准备在十年之后再建筑正式校舍。请你作出计划并取得陈云同志同意后再来和我一谈。”后来他又当面对我说：扩大招生不能不盖些房子，但目前国家财政比较紧，不能拿出很

多钱来盖房子，可先盖些简易的乎房，以后国家财政宽裕了，再建筑现代化的校舍。按照这一精神，我们在 9 月间提出了建筑一批平房和一座图书馆的计划方案。少奇同志在批准这个方案后，不久又写信给我说，1952 年要增招 200 名学员，需再增建相应的校舍，嘱咐我们及早拟订扩建的计划。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很快又盖起了一批节约耐用、居住便利的平房，既为国家节省了资金，又满足了扩大招生的需要。

1952 年春开展“三反”运动时，少奇同志在 4 月上旬亲自来校向学员作关于“三反”和整党的动员报告。运动开展以后，由于当时具体领导马列学院“三反”运动的有关同志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观臆断，大搞逼供信，结果把副秘书长刘元士同志打成“大老虎”。马列学院打出“大老虎”的“经验”，曾经传遍全国，影响很大很坏。但后来事实证明，刘元士同志并没有贪污行为。当我向少奇同志汇报时，少奇同志批评我说：“你既然知道刘元士没有贪污，为什么不顶住？我们不能容许这种违犯党的原则、不实事求是的事发生！”

我深知少奇同志涵养很好，不轻易动感情，但是这一次，他得知党校的好同志受到诬陷，假经验传遍全国，显然是被激怒了。他提高了声音又说：“对于这种荒唐事，就是要一膀子抗住！一定要一膀子抗住！”我承认我当时没有抗住。他要我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接着，他指派中央组织部的负责同志来马列学院，通过调查研究，检查总结，对直接领导这次运动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要把马列学院越办越好

少奇同志在马列学院的几次讲话和听取我们汇报工作时多次表示：马列学院不但要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1952 年春以后，他虽然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职务，但仍然时刻关心着马列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我们为建设党校所作的努力，也经常给以亲切的鼓励。特别是在党校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他总是对我们作出明确的指示，支持我们的工作。

1953 年春，在经过全国人民的 3 年奋战之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为了使党的干部理论教育工作与这个形势相适应，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马列学院提出了扩大招生的新任务：成立第一部，专司培养高等学校和党校的马列主义师资；第二部训练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为了加强领导，除中央任命凯丰同志为院长外，少奇同志知人善任，又指名调侯维煜同志任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这个措施，不仅对马列学院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很大的支持。几年以未，马列学院一直由我主持日常工作，随着任务与日俱增，我深深感到担子很重，曾多次要求少奇同志派个政治水平和组织才能较强的同志来参加领导工作。现在中央派侯维煌同志来，他以组织领导能力见长，正是马列学院最需要的领导人才。

4 月间，我和维煜同志在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座谈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与马列学院扩大任务相应的初步意见。少奇同志除批示“同意所拟各项意见”外，还嘱咐我们“向中央写一个报告，将马列学院各项问题提交中央会议上作一决定。”

遵照他的指示，我们在 5 月底上报了《关于马列学院教学任务、教学方

针，组织机构、组织领导及党务工作向毛主席并中央的报告》。

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讨论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决定成立由胡乔木、安子文、凯丰、杨献珍、侯维煜等同志组成的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至于校舍建筑，中央指示：“应按照拟定的规模，做出计划，经中央办公厅提交北京市委决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这个报告的传达贯彻，有力地推动了马列学院的各项工作，全院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955 年马列学院改名高级党校后，我们在北京市委刘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选定了新校舍的校址，拟定了建筑计划，报请中央审批。在讨论批准这个计划时，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恩来同志都表示：“高级党校的房子要盖好一点。”高级党校要办好，房子也要长期打算。”在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高级党校的新校舍在 60 年代初竣工使用。这些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办公大楼、大礼堂和学员宿舍，是党中央负责同志关心和支持党校建设的最好的物质基础。

1956 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完成，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即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枝的工作怎样适应这个新形势？我们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在六月间制订了一个《高级党校一九五六——九六二年建设规划草案》。7 月初，我和侯维煜同志一起向少奇同志连续作了两次汇报。少奇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对高级党校的课程安排、各科教学的重点、党的思想工作、扩大教学干部队伍、培养教学人员的方针，以及实行学衔制度等等，都作了全面的具体的指示。少奇同志的指示和党校 7 年建设规划的确定，大大鼓舞了全校教学和行政人员，因而各单位掀起了刻苦学习，向科学进军，钻研业务，更好地为学员服务的热潮，显著地提高了各项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直到近一两年，一些曾在那个时期到党校学习过的同志，还念念不忘地回忆当时那种既紧张严肃，又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和自己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收获。特别是当时全校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学员服务的精神，使学员感受很深，经久难忘。

学习理论要有艰苦的独立思考的精神

少奇同志一贯提倡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在给马列学院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员讲话时说：“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就不能胜利。共产党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我们党在这方面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干部做了很多工作，但理论知识不够。就整个党来说，我们是有理论的党，党中央、毛主席的马列主义的修养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多数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点。”“很多问题，马克思、列宁早就说过了，问题是没有读他们的书。”“办马列学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少奇同志还一再向大家指出：在理论学习中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爬在地上看不远，会迷失方向，站起来就看得远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站起来，不爬行了，眼界开阔了，天地大了，过去没有想通的，现在也可以想通了。”这个生动的比喻，给当时听课的学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少奇同志不止一次地强调“学习理论一定要有自觉的、艰苦的、独立思考的精神”，“不经过独立的、艰苦的工作，要了解真理是不可能的。”“学

习主要是靠自己，听报告、教员讲课只能给予一定的帮助，不能完全依赖报告和教员。”高级党校在教学中的“以自学为主”的原则，就是根据少奇同志的这一指示提出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曾经抓住少奇同志在谈到理论学习时借用的两句谚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诬蔑为修正主义谬论，大张挞伐。为了分清是非，以正视听，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说明。

少奇同志的这两句话是 1948 年 12 月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讲的。当时，革命形势正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快得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北线，即将解放平津；在南线，很快就可能消灭国民党四个兵团。全党全军同志都怀着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欢乐，进行着最后的斗争。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岁月！当时马列学院的学员，都是刚刚离开自己的实际工作岗位，火线上那种硝烟弥漫、枪炮轰鸣的战斗景象，以及建党建政、土改支前的热烈气氛，都还在他们的脑海中浮动，而报纸上的胜利喜讯和战友们传来的战斗消息，又时刻触动起他们渴望立即返回战斗岗位，参加实际斗争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不能安心学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少奇同志作报告前，听我们汇报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在分析了形势以后就接着对学员们说：“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窗外事可以问一问，但不要因此不安心。”在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用这两句谚语来鼓励大家安下心来学习，以便今后更好地投入实际斗争，这有什么不对呢？林彪、“四人帮”一伙抓住这两句话大做文章，不知道糟蹋了多少笔墨纸张，喷溅了多少毒液唾沫。现在，应该是还它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联系实际，整顿思想作风

事实上，少奇同志在提倡学习理论的同时，没有一次不强调要联系实际。就在引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那次讲话中，他就一再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且“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年去联系实际”，“不仅是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还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他在第二期学员开学时又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你会运用就说明你学得好，不会运用就是没有学好。”

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联系学员的思想实际，改造思想，整顿作风。少奇同志总结了过去办党校的经验，明确地提出，学习理论必须结合改造思想，整顿作风。他在 1951 年第一期学员毕业式上说：“过去的党校，最初只读书，不搞思想作风；后来又只搞思想作风，不读书。现在要把两者结合起来。”1956 年和 1957 年他还说：“在党校的学习中，一定要注意解决思想问题……”“读书同时必须要改造思想。我们干部读书是有必要的，过去不是读得多了，而是读得少了。但读书必须对工作有所帮助，只读书百不改造思想，对工作没有帮助，就是教条主义。”“你们在学哲学过程中，采取思想总结的方式，集中地反对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反对脱离群众的观点，这很好。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整风，整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在党校学了一年，不整风，就可能犯更大的错误。学了理论，整了风，就

可能少犯错误，与群众的关系更好些，也可能更谦虚些。”少奇同志还一再告诫我们：“思想问题要提得尖锐，原则问题要原则对待，但是方式一定要好，不要伤感情，不能伤害同志的自尊心，不能使人家没有发言权。要真正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同志式的爱护的态度提出意见，互相批评，弄清是非，达到团绘。要允许讲不同的意见，人家没有想好，没有讲完，就先让人家好好睡觉，睡好了再讲。”“要使人感到在党校整风学习能真正得到益处。”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并没有能象少奇同志所嘱咐的那样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解决思想问题，以致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伤害了好多同志，这是一个很值得记取的沉痛教训。

“教学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

从马列学院创办的第一天起，少奇同志就关心党校的理论队伍的建设。他在 1950 年第二期学员开学时，就说，我们几年后要大办党校，要有教授和助教。1953 年，我和维煜同志提出，在 5 年内使各教研室的教员、助教达到 300 人左右，他表示完全同意。1956 年，我们向他汇报高级党校 7 年建设规划时，提出教学干部要由现有 103 人增至 600 余人。我们一开始还担心这个数字是不是提得太大了，但是少奇同志却说：“教研室干部数量似乎少了一些，可以增加至 800 到 1000 人。”他还说：“教学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不要怕编制大，大一点也好，不能和政府、行政机关比，但学校的行政编制不要大了。”我们主张在教学人员中实行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学衔制度，他也极表赞同，说：“实行学衔制度是必要的，既要人家安心工作，学校就要正规化，需要采取这样一些制度，才能使人们树立起理论教育工作的事业思想。”

少奇同志认为，“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科学研究为教学服务”的方针很对，很好，有利于培养教学人员。他还指出：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一定要提倡独立思考、大胆创新。他在 1956 年的谈话中又再三强调：“要独立思考，要自己研究讲解，无论如何要搞出自己的东西。”“你们要自己下苦功，钻研总结我们党的经验，搞出一些讲稿。”“我们有新的经验，很多东西是经典著作没有的。”“不仅要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要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凡是能独立思考的，就不会栽跟头，照抄照撒一定要栽跟头。”“不要怕讲错，讲错了就承认错误。不要停留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过去的观点上。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在各种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就很值得考虑，有些观点不要过于肯定，过于肯定就僵死了。几种讲法部可以讲，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不要讲成一把尺子，到处去量。因为普遍真理在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是不同的。这样，教的容易，学的有益。不要讲了不能变，讲了不能变就成了教条了。”他还说：“做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深入调查实际材料，仅仅看书不能当好教员，要到实际中去学习，只靠书本考的博士是没有本事的。”

在我国革命胜利后即将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少奇同志对于教学课程的安排，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他告诉我们说：“要注意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多独立思考，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讲授政治经济学。”

1957 年 5 月，我和维煜同志向他请示如何在党校开展整风问题，他用了

很长时间向我们谈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种种矛盾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重大意义，他说：“这些问题在苏联教科书中是学习不到的，我们要研究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特别是谈到如何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问题时，他说：“我们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多样、更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的灵活性、多样性还不如资本主义，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采，更方便、更灵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情你们用较大的力量来研究，好不好？”

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备受林彪、“四人帮”摧残的恶果充分暴露出来之后，再回顾少奇同志的这些话，我们可以更切实地感受到它的极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极其丰富的实践意义，我们当时对它的体会虽不根深刻，但也要试图朝这方面作些工作。可是，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和康生的干扰破坏，阻碍了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期望，也长期未能实现。

所谓“里通外国”的真相

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少奇同志领导党校工作，还有一个所谓“刘少奇利用党校搞里通外国”的问题，他们说的“里通外国的如山的铁证”，实际上只有两条，一条是 1950 年经少奇同志批准，由中组部、中宣部、马列学院和人民大学共同组成党校工作访问团，由我率领到苏联参观访问，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建立了交换教学资料的关系，后来竟被说成是“利用合法手段，出卖党的机密”；一条是 1955 年苏共社会科学院哲学教授格列则尔曼来信，这里着重介绍后一桩事情的来龙去脉。

1953 年下半年，我们写了一个《马列学院第二部第二、三、四、五班的哲学教学经验总结》。总结的中心是，在哲学教学中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交给学员，使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后，能够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个总结送中央后，少奇同志肯定了我们的教学经验，即理论联系实际的经验，也就是所谓“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十六字方针（这个方针经中央政治局于 1953 年 6 月 26 日批准，1956 年 2 月 1 日中央又将这十六字改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并嘱咐我们把这个总结送交《学习》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

当时在马列学院教课的苏联专家，讲课时脱离实际的倾向很严重。我们想用这个总结影响一下苏联专家，我曾请当时在苏联社会科学院学习的一个苏籍华人名叫曾秀夫的，把这个总结替我们译成俄文。曾秀夫把这个文件译成俄文后，未告诉我们，就直接把俄文译稿送给格列则尔曼看。我并不认识格列则尔曼，也从未通过信。8 月间，格烈则尔曼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们哲学研究室以极大兴趣讨论了这个总结，认为我们在哲学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们接到格列则尔曼的信后，认为他们对我们的哲学教学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也讲了苏共哲学教学的历史经验，说他们在理论联系实际上曾经有过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叫我们也注意防止这种倾向的发生。这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我给少奇同志写了一封信，把格列则尔曼的来信给他送去。少奇同志看过后，批“送毛主席和恩来、陈云、小平同志”，并

“建议此信在《人民日报》和《学习》杂志发表”。毛主席阅后，还用铅笔批了几个字：“很感兴趣地看了这封信。”

就在这期间，康生一次见到我时说，他一看就断定这封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说这些人是绕着弯子骂我们的。我实在看不出这封信是怎样反对毛主席、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是怎样在骂我们的。

就是这样一封信，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成为刘少奇、杨献珍、侯维煜“里通外国的如山的铁证”。但是，这个彼称为“如山”的“铁证”，在铁的事实面前，很快就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少奇同志的历史是革命的历史，光荣的历史。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以他的广博精湛的理论修养和出类拔革的领导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史册，永垂千古，他对党校工作的教诲，将在今后的党校建设中继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少奇同志的片断回忆

马文瑞

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9 年了。回想起少奇同志和我的多次谈话，回想起他对劳动工资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他亲切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怎能不让我深深地怀念！

我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是在 1935 年冬天。当时我任陕北省委秘书长，有一次，省委在瓦窑堡开会，研究职工运动，少奇同志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那时他是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他刚刚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因艰苦跋涉而消瘦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面容清瘦，但目光炯炯，声音宏亮，谈笑风生，给我一个精力充沛、温和睿智的印象。以后在延安又几次见面，但接触不多，接触较多的时期，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1954 年，我被任命为国家劳动部长，多次参加中央的会议，跟少奇同志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特别是在 1956 年,党的八大提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全国工资改革以后，劳动工资问题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为此他曾亲自给我写信，多次找我谈话。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极为关心劳动制度的改革，以及他那深入实际、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全国解放以后，企业用人基本上实行的是固定工制度。经过建国初期的几年实践，少奇同志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了这种劳动制度的弊端。1957 年初，他在上海、湖南等他的讲话中，几次提出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建议。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劳动工资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劳动制度要有改革”，“把过去老的一套挡住，搞新的一套。”在 1958 年前后，他几次执我谈话，中心也是讲这个问题，他说，固定工制度弊病很大，这是一种包下来的办法，统得大死。企业用人只能进，不能出，企业不能选择自己需要的工人，工人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有的企业本来就是季节性的，如糖厂、榨油厂，搞成固定工，增加了国家负担，浪费了劳动力；同时还造成了千些工人的依赖思想：反正有了铁饭碗，“干不干，两斤半”，没有责任心、进取心、竞争心，不努力钻研技术。他还幽默地说：“怎么能‘固定’呢？就是国家主席也不能固定嘛，五年一届，要经人大代表选举，选不上也不能当嘛！”他指出，合同工制度就比较灵活，订合同，规定期限，企业需要，干得又好，合同可继续订；不需要，工人可另找工作，企业不背包袱。合同工为了续订合同，就努力工作，学习技术，有上进心，这就调动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在一个时期，这两种劳动制度可以并存，逐步用合同工制度代替固定工制度。

1958 年上半年，“大跃进”即将开始，各地区各部门都喊劳动力紧张。那时，劳动部主管劳动力的调配，于是纷纷找劳动部要人。我感到在各企业各部门内部进行调剂，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只有从社会上（包括城市和乡村）再招收一批新工人，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要求，因而向中央打了招工报告，1958 年 6 月 21 日，少奇同志亲自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就招工问题以及招工问题涉及到的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里要求我们“眼光应当看宽一些”，研究的范围“不要局限在一种工厂制度范围之内”，要解放思想，这样才“可能发现和提出更多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办法。”我体会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不要受固定工制度的束缚，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大胆探索，把劳动制度搞活。针对劳动力紧张的问题，他提出

了西个办法，一是挖掘广大妇女劳动力资源。当时参加工作的妇女还不多，他指出：“不论在城市和乡村，我国广大的妇女还远没有从分散烦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认真地系统地把妇女的家务劳动以及其他为生活服务的事业集体化，组织成为相当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事业，那我们就能够从社会上解放极大的一批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并使青年们能够腾出时间进行学习。”二是要把城市中闲散的全劳动力和大批的半劳动力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安排适当的工作，“采用较为灵活的劳动制度（如每日工作四小时或六小时，发＝分之一或四分之三的工资等）”，这样就可以解除多数城市劳动力紧张的情况。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它应当和一定的劳动制度相适应。他在探索搞活劳动制度的同时，也在探索改革教育制度，他是从教育如何更好地与工业生产劳动相结合入手的，他在信中说：”学校教育同工业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是会有许多的，但是我想，其中会有一种最高的方式，这就是学校同工厂合而为一的方式。”他的具体设想是：在技术不复杂的工厂，一律招收初中毕业生，经过短期训练，进工厂作工，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发一半工资，八至十年内学完高中、大学的课程，大学毕业另行分配适当的工作，再招新生。技术复杂的工厂，招收中技毕业生，实行六小时劳动，两小时学习，发四分之三的工资，在同样的时间内学完高中、大学的课程。这样，青年可通过半工半读上完大学，既满足了他们求学的愿望，又不必过多地增加国家和家庭的负担，工厂也不缺合格的劳动力。由于教育的普及，工人的素质也会大大提高。

以上这些想法，少奇同志跟我谈过，在别的地方也多次讲过。他一再倡导的合同工制度，在一些地方、部门、企业曾经进行了试点，初步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遗憾的是，这个很有活力的劳动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资产阶级旧制度”，还未推开就夭折了。应该说，少奇同志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提出这些主张，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从实际出发，一心想探索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劳动制度，方向是正确的，对我们今天劳动制度的改革，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1986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文件，决定改革劳动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正是借鉴了少奇同志的主张和当时的试点经验（当然，在基本原则与具体做法上有了进一步的完善）。目前，我国的教育制度还存在着脱离生产实际的倾向，少奇同志关于教育与工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对于指导今后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必然会发挥其重要作用。

从我与少奇同志的多次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工作深入、认真负责的好领导。他为了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情况，始终保持着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好作风。

他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就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56 年以后，他多次到外地调查劳动工资问题，有时还通知劳动部派人同去。1958 年 3 月，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他在去成都的途中，还在石家庄、太原等地停下来进行调查并作劳动工资问题的报告。他听说苏联的劳动制度跟我国的并不完全相同，就亲自指示，由劳动部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考察，以便了解他们的情况，吸取他们的经验。当时，我照办了。

少奇同志对劳动部的工作抓得很紧，除了通过写信、作批示进行指导，还曾亲自到劳动部机关来，和我们一起研究工作。1958 年 6 月 29 日下午，他到劳动部找我们谈话，部机关局级以上干部都参加了。他谈的问题范围比

较广，在谈到劳动工作的管理体制时，他说劳动部“大部分时间可以用于调查研究”。他强调，有了新的设想，一定要经过试验，看是否真有效果。他说：“你们搞几个人当厂长好不好，特别是新厂，可以按你们的设想进行实验，看看是否比别人的搞得好一点。”他还提出，搞实验要全面，不要光搞厂子，还要搞一个市、县。他要求机关干部要有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要了解实际。他明确地说：“劳动部门的干部要知道厂长的艰苦，自己不能当厂长的人，不能做劳动工作。”他这样重视实践，强调深入实际，就是为了防止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脱离实际，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

他曾经让我写一篇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文章。我写了，他看过以后认为轮廓尚可，但又以他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提出有些地方不够成熟，必需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修改。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这篇文章始终没有发表。

少奇同志优良的工作作风，我认为在今天贯彻改革开放方针的新形势下，仍是值得我们的广大干部学习和发扬的。我们当前所处的环境，比过去复杂得多了，工作、生活节奏加快，信息量大大增加，没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没有必要的调查研究，没有对于客观实际的全面面正确的了解，要作出科学的决策，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在工作中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除了别的原因之外，与他们工作不深入、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是有密切关系的。

少奇同志在“文革”中含冤去世，是党和人民的极大损失。消息传到我的耳朵，已经很晚了，当时我也身遭软禁，只有心里暗暗痛悼而已。使我感到无比欣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少奇同志的冤案后来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少奇同志继续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他的　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他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以及其他许多富有远见的思想，在改革的实践中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功勋卓著的少奇同志如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

1983 年 1 月

他永远屹立在我们心间

黄树则

一

少奇同志！

——我们这样称呼他。在革命战争期间，我们这样称呼他；在建国后，他当了国家主席之后，我们仍然这样称呼他。在他面前，我们这样称呼他，同志们相互之间谈到他的时候，也是这样称呼他。

一想起少奇同志，就会想起我们曾经熟读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一本深入共产党员之心的书。我们这一代，谁没有受过它的熏陶和教育啊！

在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学习过 22 篇《整风文献》，其中的一篇就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同志们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的时候，经常使用这一本书的语言，用它来对照自己。特别是其中提到的应该纠正的几种错误思想，好象一斧一凿似地时时在引赵我们的警惕。“不要为了一针一线的问题而争论不休，伤感备至！”我记得，这就是当时同志们常说的一句话，用以制止一些无原则的争论。

我回想，1944 年秋的一个晚上，傅连暲同志带领我和另外几个医生到少奇同志的住处，给他检查身体。检查之后，他让我们都坐下，给我们讲了抗日战争以及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形势。当谈到学习的时候，傅连暲同志说：“我们在整风中学习了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受教育很大。”他沉吟了一会，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接着又说，“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很多困难，但是，有毛泽东同志领导，事情要好办得多。”

我回想，在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期间，延安所有的同志们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毛泽东同志的安全。有一天，我和傅连暲同志去看少奇同志。傅连暲同志请示了一件有关保健工作的问题之后，少奇同志立刻把话题转向了重庆谈判。他说，“谈判已经差不多了，现在最主要的是能够让毛泽东同志早点安全回来。毛泽东同志会谈了，又安全回来了，这就是我们的胜利。”停了一会，他又重复悦，“让毛泽东同志早点安全回来，这是最重要的。”

我国想，当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四位同志在黑茶山遇难的消息传来之后，党中央为他们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追悼会。林伯渠同志主持开会，少奇同志讲了话。他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推翻政协决议、一手包办召开“国民参政会”的违背人民意愿的作法，说明四位烈士是在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中牺牲了的。少奇同志挥动着他的手臂，激昂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举手赞成违反人民利益的议案！”接着，他阐述了我们党所采取的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政策。最后他以充满热情的词句称颂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功绩。

我回想， 1946 年夏天，关向应同志在病危的时候，要求向党中央作临终的告别。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等受党中央的委托到他的住处去探望。他虽然身体已经衰弱不支，但是竭力讲了很多话。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等走出来到另外一间窑洞时，我和关向应同志身边的几个同志都在那里，大家坐

下，沉寂了好一会。彭德怀伺志说：“看来仙还想多说几句，可是精力来不及了！”接着，少奇同志望着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挂在心上的是党的事业。所以他只要有一口气，总想多说一些，为党多尽一些力量。”

我回想，1956 年，我随从周恩来同志到东南亚六国访问回国之后不久，去看望少奇同志。他很愿意多听听我所看到的几个国家的情况，特意雷我在他那里吃午饭。当我谈到我们的总理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都拥挤在一起，热情欢呼的时候，少奇同志说：“这都说明世界人民倾向革命，他们喜欢解放了的中国。”

我回想，在 1960 年的严冬季节，少奇同志率领代表团，参加了 81 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会议是十分紧张的，少奇同志每天很少休息。有一天晚上，在我们的住处安排了一次电影演出，影片是根据托尔斯泰小说改编的《战争与和平》。跟随少奇同志的医生对我说：“你能不能劝少奇同志今晚看看电影，休息一下呢？他实在太累了。”我立刻走到少奇同志的住室，他正在书案前看文件。我问了问他的健康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建议。他没有马上回答，却谈起了会议的情况。他说：“如果搞不好，这次会议可能成为一次错误的会议。”谈了一会，当我提醒他电影开演的时间已经快到了的时候，他看了看手表，微笑着说：“好吧，听你们的，我回头就去。”那是他在莫斯科期间唯一的一次休息。会议终于胜利地结束之后，他在苏联进行几天的访问。一路上他作了几次演讲，主要是结合中国的实际，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是几次非常难得而又难忘的学习。

我回想，罗荣桓同志病重临危的时候，少奇同志曾到医院看望他。那时罗荣桓同志已经不能讲话了。当我们事先把少奇同志要来看他的消息告诉他时，他现出急切期待的表情，极力和疾病作最后的搏斗。少奇同志来了，紧紧握住他的手。少奇同志走出病房之后不久，他就停止了呼吸。

罗荣恒同志在他还能讲话的时候，曾经对他的子女们说过：“我什么遗产也没有给你们留下，留下的只是对你们的希望，希望你们坚信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现在，当我记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禁又联想到少奇同志说过的那句话：“一个共产党员；始　终挂在心上的是党的事业。”

二

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卫生工作。他曾作过多次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对我们卫生工作者们是很大的教育。

1956 年，正当高级农业合作社普遍成立的时候，少奇同志在 3 月上旬听了卫生部党组的工作汇报之后说：“要加强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每个乡都要有医务所或者卫生所，配备中医、西医、护士、助产士。每个中心乡卫生院最好还配备一名高级西医师。现在许多高级医务人员都分配在城市，是不公平的。”

毛泽东同志在 1965 年提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就在那年，周恩来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也都讲了这个问题。少奇同志曾在当年的 5 月和 7 月向卫生部党组的可志们作了两次重要的讲话。他着重讲到：“解放已经十六年了，农村卫生面貌没有从基本上改变，还是那么个样子。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多人口的城市，百分之七十的医务人员都集中在城

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缺乏。卫生工作不为五亿多农民服务，怎么叫为人民服务呢？”他还说，“一方面要派医生到农村，同时也要解决农村医生的培养问题。”提到药品供应时，他说：“要把药品供应点深入到农村。目前不是药品多了，而是到不了农村。应该研究生产大量常用的药品，简单适用的药品。农村常用药品的价钱不要高。药品生产部门、供应部门、医疗器械生产部门可以不赚钱或者少收点利润嘛。”

差不多一见到卫生部党组的同志们，他总要问到中医工作，谈到中医工作。

“你们要主动团结中医，欢迎他们，给他们以应有的地位。”这是他对卫生部党组同志们特别强调提出的一句话。

“在学习方法上，有十二个字就包括了，这就是：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这是谈到西医学习中医时他指出的原则。

他对老中医带徒弟的传统教育方法，非常重视。1957 年 2 月间，他和邓小平同志一起向卫生部党组几个同志谈话时，曾经讲过：“凡是有本事的中医，都要让他们带徒弟。你们要搞一个中医带徒弟的办法，师徒关系、师傅收益、什么人可以带徒弟、带徒弟要具备哪些条件等等，都要详细规定，写好报送中央。”

他指出，要整理研究我们的传统医学，就必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也就在 1957 年 2 月那次谈话中，他说：“要把西医里面有经验的老教授请来参加中医的研究、整理、提高工作。组织几十个人就够了。这不是简单的事，没有几年是不行的。几年之后，就会从中产生出东西。也有可能他们研究了两年还弄不出东西来，那也不要责怪他们。不要要求过高过急，同时也不要怀疑我们的作法，要坚持下去。”1964 年 1 月 2 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卫生代表团时说：“中国原来就有自己的医学，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中国医学有它的特点。当然，传统医学如果没有和近代科学结合，要进一步发展；是相当围难的。”

血吸虫病曾经是在我国南方流行很广的一种危害很大的寄生虫病。为防治、消灭这个病，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都曾亲自过问，作过指示。1956 年 3 月，那时贺诚同志已经调离政府卫生部，少奇同志为了了解血吸虫病防治的进程，并且继续发挥贺诚同志在大规模防治疾病方面的作用，特别派贺诚同志去上海参加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会议，并且到几个省去实地调查，写报告给中央。贺诚同志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办了，在 6 月末给中央写了详细的报告。少奇同志立即把这个报告批给了卫生部党组。

当我们给少奇同志检查身体或者看病的时候，他常常要问一问群众卫生工作的情况。他很关心儿童的口腔卫生问题。1960 年 9 月的一天，我陪同口腔科专家给他检查牙齿之后，他特意对我们说：“儿童的口腔卫生非常重要，要广泛宣传，让小学生养成饭后刷牙漱口的习惯。”他还讲了很多开展口腔卫生工作的具体问题。卫生部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召开了两次口腔科专家的座谈会，会后向中央写了《关于口腔卫生工作的报告》，经中央批准，转发给了全国。就在当年的 10 月下旬，少奇同志在接见古巴卫生代表团之前，又向卫生部陪同接见的李德全、崔义田同志谈到了口腔卫生问题。他说：“我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刷牙，以为只是为了白一点，刷的方法也不对。囚十岁以后常牙痛，而且慢慢掉了儿个牙。近些年来，每次饭后刷牙，花不了几分钟。这样做了几年，牙不痛了。要提倡饭后刷牙漱口，长期坚持。”

对于如何做好行政领导工作，少奇同志留下的教言更是有 深远意义的。早在建国之初，他曾在一件书面指示中，提醒卫生部党组的同志，切不要犯命令主义、主观主义等毛病。他说，即或领导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多数人还不能接受，也不要强迫执行，要耐心他说服他们，并且要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1956 年 3 月 7 日，他曾对卫生部党组的同志讲过这样一段请：“ 一切工作要靠干部去做，管理干部的工作要好好研究一下。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感到舒畅，就证明干部管理工作做得不坏，否则就有问题。 ”

我深深感到，少奇同志这些话到今天还在闪耀着光芒，一直到久远。

三

少奇同志是把他的全副精力都放在革命事业上的，对于自三的生活很少考虑。在他患病的时候，我们问起他的症状，他回答总是非常简单，有时候简直忘掉了，必须由王光美同志在一旁提醒。可以看出，即或在看病的时候，他的思路也没有离开工作。我们知道他的这个习惯，所以总还要多问一问光美同志。有几次我们劝他好好休息几天，他总是说：“ 你们把病情和应该注意的事情告诉我本人就行了，我自己会安排好的。 ”他不同意我们把他的病情写报告给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以免让他们操心。

少奇同志的身体一般是健康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体质比较好，一方面是由于光美同志的细心照护。他对医生建议是重视的，只要不影响他的工作，他就照办。多年来，他坚持每晚作体操，就是根据医生的建议办的。1960 年冬他在莫斯科开会期间，仍然是这样，每晚由医生陪着他作体操。

他虽然不爱多讲话，但他的对人亲切、诚恳的态度总使人感到他在流露着内心的热情，他的一举一动都给人一个从容不迫的印象，不显得很繁忙。但是我们知道，时间对于他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总不愿意太多占用他的时间。

我最后一次参加给少奇同志看病是在 1965 年 12 月间。他当时患感冒，发热比较高。我从他的住室走出来的时候，正好周恩来同志来看望他。我立刻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说，“ 前天，他把五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稿一口气看完，看了一整夜。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我劝他暂且不要看，可是他坚持要看。一定是太累了。要让他好好休息！ ”

我最后一次见到少奇同志是 1966 年国庆节那天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记得他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军服，仍和往常一样地走向城楼的前廊，当毛泽东同志下到金水桥去会见群众时，他特别嘱咐警卫的同志们把毛泽东同志照料好。那正是一场人一们所不理解的动乱开始走向高潮，他已经开始遭到不幸的时候。

21 年过去了。经过动乱，拨乱反正，我国现在已经出现了空前安定、繁荣的局面。记得 1980 年初，当少奇同志得到平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真好象久压在我们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被搬掉了。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正是这样。林彪、“ 四人帮 ”之流早已身败名裂，而少奇同志的伟大革命形象将永远屹立在我们心间。

1987 年 8 月

少奇同志关心体育事业

荣高棠 黄中

亲切的关怀

1952 年，我们从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回来后，与了一个报告，建议成立国家体委，诸一位德高望重的同志，最好是贺龙同志来管体育。这个报告就是写给刘少奇同志转中央的。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少奇同志是很支持的。1958 年，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党的八大二次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出，讲究卫生，提倡体育，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并把它列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少奇同志省多次出席一些重大的体育活动，向为国争光的运动员颁发“体育运动荣誉奖章”，接见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和优秀运动员等等。这些对体育战线都是很大的鼓舞。

少奇同志工作很忙，又不分管体育，但还是抽出时间到体育场馆观看比赛。1956 年，有一次，他和王光美同志来到北京体育馆看体操表演，我们知道后赶去，问少奇同志有什么事吗，他笑笑说，没有事，就是来看看，我很喜欢体操运动。看体操，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嘛！他们一直看到表演结束才离开，始终兴致勃勃。他还说过，“看到运动员使人心中愉快。”这本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少年一代健壮成长的喜悦心情。想不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竟恶毒攻击说这是与毛主席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唱反调，是搞资产阶级的娱乐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提倡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娱乐，恩格斯、列宁都讲到体育也是一种娱乐活动，毛主席当年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精辟地阐述过体育有强意志、调感情的作用。体育是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参加锻炼可以增进健康，丰富精神生活，就是观看体育比赛，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享受，确实能够促使人们心情愉快，意气凤发地投入生产劳动、学习和工作。

运动员创造了优异成绩，少奇同志总是给以热情的鼓励。他曾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三次亲切接见为祖国屡建功勋的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是在 1959 年，那时容国团在第 25 届世界锦标赛中为祖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二次是在 1961 年乒乓球队在第 26 届世界锦标赛中取得三项世界冠军之后；第三次是在 1962 年夏季乒乓球队到北戴河集训时。每次接见，少奇同志都很关切地询问乒乓小将们的思想、技术情况。他曾很有兴味地了解小将们如何掌握运用弧圈球这种新技术，鼓励运动员精益求精。1965 年第二届全运会开幕式，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兴致都很高，尤其对整齐壮观的团体操表演十分赞赏，对几千青少年组成的变幻奇特的背景感到新鲜，一再询问是怎样组合起来的。少奇同志听了我们的说明后指出，这对培养训练青少年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很有好处。1958 年，他和周总理到唐山视察工作时，曾经和唐山铁道学院女子垒球队亲切交谈，还兴高采烈地戴上垒球手套与运动员一起照相。

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广大劳动人民和青少年一代的健康。1955 年，他为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题词：“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健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说过，工人农民劳动之余，也要做些体操等活动，对全面锻炼身体有好处。1958 年一次在火车上和江西部昌县参观团同志们谈话时，他

也谆谆嘱咐，农业社还要搞体育。他要我们每年系统调查几个学校，把学生的体育活动搞好，除了办体育学院外，还应当帮助教育部把体育系建立起来。他主张办半工半读的学校，并且提出，就是这类学校每天也应有半小时体育活动。

体育是全民的事业

少奇同志对国内和国际体育都作过不少指示，比较集中的一次是 1956 年听取体委工作汇报的时候。这一年 3 月初，我们接到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钱俊瑞同志的电话，说少奇同志最近要听取文教各部门的工作汇报，要我们把体育工作的现状，7 年和 12 年规划及其他有关材料先送去。可以看出少奇同志的工作作风是很认真严谨的。3 月 9 日，少奇同志整整用了半天时间，详细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这次少奇同志谈了不少话，他指出：“体育已发展成为全民的事业”，鼓励我们党内要团结，还要团结好党外人士，搞好这项事业。他强调体育工作有了规划后，还要研究实际情况的发展，要根据一定的条件来开展。他积极支持在我国广泛开展各种有益于人民身心的体育活动，叮嘱我们：除了现代体育项目外，还要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传统体育项目，探讨其科学价值，采取各种办法传授推广。

他在听取汇报时还指出，“体育担负着国家的政治工作任务促进各国人民的团结”，体育在外交工作上可以同文艺等一道成为“开路先锋”。

要赶超西方体育强国

少奇同志几次接见亚非拉国家的体育队时，都表示了我国总有一天要赶上和超过西方体育强国的坚强信心，1965 年 6 月接见几内亚篮球队时，他在谈话中教育我们一方面对外国好的东西要学习，另方面对外国又不要迷信。他说，我们打了一百多年的败仗，就认为中国人不行，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他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崇拜洋人、瞧不起自己的思想，鼓励我们要有赶超世界先进体育运动水平的信心。

他指示我们要加强与第三世界的体育交往，认真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当一些外国朋友感谢我们在体育上对他们的帮助时，少奇同志总是说：“帮助是互相的。”“我们在体育上的合作，交流经验，这是在平等和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的。”他还说，我们在某些方面帮助别人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帮助，不要耍花样。做朋友，就要做真朋友，不做假朋友。我们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人家比我们好的，就要向他们学。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了我党和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一贯方针。

从实际出发开展体育活动

少奇同志曾指示：“体育运动是好事，要放手发展，但要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文化水平，考虑到怎样的程度适当。”他说，体育事业一方面发展要快，一方面要有步骤。事物总是按一定规律发展的。他指出，有些地方，在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时，应当先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不顾条件勉强地去搞体育就一定碰钉子。他强调“农村不要向城市看齐，主要搞不花钱的活动”。

体育工作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体育既不能消极地依赖于经济条件，又不能完全脱离经济发展的水平。1958 年我们一度头脑发热，朋离当时的条件，搞城乡并举，要求人人通过劳卫制，三五年内普及农村体育等，这些错误的教训是深刻的。

勤俭办体育，注意节约和组织收入，不能事事都向国家要钱，这是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的。他说，群众自己凑几个钱，就更加爱护自己的事业，更加注意节省。建国初期，他积极倡议在我国开展国防体育活动时，也强调这项活动开支较大，要节约，有些活动可以收些费。现在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仍须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

少奇同志尽管是国家主席，但和我们接触时很平易近人，在决定问题时，强调按组织办事。他在听取我们汇报体育工作规划后曾说过，“你们的计划我都同意，但要解决具体问题，仍须按一定的手续，由国务院批。”从少奇同志身上，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严格坚持组织原则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

多年来，少奇同志在为党为国为人民辛勤操劳中，坚持体育锻炼的精神也是很感人的。他长期坚持每晚睡觉前散步半小时的习惯，经常练简化太极拳，有时还在家里同亲人们一起打乒乓球。1954 年，少奇同志开始学游泳，他那时已五十六岁，但很快就学会了。1961 年庐山会议前，他曾在九江畅游长江；1964 年还和毛主席同游十三陵水库。少奇同志喜欢自由泳；也能仰泳，游得轻松自如。1960 年初，少奇同志右肩关节周园发炎，胳膊抬不起来，专门做了一个木架，拄上绳环，坚持用左手帮助右手拉练，这种体育疗法的效果很好。最近，听王光美同志谈起，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起初少奇同志还坚持散步，后来身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摧残，步履十分艰难，终致卧床不起……

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丰功伟绩是永世不朽的。体育界将与全国人民一道在本世纪内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体育强国，少奇同志着英魂有知，也当会含笑九泉。

1980 年 3 月作

1987 年 9 月改

终生难忘的接见

王玉茹

“建设时期的游击队”，这是我们爱戴尊敬的刘少奇同志对地质战士的称呼，也是地质战士的崇高荣誉。多少年来，这光荣的称号曾激励着许许多多的地质战士，成年累月地战斗在崇山峻岭、大漠荒原，风餐露宿，不畏艰辛地唤醒沉睡的大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寻找宝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随着历史的发展，许多往事愈加令人深思和怀念。

少奇同志当年接见年青的地质战士时讲的一番话，经过三十年来实践的检验，越发使人感受到他那深邃思想的光辉。这番话既是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大学生的谆谆教诲，也是一名老共产主义战士对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是一次既严肃又亲切的对话，也是一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恳谈。

30 年前，少奇同志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 1957 年应届毕业生代表时，我作为在场的一员，和他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和晚上，至今记忆犹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深沉。更有力量。它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他象送自己的孩子出征

1957 年 5 月 17 日，我刚刚上班不久，电话铃声响了，是党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通知说，当天下午 3 时，刘少奇同志要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让我们推选 50 名同学前往中南海。接到电话后，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几天前，我们团委曾把毕业生在毕业前夕希望中央领导同志接见的信件转了上去，其中有一封是直接写给少奇同志的。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繁忙,何况应届毕业的学生何止万千,我们能得到回复吗？可是，我们这个愿望竟然这么快就成了现实，这怎么能不让人激动呢？

1957 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特别是这年的夏天，我们党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性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当时，新中国成立了七年多，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为了更快地建设起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在青年中，当时正掀起一个向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潮。青年是人民中间最活跃的一部分力量，他们对国家、对党、对自己都充满了希望，当然，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对现实生活中那些不如人意的现象有意见，有看法。就要走向生活了，许多同学的心情激动而又忐忑不安。有的同学担心毕业后到野外工作，将成为一个平凡的“地质匠”，业务上一事无成：有的同学怕在野外消息闭塞，渐渐地变成对政治谈漠的人。还有一些同学在思考：碰到官僚主义怎么办？怎样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坚持真理？怎样在复杂的环境里永远保持青年人的朝气……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少奇同志看到地质工作在工业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看到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地质学院毕业生，将要去迎接更加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去过那种艰苦的野外生活，为了让这一代青年经得起风浪，怀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深情，象送自己的孩子出征一样，在临别前接见了年轻的地质战士。

我当时作为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团委副书记，带领 50 多名毕业生代表，参加了这次接见。

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了

5 月 17 日下午，在中南海一个朴素幽静的会客室里，虽然有 50 多颗心在激烈地跳动，可是室内却静得出奇。当少奇同志微笑着走进来时，大家异口同声地问候：“少奇同志，您好！”少奇同志招招手，亲切地答道：“好！你们好吗？都坐下吧。”这时，他走到一个长桌前面，坐在为他准备好的一张椅子上。我看到他穿着一件自布衬衫，袖口已经起毛，领口中间还补了一条。他翻开笔记本，对我们说：“你们有话要讲吧？你们先讲。”本来我掌握了同学们不少思想情况，可这时一下子又概括不起来了，象连珠炮似地提了一连串问题。少奇同志仔细认真地听着，思索着。还往本子上记着。我讲完后，他亲切地笑着问：“还有什么吗？”之后，他根据我们提的问题，一个一个他讲下去。他时而坐着讲，时而站起来。讲得既生动又深刻，象磁铁般地吸引着大家。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开始讲话时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你们今后的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呢？”大家听了后，不觉都愣住了。是啊！在学校学了 4 年地质，就要毕业了，究竟怎样认识地质勘探这个工作呢？大家聚精会神地等待少奇同志继续讲下去，这时，他站起身来，说：“我打个比喻：我们是打过游击的，从 1927 年算起，到 1949 年，打了 22 年，没有丢下过枪，包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在内。何长工同志就是 1927 年在井冈山和毛主席一起打游击的。我是 1932 年才到瑞金打游击。我们这些老干部没有打过仗的很少。那时候打游击很苦，是野外生活，还要行军，吃饭、穿衣、住房、结婚都有很大的困难。我们是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先锋队。建设时期也要有人打游击，也就是说，要派一支队伍去侦察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宝藏。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凡是要搞建设的地方，总是需要你们先去，等那个地方的房子盖好了，你们又走了；其他地方你们也要去普查，看到底有没有矿藏。总之，你们总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还要过野外生活，是比较苦的。将来全国的地质工作人员要有几十万，你们几十万人吃一点苦，就能使六亿人民得到幸福。”

随后，少奇同志谈到了什么叫政治进步。他说：“野外工作是比较苦一点，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比较差，但要说政治生活也差，政治上容易疲沓，我看不一定。我们从前打游击，政治上疲沓的也有，但政治上进步的比较多。刚才讲，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六亿人民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你们要情愿吃一点苦。如果你们有这样一个决心，你们政治上就会进步，这是个基本点。”他还讲了进步与落后的辩证关系，指出：吃了苦不应当骄傲，如果认为自己比别人进步，一背这个包袱，政治上就要落后；只有既吃了苦，又不吹牛，政治上才是进步的，人民才会信任你们。

要成为又会操作又讲得出道理的知识分子

有些同学担心在野外持久了，会变成一个平凡的“地质匠”。少奇同志

对这种想法很注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是不是怕自己在野外工作多少年，科学水平落后？我看不见得，我倒是赞成你们做一个时期的‘地质匠’。”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你们现在大学毕业了，学了很多知识，但是你们到底有多少知识，要有个正确的估计。现在有些大学毕业生，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你们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是一知半解的，也就是说，知识还不够完全。你们读了很多书，学了从古以来地质学方面的知识，知道了世界上地质学方面的先进办法，在这方面讲，你们似乎知识很多。但另一方面，我看你们实际的知识、真正的知识还没有接触到。你们应该了解这一点。你们在学校学了那么一些东西，只能叫半知识分子，不能叫完全的知识分子。要做一　个完全的知识分子，还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去学习，因为真正的知识主要是在工作中取得的。”为了帮助同学们真正弄懂这个道理，少奇同志又打了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例如骑脚踏车和游泳，虽然理论上能讲得很清楚，但如果自己没有去实践，还是不会骑，不会游。当然，只会操作，不懂理论，知识也不完全。舞台上骑脚踏车表演的杂技演员，你们看，他表演得很好吧，可是他就是讲不出道理，这就需要力学家来讲了。只会操作讲不出道理，知识不完全；讲得出道理但不会操作，知识也不完全；又会操作又讲得出道理，知识就完全了。希望你们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

谈到向科学进军，少奇同志说：“这个口号我看是不错的。但是向科学进军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妨碍工作，不能把工作丢开，一定要把工作摆在第一位。”他还指出：有些人向科学进军，不是从六亿人民的需要出发，而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不是有理想的人。我赞成青年人有高尚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为了六亿人民的幸福。

有的同学提出：参加工作以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关系不如学校那么简单，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怎么处好自己和周围同志的关系，保持青年人的革命朝气呢？少奇同志说：“是呀！工作以后就是复杂些，你们要和很多人接触，和工人、农民接触。你们就是要和他们一道吃饭、劳动，从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不要那么特殊，要放下架子，新中国的青年绝不要搞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要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劳动人民的国家。和别人相处，要虚心向别人学习，耐心诚恳地帮助别人；总想占人家便宜，不是互利，而是一利，那样关系总是搞不好。要不怕自己吃亏，不是吃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多次……要这样做下去，一年、两年、八年、十年……长了，人家就会知道你是个好人，诚实的人，可靠的人，可信任的人。我希望听到人民对大学毕业生有这样的结论，愿你们做这样的人。”

他还谈到坚持真理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坚持真理就是要对各种错误的意见表示态度，不要对什么都模棱两可。但是，什么是真理，你们年轻人还不大清楚，不易辨认。因此，就要谨慎些，稳重些。官僚主义要反，但是要看到这是个长时期的斗争，也是一场曲折的斗争。反了一阵，好一些，但还会再有，那就再反。反对官僚主义的方式也要加以研究，一般我们还是主张搞小民主的办法。你们快毕业了，将来你们都会担起大大小小的领导工作，都能保证不犯官僚主义吗？”大家都笑了。

后来，他又讲到了野外生活问题、供给问题、医疗问题、工资问题、文化生活问题、群众纪律问题和年轻人的婚姻问题、住房问题以及在野外的看报纸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我们没有提到，可是他却想得那样细致和周到，

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后，少奇同志问：“这样的‘游击队’生活，你们干不干？”同学们响亮地回答：“干！”少奇同志听到这有力的回答，高兴地站了起来。他放大嗓音说：要干就愉快地干！长期地干下去。吃了苦中苦，政治上才不会疲沓。

送给“青年游击队员”一支猎枪

那天的时间不知怎么过得特别快，没想到少奇同志一口气讲了整整3个小时，不知不觉已到黄昏时分了。同学们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这时，我想起同学们还带来了一些献给少奇同志的小礼品。有的是他们毕业实习时爬上6000多米高的山峰，采集来的珍贵标本；有的是一块精美、完整的矿物结晶；还有的是他们自己精心编制的彩色小花环，象征着全班儿十颗红心听从党的召唤，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有的是同学们自己编写的诗歌小集……礼物虽小，可是代表了同学们对党和祖国的一片心意。几个班的代表走上前去，把这些礼品送给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和他们亲切握手，还连声说：“谢谢你们。”

接着他说：“我送给你们什么礼物啊？送给你们一支猎枪吧！这支枪是前几天伏罗希洛夫同志送给我的，转送给你们。让你们这些‘青年游击队员’为了搞好地质勘探，把老虎和狼打跑。”这时，有不少同学流下了泪水，激动地说：“我们决心去打游击，干它一辈子！”少奇同志看到同学们那种热情，又站了起来意味深长地说：“热情是需要的，但是很多事单靠热情还不够，还需要冷静，需要理智。不要怕碰钉子，不要性急，要坚持下去！坚持真理有时就可能受些打击，不要怕在主活中、工作中受挫折，一个人一帆风顺并不好，要在斗争中成长。希望你们永远精神饱满，身体也是好好的。”少奇同志这一番包含着人生哲理的话，我们在后来的实践中，才越发感到它的分量。我们是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位严肃、慈祥而又平易可亲的老前辈啊！在依依难舍时，他最后说：“让我祝你们劳动好！学习好！团结好！”随后，少奇同志和参加接见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照完像，我对少奇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把您讲的话，很快整理出来，传达给每个同学。”这时，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也走过来说：“我们要尽快地在报上发表您的重要讲话。”少奇同志说：“你们什么时候整理好，就拿到我这里来，我要亲自看过。”

一辆大客车刚刚开出中南海，车上就响起了《勘探队员之歌》的嘹亮歌声。一路上歌声不断，似乎这歌声可以代表大家此时此刻的全部感受。

我们的人民实在太好了

当天深夜，我们带着报道少奇同志接见的消息初稿，到了中南海少奇同志家里。我们在一间很简朴的会客室里等待接见。不一会儿，少奇同志从里屋走了出来，他笑着和我们握手，还夸奖说：“你们好快呀，要是我们的工作都有这样的效率就好了，还是年青人干劲大。”

我们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大茶几周围。开始，少奇同志手握一管粗铅笔，戴上眼镜，非常认真地看稿，一个字一个字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还斟酌，修改。我们估计，用这个办法，可能要搞个通宵了。王光美同志向少奇

同志建议：“还是让他们读给你听吧，边听边改。”于是，我一句句地念给少奇同志听。他对讲话的内容修改得不多，但是对我们形容他的音容笑貌、谈吐风度的话，诸如什么。‘神采奕奕”、“慈祥和蔼”，还有什么“伟大”、“敬爱”、“崇高”、“最难忘”、“最宝贵”等等，统统用铅笔重重地圈掉了。他一边圈，一边严肃地对我和中国青年报的徐才同志说：“这些都　是废话，不仅无足轻重，而且讨厌。不要华而不实，写文章也要如此。现在有些文章有这个问题，废话多，这也是文风问题，要注意。”他看到我似乎有点委屈的样子，又说：“我不是批评你们。我是说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写了那么多神采奕奕，我真的有那么神采奕奕吗？”说着，他爽朗地笑了，我们也都跟着笑了起来。我说：“不写那么多，可是总得给我们保留两处，否则，群众要责怪我们了。”由于我坚持要保留几处，他总算没有全部圈掉。

关于同学们给少奇同志送礼的那一段，他主张不要写。他说：“我们不主张给领导同志送礼。写出去将来老百姓纷纷给领导同志送札就不好了。我送给你们一支猎枪可以写。”他还讲起河北平山县的一位老大娘，前些天到中南海来，一定要把一袋小米和几斤红枣送给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讲了这件事以后，无限深情他说：“我们的人民实在太好了，太可爱了，我们为他们做的事还很不够啊！”我听了很受感动。在整个下午和晚上的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人民的热爱和赤诚，包括对青年的热爱和关注。我仍坚持写同学们送礼这一段。我说：“这些小礼物代表了同学们的心意，这段不写进去，同学们要有意见的。”他看着我那执着的样子，微笑了。他说：“你把群众和同学们端出来，这一着真厉害，把我‘将’住了。”由于我的再三要求，少奇同志总算没把这一段删掉。

要学会引导群众和教育群众

少奇同志审阅完稿子，仍然没有一丝倦意。他让王光美同志给我们做点吃的。他说：“他们肯定饿了，下午座谈一个下午，会后赶写了七八千字的稿子，又急急忙忙跑到这里，真是发愤忘食了。”光美同志很快给我们端来了热牛奶，又端出一盘点心，我真的无拘无束地吃起来了，象在自己家里。

他谈到整风，问我学校里现在都贴了一些什么大字报，集中反映的是些什么问题？当我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如实向他汇报的时候，他若有所思地说：“领导要到群众中去，关键是要改善党群关系，根本问题是个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不要坐在办公室里，哪里有怕群众的领导呢？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就在人民群众之中，过去是这样，现在还应该是这样。学校的领导更要经常深入师生之中。办好一所大学不简单，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增长才干，以身作则，吃昔在前，享受在后。要努力为群众谋利益，绝不能为自己谋私利，要到教学第一线去，搞好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不要等问题成堆。要教育行政、后勤人员搞好服务，这不是谁高谁低，而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一为祖国培养合格的和优秀的人才。”

当我谈到有些师生也有些过激的语言和行为，诸如贴出“红辣椒”大字报和一些不大好的漫画等。他说：“要学会教育群众和引导群众。群众的思想是参差不齐的。一个人的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有些过头和偏激的语言和作法，是不难想象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冷静沉着，学会分析问题。群众提的意见正确，要虚心接受，坚决改正，尽快改正：不妥或过分，就要进行

教育，说明情况，讲清楚有些事情一时还办不到，不同能一个早晨把所有应该做的事都做好、还有个主客观的条件问题。对一些内容和形式不好的大字报和漫画，要批评，这也是一种教育。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方法得当，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不脱离群众，一些偏激的同志也会受到教育，改变自己的思想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是特殊的教师

少奇同志进而问我什么时候入党的？做青年团工作有多久了？我向他老人家介绍了自己的简单经历。当他听到我中学时代参加“民联”，在中学、大学读书期间都是学生干部，很是高兴。我还谈到自己在大学毕业后，留校搞青年团工作，思想上有些想不通，有委屈情绪，甚至觉得浪费了 4 年大学时间，特别是看到有的同学给团委贴的“红辣椒”大字报，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费力不讨好……少奇同志慈祥地、耐心地听我讲，然后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们共和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你毕业后留校做青年团的工作，这是党对你的信任和爱护，也是一种锻炼。这项工作比你搞业务工作更重要，因为一个大学的团委书记，是在众多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你在大学 4 年中学习的知识，对你从事这项工作都有用，可能还不够。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难度很大、意义重大而深远的事业。思想是人的灵魂，思想指挥着人的行为，好的思想，科学的、先进的思想能够指导人们创造奇迹。我们党的工作，青年团的工作，很大程度是做人的思想转变工作，做人的教育工作，要让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愿意为实现它而奋斗，这需要有很大的本领和献身精神。”

少奇同志还说：“你们是所谓‘双肩挑’的干部，做一个大学教师，当然也不容易，可是，青年团的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更是一种特殊的教师。要好好珍惜这个工作。你还年青，基础是很好的，要准备经受挫折和委屈；要严格要求自己，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信心，磨炼意志，努力工作，尽职尽责。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让别人对我们如何评价，而是出于对党的事业和对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一生要经受多种考验，使自己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起来！我们党多么希望你们这些年青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共产党人快快成长，来承担大业呵！”我被这语重心长的一番话深深感动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当时暗下决心：敬爱的少奇同志，我一定刻苦学习，顽强锻炼，不辜负您的教导，永远记住这珍贵的时刻。

已经是凌晨 3 点多钟了，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位平易近人的革命前辈，可是，确实不能再坐下去了，党和国家还有多少重大的事在等待着他呢！临别时，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谆谆叮嘱我，让我回校后转告党委领导同志，要主动地到群众中去，学会引导和教育群众，把学校的整风工作搞好，今后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和问题，可以写信给他。少奇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当我回头看他时，他还站在那里，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我的眼睛不禁被泪水模糊了……

5 月 19 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和四版用两个版面详细报道了少奇同志的这次接见。我回到学校，立即向党委领导同志转达了少奇同志的有关指示，并认为应该在学生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少奇同志接见毕业生代表时的讲话精神，学习和领会他的思想，应该把这件事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可惜，学校

不久就进入反右派斗争的高潮，我由于坚持宣传这次接见，不同意在学生中划那么多右派，被视为干扰运动，同时还被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很快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那一段时日，我思想斗争极为激烈，许多事不能理解，违心地作了多次检查，还是通不过，一定要承认是反党。我曾几次鼓起勇气想给少奇同志写信，但是，又觉得为个人的事，求助于这么高的领导，觉得不应该。少奇同志说要经得起考验，严格要求自己。我决心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出成绩，争取再次受到他的接见，聆听他的教诲，可是，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身陷囹圄 6 年多，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所敬爱的少奇同志——我们的国家主席，竟被污蔑为“头号走资派”，我陷入了比 1957 年整风时更大的困惑中。

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少奇同志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议，沉冤大白，使我激动不已。1981 年，我重新调回北京。1982 年冬季的一天，我去看望王光美同志。见面后，我们紧紧地握手，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淌。我们畅谈了近两个小时。临别，她送给我和我爱人一本精装的《刘少奇选集》。她在扉页上写着，“感谢你们对少奇同志的棵切怀念。”

30 年来，每当我想起 1957 年的 5 月 17 日，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如今，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期，在这继往开来的时日，回忆起少奇同志当年那一席谈话，还是那么亲切感人。我们要更好地继承少奇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告慰他的英灵。

1987 年 8 月

实事求是的榜样——回忆七千人大会中少奇同志的作风

吴冷西

1962 年一二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建国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当时，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农业生产已经连续三年歉收，粮、棉、油料都减产，粮食产量 1961 年比 1957 年减少了 1000 亿斤，家畜、家禽越来越少，不少农村发生了饥荒，城市口粮也减少供应，副食品也非常紧张，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以农业原料为主的轻工业生产，从 1960 年起就急剧下降，重工业生产从 1961 年起也下降， 1961 年工业总产值比 1960 年下降 40%，许多工厂停产。市场上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连买一双袜子也很困难。

页对这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相当混乱。特别是在党内，一种互相埋怨的腐蚀党内团结的情绪在滋长。党中央在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过程中，特别是在讨论全国农业会议和全国工业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时了解到：许多干部对当前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很不一致，对“大跃进”以来的 4 年工作评价也褒贬各异。虽然中央自 1960 年冬起就开始纠正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接着又发出了一系列指示，重新规定了许多旨在纠正过去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正确方针政策，但党内许多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负责干部很不理解，因而贯彻执行也很不得力。

考虑到这种情况，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这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总结 4 年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以便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整个国民经济早日好转。鉴于会议内容这么重要，中央还决定扩大参加会议的范围，全国所有县委有 2 人、地委有 3 人、省委和中央各部有 4 人参加会议，加上许多大型工矿企业的负责人，一共有七千多人。这次会议因以名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叫做“七千人大会”。

会议是在毛主席主持下召开的。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发挥重大作用，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

刘少奇同志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负责准备提交会议讨论的全面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协助少奇同志起草这个报告。少奇同志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报告的主旨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无论总结 4 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提出克服困难的方针政策，都要实事求是。在报告初稿的起草过程中，他对参加起草工作的同志反复强调这个思想。在报告的整个起草和修改过程中，以至整个大会过程中，少奇同志都身体力行，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出来以后，先送给毛主席看。原先设想，毛主席看过并认为大体可用以后再提交政治局讨论。过了两天，小平同志告诉我们，毛主席的意见是不要等他看了，也不等政治局讨论了，就把初稿直接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与此同时，成立一个由少奇同志主持的起草委员会（包括政治局、各中央局以及有关负责同志共 21 人），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再向六千人大会作正式报告。

毛主席提出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开会方法，可能是考虑到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关系重大，有必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事实也正是这样。少奇同志的报告初稿，涉及对过去 4 年工作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分析和经验教训，涉及对当前经济困难的看法和今后的任务，涉及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涉及党的作风和党内生活的重大问题，而参加大会的六千人，真是来自五湖四海，工作岗位不同，工作阅历不同，自然而然地对上述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这些不同的看法，既反映在大会的分组讨论中，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到起草委员会中来。这也就使起草和修改工作显得更加复杂，统一思想的难度增大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气魄与毅力也就显得特别突出。

少奇同志素以观点的鲜明性和尖锐性著称，他在讨论问题时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而且力求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少奇同志也素以论证充分、逻辑性强见长，他的谈话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人心悦诚眼，即使你不完全同意，也难以辩驳，这些特色，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充分显示出来了。

最典型地显示少奇同志实事求是作风的，是他在会议中提出两个“三六开”的观点。

一个“三七开”是对过去 4 年工作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认为，报告初稿中成绩讲得不充分，缺点错误讲得过多。这种思想状况，严重影响认真总结这 4 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多次引用毛主席关于我军打仗报战果一定要真实的意见，反复说明：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两者都摆开来讲，有多少讲多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都要实事求是。他指出，成绩是跑不了的，缺点错误也是不能否认的，两者都是客观存在。当前的问题是不少同志不敢正视或者低估“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严重性。他尖锐地提出，不能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套话来概括这 4 年工作中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这 4 年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讲成绩与缺点的关系，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比较合乎实际。就是说，成绩是七分而不是丸分，缺点锗误三分而不是一分。这样实事求是的估计，广大干部和群众寸心眼。这两年大家饿肚子，心里都有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来掩盖实际情况，掩盖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严重错误。

少奇同志还进一步分析，“三七开”是就全国总的情况说的。至于有些地方，也许工作得比较好，缺点错误比较少，那里可能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或者是八个指头与两个指头的关系。同时，也可能有些地方工作做得特别差，错误犯得特别多，那恐怕连“三七开”也打不住，甚至可能是倒“三七开”。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实事求是，由干部和群众去评价。

少奇同志这样实事求是的分析，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住，使许多同志思想通了，气也顺了，能够比较冷静地来思考这几年工作的经验教训了。

其实，“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这是 1959 年庐山会议前期（7 月上半月）很受与会同志欣赏的少奇同志两句名言，当时对大家总结 1958 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启发很大。那也是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许多同志在会上敞开思想，互相交心，谈思想，谈体会，畅所欲言，无所拘束。毛主席当时称赞这是开“神仙会”。半个月的“神仙会”，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稿，主要内容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当时已经认识到的“左”的错误，只差会议最后通过。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从 7 月下半月开始，毛主席错误地发动

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形势急转直下，大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所谓“军事俱乐部”，纠“左”被这场强台风扫荡得无影无踪了。

在七千人大会过程中，少奇同志重申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的两句话时，曾提出要记住庐山会议后半段否定前半段的教训。他指出，由于后半段反右倾否定了前半段纠“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错误，在庐山会议以后，不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严重了。这就使得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大大超过了1959年上半年。

所幸七千人大会没有重蹈庐山会议的覆辙，自始至终注意贯彻实事求是的作风，比较重视过去几年中的错误，初步地总结了经验教训。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三七开”，就是对造成当时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的分析。

当时，干部（包括相当负责的高级干部）对这个问题看法很不一致。当前的困难，究竟是连续三年（1959—1961）自然灾害造成的，还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哪一个是主要原因？七千人大会初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大家都承认，自然灾害和缺点错误都是原因。至于哪一方面是主要原因，意见就不一致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充分认识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可以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因为自然灾害是难以避免的，而缺点错误却是可以纠正的，由它们所造成的困难因而也是可以克服的。

少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农业连续三年遭灾减产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是事实，但是，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刮“三风”（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所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他尖锐地指出，当前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用湖南农民的话来说，叫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说，困难的原因，三分是自然灾害，七分是缺点错误。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三七开”，对许多同志说来，一方面震动很大，破除思想上种种清规戒律的顾虑，另一方面又信心倍增，扭转困难局面大有希望了。

少奇同志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在1960年冬率领我党代表团参加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和访问苏联回国后，很快就根据毛主席关于领导干部要认真搞调查研究的倡议，到湖南等地基层去做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家乡的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天灾有一些，但不大，困难主要是干部刮“三风”造成的，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后来又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去调查，这些省的负责同志也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少奇同志早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这种看法。

少奇同志提出和坚持这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的胆略、卓识和韧性，又需要十分耐心和细致的说服工作。经过充分的讨论，这两个观点先在起草委员会、后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只是在书面报告最后定稿时没有直书两个“三七开”，而是用比较委婉的词句来表达。关于成绩与缺点错误，报告中列举成绩12条，主要缺点错误归纳为4条。关于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报告是这样写的：“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上述工作上和作风土的错误所引起的。”

七千人大会在总结过去4年工作的经验教训时，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人就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少奇同志实事求是地指出这4年工作中

的缺点错误，毡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大会过程中，一般说来，对批评违反实事求是作风和群众，路线作风的种种错误，大家思想上比较容易接受，认识也比较一致。但是，对于报告初稿中批评的某些错误，特别是着重批评分散主义倾向，大家认识相当不一致。许多同志，特别是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对于把分散主义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加以讨论和解决，缺乏思想准备（在中央各部门工作的同志会前或多或少听过中央负责同志有关这个问题的议论），感到很突然。他们认为，这几年犯过许多错误，主要是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不是分散主义。

在会议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克服分敖主义问题，特别是少奇同志，可以说，他的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引导大家充分认识分散主义的危害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加强集中统一的极端必要性。

少奇同志针对许多同志的疑问明确提出他的基本观点，这就是：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当然是过去几年工作中的主要错误，但分散主义倾向也是主要错误，特别是在目前，它已经成为我们纠正各种错误的最大障碍。

少奇同志的这个观点，是根据大量事实提出来的。当时，分散主义倾向已成为全国普遍的严重现象。其突出表现是许多地方和部门拥权自重，既各自为政，又政出多门，形成许许多多小天地，对中央闹独立性，对下级和群众则独断专横、压制民主。中央的许多政策，尤其是 1960 年冬以来为纠正“左”的错误而重新制订的一系列政策，遇到重重阻力，贯彻不下去。有些地方和部门，对这些政策采取置之不理、或者各取所需的态度，有的甚至素性另搞一套。党中央 1960 年 11 月接连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等指示，有些党委和部门竟然加以封锁，不往下转发，也不往下传达。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许多地方和部门就迟迟不贯彻执行，或者在执行中大打折扣，当时党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瞒上欺下、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相当严重。少奇同志在报告初稿开始起草时，曾要求起草工作同志广泛收集和严加核实有关分散主义的事例，而且要指名道姓地写出来，使大家触目惊心。

少奇同志在会议中反复严肃指出，不论纠正“三风”、“五风”也好，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也好，首先必须克服分散主义。无论何时，都不能没有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当然同时也应注意发挥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性和因地制宜），尤其是在革命事业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加强这种集中统一领导。少奇同志尖锐地提出，分散主义能否克服，对社会主义事业能否继续前进关系极大。闹不闹分散主义，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少奇同志这样严肃、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倾向，对许多同志说来是非常有效的清醒剂。少奇同志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只在党内领导干部中进行，不要反到一般干部和群众头上去，更不允许采取过火的粗暴的党内斗争方法，绝不能重犯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至于报告初稿中列举许多分散主义的事例，少奇同志提出，各地方各部门认为不适当的可以订正，还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事例来代替。后来，初稿中的不少事例更换了，但最后定稿时，考虑到这类性质的错误不是被指名的某个地方或某个部门所独有，还是泛指较好，于是就把全部指名道姓删去了。这样，既批评了分散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又缓和了曾被点名的地方和部门的紧张

情绪。

少奇同志批评分散主义令人折服，还在于他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少奇同志在起草委员会中实事求是地指出，分散主义现象这么普遍而严重，不能完全责怪各地方和各部门。这种倾向的产生，首先应由中央负责。因为从“大跃进”时候开始，中央做过多次决定，把许多原属中央直接掌握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部门。他自己就曾批发过好几个这类文件。下放权力过多，给分散主义的滋长造成了条件，这是中央犯的错误。一年来中央决心改正这个错误，把下放不适当的权力收回来，并且重新制订改正其它错误的方针政策，要求各地方和各部门贯彻执行。这时候就特别需要各地方和各部门克服分散主义倾向，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

在七千人大会中，少奇同志不仅仅是对下放权力过多作自我批评。他还代表中央宣布：过去 4 年工作中的主要错误，首先由中央负责。

早在七千人大会之前，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中央发出的文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一个报告。报告中指出了这些文件中反映的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并且说明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这个报告后来在会议中分发了。小平同志在大会讲话中精辟地论述了党内生活的重大原则，批评了种种不良现象，提出了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并且作了自我批评。少奇同志在书面报告中谈到此事时还声明，中央书记处检查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以后逐渐代替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会议，因而政治局的责任首先由少奇同志承担。

毛主席 1 月 30 日在七千人大会作长篇讲话时，一方面严厉地批评党内压制民主的恶劣现象，一方面也坦率地对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这之前，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谈到中央书记处的检查报告时还说，报告不要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每人都有，只是多少的问题。

周总理在大会的最后一天讲话，对如何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总方针，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以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克服当前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这个讲话中，他多次对政府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作自我批评，郑重而又恳切，极为感人。

中央领导同志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深深地感染参加会议的伺志，有力地推动大家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小组会议中敞开思想，互相交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在毛主席 1 月 30 日讲话中批评有些省委压制民主的现象后，各省分组会迅速形成开“通气会”的高潮，如果说七千人大会前半段主要是对报告初澈包括对中央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作）提意见，那么后半段主要是县委和地委对省委提意见，省委作自我批评。毛主席曾引用一个省的同志一首打油诗，形象地道出了开“通气会”的心情。这首诗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于一稀，皆大欢喜。”“通气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许多同志讲出了多年憋在肚里的真心话，这就消除了隔阂，沟通了思想，加强了团结。许多同志深有感触他说，“许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痛快的会了”。

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陈云同志都分别参加了一些省的小组会。

少奇同志在安徽纽着重谈了发扬党内民主。周总理在福建组着重谈了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朱总司令在山东组着重谈了纠正“左”的偏向和恢复发展生产。陈云同志在陕西组着重谈了怎样使认识更全面，深入浅出地阐明全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邓小平同志除了在起草委员会中协助少奇同志以外，经常同各中央局的负责向志在一起交谈，对沟通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少奇同志的报告稿在 1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通过以后，毛主席建议，这个报告几易其稿，多次讨论，大家都很熟悉，不必再照本宣科了，可作为书面报告印发，另由少奇同志在大会上作补充说明和解释。少奇同志当天亲自通宵草拟了一个讲话提纲。第二天（1 月 28 日）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聚在后台休息室（原北京厅），少奇同志把讲话提纲交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常委看。提纲一共有十几页，因为字写的很大，很快就传看完了。少奇同志在大会上按提纲加以发挥，更鲜明地阐述了他在起草委员会中说过的许多重要观点。事后有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少奇同志书面报告和讲话都强调加强集中统一，而毛主席 1 月 30 日的讲话刚强调发扬党内民主，这怎样理解。当时的解释是：这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他们两人都是在论述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大前提下分别侧重不同的方面。少奇同志更多地突出反对分散主义。毛主席更多地针对当时有些省的分组会中出现压制民主的现象，这从他讲到这个问题时严。厉而激动就可见一斑。至千后来事情逐渐走向反面，那就始料不及了。

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来回顾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人们可以发现这个会议带有难以避免的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大会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认识和纠正党中央（以毛主席为代表）总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并没有完全做到实事求是（少奇同志也难以完全做到），有些错误的东西当时还被肯定，后来又恶性发展了。

但是无论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七千人大会毕竟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 4 年中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这个时期内我党所犯的相当大部分的错误，重新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了全党思想，加强集中统一，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克服当时严重经济困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尽旱争取全国经济形势好转而奋斗。这次大会及其以后的 2 月“西楼会议”、5 月中央工作会议，由于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小平同志以及丰富春等同志的共同努力，并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雷厉风行之势贯彻执行。加上党中央采取的其他重大政治措施，给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甄别平反，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魂人民的一部分，经过 1962 年的紧张工作，国民经济在 1963 年开始好转了， 1964 年全面好转了。周总理 1964 年底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当然，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不久就夭折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之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全页展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事业，改

革和开放才形成势不可挡的潮流。抚今追昔，六千人大会有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少奇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将长久地为人们敬仰和思念。

1988 年 3 月

民主作风的楷模

杨波

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刘少奇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前夕，我回忆了自己在少奇同志的亲自指导下进行佃查研究工作的一段经历。少奇同志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和平等待人乐于听不同意见的优良作风，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深切地感到，在这些方面，少奇同志确实是我们的楷

模。

那是在 1961 年四五月间，少奇同志为了纠正“ 大跃迸 ”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 左 ”的错误，研究调整农村的政策，亲自到湖南省长沙、宁乡两县做了四十多天的调查。他到湖南以后，就深入到农村，住在农村，吃在农村，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走家串户，召开调查会，并就当时农村的经济情况和政策问题，与省、县、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和农民座谈讨论，多方面听取意见。我原来是参加胡乔木同志领导的调查组在长沙县做农业问题的调查，少奇同志去了以后，认为不仅要研究农业问题、食堂问题，而且手工业、商业方面的政策问题也很多，需要深入调查，很好研究。他认为，农村手工业和商业的所有制问题和许多政策问题都需要解决，不然，就改变不了刮“ 共产风 ”中所造成的“ 平调 ”状况，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手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他指示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专门就农村的手工业、商业问题进行调查。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在长沙县福临公社，广福公社进行了调查，召开了调查会，也走访了社办工业干部、手工业工人和商业、供销社的工作同志。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我们把了解到的情况和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整理了一份汇报材料，少奇同志于 4 月 24 日晚上和 4 月 25 日上午，在他住的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的简陋房子里，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听取我们的汇报。在汇报的过程中，少奇同志一面听我们讲情况和问题，亲自作笔记，一面不时地提出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并讲述他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要我们再调查、再研究。

我们向少奇同志汇报：长沙县在公社化运动中，把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取消了，把分散的手工业工人都集中到社办工业中劳动，如同心大队综合工厂把绣花、缝衣的和打铁的都集中在一起生产，群众很有意见。少奇同志说：“ 把绣花、缝衣的和打铁的搞到一起，这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一行跟那一行不相通嘛！绣花、缝衣怎么能跟打铁的搞到一起呢！这是根本不懂事的人搞的。 ”“ 象绣花、编蔑席，显然是分散生产好。 ”当少奇同志听说社办工业中由于搞平均主义，吃“ 大锅饭 ”，使手工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时，他说，提高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待遇，是一件大事情，搞不好。手工业会没有人愿干。“ 一定要恢复 1957 年前的工资定额。问题是这样：一个是要师傅愿带，另一个是要有人愿学。师傅的味道不大，学徒的味道就更不大。 ”“ 目前手工业工人的工资降致这样低，他满意呀？假如把你们自己打比，你一个月 64 块钱，降到 40 块钱，你满不满意？我看一定不满意，一定要走，除非人家把你的饭碗卡住（注：当时的社办工业，为了稳定手工业工人队伍，采用不给粮食、不开介绍信等办法限制他们自由流动）。这样，你就消极怠工。恐怕现在的手工业工人就是消极怠工，你们去查一查。天华大队一个泥水匠，以前

给人家打一个灶只要一天，现在要三天，你把他工资降低这样多，他就闲这个办法抵制。县、社工业里的手工业工人，恐怕也是这样抵制的，总之他是有办法抵制的。他们这样抵制，是为了使你们领导人觉悟起来，改变政策。”

当谈到怎样才有利于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的问题时，少奇同志提出要考虑恢复手工业合作社。他说：“你把手工业合作社收归国有，一收归国有，降低手工业工人的工资，你就赚钱，他就减少收入；你搞计划产值，他赚钱的就搞，不赚钱的就不搞，结果赚了几个钱，许多产品没有了。这不是长期办下去的办法，维持不住。”“县、社工业，搞计划产值，粗制滥造，按斤论两，这是根本不懂生产嘛！锄头多少钱一斤，犁头多少钱一百斤，怎么能这样定呢？”他指出：把手工业工人集中起来不利，应该把他们放回去。与其由于维持不住而被动恢复手工业合作社，不如主动恢复手工业合作社。

关于商业工作，我们也作了详细的汇报。少奇同志听得很仔细，并且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特别强调利用价值法则指导生产的重要性。他说：“价格定的不合理，生产发展就不合理。花钵子很多，蒸钵子没有，这是价格的原因，赶快改嘛！而且这些东西的价格，不是国家定的，是你们地方定的，马上改嘛！”“现在火钳、锅铲、菜刀、水壶、蒸钵等等，这些东西的价格不合理……价格高了的，你们就降低一点，价格低了的，你们就提高一点，用价值法则指导生产嘛！搞商业的人，要有生产观点，要有群众观点。没有生产观点，没有群众观点，结果那些东西都没有了。”“价格定的不合理，不仅是妨碍生产的问题，而且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力。”“你们商业局天天管买卖，什么东西销不出去，什么东西收不回来，什么东西供不应求，价格合理不合理，应该最敏感嘛，赶快提意见，提建议嘛！”少奇同志认为物价问题很突出，也很重要，他建议：从县到中央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物价的管理机构，专门研究物价政策，及时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以利于指导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央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在 1961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中，专门写了一条必须加强物价管理工作，规定“从中央到县都要建立和健全物价委员会，规定掌握物价的具体权限，集中领导，分级管理。”

商业部门开“后门”，是群众很不满意的一件事。国家供应农村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农民不能及时按量买到，而是被少数人从“后门”买走了。对此，少奇同志非常重视，指示我们要严肃对待，要张榜公布，让群众都知道，让群众加强监督。他说：“谁买了多少糖，谁买了多少布，供销部有帐目、有条子的，你们搞一份交福临公社党委公布。这样揭露一次，以后就会好一点，就不这样搞了。你告诉福临公社党委，说我讲的，这个事情要贴榜，每个大队都要贴。如果有我的条子，有你们工作组的条子，也贴出来。我们来了，也许有人利用我们的名字乱买一些东西，哪个买了多少，开一个单子贴出来，每个大队贴一张，让群众看。走‘后门’是一个大事，这样搞一下非常必要。”“开‘后门’，干部特殊化，结果挤了老百胜，这是没有群众观点，是脱离群众的。要整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贴榜，靠老百姓起来攻。老百姓起来一攻，大家就清醒一点。”又说：“党员‘走后门’，严重的要开除党籍。我们常说要提高商业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怎么才算提高？就是要有群众观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山上生长的一种植物）供应长沙酒厂造酒，助长了对山林的破坏问题时，少奇同志很重视。他说：“要禁止在山坡上、丘陵上挖茶蔸、铲草皮，不然就会造成水上流失，使田变质。我爬

到天华山一望，山都挖得稀烂，年老的农民都懂得，再不禁止，让其挖下去，将来是一个大害。这件事，要严格禁止，请你们省委、县委注意，不要放松下去。你们这里挖金刚刺的克子供应长沙酒厂造酒，以后不要挖了，长沙市酒厂要搞别的东西造酒，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就停办。山，现在已经破坏得很严重，再破坏下去，就会变成光山，变成平地。怎么保护山？这个问题请你们讨论一下。要禁止挖，不但要禁止挖，还要栽树栽草。”“除了挖中药材以外，所有植物的根不准挖，商业部门也不要收了。”

供销合作社是农民集资兴办的群众性经济组织，它在为农业生产服务和为农民生活服务，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巩固工农联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非常有益的工作，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但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这一群众经济组织也在“共产凤”中被“平调”了，农村供销合作社变成了人民公社的“供销部”。少奇同志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提出仍应恢复供销合作社这一群众经济组织。他说：“供销合作社究竟是归公社所有还是不归公社所有？我看，不要把供销社归公社所有。那么归谁所有？归社员代表大会所有，归理事会所有，就是说，归社员所有，归社员选举出来的代表会和社员代表会选举出来的理事会、监事会所有。”又说，“供销合作社，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不属公社。以后公社党委对供销社除了政治领导外，经济上无权领导。经济上归县联社管，政治上归公社党委或大队总支领导。”少奇同志进而提出，“公社党委、县委的经济权，将来可能要被剥夺。但他们没有一点流动资金权，恐怕也不好。那么，流动资金哪里来？是不是可以由公社管理委员会、县人民委员会向银行借款？你向银行借款，它的制度严格，你得付利息，到期要还，不还，它就会扣你的办公费。”少奇同志这里提出的意见，我认为他是在考虑如何使党政职责分开、政企职责分开的问题，要发挥银行这一重要经济杠杆的作用。这与他一贯主张的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这次汇报丰，少奇同志还就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组织工业品下乡、商业队伍的整顿等问题，讲了许多意见。最后，他谦虚他说：“我讲的，你们当作一种意见去讨论，不是非如此不可。”这次汇报以后，我们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和提出的问题，在长沙、宁乡两县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并召开了几次有省轻工业厅、商业厅和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参加的座谈会进行讨论。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少奇同志于 5 月 12 日晚上在宁乡县委的会议室里再次听取了我们关于农村商业和手工业问题的汇报。这次汇报持续了三卜多小时，少奇同志一方面听我们讲情况，讲意见，一方面提出他的意见，要大家充分讨论。

我们在汇报中反映，宁乡县商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同长沙县福临公社的情况基本一样，经营管理漏洞很大，帐目不清，甚至无帐；商业工作的力量也削弱了，同 1957 年相比，人员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少奇同志听了以后感慨他说：“本来我们是会做生意的。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那样严重的封锁，都被我们打破了，保证了必需的供应。解放初期，财政经济那么困难，我们也终于使物价稳定下来。可是过去几年的轻率决定，把好的东西搞掉了，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向少奇同志反映：“大跃进”中把许多历史上形成的合理的商品流通渠道打乱了，不是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而是按行政区划分配商品、调拨物资，这不但延缓了商品周转速度，增加了商品流通费用，增加了商品损耗，而且造成商品分配不合理，

此地积压彼地脱销，基层商业企业和群众很有意见。少奇同志听了以后，指出：“要恢复长期形成的合理的传统经济关系。过去道林、花明（注：两者都是宁乡县的地名）由长沙、湘潭直接进货，现在都要由省到专区，再到县到公社，按系统一级一级调拨，这怎么行呢？”要允许购销自由。商业不能层层封锁，划地为牢。资本主义都有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怎么行呢！现在这样多关卡，这不是经济的客观规律，这是人为地建立起来的障碍、壁垒，”“商业人员要学会做生意，而且应该比资本家做得更好。所谓好，就是周转快，费用低，损耗少，分配比较公平合理，便利群众，使群众更节省劳动力。现在有的人不象做生意的样子，象一个做官的样子。”

我们还汇报说，群众反映很强烈的一个问题，就是收购农副产品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对此，少奇同志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你说他吃了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于是他就连鸡也杀掉吃了，把‘共产主义’也吃掉了。”（注：当时向农民派购鸡蛋，有些农民不愿多卖，留一些自己吃，有的干部就说农民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又说：“所谓‘麻不落地，户不存麻，五寸必打，片麻必收’，这是不懂生产、不懂麻的人搞的。这些口号，是破坏性的口号。这是破坏生产。”“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是割社会主义的肉。”少奇同志进而提出，要研究农副产品的派购问题，他主张少搞或不搞派购，改为与农民签订购销合同，实行等价交换。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凡是工业品销到农村去的，都要换一点农副产品回来。有些东西是高价出售的，我是高价，你也是高价；如果是低价，你是低价，我也是低价，最后还是等价交换。你们全面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在汇报、讨论手工业问题时，在是否有必要调整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上，我没有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并与少奇同志争论了好长时间。少奇同志在讨论中那种平等待人、谆谆诱导、以理服人的民主作风，使我这个做具体工作的党员受到深刻的教育，至今记忆犹新。

根据调查，宁乡县城关镇原有 24 个手工业合作社，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 20 个转为社办工业，4 个变为国营工业。所有制这样改变以后，生产中为市场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产品减少了，而且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下降了，原材料消耗增加，成本提高，工人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群众意见很大。大家认为，县、社工业面临着危机，问题必须解决。采取什么办法解决、我们参加调查的同志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同意少奇同志 4 月下旬在天华大队谈的意见，即从所有制方面着手，把合并到杜办工业中的手工业退回去，恢复过去的手工业合作社，实行小集体所有制，自主经营，民主管理，按劳分配，自负盈亏，以利于调动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发展手工业生产。另一种意见是，不赞成调整所有制，主张仍维持社办工业的现状，认为只要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合理安排供产销，改善经营管理，实行按劳分配，克服高指标、瞎指挥的错误，就可以解决现存问题。我把上述情况和意见汇报以后，少奇同志根据他的调查仍然坚持上次谈的意见，认为不从所有制方面着手解决，不改变“平调”的状况，很难调动手工业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他说：“不问条件如何，一下子把所有手工业者的所有制都改变了，是不对的。省轻工业厅认为以搞手工业合作社为好，我着手工业合作社势必要恢复。”当然，“能改进的可以不退，有优越性的可

以保留，标准是四条：产量高，质量好，品种多，工人收入增加。”我当时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不敢否定社办主业中的“平调”问题，不敢怀疑“一大二公”的错误，因而不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而赞成第二种意见，认为不改变所有制，只要加强领导，改善经营管理，也可以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我争辩说，如果把社办工业退回去，恢复手工业合作社，那就体现不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和优越性。少奇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现在生产下降，质量下降，工人收人降低，手工业者很有意见，哪有什么优越性？这样下去，社办工业非垮台不可。“现在你把乡下手工业工人统统集中到县、社工厂，他工资低，收入减少，一定要跑。是把他们卡住好，还是把他们解放好？我看把他们解放好，让他们回去。把他们放回去，你们工厂就会垮台。这个问题，你们去想一想。”少奇同志讲了这些意见以后，我还是坚持己见，不同意他的意见。我甚至提出：问题是对社办工业采取什么方针，是收缩还是巩固，是追还是进？少奇同志耐心地听了我的意见，并明确指出：“你说不会垮，我看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公社办工业的人，经验就不够，蚀了本，工人不满意，鸡没有偷到，却失了一把米。”这时，我又说，公社工业是白手起家。少奇同志说：“什么白手起家，我看是黑手起家。”（注：意指社办工业是“平调”手工业合作社的资财）又说：“你们去具体研究一下，算一算帐，看能不能找出这样的典型来：使得工人很积极，努力做工，生产情绪、产品质量、劳动效率、工资待遇都恢复到 1957 年以前。首先是恢复，然后还有一点进步。工资待遇高一点，劳动效率高一点，产品质量高一点。恐怕这件事不容易办，不是里手，就不能恢复到 1957 年以前，就不能进步。恢复到 1957 年以前，工人又满意，工厂又有钱赚，就要认真地经营，认真地核算，现在的县、社工业是不是有这个本事，恐怕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本事就办不下去。”

这时，会议室里的对针已指向 13 日零点，我却仍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说县和公社的一些同志也是这种意见。少奇同志听了我反复说明的那些并不反映群众真正要求的意见以后，既没有不高兴，也没有批评我，最后很和蔼他说：“杨波同志，看来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那好，我再给你五个月的时间（注：我 1960 年 12 月参加中央调查组到湖南做农村调查，到这对已有五个月），去搞两个点）一个按照我的办法搞，一个按照你的办法搞，然后再来总结，看哪个办法好，群众满意。”少奇同志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实际上是等待我的觉悟，让实践来证明我伯意见是不对的。我听了以后，当时虽然还没有觉悟到自己的不对，但心里却热乎乎的，深为少奇同志与下属以平等态度讨论问题的民主作风所感动。

汇报会结束以后，少奇同志即乘吉普车于 13 日凌晨 1 时返回长沙，我也跟着回长沙。在回程的路上，有位同志告诉我，少奇同志本来要在 12 日 23 时以前离开宁乡回长沙，由于我坚持己见，与少奇同志争论，结果把会议时间拖长了一个多小时，不得不推迟到次日凌层出发。我听了这一情况，顿时觉得很不应该，内疚的心情久久不得平静。当夜，虽然吃了安眠药，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开始怀疑自己的意见是否真正反映了群众的意愿，同时也深深感到自己不应该那样不虚心，执意与少奇同志争论，既浪费了他的时间，也影响了他老人家的休息。以后的实践证明：少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的意见是错误的。

1961 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

条》），同时也讨论制定手工业和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赞成刘少奇同志在湖南调查中所提出的关于手工业和商业问题的许多重要意见。这次会后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中，采纳了少奇同志的意见，决定调整手工业的所有制，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对于那些适宜于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也允许他们独立劳动，自产自销，收入归己；决定恢复供销合作社，并明确了一系列关于手工业和商业的政策问题。这两个文件下’达以后，受到了全党和生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对于恢复和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对于恢复和发展当时遭虱严重破坏的整个国民经济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 1961 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 26 年。26 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9 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了巨大的发展，广大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成倍增长，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现在的情况与 26 年前是无法相比的，但是我认为，少奇同志当时关于手工业和商业问题的许多重要意见，仍有现实的意义，对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解会有帮助，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现在，我把少奇同志的意见整理出来，把我亲自感受到的少奇同志的民主作风，介给给同志们，作为我对少奇同志的纪念。少奇同志对我的教育，我将铭记在心，永生不忘，并以少奇同志为榜样，不断加强自己的思想作风修养。

跟随少奇同志在湖南农村调查

李强

1961 年初，刘少奇同志在参加完广州会议后，回到湖南，先后深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和宁乡县花明楼、东湖塘公社等地，作了历时四十四天的农村考察。当时，我是省公安厅厅长，担负着警卫和陪同任务，工作在少奇同志身边。我亲眼看到少奇同志深入群众，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亲切关心群众疾苦的工作作风，并直接聆听他的教诲，特别是对公安工作的一系列教导。今天，我翻开当时逐日记下的笔记，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少奇同志在湖南农村考察的情景，他老人家慈祥的面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和他那亲切难忘的教诲，又重现在我眼前，索回在我脑海中，使我肃然起敬。

一

在跟随少奇同志考察湖南农村的日子里，我从直接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他不仅从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为我们作出榜样。1961 年 4 月 30 日，少奇同志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在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指出：“要作好调查研究不容易，就是人的主观世界反映客观世界不容易。”“作调查研究是为了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中又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统一起来。”在考察过程中，少奇同志随时随地教育我们，公安工作要发扬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悦，“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能符合客观情况的。你们公安工作也是一样，光看文件不行，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才行”，“要把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样，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才能了解情况”，并反复强调要把自己真正放在社会公仆和小学生的地位上。少奇同志亲自具体指导我们认真调查研究，彻底弄清和平反冯国全“破坏耕牛”案的事例，对我们是一次深刻的生动的教育。

情况是这样的：在天华大队的座谈会上和个别访问中，少奇同志听到群众反映有个社员叫冯国全，给生产队养了一头牛。牛死后，从牛肺内取出一根铁丝，他就被按“破坏耕牛”罪处理了。少奇同志抓住这个案件，指示我们进行调查。经初发了解，天华大队在 1957 年 2 月间死亡一头耕牛，剖腹以后在肺内发现一根 3 寸多长的 18 号铁丝。该队既未认真查明原由，也没有向上级请示报告，就擅自作出把扶丝钉进牛肚“破坏耕牛”的结论，先后两次斗争了养牛户冯国全，但冯一直未承认此事。我们汇报这个情况后，少奇同志启发大家思考问题。他说：“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铁丝怎么钉进牛肚子里？不可能吧？！”让我们进一步调查，他说：“牛是反刍动物。这个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兽医，或者问问专门学习过这种医学的人。”随后，我们遵照少奇同志指示，组织调查组，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查访了剥牛的详细过程，请老兽，医和兽医学校的专业技术人员专题座谈和作技术鉴定，否定了原来认为铁丝是从牛颈部直接钉到肺

部，或从鼻孔插入气管而吸进肺部的两种看法，认定铁丝是混入饲料中从食道吃进冒部，又从胃部穿入肺里的。而类似吃过铁丝的病牛都有肚泻、咳嗽、食欲减退、膘体渐瘦、耕犁无力等症状，这与冯国全饲养的那头牛的病历相吻合。但是，铁丝究竟是何时、何地、怎样进入牛肺的呢？为了揭穿这个谜，我们又调查了这头耕牛的来源，先后在长沙、湘阴等地我到了前后几个养牛户了解情况。这头牛是 1956 年 10 月由冯国全从湘阴县桃花乡换来的，换来以前，牛已经常泻肚，犁田缓慢。这正是铁丝进入胃部引起胃炎的病状反应。经调查桃花乡先后曾养过这头牛的三个养牛人，均未发现问题。再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头牛是 1955 年 8 月从长沙县青山乡彭炳泉家买去的，通过向彭的邻居杨福珍访问，查明牛死亡的真实原因是原牛主彭炳泉的寄子黄光辉（当时 10 岁），因年幼无知，出于好奇心，将铁丝包在青草内喂入牛口的。冯国全“破坏耕牛”案完全是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所造成的冤案。这一件时过 4 年、牛易 3 地的难案，终于查清了，作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结论。为了挽回影响，工作组在天华大队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为社员冯国全恢复了名誉。冯国全深受感动，他说：“这次刘主席帮我申了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党的恩情。”他心情舒畅，积极劳动，当年是全生产队劳动工分最多的一个，并被群众选为社员代表，他高兴地说：“我又重新享受了民主权利。”广大群众对此事极为赞颂，奔走相告，说“共产党做事真是实事求是，6 年前的事也查得一清二楚，搞个水落石出，真了不起。”

对于这个案件的调查甄别，湖南省公安厅在 1961 年 6 月份写了专题报告。7 月 10 日，少奇同志在北京亲自审阅和修改了这个调查报告，针对当时偷牛、死牛问题较多的情况给公安部写了批语：“此件发至县以上公安政法部门阅读，对各地几年来所有由于死牛的胃内、肺内发现铁钉、铁丝等而定为‘破坏耕牛’的案件，都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以便使我们的结论都符合实际情况……从死牛的胃内、肺内发现铁丝、铁钉等物，有些是破坏案件，但并不都是破坏案件，更不能肯定当时的饲养员就是耕牛的破坏者”。公安部就此发出通知，号召县以上公安机关组织全体公安干警认真学习和贯彻少奇同志指示。它大大促进了我们公安队伍的思想、政策水平的提高和作风的改进。我们深深感到，人民公安机关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为公安工作制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什，在坚决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的同时，要严防误伤好人。而要真正做到这样，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

二

少奇同志来湖南考察时，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精辟阐述和正确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伟大学说，并正确运用这一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努力克服暂时的困难，要纠正“五风”对农村带来的破坏，要加强同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作斗争。同时他指出，上述三个方页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页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因而他一再教导我们做公安工作的，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少奇同志亲自抓我省刘桂阳案件这个典型，就深刻体现了他的那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风貌。

少奇同志来湖南之前，曾亲自审阅了湖南省公安厅关于刘桂阳案件向中

央公安部写的处理报告。报告反映：我省郴县鲤鱼江电厂 20 岁的运煤女工刘桂阳，到国务院北门外墙上贴了有“中央首长，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到下面去看一看”、“打倒、铲除、消灭人民公社”等内容的标语，被解回原籍，由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因刘已怀孕，保释回家），湖南省公安厅认为刘桂阳到国务院大门前贴的标语有些内容是反动的，但对她本人又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处理，因为她本人过去一贯表现好，看不出她与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有什么矛盾与冲突。她张贴标语的动机是让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农村情况，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不是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认为可以由原判单位撤销对刘栓阳的判决，予以释放，并与她原工作单位协商，仍将她留在原单位工作，不子开除，也不要歧视，但要对她进行反复耐心的教育。少奇同志为这份报告写了批示：“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处理意见，并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同志亲自我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在认识上和作法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个重要批示，充分体现了少奇同志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严肃慎重态度。事后，遵照少奇同志的批示，由原判单位对刘桂阳宣布撤销原判，回原单位继续工作。鲤鱼江电厂、郴县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和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都找刘桂阳同志谈了话。刘桂阳对此非常感动，一再检查自己的错误。同时，非常感激领导上对她敢于反映情况的鼓励。她还高兴地向张平化同志反映了她家乡在整风整社后群众生产、生活变化的情况。广大干部和群众也表示拥护和赞成，反映很好。

少奇同志来湖南后，还十分关注这个案件的落实情况。有一次，我陪同少奇同志从韶山回长沙，在汽车上，少奇同志又问到这个案件。我汇报说：关于处理后的反映，公安厅专门向省委和公安部写了报告。少奇同志说：“我看到了。”又说：“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么一条吗？无非是根据她写了反动标语。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同时也严肃指出：她对某些问题在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短短几句话，分析得十分中肯透彻，令人信服。夏重要的是，少奇同志那种对一个人的政猜生命高度负责的精神，给了我们深深的教益。

还有一件事也很感动人。少奇同志在宁乡县炭子冲大队调查访问中，群众向他反映齐海湘案件是一起错案。少奇同志便问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吗？”并说：“群众反映是一起错案，本人被捕后不久死了。人虽死了，也应查清，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本人死了，还有子女后代。我们要对案件负责，还要对他子女后代负责。”后来，我们专门进行了调查，查明齐海湘家系赤贫，本人做过长工，下过煤窑，得了矽肺病，1948 年加入反动会道门，为一般道徒。1959 年，齐海湘矽肺病严重，由于迷信。求神治病。同年 12 月他因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罪被批斗后逮捕，判处有期徒刑 8 年，不久病危，在送回家的途中死亡。这确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案，我们随即进行了平反纠正。少奇同志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我们树立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典范。

少奇同志非常重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在湖南调查期间，经常教育我们公安人员要增强法制观念，模范地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发挥法律武器的作用，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

他针对当时由于“五风”的影响，有些干部作风不民主，群众不敢讲话的情况，语重心长他说：“首先党内要民主，要把党内生活搞得主动活泼，心情舒畅，有话就可以讲”。

少奇同志在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发现原大队总支书记王升平同志曾给他写过六封信，但他只收到两封，有的基层干部随便拆扣信件，封锁信息。他多次严肃指出：“给中央写信好，不管是好人写的，还是坏人写的，中央看看也没有什么坏处”，“扣信是违法的”，“任何一个人都有通信自由，任何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向自己的上级党委告状，这是宪法、党章所规定了的”。他亲切地对基层的同志们说：“告状怕什么，就是告到我那里，我也不是糊涂人嘛！不会一下把你们的职都撤了吧！我还可以调查了解嘛！”“真的说不假，假的说不真。”“我是这里长大的，我想同这里一些人通信，经常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好不好？”并诚恳地提出“以后大家可以给我写信，也可以到北京去找我面谈。如果是为了大家的事找我的话，我出路费。我也要找一些人去北京”。

少奇同志在同宁乡县公、检、法的同志谈话中，针对当时农村中发生的违法乱纪，随意打死、打伤人的现象，严肃指出：“今后不管什么人打死人、打伤人，都要受到审判，包括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内。我打死了人也要受审判，你们打死了人就不受审判吗？”

少奇同志还强调制定政策法令要从促进生产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说，“马列主义的政策法令是促进生产的、人民需要的政策法令。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是不好的。”少奇同志在谈到当时农村有的社队乱拿乱摸成风的问题时说：“这种风是怎样出现的呢？一是社员收获的东西少了，二是刮‘共产风’的影响。”他指出：“三级所有制，个人所有制，都不准受到侵犯，不能动摇，一动摇人心就不安，生产就受到影响。”针对当时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少奇同志还提出：“要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立个法，定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必须经过代表大会通过。”实践证明，少奇同志这些指示是非常中肯的，完全正确的。少奇同志还十分关心公安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农村基层公安队伍的建设，强调要便利广大人民群众，维护好农村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他在湖南考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加强公安队伍的建设，特别强调要把公安机关搞纯洁。并提出：公安派出所要便利群众，要把治安案件管起来，要老百姓少跑路，要公安干警多深入下去。他在临走时还再三叮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要抓紧，把生产保卫好，把农村的秩序维护好。”

四

在跟随少奇同志的难忘日子里，我们无不为他那种艰苦朴素、关心群众、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所感动。

我们记得，当得知少奇同志要来湖南农村考察的消息时，心 情十分激动。我们认真细致地作了安全保卫工作的布置，并给少奇同志下乡后的住地搬去了床铺、沙发等，想既保证少奇同志下乡后的安全，又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少奇同志来湖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这次调查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穿布衣，背被包，自带油盐柴米，自备碗筷用具，人要少，一切轻装简行，想住就住，想走就走。”并强调：“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不这样，调查研究之风就不能兴起。”

第一次出发到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时天正下着雨，泥泞路滑，少奇同志身着蓝布衣，手打雨伞，下车步行到一间破旧房里。岳子窗户是敞开的，就用布挡着风，原来的旧木床上加点稻草，两张方桌拼起，四条长凳围摆。在王家湾生产队调查的 5 天中，少奇同志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少奇同志在这里找人谈话、开会经常到深夜。开会时，我们点燃两支蜡烛照明，少奇同志还吹熄一支。少奇同志和我们陪同人员吃一样的粗茶淡饭，我们心里总觉得不安、几次提出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都被他拒绝了。少奇同志在离开王家湾前往毛泽东同志的旧居韶山时，中途经过炭子冲旧居，少奇同志只在车上望了一下，却不让停车而直往韶山。出发前，少奇同志要我们不要通知韶山作准备，更不准招待，并说：“招待必有浪费，也有贪污，招待费这笔帐，是一笔贪污浪费帐。”

少奇同志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但对同志、对人民却极端热忱，时刻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上。由韶山返回长沙途中，他不顾劳累，在湘潭市郊区许家垅下车进行访问，走到一家社员堂屋里，看到一个木匠师傅在做活。少奇同志问他：“你是这里的人吗？多大年纪啦？”这位木匠仍忙着做活，没有答活。接着少奇同志又问他：“身体怎样？家里几口人？”边问边往凳上坐下。木匠师傅抬头一看，感到面熟，他看墙上挂的毛主席、刘主席像，又十分惊异地看看少奇同志，一下认出来了。他激动得不知所措，连呼刘主席！刘主席！顷刻就有十几个人围坐下来，少奇同志和他们亲切交谈，问了他们的身体、生产、生活情况。社员群众的心情是多么兴奋，多么激动啊！随后，少奇同志对整个大院逐户地进行了访问，当听到一间小房子里有病人呻吟时，就急忙进去看望。当时天色已晚，屋内光线很暗，王光美同志就打着电筒陪同他走到病人床边询问病情。病人许冯氏说她腿上生了一个恶疮。王光美同志轻轻掀起被子，少奇同志极为关切地仔细观察了许冯氏老大大的疮口，随即嘱咐随同的医生留下给她治疗。许冯氏后来知道是刘主席看过她，激动得热泪盈眶，教育她的儿子听党的话，搞好生产，报答党的恩情。

少奇同志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查时，发现群众对食堂反映强烈，特别是听到为了办食堂，拆了不少房屋，砍了不少树木，山上地荒了无人种，山下社员无房住，就决定登天华山实地勘查。这年，少奇同志已经 63 岁了。登山时，他边走边看，因山上路窄，雨后路滑，陪同的同志砍了一根小树给他做手杖，他拒绝了，并惋惜他说：“这根树成活要几年呀！再过几年就可以成材了，要爱惜它。”他一直登上天华山顶，察看了大队的山山水水。

5 月 2 日，少奇同志回到他的旧居考察时，除了召集座谈会和个别接见群众外，还亲自走访了罗家塘、安湖塘、柘木冲、首子冲等生产队，远的地方达 20 多华里，全是步行。他听到一些社员缺房子、少用具，就提出把自己旧居的房子和桌椅分给群众去用。故乡人民对少奇同志的这种关心由衷赞颂。他们说：刘主席外出 30 多年，为人民付出多少心血呀！全国解放了，革命胜利了，他回到家乡还是那么平易近人，言行朴实，和老百姓讲一样的话，还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有困难的群众，真是人民的好领袖。

少奇同志不仅时刻关心群众，而且对我们随行工作人员也体贴入微。他经常到我们住处看看，同我们拉家常，谈工作，问生活，甚至对我们开地铺睡觉是否潮湿、雨布能否挡风等等都关心到了。

26 年后的今天，我们追忆起少奇同志当年视察湖南农村时的动人情景，仍历历在日，感奋不已。他那种维护党的政策的模范行动，那种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那种与群众血肉相连、关心人民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那种艰苦朴素、克己奉公、谦虚谨慎的崇高品德，必将激发我们的革命热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1987 年 11 月

青年一代的严师益友

张黎群

有的人走了，便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留下萋萋芳草，黄土一杯。

有的人走了，却象触目的感叹号，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长久地荡起涟漪。

每当我忆起 1957 年春季与少奇同志朝夕相处的一个多月,脑际中索绕的是他那慈祥安定的面容，从容不迫的风度，仿佛他还在和我们讨论工作。他离开我们虽然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他的不朽形象仍然活在我的心里。

动员

五十年代，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担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1957 年 2 月的一天，我们在中南海听小平同志的报告。临开会前 10 分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把我从座位上叫出去，对我说：“少奇同志要到外地去视察工作，他要组织一个调查研究的班子，团中央决定派你随同少奇同志前去。”紧接着又叮咛一句：“注意深入调查，勤奋工作，少奇同志才会高兴。”

受命的烦刻间，我立即意识到此行的重要性。那时，我们国家正面临着政治、经济形势的转折关头，一系列既重大又复杂的问题亟待决策。当时“左”的思想已在许多方百露出端倪，如何对国情、党情、民情取得正确认识，作出科学判断和英明的决策，是我们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考验。少奇同志这时候外出调查，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

当天下午，我在北京车站登上了即将南下的专列火车，我应召走进一节整洁简朴的车厢，准备聆听少奇同志在启程前的“动员”。我走进车厢时，少奇同志已经坐在一张长方桌旁边。当我们 8 名调研人员各自入座后，他开始讲话了，但并没有作什么长篇讲话，而是亲切随便地和我们“拉呱”。他问了我们几个人的姓名、文化程度、工作简历，而后自然地把话锋转到此行的任务上。他说：“同志们，我们要在一块工作了，从北方去南方，到干部中、人民中作调查研究。今天到保定，去河北省委那里谈谈。”

部署工作的会议就此结束了。这和我想象中的动员大不相同，但是给我胃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我从少奇同志言简意赅的谈话中取得了信心。我想，在少奇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我们一定能搞好这次调查研究。

真实

在南下 5 省的调查中，少奇同志一再提醒我们警惕听来的“不实之辞”。一天，列车快要开出河南境界了，大家正在餐车上吃午饭，少奇同志坐在我们斜对面的饭桌上，对我们说：“我在石家庄就发现农村耕牛不足，看见人拉犁。到了河南，发现情况更严重，但是他们汇报时不讲这个，尽讲好的。”说罢，他望着窗外沉思了良久。显然，他是在为某些基层干部这种“报喜不报忧”的不良作风担忧。

事实上，从石家庄开始，少奇同志就已经注意到有人说假话的问题了。他多次参加各类座谈会，在会上严肃诚恳地告诫人们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

有一次，他用《孟子》一书中“齐人一妻一妾”的故事来启发我们。他说：“大家都知道孟子吧？读过他的书吗？《孟子》《离娄》二章中有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个人，家有一妻一妾。她们发现自己的丈夫每天都要外出，每天都酒足饭饱而后才回家来，他妻子问他和什么人在一起吃喝，他趁势吹牛皮了，答道：全是些有钱有势的体面人物。”

讲到这里，少奇同志笑了，接下去说：“这个人的谎言快破产了，他的夫人起了疑心，对他的小老婆说，丈夫的话有假，靠不住，从来没有阔人到我们家作过客呀！我要去暗中侦察他。第二天一早，丈夫又照常出门了，妻子就悄悄地尾随盯梢，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走遍全城大街小巷，没有一人理睬他。最后，他走到东郊的坟地里，向祭祖坟的人伸手乞讨剩下的酒和饭菜来吃：没有喂饱肚子，又东张西望地上别处去哀求。原来，他就是这样吃饱喝足的。他妻子回到家里，把她所看见的经过情况一五一十他讲给小老婆听。两个受骗人都感到很失望，抱头痛哭。这时，丈夫从外面回来了，她们把丈夫狠狠嘲笑了一顿，可他还洋洋自得，摆威风，吹牛皮，一如既往，他还不晓得谎言已经被揭穿了。”最后，少奇同志收起笑容，诚恳严肃地说：“你们看，用吹牛说谎、欺骗的手段来过日子，老婆都为之不齿。”又说“共产党员要经常反省。要向党讲真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讲真话最要紧！”

在调查途中，少奇同志还跟不同的对象多次讲过这个故事。每当少奇同志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往往是在他敏锐地察觉到向他汇报的同志不大讲真话的节骨眼上。

考验

1957 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呈现了兴旺发达的势头。但是，党内不正之风已起于青萍之末，假话、大话、空话时有所闻。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少奇同志看到了不正之风将给党带来的危险，他从洽党治国的高度出发，全面深刻地研究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和增进党同人民的联系问题。

少奇同志认为，医治官僚主义顽症的途径，就是要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到人民群众中去倾听意见，同他们面对面地商量问题，交换意见。在峰峰煤矿，我们跟随他去看望工人。他到工人食堂，在饭桌上和工人们亲切交谈，象老朋友一样。他到工人清舍区，串东家，走西家，和工人们商量克服往房困难的办法，对工人的疾苦非常关心。

为了教育各地干部避免脱离群众的危险，少奇同志反复向他们强调，共产党要得民心。他说，民心向背是党和国家兴衰的标志，要得民心，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当好人民的公仆。我们目前的现况怎么样呢？主流是好的；有的不那么好了，成了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很危险的。

在河北省视察的时候，林铁同志汇报说，省委厉行艰苦奋斗的方针，没有益楼堂馆所和“书记院”，少奇同志听了很高兴，他用铅笔在本本上重重一划，说道：“你们的作法非常正确，要坚持下去，执政者要带头勤俭建国。”相反，当他在其他地方看到一些工厂的领导人住的是一幢幢新盖的公馆，而工人们却住得很差，他便忧形于色，严肃地说：“我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

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

理论

在这次南方之行中，少奇同志深入了解民情、国情、党情后，形成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宝贵思想。《刘少奇选集》下卷收入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1957 年 4 月 8 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 年 4 月 27 日）、《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1957 年 5 月 5 日）、《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1957 年 5 月 17 日）、《我国应有而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1958 年 5 月 30 日）等文章，就是在这次调查中或之后不久写成的。

少奇同志这些重要文章，武装了人民和干部的头脑，使人们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能够正确地审时度势，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阔步前进。

我在这些光辉著作形成过程中深受教育，特别是《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这一篇给我的启迪更是终身难忘。

这篇光辉著作是这样诞生的：

1957 年 2 月，少奇同志带领我们来到河北省石家庄以后，亲自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中小学教师座谈会。与会的同志在少奇同志的启发下，畅所欲言，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不少问题。少奇同志经过分析、思考，认为中心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少奇同志讲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的途径，让大家再思索再研究——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第一个回合。

之后，在河南省新乡、郑州的一些座谈会上，少奇同志听了各界人士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系统更深刻了，因而，他在这些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解决了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还提出了解决实际矛盾的具体措施——这是再回到群众中去检验的第二个回合。

到了湖南长沙又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成熟了。1957 年 3 月 22 日，他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理论而又实际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他的讲活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在他讲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地聆听。《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根据这次讲话整理而成的。

导师

作为一名专职的青年工作者，我在跟随少奇同志南下调查的一个多月中，深深感受到，少奇同志非常热爱青年、关心青年，同时也非常理解青年、信任青年，他不愧是青年的导师。

五十年代的青年，怀着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崇高理想，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他们的响亮口号是“一切为了祖国！”当然，青年们也存在不少思想问题，有一些青年带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便不很满意，在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青年人“闹事”的现象。

对于青年当中的这些问题怎么认识？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这

些都是少奇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十分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如何认识和解决青年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也关系到青年一代能杏健康成长。

少奇同志殷切期望青年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说，老一代的人总是要被年轻人代替的。那些能吃苦，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又取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年轻人，就是说，那些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当然最有可能来接替老一代的人。

在 5 省调查中，他亲自参加青年人的座谈会，和青年们面对面地谈话。他谆谆教诲青年说：“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是取得党和人民群众信任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青年都能够向着这个方向锻炼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美德的人，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人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

除了和青年们直接交谈以外，少奇同志还多次和各地党政负责同志谈到青年的教育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他认为，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对青年的健康成长影响甚大，如果长辈不能以身作则，社会风气不好，青年便受到不良影响。他还指出，许多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原困在于学校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缺点。还有，一部分国家干部忘记了卖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斤斤计较个人地位和个人待遇，有的甚至发展到了争名夺刊、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坏思想、坏行为也是对青年的腐蚀剂。

从少奇同志关于青年工作的一系列谈话中，我深深感受到，少奇同志对于青年的要求是严格之至的。它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青年的殷切期望和热情关怀，也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族、人民高度负责的崇高精神。

事隔三十年了。当时沿着少奇同志指引的方向前进的青年，而令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如果说，几十年来，他们之所以没有虚度年华，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不同的贡献，是得益于少奇同志的教导，那么，今天的青年工作者也同样可以从少奇同志的教导中汲取教益。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成果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吧！

1988 年 2 月

追忆刘少奇同志林区之行

周重光

1961 年夏季，刘少奇同志到东北、内蒙林区视察，前后 3 周，我当时是东北林学院的教授，有机会跟随少奇同志到林区学习。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情景，终生难忘。他那和蔼敦厚的风度，沉着坚毅的性格，吃苦耐劳、深入实际的作风，实事求是、为国为民的高大形象，经过昔雨凄风的磨难，更加引起我的思念和景仰。

一

1961 年夏天，小兴安岭的雨季，好象来得特别早。少奇同志进入林区，几乎天天下雨，时而毛毛细雨，时而大雨滂沱。少奇同志时间抓得特别紧，晚上都安排了汇报或座谈，白天总要到原始红松林里、新老采伐迹地、贮木场或其他地方去调查参观。

当时林区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窄轨铁路。路基不象宽轨铁路那样坚实，雨水多了常出问题。少奇同志到达带岭的当天，那里的群山之巅，就笼罩着浓浓的云雾。第二天早晨，太阳从云缝中眯一眯眼睛就躲藏起来了，而后的林丛和花草，都淋得湿漉漉的。少奇同志从车窗望了望远方的天空，决定按计划到现场去看，带岭林业局党委书记张子良同志考虑到雨天的林区道路泥泞难行，就恳切地劝阻少奇同志等候天晴再进山，少奇同志说：“ 夏季林区多雨，、啥时候才会晴天呢？！还是去吧！”这样，在溟濛的雨雾中，小火车发动了，慢慢地驶向那林区的深处。

近午时刻，在微雨濛濛中来到寒月林场。下了小火车，沿着地表破坏严重的拖拉机道边徒步前进，道路十分泥泞，步履维艰，走了许久，才爬到了山腰。这里是寒月的一个伐区，红旗油锯手孟昭贵同志正在这里伐木。少奇同志和李范五、张昭等许多同志都围拢上来。孟昭贵同志用大斧砍去树周的灌木，带着满面的笑容对大家说：“ 请往后退些，倒木有危险！”大家部往后退了，少奇同志站在孟昭贵同志的身边，注视着他把一株直径近 40 厘米的大红松伐倒，并仔细观察了树桩的断面，估算这株树木的年龄和出材量，还询问伐木工人每日、每月和每年的采伐量。

接着，少奇同志又看了伐倒木的打枝、造材、集材和装车。然后又向山上走了一段，察看并听取了伐区设置、清理林场和天然更新情况。正要转移地点，天忽然亮了，似乎要放晴。谁料刹那之间，疾风吹过，雷雨交加。下山的路上，集注了大量的流水，到山坡下部，竟象一条泛滥的溪流，夹杂着泥沙、树叶和杂草，迅猛地向河谷里奔流着。小兴安岭夏季的雨天，象深秋二样凉飕飕的。少奇同志和大家一起，顶着倾盆大雨，虽然携带着雨具，但蓝色的棉布衣服都打湿了；忍受着满身的湿寒，踏着一尺来深的浊流和溜滑的山坡，不慌不忙地走下山去。

大兴安岭的夏天，也进入了雨季。8 月初的一个中午，少奇同志来到了图里河林区。参观了一个苗圃之后，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访问了苗圃工人的家庭。接着到一个杂草丛生、陡峭难行的山坡上去看落叶松人工更新。当时云雾笼罩着周围的山顶，眼看就要下雨了，内蒙古自治区王逸伦书记和林业

局同志们劝少奇同志不要去了，但少奇同志坚持要去。刚刚上到山坡顶色、部，而下大了，少奇同志在水湿的杂草丛中往复地穿行着，顶着风雨一直看完山头上、山坡下的落叶松人工造林，才慢慢走下又陡又滑的山坡。

当时少奇同志已经是 60 多岁的老人了。他那坚强、沉着、不畏艰险、和群众共甘苦的品德，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人们称它是“红松的故乡”。红松林采伐之后，怎样让它比较快地恢复起来，继续生产森林产品和发挥森林巨大的生态平衡作用，红松究竟宜于天然更新，还是人工更新，或者二者兼顾，这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林学方面多年来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少奇同志为研究这个重要的技术政策问题，听取了许多工人、干部、专家的意见，而且亲自到原始林和新老采伐迹地去考察。

少奇同志冒雨去凉水实验林场看了解放后最早栽植的一块红松人工林。那是 7 月 21 日中午，少奇同志登上小火车，沿着涨满了水的永翠河向林场进发。穿过凡处窃茂的落叶松幼林和断断续续的天然次生林与过伐林，小火车开进了凉水实验林场。雨还在下着。林场同志们领着道，少奇同志沿着似路非路、长满了草丛的小溪慢慢地走着，时而停下来，看看树种、灌木和药草，征询着林区科技人员的意见，时而跟张世军、张子良等同志交谈。

走到那一片欣欣向荣的人工红松幼林跟前，少奇同志眺望了一下，显得非常高兴。他站在一株 1 米来高的小红松旁边，仔细地打量着小红松的长势，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翠绿的针叶，听着介绍这片小红松人工林的来历。这一小片红松人工林，来之不易呀！它给人们带来希望，证明红松是可以人工更新的！带岭局技术人员努力钻研、大胆试验的精神，得到少奇同志的好评。

谈到不同采伐方式对红松更新的影响，几个同志说：不论用那种采伐方式，红松都不能天然更新，也有的同志说：“红松可以天然更新，只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少奇同志注意到，客观实际从同志们的意见中反映出来了，他进一步留心观察问题产生伪来源；在五营第四林场，少奇同志由王铡等同志陪同，冒着大雨，花了近两小时的时间，从山下到山上，仔细地考察红松天然更新的特性。他注意到了杂草丛生妨害各类树种的繁殖，但在火烧枝丫迹地上，许多阔叶树类，特别是桦树和杨树就能够迅速更新。在镜泊湖畔，少奇同志叉看了牡丹江休管局对较大范围的柞树天然次生林改造试验。这也是老采伐迹地上人工更新的一种类型。在柞树幼林里，伐出两米宽的一条条空地，栽上了红松小苗，经过 3 年风霜雨露，开始抽出了新的枝叶。胡立教同志（当时任牡丹江地委第一书记）和李范五同志，陪着少奇同志来到造林地上，少奇同志看着被杂草挤压着的红松小苗，就蹲在地上，拔去苗周的杂草，抚摸、观察着可爱的红松小苗，好象期待着它们迅速地成林；成材。牡丹江林业局同志介绍着他们的技术管理和一些红松人工更新的设想，少奇同志很重视他们的经验和已取得的成果。

少奇同志经过许多天的实地观察，听取了林业局同志们的介绍和讨论，对小兴安岭和镜泊湖地区阔叶红松混交林的采伐更新方式，已经产生了一个明确的看法。他反复强调：要积极地进行人工更新，又要充分利用天然更新。这样就能多快好省地完成森林更新工作。最后少奇同志进一步肯定了“人工更新为主，天然更新为辅，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的方针。从此以后，这就成为我国天然林区森林更新的方针，在恢复和发展我国林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少奇同志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象，是他的工作作风。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利用多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种作风，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好传统好作风。

从少奇同志进入林区第一天起，每天时间抓得很紧。经常利用夜晚，或在行车途中，在现场，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讨论，听取群众意见，议论各种问题。

三

8 月初，少奇同志来到根河林业局。象在其他林区一样，头天晚上，少奇同志听取汇报，第二天上午就到落叶松原始林中去看。稀疏的落叶松林，伴生着几株风姿美丽的白桦。夏天林子里特有的植物花叶清香，阵阵袭来。林间空旷的地方，长着一丛丛落叶松幼树。但有许多地方，被一片一片的杜鹃占据了，少奇同志走着，看着，也听着大家的议论。在起伏不大的林内，跑了不少地方，王光美同志叫大家休息一会。少奇同志坐在一棵大落叶松旁边的草地上，手中拿着几枝越桔、杜鹃和落叶松的小枝。大家围成一个半圆圈，坐在少奇同志的前面。少奇同志让林业局的同志讲一讲落叶松林更新的情况。这样，一个林间的座谈会就开始了。

太阳光透过稀疏的林冠，已不那么炎热，偶尔吹过点小风，微微感到些清爽。林业局的同志从容不迫地讲着，其间有插话，有提问，也有争论。就在落叶松采伐迹地上是否应等待天然更新这个问题上就争辩了许久。少奇同志叫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也是第一次到大兴安岭林区，没有实际经验，因而我所讲的意见是元助于这场争论的解决的。当这场各持己见的辩论暂时告一段落，我们走出了落叶松原始森林，又来到了不同宽度的采伐带上，观察落叶松天然更新的情况。同听到的情况相反，在新旧采伐迹地上，几乎看不到天然更新的苗木。这对于刚才争论的问题很有说服力。少奇同志观察到了这些情况，提请有关同志认真研究。

在伊图里河的一处山坡上，一些孤立的落叶松大树之间，成丛的落叶松幼树，茁壮地生长着，形成了一代新林。这一代新林，究竟是老林采伐以前遗留下来的幼树，还是采伐以后更新的呢？仅仅在这一点上就展开了一场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少奇同志让我发表意见。我沉思了一下，从落叶松幼林丛中，选了 3 株样木，从地面切下，计数了它们的年轮，可以看出这些幼树是在老树采伐前 3 年就出生了。少奇同志脸上浮现着微微笑容，说：“这就证明是伐前更新嘛！”

少奇同志对任何一个问题，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并且相信科学根据。

四

离开了大兴安岭林区，少奇同志来到了草原边缘的城市——海拉尔。海拉尔市西部沙丘上的樟子松林，矫健优美，独具特色。少奇同志不放过机会，又到那里去看了沙丘上樟子松林的风貌。少奇同志提出了要重视并认真研究樟子松在干旱地区的造林工作。

少奇同志利用在海拉尔的机会，到鄂温克族自治县的一个牧民公社进行了访问和探望：在一座不高的山旁，展现出起伏不大、视野开阔的半干旱草

原，遥遥地望见了一座座圆顶的蒙古包群，那就是公社的所在地。牧民们象过节日一样，穿着华丽的民族服装，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的亲人。少奇同志和牧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询问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治，观看了他们精彩的马术表演和民族传统的角力。当少奇同志要离去的时候，牧民们紧紧地围送着，缓缓地前进，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离开哈尔滨之前，8 月 8 日下午，少奇同志到东北林学院参观。

少奇同志被迎接到一个明朗而安静的接待室里。王若平同吉简要地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少奇同志面带着笑容，再三强调发展林业，办好林业教育的重要意义。勉励林学院师生员工，共同努力把学校办好。少奇同志参观了林学系的几个教学实验室和研究室，他总是亲切地和介绍概况的老师们握手，并且仔细地观看着陈列的标本、图片和一部分研究成果。

离开校园，少奇同志又到附近的学院实验林场参观。少奇同志走近林缘，眺望着这些在林区已多次遇见过的树种，有时伸手拉住胡桃楸、小白桦，水曲柳的枝叶，抚摸着，充满爱抚之情。树木、森林，你这世界上最巨大的物质生产者，你的每一片绿叶，都蕴藏着为人民造福的创造力，怎能不引起少奇同志的喜爱和神往！少奇同志勉励实验林场的同志们，能够把东北林区的主要树种都引进来，一方面进行研究，另外也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少奇同志在离开学院的时候，大楼前挤满了人群，无数双热情的眼睛，注视着少奇同志慈洋的面容，无数双高举着的手，微微地挥动着欢送着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视察东北、年蒙林区和参观我们学院，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他老人家给我们的教诲、鼓励和期望，将永远鞭策着我们前进，书激励眷我们为林业的四化建设，做出最有益的贡献。

1987 年 6 月

他沉浸在思想的海洋中

金凤

1948 年我进入解放区，不止一次，听到老同志们用十分尊敬的口吻谈到刘少奇同志，说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卓越的组织家。

“这么说吧”，红军时期入党的李亚群同志热情地挥动着他的手说：“少奇同志就是中国的斯维尔德洛夫，是我们党的第二号人物。”他扶了扶他的眼镜兴奋他说。

这些话引起我极大的注意。在国民党统治区，我经常听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毛泽东、朱德、周思来，很少听到刘少奇同志。这自然是因为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也因为我的幼稚和无知。

不久，组织上发下的整风文献，除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文章，还有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少奇同志的著作。怎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少奇同志论述得多么深刻、精辟啊！全国解放后，我多次阅读少奇同志这部重要著作，不断地从这本书中汲取改造自己、加强党性锻炼的精神营养。我十分珍爱这本用解放区出版的土纸印刷的小册子。多次翻阅，几乎翻烂了，又用纸仔细糊好。不幸，“文革”时抄家，和别的书一起被“造反派”砸烂了。

1949 年 3 月，我调到《人民日报》当记者。从老解放区来的上批老记者如田流、陆灏、林韦、林里等同志也陆续来到北乎。我听说，少奇同志在 1948 年 10 月曾对华北记者团发表了重要讲话。感谢姚力文同志送给我一个讲话的手抄本。我急切地一口气读下去，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少奇同志是针对着我的思想来讲的。

少奇同志讲到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有的同志说，做新闻工作没有兴趣，没有味道，担心是不是有前途。很明白，这是不懂得你们工作的重要性，自己轻视自己。”

我那时对新闻工作没有多少兴趣，总希望转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上去。学习了少奇同志的讲话，解决了认识问题，开始树立新闻工作的事业心。

“你们的工作还没有上路……你们的工作还有些象豆芽，还在生长的阶段，但是生命力很强，将来是会上路的。”少奇同志对一些老解放区的记者作了这样的评价，我这样的青年记者更谈不上“上路”了。这使我对自己的工作保持了足够清醒的头脑，也从少奇同志那里得到了鼓舞：“将来是会上路的。”

在 1949 年举行的不少全国性会议上，我见到了少奇同志，听到了他的重要讲话。他的头发那时已有些灰白，态度从容、沉静，完全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模样。

在 1949 年 4 月召开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说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途和一些政策问题。他说，他在天津接收后首先研究了天津的经济问题，发现要着重解决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因为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形态。他指出，一定要坚决执行“公私兼顾”的政策，这样才能繁荣经济。他说到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是有历史功绩的，因为发展了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下也是进步的。剥削制度是社会制度，是由社会的发展，主要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的。他说，中国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到达社会主义，但是，必须进入社会主义。否则，工业化的前途就是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前途，也是中国资本家的前途。如何能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呢？即需从现在做起。这就是使资本家不能独占剩余价值，积累过多的私人财产。以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对资本家采取限制的政策是必要的，现在少些，将来要多些。对资本家采取限制、改造和利用的政策，这是一个完整的政策。

这些论述，在当时听来觉得非常新鲜、生动而又深刻，少奇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也使我们看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

1949 年 11 月，北京举行了有 31 个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参加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世界工联主席赛扬（法国人）和几位副主席都参加了。少奇同志作为会议的执行主席，实际上主持了这次大会。

开会第一天，我更仔细地观察了少奇同志。他坐在主席台上，看来时时在沉思。我觉得，他几乎沉浸在思想的海洋中，甚至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一种深刻的思想的化身。

赛扬是法共中央委员，架子大，脾气也大。他虽然是共产党员，但却残留着白种人看不起有色人种包括中国人的鄙陋思想。一位苏联副主席和一些苏联工会代表也很高做。我，那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名青年共产党员，深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自豪。我们又一向十分尊重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把他们当作“老大哥”。当我在采访中看到赛扬，特别是苏联代表的一些盛气凌人的表现，不免有些气愤。

会议的参加者来自亚洲和澳大利亚的 31 个国家，并非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有的是工团主义者，有的是和平主义者，有的倾向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各国国情又很不相同，有的如中国、朝鲜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的如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更多亚洲国家如印度、缅甸、泰国、印尼刚刚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各国工人运动的要求自然也不一致。而莫斯科那时就惯于发号施令了，思想把会议的方向完完全全纳入苏联的轨道。这就在大会议程上，特别在通过一些决议时发生了尖锐的争执。赛扬是跟着苏联走的，他看到会议不大符合他和苏联的要求，大发脾气。赛扬甚至想甩手不干，声明他马上要回欧洲去！一些苏联代表也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样子。

我们的少奇同志此时显示出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和高度灵活的政治策略。他不慌不忙，几句话就平息了赛扬的怒火。然后，少奇同志和所有到会的、包括不同政治倾向但要求进步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各国代表充分协商，终于顺利通过了大家满意的议程和决议。

傲慢的赛扬和傲慢的苏联人低头了。他们认识和承认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地位，承认和认识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刘少奇同志的杰出才能。在告别宴会上，我亲眼看到傲慢的赛扬举着酒杯走到少奇同志面前，翘起大拇指说：“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请你一定干杯，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仍然那样冷静、沉稳。他微微一笑，举起酒杯，和赛扬以及其他代表团团长一起干杯。在少奇同志充满艰险斗争的一生中，这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以后在一些会议上，也听到少奇同志的报告或听过传达。印象最深的是1962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入大会上他的报告。我和《人民日报》一些党员干部蓝在党中央直属机关的一座招待所学习。《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同志是学习组组长。他孤席七千人大会，随时回来向我们透露一点会议的情况。正是国民经济因难时期，党中央召集了省、市、地、县委书、共七千人的扩大的工作会议，总结经验，统一思想，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我们非常关心会议的情况。

在那困难时期，不仅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挨饿，连许许多多干部都浮肿了。党中央决定举办十六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一方面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也是挽救干部的一种紧急措施。学习班的伙食按当时标准来说是很高的了，有富强场面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荤菜。一天伙食标准一元钱，每天学习六小时。

我们一面学习，一面带点休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我们学习得很认真。我们联系实际，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我们争论得最激烈的一些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仅仅是自然灾害加上苏联撤退专家吗？

参加学习的同志中，有不少人非常熟悉农村工作情况，知道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横跨地球上多少纬度，从亚寒带直到亚热带，每年总会有一些地方发生自然灾害。譬如雨水多了，北方丰收，南方就会遭灾。雨水少了，南方丰收，北方又会干旱。就全国来讲，大约五年之中，一丰一歉，三个平常年景。我们的农业还很落后，没有摆脱“靠老天爷吃饭”的局面。既然如此，为什么五十年代前期，没有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时还刚刚土改和实行合作化哩。而到了六十年代初，却闹到这样严重的境地，两千万工人遣散还乡，更多农民挨饿以至死亡，数十万干部浮肿，以至于对于区区十几万十六级以上干部，不得不采取这样特殊的保护措施。我们真感到痛心啊！

一些同志大胆提出，除了自然灾害以外，是不是还有人为的因素，如“大跃进”、“共产凤”、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等等。但立即遭到一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的激烈反驳：“中央明明说是自然灾害造成，你们却说有人祸因素？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吗？”

好一顶大帽子！提出有“人祸”因素的同志沉默了，彼压服了，而内心仍然很不服气。

这时候，听说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报告。新闻界的消息是够灵通的。我们听说，少奇同志在起草报告时，要求把大跃进时的缺点、错误要“翻箱倒柜地统统倒出来，不然，解决不了干部的思想问题。如果再不承认错误，全国广大干部和人民是不会服气的”。少奇同志还说，光批评底下是不行的，中央要负起责任，作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这样，干部才能口服心服。少奇同志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简直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他的心和千千万万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是相通的。少奇同志在报告中，也谈到要反对地方上的分散主义，同时着重讲到中央应负的责任。少奇同志在谈到国民经济因难的原因时说，是天灾为主还是人祸为主？说穿了，主要是人祸，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我们自己犯的错误。他还谈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固然要花学费，但这几年学费花得实在太多了。再不接受教训，学费等于白花了！

少奇同志报告的内容十分丰富。就我们听到的这些意见已足够使我们兴

奋的了，等于给我们的争论作了权威性的结论。

在招待所陈设典雅的大客厅里，不时地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那掌声，几乎要冲破天花板似的。参加学习的同志都有十几年或二十几年的党龄，年龄最小的我也已 30 多岁，许多是 40 多岁的中年人。但大家情绪却显得那样兴奋、激昂，简直象一群年轻人！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们便理直气壮地引用少奇同志的报告。

我更加崇敬少奇同志了。

那几年，毛主席退居二线，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有力地执行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全国经济很快恢复与发展，1964 年到 1965 年差不多达到建国后经济建设的第二个高潮。然而，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 年 5 月下旬，我从上海采访回来，看到了那个著名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提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大家纷纷猜测究竟指的谁呢？有人说是彭德怀，有人说是彭真，但他们都已彼“揪出未”了呀。没有一个人敢猜测到少奇同志身上去，也不忍心这样想。少奇同志在党内仅仅次于毛主席的地位，不是从 1945 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已确定了的吗？1956 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不是由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吗？少奇同志在党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那时还在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然而，林彪那一篇“政变经”却使我听了毛骨悚然。他列举了古今中外那么多次政变究竟为了什么？他那“几千年出一个天才”的论断也使我感到惊异。这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周公五百年后出孔子、孔子五百年后出太史公”那种唯心主义的论述有什么差别？我隐隐感到一扬巨大的政治风暴正在不祥地酝酿着。

1966 年 8 月、我正在新疆南部的名城和阗采访，看到少奇同志出国访问时途经新疆住过的房子，也听说他在这里鼓励干部和群众向沙漠进军，变“沙进人退”的历史为“人进沙退”的历史。地委书记的房里，还挂着少奇同志出国访问后带回来送给他的花环。气氛似乎很正常。“然而，正是在这里，收音机中传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我听到了“炮打司令部”那一张异乎寻常的大字报，也听到了少奇同志的名字已从第 2 位降到第 8 位。我十分吃惊而且着实担心了。

9 月初回到《人民日报》，已是一片狂热、动乱的气氛。报社已被夺权。我只是一名普通记者，群众也没有贴我什么大字报。承蒙“革命小将”看得起我，让我和范荣康同志一起参加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采访。

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我从望远镜中最后一次看到少奇同志。他穿着一身军装，脸上依然是那样宁静地在沉思的神色。我放心了，能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这不是政治上安全可靠的标志吗？

然而我毕竟大错而特错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政治阴谋，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可以说你是“亲密战友”，明天便可以将你打倒！政治小丑戚本禹一篇文章，公开点了“中国的赫鲁跷夫”。他们狂热地开动宣传机器，各种“大批判”文章和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7 月的夏天，气候十分闷热。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的一手操纵下，北京又上演了一幕政治丑剧。北京红卫兵的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带领几千学生，在中南海西门外“安

营扎寨”，一定要“揪出”少奇同志“公开批判”，蛮横地要少奇同志交出所谓“检讨书”。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顶住了压力，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了少奇同志。我在红卫兵小报上看到少奇同志所写的材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包括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他写的是经过党中央批准他们出狱的。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政治形势下，没有高度的党性修养，能这样不顾个人安危而保护同志们吗？少奇同志真是“威武不能屈”啊！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判所谓“黑修养”，我真有点沉不住气了。我们这些 40 年代入党的党员，都是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精神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批判了这本书，就是批判了党，批判了千千万万党员的心呀！环顾中国大地，到处充塞着打倒××的大字报，响彻高音喇叭刺耳的声音，哪里有一片清清净净的土地？

1968 年 5 月，我被陈伯达下手令关进北京卫戍区，完全与世隔绝，再也听不到外面的政治叫嚣。《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是我能看到的唯一的报纸和杂志。

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 1968 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这在党的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称“创举”！“开除”就是“开除”，何须加上“永远”这个副词。这是一种色厉内在的表现吧，是一种心虚自知理亏的流露吧。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宇宙间除了“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称为“永远”的。何况世事如棋，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且看这个“永远”能“永远”到几时？！我在监狱中面对沉默的墙壁，尽可以驰骋我的思维和想象。

原来这个“永远”不过只有十年。阴谋策划将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的林彪和“吗人帮”，一个个落得永远覆灭的下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将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我们敬仰的刘少奇同志终于彻底平反。

我后来听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少奇同志死得很是凄苦。他在“文革”初，曾经提出西条要求：一切责任由他承担，不要再层层揪，揪层层了；他要求回到湖南老家务农为生。前一条要求，看出他在泰山压顶、极其险恶的逆境中还想尽力保护党的各级组织，即使他自己粉身碎骨。后一条要求是表示他将永远退出政治舞台。这样大公无私的退让要求也彼无情拒绝了。

历史是最公正。严厉的见证人。残酷迫害少奇同志的那些政治小丑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少奇同志的功绩和著作永远留在人间。

面前是精装的《刘少奇选集》，我又重新仔细阅读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这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业务上哺育过我、滋养过我的两篇重要著作。它们已化为我的血肉，我的灵魂和我的见十年平凡的工作。我相信，许多共产党员都曾经而且将要继续从少奇同志的著作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真理自在人间，永远存在的只能是少奇同志代表的真理和他的思想。

1982 年作

1987 年 8 月改

刘少奇同志和泥巴腿

王升平

1953 年秋天，当时我在刘少奇同意家乡安湖塘多半农会主席。一天，少奇同志的在大拿读书的侄孙刘正山从北京回来，带来少奇同志的口信说：成立了新中国，进了北京城，和劳动群众隔远了，不象战争年月那样亲近。这几年，下面来信也好，汇报也好，一讲起农村形势，就是“好、好、好”。过去那么穷困的日子，好象一步登天变成“天堂”了，这不切合实际。作为领导人，不能全面掌握下情，听不到群众的真正呼声，肯定是要吃苦头、走弯路、打败仗的。所以，少奇同志希望我们选派儿位老实的，有经验的、敢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去，当面向少奇同志谈谈心……

这桩大喜事，很快传遍家家户户，人人都乐得合不上嘴。经过认真商量，选派了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刘永武 4 个人，代表全乡农民进京汇报。我当时也真想把心里话细细地向少奇同志汇报汇报。可是，一来乡里农活、工作说不齐身；二来我刚 20 多岁，离“老农”还差一大截，去不了。心里装着的许多事，怎么报告给少奇同志呢？特别是那会儿，生产底子薄，种子、农具，都遇到不少困难。我琢磨：田，铁板钉钉，就那么多，可是人口，却在不断增加。总不能一个心眼栓在一棵树上哇！这儿地下煤炭挺多，少奇同志的家，就在炭子冲，如果农村也能组织点人力，开矿采煤，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生活，岂不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我决心给少奇同志写信说说我的想法。我只读过半年书，要给党和园家的高级领导人写信，不是件简单事，比起开几亩山荒，要费劲得多！但是说来也怪，这次一拿起笔，要说的话，就象天上的行云、地上的流水一般，越写越多，密密麻麻整整写了 6 大篇。第二天，我把信交给了成敬常，千叮咛，万托付，要他一定亲手送给少奇同志。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做活，忽然有人急三火四地跑来，离挺远就扯着嗓子朝我说道：“快，快，北京来信了，是写给你王升平的！”

听到这话，我愣住了，我在北京一无亲，二无故，谁会给我来信？

正迟疑呢，成敬常已把信递到我手上。果然不错，长条大信封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着我的名字。急忙拆开一看，啊，原来是刘少奇同志写来的回信，这可是我连做梦也没敢想的呀！本来嘛，他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天到晚有多少大事要想、要办，哪有时间亲自回信，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刘少奇同志确实回了信，而且是亲笔写的，整整三张纸！我和乡亲们一字字、一句句，读了一遍又一遍，谁个心里不是热乎乎的，谁个眼窝不是挂满了泪珠……

多少年来，我一直象爱惜自己眼睛一样，珍藏着这封信。不管是遇到了困难，还是取得了成绩，或者逢年过节，常常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后来，就送到了旧居陈列室陈列，让更多的人都能从少奇同志的信受到教育。可是 1966 年，一场灾难降临，这封信也没能幸免，硬是被毁了……

信，他们可以撕个粉碎，可以烧成灰烬，但是早就刻在人们心中的每个字、每句话，却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撕毁的呀！喏，至今我还能把这封信原原本本背诵出来：

“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

有一次至两次来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藏，不要夸大。

关于开采清溪煤矿，我责转工业部和省酌情办理。信中提到很多问题，我不能一一解答。可见你的文化能够表达你的意思。今后希望你们不断写信，告诉我实际情况。”

从此，乡亲们都说我当上少奇同志的农民通讯员了。

第二年，少奇同志的两个亲属，不在乡里好好劳动，自作主张跑到北京。回来后，到处宣扬，说少奇同志如何热情款待他们，还因为报矿有功，受到了奖励，给了一笔钱……讲得有鼻子有眼的。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不对劲。他俩根本没发现什么新矿，报么子呀？便给少奇同志写了第二封信。信里除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外，还说了他俩进京这事造成的不良影响。没有好久，收到少奇同志的第二封亲笔回信，写的是：“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事先我不知道。他们再三要求，我给了三十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我已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

1958 年冬，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热日子里，许多干部脑子胀得象大鼓，名堂越来越多，什么“肥山积个万千，粪海造个无边”。挨家挨户收来百多个铁锅，炼不出八十斤“牛头壳”；有人还把小学校给拆了。我心疼，舍不得，吵起架来……当时我是社长兼书记，总觉得那样干不行，可是究竟怎么办才对，这颗心就象悬在深井里一般，没有一点底。于是，又拿起笔来，给少奇同志写了第三封信。

到了 1959 年，这害人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五风”，不但没有平息下来，反而越刮越凶。县委的一个部长下来亲自督阵，大搞什么“乎山挖树砌凉亭”，“屎湖尿海广积肥”；又是什么粮食产量翻几番，亩产突破万斤关……做田人哪个心里没有谱。这样下去，社员们辛辛苦苦昔劳动得来的果实，全要糟踏掉，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又急又气，连着写了两封信给少奇同志，请少奇同志给我们指点指点，应该怎么办才对，却始终不见回信。后来我长了个心眼，专门搭车跑到长沙把信发出……日子一天天过去，眼巴巴等待着他老人家的回信，结果还是失望了。这以后，搞了次整风整社运动，我犯了“错误”，受了批判，最后被撤销职务，弄得我心灰意冷，再没心思当干部了！可是半夜三更睡不着时又在想，我是刚解放就入党的党员，这样糊里糊涂过日子，对不起党，对不起社员。要干，又怎么干？当时的心境，真是矛盾极了。

1961 年“五一”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早上，我在食堂喝了碗米星难见的菜汤，来到塘边钓黄鳝。忽然，乡领导陪着省公安厅的干部来到跟前，要我去见首长。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脑袋立刻“轰”地一下，心里不住嘀咕：公安厅的干部亲自来找我，看来十有七八要进“班房”了……我耷拉着脑袋，一面跟着他们走着，一面没边没沿地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炭子冲。这时，忽见一位首长向我走来，后边还有位个子高高的女同志。没等我开口，他先打起招呼来：“你是王升平吧？”这个万万没想到的情况，使我惊奇地睁大两眼，回答说：“是啊，我是王升平。”对方似乎猜出我的心理，摘下蓝布帽子，又问：“王升平同志，你认识我吗？”我一看到那满头白发，和蔼慈祥的脸，立刻想起和家里挂的那张彩像一模一样，我高兴得赶忙跑了上去，深深地鞠了个躬，“刘主席，是您，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吧！”

“你也好吧！”少奇同志一边咎话，一边伸出手来。这时，我才想到自

己赤着两只脚，系着个破围腰，戴了顶烂帽子，手上泥泥水水，怎么好和首长握手呢？少奇同志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哈哈笑着，紧紧地握住我这双长着厚茧、树皮一样的粗手。不知怎么的，我心里一热，眼泪就象开了闸似的，哗哗淌了出来……

“请到屋里坐。”少奇同志摆手让我头里走。我怎么好意思走在少奇同志前面呢，说，“请刘主席走前头。”少奇同志不依。王光美同志说：“小王，你是刘主席请来的客人，你就走前头吧！”我只好听从了。

来到屋里，少奇同志和我谈起家常，问我多大年纪，读了几年书，我都回答了。他老人家又问：“都做过什么事？”

“在娘怀里，就跟着讨米。八岁时读了半年书，实在念不起，十二三岁便开始给窑主背煤。”

“你出身很苦喽，父亲叫什么名字？”

他听说我父亲叫王春华，做了36年长工，就问：

“噢，王春华，是不是也在守自冲做过？”

谈到工作，少奇同志问我：“你为啥犯了错误？”

“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少奇同志听了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公社看了个‘万头猪场’，进去一看，连百头都不足，虚报浮夸害死人哩。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你怎么也不来信呢？”

“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给刘主席写了七封信。”

“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近一二年没见到你的信了。说说看，那几封都写了些什么内容。”

于是，我把后几封信的内容讲了一遍。少奇同志认真听着，王光美同志不停地记着。话音刚落，少奇同志接着问道：“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一问到食堂，我心里象十五个桶子打水——七上八下地翻腾。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全拆散了，猪不能养，鸡没法喂，每天只有那么几两米，都用野菜、树皮充饥，有几个没得浮肿病？三天两头就有人饿死。别人不讲，就连少奇同志亲姐姐家，不出一个月，不是连着埋了两口子哇！可是我没马上回答。那年头，谁要说个“不”字，就会戴上什么“拔红旗”“反大跃进”“砍共产主义萌芽”等等一大堆的“帽子”。

坐在一旁的王光美同志，看出我为难的样子，说了一句：“他可能怕……”

“你不要怕，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嘛！”

“缺点讲得讲不得？”

“把你请来就是要请你讲讲心里话嘛！不要怕，我和毛泽东同志过去都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干革命嘛，就要有这么几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班房，还要不怕老婆离婚……你讲讲心里话，食堂到底怎么样？”

望着少奇同志那诚恳严肃的神情，我立刻想起了他回信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藏，不要夸大”的教导，想到自己作为他老人家的“农民通讯员”，在节骨眼上，怎能不替乡亲们把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呢！

“报告刘主席，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拿柘木冲食堂说吧，开伙时一百一二十人，眼下呢，不到八十，饿死了十多个，

外流了十多个，活着的也大都是水肿。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人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如今二十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母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要知道，猪、鸡那就是农民的油瓶瓶、盐罐罐啊！”

少奇同志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有许多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好多劳力去做饭去了。一家一户，哪有专人煮饭、专人挑水的，不都是早晨起来挑几担水，晚上回来砍点柴，一早一晚开菜地，吃过饭随手喂喂猪……看来农村办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你认为食堂不好，群众大都不愿意办下去，你敢不敢回去宣布食堂停办呢？”少奇同志两道锐利的目光紧紧盯着我，我胆怯地说：“报告刘主席，那我不敢，我是个犯了错误的干部，已经削职为民了。”“但是你还是共产党员嘛，你回去商量一下，说这是省委工作组说的。”又说：“刮‘五风’的错误，不能只怪你王升平，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镶起来，子子孙孙传下去，要大家记住，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从早上一直聊到中午，谈了三个多小时。炊事员催吃饭，我起身要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无论如何也不让，要我一块吃。

我们三人边吃，边谈，象在家里一样随便。少奇同志晓得我对自己的“错误”还想不通，不愿再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干部，就语重心长他说：“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的。”

吃过饭，我考虑他老人家很忙，中午也该歇一歇，就起身告辞，少奇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嘱咐道：“今后还希望你每年给我写一两封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农村情况如实告诉我。如果信寄不到，你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第二天一早，明光光的太阳刚刚露出红脸，山上的鸟儿喊喊喳喳叫得格外欢畅。我正在屋里高高兴兴地烧饭，忽然身后传来了亲切熟悉的声音：“王升平，食堂停办了没有？”我立即站起转身一看，是少奇同志。我高兴地报告说：“嗯，停了。刘主席！昨天连夜开会，一说刘主席支持解散食堂，用不着动员，没一个有意见的。许多人流着眼泪，不住地鼓着掌，都说刘主席是我们泥巴腿的贴心人，事事都想到我们心上。”少奇同志听后，说：“实事求是嘛，错了就改。”少奇同志看我是用装盐的陶罐烧饭，摇了摇头，自言自语他说了句：“唉，解放 12 年了，群众过日子连个锅子都没有。”又朝屋子四周仔细看了看，转了转，痛心地问道：“屋里怎么没得东西？”我连忙解释说：“这两年，‘五风’刮得凶，一会儿要拆房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没多久，我已经搬了八次家。东西再多，也经不起这么闹啊！”

少奇同志若有所思地走到门口，指着对面旧居，诚恳他说：“纪念馆不要办了，把我家的房子，全部腾给乡亲们住。屋子里闲着的那堆木板，都拿去给乡亲们做门窗。玉升平，你先带个头搬进去。至少可以住上 10 年、20 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从我屋里出来，少奇同志又到了成敬常家。1953 年进京汇报时，刘主席见过他。不到 10 年，这个虚岁还不满 50 的中年汉子，脸色蜡黄，又干又瘦，象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他正在用陶罐煮野菜，连个油星都没有。少奇同志握着他的手，沉痛他说：“将近 40 年没回家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

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做好，对你们不起，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王升平这件事办得好吧？”

“那可是好！食堂一散，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啊！”

“王升平是个好同志，有些错误不能全怪他，是中央提倡的，象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乡亲们饿了一年，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事不过三嘛，吃了一次苦头，再吃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就不行了！”

说罢，少奇同志提出和大家照个像，送给成敬常一包糖粒子，让他养好身体，还笑着批评他没完成任务，这几年没有写信反映情况。

不知啥时候，群众围了很多。在一片这些年来很少听到的欢声笑语中，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依依不舍地和大家挥手告别，沿着弯弯曲曲的泥土小路，绕过池塘，越过山坡，朝赵家冲走去……

1980 年 3 月

[陈淀国记录整理]

少奇同志二三事

王光英

不少人知道少奇同志是我的亲戚，但我深切怀念他并不是由于这层关系。三十年来，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使我终生难忘。他虽离开了我们，闭目沉思，二幕幕的往事就象过电影般，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

1948 年冬天，北平和天津解放前夕，平津铁路已中断，我被截在北平西城旧刑部街 32 号家里。当时，全家大小都兴奋地期待着北平的解放，殷切希望能早日见到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几个兄妹。

一天，突然来了位陌生的“客人”，悄悄地告诉我母亲，光美不久就要回来了，并且说，她在解放区结了婚，爱人是刘少奇同志。那时，我只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这个名字却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立时成为我们家的最新消息。大家非常兴奋，尤其是我母亲，她已年过六旬，十个子女中五个在外参加革命，老人家思念儿女的心是很切的。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我父亲这位讲究礼节的老人就琢磨着怎么和少奇同志见面最好，后来，他决定还是请少奇同志吃顿饭。

那是个三月的好晴天。上午，少奇同志来了。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我特意换上了一身最好的西服，还打上了领带，一同迎了出去。少奇同志瘦高的个子，两眼炯炯有神，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穿一套解放区生产的黑色粗呢制服，衣领看上去裁得不大合体，头上戴着当时在工人中很流行的鸭舌帽，帽子底下，头发还是乌黑黑的，脚上是一双布鞋。他的简朴，使我对自己的衣着感到有点不自在。他握住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家这些年不容易啊！话虽简单，含意却很深。1924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我父亲不肯跟他们同流合污，坚持留在北京，隐居多年，教育子女，后来我们兄妹中半数参加革命，二老都是支持的。特别是我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工人员，真是不容易啊。少奇同志短短一句话，表扬了二老的晚节。当时又何曾料到，十八年后两位老人竟受到少奇同志冤案的株连！

寒暄之后，大家陪他步入堂屋，很自然地攀谈起来。

初解放时，人们哪能没有点旧思想，我更免不了俗礼。照老规矩，第一次见面，空手不合适，所以我赶忙骑了辆车到西单牌楼去物色一件礼物。当时西单附近铺面很多，竟不知送点什么合适，最后在一家百货店里看中了一条驼、灰两色交织的方格簿毛围巾，觉得朴素大方，也适用，就买下送给了少奇同志。他很高兴，可说了句，我们没有这些规矩，以后不要搞了。这条围巾就是他后来常围着的那条，许多照片上都见到过，出国用的也是它，似乎再没更换过另一条，一直用到最后吧。他在生活上之简朴，是人所夙知的。谁能想到这条围巾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了他的、也是我的一条罪状，说他被资本家的一条围巾套住了脖子……

记得我们刚坐下，他就顺手点了根“前门”烟，很关心地问起天津的情况。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只知还要打仗，文子弹、哪些工厂可以制造装甲车，稍加改造就能支援大军南下作战。他听着听着，笑了起来，说，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当如何搞……几句话就使我明白了他所想的是什么，

想得又多么长远。我这才觉察到自己确实是个“近视眼”。接着，他又问我对国家建设还有什么好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我这个人心直口快，谈了不少看法，他听了很满意。谈到我所了解的天津工商界情况时，我向他介绍工商界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有的还听信了反动宣传，害怕买卖要没收，要象地主那样的挨斗，所以人人自危，没有心思做买卖，更谈不上发展生产了。极少数人甚至想抽逃资金，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匿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少奇同志听了对我说，你回去多联系联系工商界，做点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嘛。我那时刚满 30 岁，还是个热血青年，对“资本家”这顶帽子感到不光彩，是坚决要把它抛掉的。我就一古脑儿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不愿干工商界的事了，我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有一技之长，我不需要企业和资本，我完全可以搞技术，干本行。再说，兄弟姊妹中一半是党员，我干嘛当资本家？我要向他们学习……

少奇同志坐在我对面，十分注意地听着、思考着，没有拦我的话，让我谈完，他才慢慢地用一口纯正的湖南话对我说，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他是多么通俗易懂、多么形象地指明了我该走的路。几句话明确了我一辈子的努力方向，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他不是个好动、好说的人，但他亲切、诚挚，使人感到那么容易接近。他听人讲话总是十分专注，能迅速准确地抓住对方的思想脉络，不仅对所讲的情况一清二楚，连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样想也清清楚楚，他帮助人认识问题，没有丝毫教训的味道，讲得那么入情入理、那么透辟，态度又那么谦逊，使人不仅心服口服，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还觉得舒舒服服。古语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我所说的这些，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可是犹如昨天刚刚发生，少奇同志初见面对对我的一席谈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

堂屋闲谈之后，大家陪他吃我父亲从西单牌楼“曲园”叫来的湖南菜，用着湖南的长筷子。头一道菜是腊味，他尝了尝，说果然是地道的湖南腊味。饭后小坐时，又谈起天津情况，他告诉我不久将到天津去看看。

一个月后，他果然来到天津。他到许多地方参观访问，找了各行各业的干部和群众谈话，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八篇讲话。其中谈到“要有限制地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采取限制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针对当时劳资关系紧张。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情况，他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整和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他的这些话，完全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当时天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工商业者打消了疑虑，企业倒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并扩大了就业，稳定了物价，效果明显表现在一个月后。5 月份，全市财政收入比 4 月份增加 1.5 倍，6 月份进出口总值达

到解放前天津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工商业者逐渐靠拢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市工商界 4 万 2 千人的大游行，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有人说，这件事没有在别处发生，而发生在天津，与少奇同志天津之行的深远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少奇同志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

的北方最大工业城市——天津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中的威望。

我们兄弟姊妹很多，分散各地难得见面，记得 1960 年有人提出是否找个机会大家聚会一下。适逢那年春节前夕，我正在北京开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举行的会议，其他兄妹们有几位也在北京，大家相约去到少奇同志那里，光美为此还特地作了些准备。总共去了 20 余人，其实孩子多于大人。当时正值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吃饭时，桌上是一锅黄羊肉烩青菜粉条，一锅大米小米两掺的“二米饭”。我清楚地记得由于营养不良，显得消瘦的刘平平直抢黄羊肉吃。看来，她平日也和老百姓一样，过着艰苦的日子。想到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人终日操心国事，工作劳累，物质生活并不优越，不由得我一阵心酸。少奇同志说过，老百姓节粮度荒，国家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他要求自己与民同甘苦。回想那年在中南海的简陋晚餐，我对老一辈革命家更加崇敬了。

饭后，大家聚在楼下客室里，少奇同志坐在孩子们中间。距第一次见面，十个年头过去了，他乌黑的头发已经灰白，精神倒还健旺，身上穿的还是那套不大合体的黑色粗呢制服，脚上还是一双布鞋；他顺手点燃的还是一支“前门”烟，目光还是那么亲切、诚挚。他问大家有什么想法，想听他讲点什么？大侄女提了个问题：我们改造世界观从哪里入手？他稍为思考一下，就从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谈到人应当有理想，应当考虑到在整个社会进步中该起什么作用。为了让孩子们能听明白，少奇同志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怎样改造世界观。他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谈起，说，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能性急，要多看，多谈，多锻炼，自然就会有效果。碰到学习、工作、接触中发生的很多问题，如何看法，如何处理得更好？有一个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他更多谈到的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局部利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他列举了马克思的话：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民族利益服从全世界的利益，即国际利益。他说，这是永远正确的，这是对处理人民内部问题讲的，对处理自己的问题与大家的问题讲的。他还说，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发生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个人、集体，部分、整体，暂时、长远，是能统一起来的，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看要宁愿吃点亏。人家不干的，你干，这不是吃了亏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常说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现在是人民做主的国家，有公道，真理能得到发扬，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利益，反而不会满足个人愿望，不考虑个人利益，则最后会取得人民的信任，个人问题反而解决了。

他谈得很多，一口气讲了近两小时，他用浅显的语言谈出了深刻的马列主义原理。我们听的人都很解渴。这次谈话是我在膝盖上，用一叠稿纸速记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谈话材料被抄，谈话中那么多到现在仍有“教益的话只字不提，却把其中比喻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说成是少奇同志的“六大黑论”之一，称它为“市侩哲学”，大肆上纲上线批判。现在重读这份谈话材料，我不禁感慨万端，谈话虽在多年以前，但字字句句闪耀着马列主义真理的光辉。他着重说明：革命者的个人利益和党的、阶级的、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党的、阶级的、民族的利

益；组织、领导和人民，对个人的正当利益，是应该适当照顾的。这和党一贯提倡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有什么错误呢？又哪有丝毫的“市侩哲学”的气味呢？

1960 年以后很少见到少奇同志，只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会场上遇见过。他显得苍老，头发已经全白了。因为不断有人找他攀谈，我没有过去打搅，只是点颔致意而已：哪想得到，这次见面竟是永别呢？

“文化大革命”对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1967 年初，康生在大会上公开点了我的名，把一顶“大资产阶级”的帽子扣到我头上。之后，他的打手们又把我揪到天安门广场，用六辆卡车并成舞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批斗我和我的两个哥哥。我心中不解——哦怎么一下变成了“极端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呢？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这是为了拉线到中南海，把实况播送给少奇同志听。批斗结束，又把我押到中南海西门转了一阵。原来，批斗我是为了制造把少奇同志赶出中南海的声势！我听了心痛如绞，在我与少奇同志的接触中，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偏离党的政策的话，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不利于党的话。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位最勇敢、最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为党的事业奉献出自己，奋斗了一生，这样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叛徒、年奸、工贼”呢？！

之后，谢富治亲自签署拘留证，捕我入狱。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更没有想到在囚册上把我登记为“现行反革命囚犯”。如果不是少奇同志教会了我正确的思想方法，我是不可能活着走出车门了。我记起少奇同志借用过老子的一句话：“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我就把这囚徒生活得到的时间当作一种能够坐下来学习的机会吧。为了寻求答案，我几乎通读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并把“毛选”四卷精读了六这。读书使我懂得了过去不懂得的事，我增长了识别能力，看穿了那些人想于的是什么，他们对少奇同志的诬陷迟早会弄个水落石出，决不可能长久欺骗下去的！有了这些认识，我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我时常想念少奇同志。在空旷冷寂的牢房中，我仿佛听到他缓慢而诚挚的声音在说：社会斗争是逃不了的；共产党人，就要把个人的事看得淡薄些，别人暂时不了解，最后还是会了解的……但我却深深地为少奇同志担心，他在哪儿呢？也被囚禁在四堵光壁的狱中么？他年纪已近七旬，过去又患有肺病，他的身体能够吃得消么？

1975 年，我从狱中出来。数月之后我才知道，少奇同志在我们不知道的时辰永远离开了我们。记得他谈到恩格斯时说过，恩格斯死后按遗嘱火葬，把骨灰抛到大海里，所以没有他的墓，什么也没留下来，但结果呢，他的著作、思想都遗留下来了。他还说，真理的发现者常常是为真理而牺牲的……

少奇同志，你含冤而死，你为真理牺牲了。尽管你遭到百般诬陷，但是，真理的光焰是扑不灭的，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裁决！今天，在响彻云霄的“四化”进军声中，你光辉的思想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论党内斗争》等著名文献，将继续是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的指南。你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人民敬爱你，怀念你，你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80 年 5 月作

对我们晚辈的亲切关怀

刘维孔

1980 年元月的一天，我儿子听说要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了，就天真地问我：“妈妈，他长得很丑吧？”我非常反感地咬问：“谁告诉你的？”孩子说：“我刚上学的时候从漫画上看到的呢。”我一听，内心感到非常难过。怎么能责怪孩子的无知呢！他是 1966 年出生的。从那以后，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种大会、小会，报刊、广播、漫画、展览，都是丑化刘少奇同志，把数不清的罪名倾泻在刘少奇同志身上呵！那时候，我作为刘少奇同志的侄孙女，看到、听到这些，也常象是万针钻心。我想不通，历史怎么能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经过几次抄家，我珍藏的和刘少奇同志合影的照片早已被撕毁；我以前每次见了刘少奇同志以后所写的日记，也已荡然无存。我身边能够“合法”保存下来的，是当年被迫交代“黑关系”的一些交代材料的底稿，现在我把这些残稿略加整理，也算是一份历史的见证吧！至于对刘少奇同志千秋功绩，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已给予评说了。

刘少奇同志是我的叔祖父。1949 年湖南解放后，我跟随父亲离开宁乡老家上北京，到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了叔祖父。我那时才 15 岁，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里妹子，来到中央机关见中央领导人，我心情相当紧张，当时正是夜晚，叔祖父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我见他的相貌举止和我祖父很相似，以为他对我们小孩也会象我祖父一样的凶。可是叔祖父笑容满面，客客气气打招呼，连小孩们也一一握手，问长问短。他走到我面前，端详了一阵，然后握着我的手问道：十几岁了？读几年书呀？我红着脸作了回答。他大概看出我的窘态，就又和蔼他说：好呀，长得高大结实。这时有一位一同来京的长辈插话说：“可惜是个妹子，要是男孩就好了。”叔祖父马上纠正说，男女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好？他说话语气平和，我听了很高兴。接着，叔祖父要大家坐下谈家常。他说，我过去说过要让小孩们读书，可是你们大人不听，现在都这么大的个子了，还没有多少文化，以后就好好读书吧。于是我就留在北京读书，先后进了华北小学和北师大女附中。

叔祖父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可是他在百忙之中，仍然挂念我们这些晚辈的学习和生活。每隔几个月，他就把我们喊到一起，逐一检查学习成绩，详细询问语文多少分？作文一学期作了几篇？算术多少分？参加少先队或青年团没有？生活怎么样？

1951 年春节期间，我们去看望叔祖父，叔祖父照例又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他吸了一口烟，敲敲烟灰，意味深长他说，我在想一个问题，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叫你们上学好些呢，还是不上为好？如果将来你们不好好为人民服务，要反党反人民的话，就不如不读书，因为读了书会写反动纲领，会作反动演说，那样破坏作用就大。这个结论我现在不能下，你们自己去下好了。哦！原来他是为我们以后走什么道路操心呢！当时我还以为，叔祖父也太小看我们了。我没有体会出，叔祖父比我们想得深远得多。他是在考虑党和国家的千秋大业，他是谆谆告诫我们青年一代要读好书，好好为人民服务，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大约是 1952 年的暑假，我们几个青年又去看叔祖父。我的一个叔叔学习

成绩不够好，又没有加入团组织。叔祖父皱起眉头对他说，你是维孔的叔叔，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是你的叔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论辈数，而要比思想，以后我们大家都喊同志，你们叫我也叫同志。接着他一面扳手指，一面语重心长他说：“现在你们吃饭是农民种的粮，穿衣是工人织的布，住的房子是工人建造的。如果将来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做出反党反人民的事情，告状告到我这儿来了，我要加倍地罚你们。”叔祖父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和自己的亲属。后来有一年堂叔投考大学，发榜之前，他怕考不取，心里焦急，去找叔祖父，说：“九叔，有人说了，只要您同意，我可以不考就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叔祖父听了，又是眉头一皱，斩钉截铁他说，这不行，不能这么搞，你自己考得上就念，考不上就不念。当时我们几个在座的青年看到叔祖父的神态，都不敢吭气，室内静得只听见叔祖父喝茶的声音。叔祖父吸了一口烟，又慢慢地解释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道理，接着严肃地对我们说，不准你们打我的招牌，不要以为有我这样的关系就了不起。我是人民选的，人民不选我，我什么也不是，以后也不许以我的名义出去搞什么。

1953 年暑假，我们几个兄弟妹妹准备回湖南老家，动身前去向叔祖父告别。当时正是土改以后，叔祖父要我们回乡前先好好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特别是其中的《“糟得很”和“好得很”》部分，要重点反复学，要我们端正立场观点，多听贫雇农意见，不要受家里的不良影响。他还要我们了解几户贫雇农和中农，要出身苦，上改时表现积极，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的，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告诉他，他准备以后请这些农民到北京作客，谈谈农村情况。据我所知，后来他请了 3 位老贫农和 1 位佃中农去北京作客。

1956 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个周末的夜晚，堂姐泳兰邀我一起去找叔祖父，叔祖父笑盈盈地接待了我们。泳兰姐问他：“叔祖父，我高中快毕业了，毕了业是升学还是不升学呢？”叔祖父笑了笑，回答说，读了高中，就不一定读大学了吧？泳兰姐自己本来想升大学，听叔祖父这么一说，不禁眼泪夺眶而出。叔祖父坐在沙发上，满脸堆笑瞧着她，很有风趣地说，最近美国和蒋介石签订了反对我们的条约，你伤心不伤心？你哭了没有呢？后来他又补充说，不叫你上大学是那样的伤心，对国家大事怎么就不伤心呢？青年人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啊！他是教我们正确对待开学问题，教我们正确处理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我从多次接触中深深体会到，他越是对我们要求严格，越说明他对我们青年爱护之深。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可敬爱的长辈，俪且是我生活旅程的热心向导，我常常把自己思想上的一些疑问记下来，等见面时向他请教。他并不因为问题提得幼稚可笑而厌烦，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开导。

有一次我问他：“我为什么干一些牺牲个人利益的事，思想上总要斗争许久，您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吗？”我的提问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指着旁边的沙发，叫我坐得靠近些，然后若有所思地回忆说，有过，有这么一次，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不象你们现在这样，一本书过目一下，有了一知半解就过去了。我插嘴说：“您那时没有别的书看，所以只在一本书上打转转。”叔祖父并不否认地随声说，那倒也是。他吸了吸烟，接着说，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我又问他：“一件事情来了，您怎样判断它对不对呢？”他大概认为这样的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也就兴致勃勃地回答说，我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判断和处理一件事情的：事情来了，想想它是为个人利益还是为集体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看它是暂时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叔祖父的这些话，使我很受教育。

不久，一个这样的考验摆在我面前：1957 年我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打算到广州我爸爸那里去复习功课，等来年再考。离京前我去向叔祖父告别，叔祖父那天很晚才回来。他听说我没有考取大学，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您说呢？”他就说。“你是一个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到人家不想去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你回家乡参加生产去，好不好？”我当时感到太突然，噘着嘴没有作声。他又说，我们应该帮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外国人常讲我们中国贫穷、落后，我们应当有志气，使祖国富强起来。我是你们的前辈，我们这一辈的人把反动派打垮了，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责任，就落在你们这一辈人的肩上。现在农村要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批有文化的农民，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就应该回家去，把我们的农村建设好，让它也赶上和赛过资本主义国家。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是光荣的事情，将来要记载在历史上的。

第二天，叔祖母王光美同志又拿了一些关于劳动的书给我看，要我“看了又想，想了又看”。我那时没有心思看，坐立不安，在考虑个人前途问题。叔祖父又跟我说，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解放全人类的决心和毅力，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冷静地考虑，什么是集体利益，什么是个人利益，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因为有了集体利益才会有个人利益。今天农村既然需要有文化的人。你就应该服从祖国需要。农村的前途是美好的，但要克服许多困难，付出辛勤的劳动，才能得到。我们的国家有光明的前途。难道个人就没有前途吗？他又说，你们平时不是说要去掉资产阶级思想吗？那么你的这种思想该不该去掉？青年人要遇难挺先，舍己为人，不要占小便宜，占小便宜的人将来会吃大亏。末了他说，我跟许多青年学生作了动员报告，许多学生听了我的话，回到了农村，现在你要听话，不要将来走错了路的时候，又怪我没有教育你哩！当然，回不回去，还是由你自己……你回去仔细想想吧。

那几天，我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叔祖父的谆谆教诲，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又找教导主任和一些知心同学谈心，得到她们的热情鼓励。我终于下定回乡锻炼的决心，又去找叔祖父。叔祖父用惊喜的眼光望着我，要我汇报思想斗争的过程。我说着说着又哭起来，叔祖父却爽朗地笑道，哭什么？应该高兴地回去，农民会欢迎你的，回家后会有困难，劳动不习惯，不会干活，还会有人讽刺嘲笑你，都应该充分估计到，但也用不着害怕，只要自己有决心、有毅力，刻苦劳动，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他特别嘱咐我回农村后要服从社队的领导，当一个好社员，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他说，农民喜欢的事，你应该喜欢，农民看得惯的事，你应该看得惯，农民反对的事，你也应该反对。他嘱咐我不要做坏事，当别人不知道，自己有机会做坏事的时候，也不要做。他还提到可能会有人照顾我，他嘱咐我不要特殊照顾，三五年内不要当干部，踏踏实实劳动，同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如帮人写算、读家信。他说，劳动是要流汗、起血泡的，比口头上讲劳动光荣要辛苦得多，时间一长，磨出茧子就好了，晒晒太阳，特别是南方的太阳火辣辣的，会晒

脱皮的，晒黑了也就好了。他风趣地说，你要咬紧牙关过好劳动这一关，过些年再到这里来时，你要有一双起了茧的手，黑黑的脸，象个农民样子，再不要让人家说刘维孔始终是一个读书人。临走时，他勉励我，回去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来信，要经常给我反映农村情况。

这年初冬，我回到了宁乡花明楼家乡，投入了火热的农业劳动，一直努力想按叔祖父的吩咐去做。大跃进时期，我担任了青年突击队队长，不分昼夜地苦干。手起泡，肩头磨破了皮，我咬紧牙关过；插田累得直不起腰来，我咬紧牙关过；寒冬腊月赤脚草鞋走在冰冻的田野里，脚冻得发紫，我咬紧牙关过；这一切，都是由于党的教导，叔祖父的支持。

这段时期，我多次给叔祖父写信，谈谈自己，也谈谈农村。1958 年 5 月，叔祖父给我写了一封回信，鼓励我坚持在农村锻炼，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与他们建立深厚的感情，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不要沾染农村一些旧的习惯和不良作风。

1958 年 11 月，我光荣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开会期间，我去看望叔祖父一家。叔祖父谆谆告诫说，你能出席这个会，这是组织对你的鼓励，你只劳动了一年，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来，不要飘飘然。开会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你要好好向先进人物学习，把别人的先进经验带回去，变为自己的经验。我们散会以后，宁乡团县委负责人老贺带着县委的一封汇报信去见刘少奇同志。那时农村有一股浮夸风，这封信里大概也有所反映吧。叔祖父看完信后，坦率地说，以后多搞些实在的，收一担谷就是一担，不能说一担一斗，这样虚报，搞得我们上面不好订计划了，你回去跟县委讲一讲。他又指着我对老贺说，以后少要她开会，少出风头，好让她踏踏实实地锻炼。

1959 年，组织上准备送我上大学，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想读大学，而且准备读工科，写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叔祖父。后来叔祖母回信说，如果执意要上大学，就上农学院。因此我在这年 9 月由组织上保送进了湖南农学院。1962 年暑假期间，我又一次上北京去见叔祖父。叔祖父见面就问，硬要上大学，大学的味道怎么样呢？我说：“人不到黄河心不死，当了几年大学生，心里还是感到空虚，学到的知识还是不多。”他哈哈笑了，又问我，毕了业怎么办？我说服从分配。他说，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总有自己的想法吧？我说：“还没有考虑，您的意见呢？”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意见还是下基层去锻炼。接着他解释说，你们出路有三个方面，搞科研，当老师，下基层。前两个需要的人少，愿意去的人多，下基层需要的人多，愿意去的人少。科研机关、学校，近期内不会有很大变化，最多加几个专业，多几栋房子设备，大量的工作还是在农村，在基层，要搞田园化、机械化，等等。而且你锻炼也不够，还需要锻炼，还是下基层吧。

话题谈到他回宁乡家乡考察的事，他心情沉重地说，这几年刮五风，是广大贫下中农吃亏，去年我回宁乡，到炭子冲、王家湾看了看，看了临时医院，感到对不起群众，没有把国家搞好，使他们受了苦。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忧国忧民，肝胆照人，在晚辈面前讲得这样坦率、诚恳，我当时真不知说什么好。

握手告别时，我看到叔祖父脸上的寿斑加多了，很担心他的健康。他紧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有机会再来吧，回去问大家好。我说：“下次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他连连说，有机会，有机会。谁知这次分手，竟成永别。

写到这里，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叔祖父是我敬爱的长辈，是我们青年的好领路人。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惨遭迫害，含冤死去。今天，我可以放声痛哭叔祖父了，我也决心擦干泪水，去献身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未竟事业。可以告慰于叔祖父在天之灵的是，我们没有被黑风浊浪摧垮，我们没有出卖灵魂。农学院毕业时，我遵照叔祖父的嘱咐，在志愿书上填写了“ 下基层 ” 三个字，此后在农村基层当了 10 年农业技术员。现在，我作为一颗小螺丝钉，决心在新长征中努力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1980 年 5 月作

1987 年 11 月改

跟随少奇同志十九年

吴振英 刘振德

最初的印象

从 1948 年到 1967 年，我们先后在刘少奇同志身边担任秘书工作 19 个年头，最早去的是吴振英，最后离开的是刘振德。虽然时间长短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在我们上任前，总以为少奇同志这样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住的房子一定很阔气，很讲究，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一定很优越。再就是每个同志在接到去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的通知时，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心情：既感到光荣，又有些紧张，担心水平低，做不好工作挨批评，一犯错误更不得了。及至到了那里，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主观想象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少奇同志住的房子并不阔气。1952 年以前住的是一幢旧式房子，共有三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因年久失修，都已十分破旧。后来，管理部门给少奇同志调了好一点的房子，但孩子们住的还是集体宿舍。他的办公室仍然很简单，除了办公桌、书架、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既没有地毯，更看不到什么可供欣赏之类的摆设。在不到 20 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光是西面的一堵墙就有 4 个大窗子，到了冬天，西北风一刮，窗帘象波浪一样飘动，室内温度很难升上去，因而少奇同志办公时还要穿棉鞋。一到夏天，太阳西照，又特别热，既无空调设备，也无电扇，少奇同志有时只穿一件背心办公还满身大汗。当时，我们住在楼下，比少奇同志办公室凉快得多。有一次，少奇同志到我们办公室交代事情，风趣地对我们说：“好地方让你们住上啦。”就是在这样一间房子里，少奇同志夜以继日地为我们的国家工作了十几年。

少奇同志的卧室更简单，除了床和书架以外，只有两个凳子，四五个人进去就显得拥挤。有时夜间一两点钟，周总理有急事和少奇同志商量，我们就直接引到卧室。有一次，跟着总理来了三四个同志，卧室里就没地方坐了，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干脆就站着谈。我们要去搬几个凳子，总理说：“不用，不用，很快就谈完的。”可是谈着谈着，几十分钟就过去了。多年的工作，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脑子里装满国家大事，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快点富强起来，有一种紧迫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只要能办公，什么时间、地点、条件、形式，他们从来都不讲究的啊！

少奇同志全家人的吃用穿戴，同样是十分俭朴的。少奇同志在家里穿的都是普通布衣，有的由于年久，都洗褪了颜色，衬衣总是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吃饭更简单，尤其是夜间那顿饭，常常是把中午剩下的（有意多做一点）来个一锅烩。因为用饭时间都是在半夜 12 点以后，为了照顾厨师的休息，少奇同志就叫王光美同志做这顿饭。所以，我们开玩笑地称王光美同志是“烩饭厨师”。

1952 年以前，中南海里的生活设施还很简陋。少奇同志每天喝水，都是警卫员在煤球炉上烧的开水；洗澡用水也是一个很旧很小的锅炉烧的。少奇同志为了节省煤，一星期只洗一到两次澡。无论谁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不久就都会发现，少奇同志对于生活上的要求是低标准的。我们在他身边工作

这么多年，就从未见他对个人生活问题提过什么要求，有过什么挑剔。相反，对工作，对思想，他可是高标准，严要求。

是的，他要求严格，然而，在他身边工作却不感到困难；他很严肃，可是，又那么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我们从他身上受到的教育是终主难忘的！

“约法三章”

我们每个人刚到少奇同志那儿工作时，他都要抽时间找去谈话。

1956 年 3 月间，刘振德到那儿的当天，少奇同志就找了他。开头，他心情有些紧张。去的时候，听带他的同志说，这个时间正是少奇同志午休时间，他以为见个面，站着寒暄几句就行了。谁知，少奇同志一见他来了，马上从躺椅上起来，一再指着座位说：

“请坐，请坐。”

他很拘束地坐下来。少奇同志坐在对面，十分慈样地看着他，和蔼地问他的简单经历。当他回答哪一年入党的时候，因为紧张，竟把“四二年”说成“五二年”。少奇同志马上微笑着反问：“怎么，五二年？”他这才意识到说锗了。少奇同志点点头，很随便地和他扯起家常，谈起往事。当少奇同志听说他参军是在四兵团时，便风趣地插话说：

“陈赓同志的那个四兵团，打大仗不多，跑的路不少啊！”

他钦佩地点了点头，心想：四兵团走路确是不少，从太行山到伏牛山，从伏牛山到大别山，后来又从大别山走到云贵高原，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到底走了多少路，实在算不清了。少奇同志对一个兵团的情况这么熟悉，真了不起！

接着，少奇同志又问他念过几年书。他回答说：“这一条差劲。小时候家里穷，半半拉拉念了两年小学就出来工作了。文化很低，做不好工作。”

少奇同志说：“那不是绝对的。很多工农干部，包括现在的一些部长、中央领导人，也没念过很多书，有的原来是木匠，有的是店员，后来就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提高，现在工作不是都做得很好吗？你到这里来工作，也还可以学习嘛，这里的学习条件还是很好的。”

就这样，少奇同志和刘振德家长里短地谈了一阵子，使他感到非常亲切，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消失了。这时，少奇同志才开始谈起工作问题。

少奇同志说：“到我这里工作，一个是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要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

“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样。（在谈到“孩子”两个字时，少奇同志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有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这次谈话之后，刘振德想了很久。他觉得，少奇同志的要求不仅重要，

指导性强，而且想得那么具体，连打电话时应注意的语气态度都给想到了。这对一个刚到任的秘书是多么大的关怀和帮助啊！三条要求，等于是工作上的约法三章。这大概是少奇同志多年来为秘书工作总结的经验吧！从秘书工作的性质来看，遵守了这几条，工作上就不会犯大错误。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这几条！

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

“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这是少奇同志对每个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对秘书提出的要求。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少奇同志身边，不学会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少奇同志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特别是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国务活动更加繁重。遇上开会或其它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还要连轴转。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那些日子里，就一连几天几夜睡不好觉。他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个规律，大致是：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当天的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当天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1954 年以前，少奇同志每天工作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才休息，这是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回到寝室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又是两三个小时。不说别的，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材料这一点，大家就十分钦佩。有些年轻警卫人员说：“少奇同志那么大年纪，还能盘腿坐几个小时，我们这么年轻也比不了啊！”他们不知道，这是少奇同志在战争年代长期锻炼的本领！少奇同志在办公室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我们进去，他都不知道。所以，除了毛主席、周总理那里来电话或中央有其它重要通知，不能耽搁，要马上向他报告，一般不太急的事情，都只能利用他吃饭和散步时报告。

少奇同志对我们的工作要求很严格，但他只是集中地提出总的指导性要求，平常并不对具体事说这说那，叫人无所适从。所以，只要熟悉了他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掌握了他的工作规律，工作起来并不难。比如，他文件多，难得满桌子都是，但哪些是毛主席批来的，哪些是政治局要讨论的，哪些是要传阅的，哪些已批阅，哪些需急办，哪些可缓办，哪些要暂存在他那儿，他心中都有数，放得各有位置，清清楚楚。熟悉了这些，听到他按铃，进到办公室，连问都不需要问，就能把名目繁多、批处不同的文件取走，照他的批示交付有关部门处理。每天的电话也很多，有外事活动的、有求见的、有通知开会的、有催促批文的，等等，要及时进行排队分类，按照不同内容，确定哪些上午办，哪些下午办，哪些晚上办，分出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处理，既不乱，又不耽误时间。

不要因为个人休息耽误了国家大事

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他自己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不知疲劳，但对毛主席的休息和身体健康，却时刻挂在心上。他有事报告毛主席，总是先问问毛主席是否在休息，如果在休息，他就决不让打拢主席。但如果主席那里打电话来，他则明确规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马上向他报告。

原来，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养成了夜间通宵工作的习惯。所以常有这种情况，毛主席那里通知开会，少奇同志已经睡下了。我们只得在电话里如实地把情况告诉毛主席办公室。结果，秘书还得请示主席，主席又要考虑改不改时间，叫不叫起床。这样一周转，既耽误了时间，又给主席增加了麻烦。因此，少奇同志给我们立了这一条：“毛主席那里通知开会，你们要及时告诉我，不管我是在休息，睡觉还是在开会，都要马上叫我。”而且还很具体地指示说，“如果我休息了，你们可以先要车，后通知我起床。”

少奇同志想得多细致呀！后来我们才体会到，先要车是因为车库离我们较远，从打电话到车子开来，和起床时间差不多。

少奇同志就是这样，从来不因为自己休息而耽误主席的或国家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用在了操劳国家大事上。我们曾经听少奇同志说过：“有时不看文件，不谈话，但脑子并不闲。”的确，当我们看到少奇同志手里没有文件、书报的时候，那准是沉浸在聚精会神的思考之中了。

少奇同志平常对工作人员谈话不多，但对大家的心情和工作情况很了解。有一次，他对刘振德说：“你们不要怕影响我休息。每天的事情很多，有急的，有不太急的，不急或不太急的，可以在我吃饭时间报告；急的，如毛主席批示的文件，不能压，要及时送给我看，因为主席批的文件，有时隔一两天中央就要开会讨论，知道早了，思想上好有个准备。”

说实在的，少奇同志那么大年纪，一天工作那么长时间，我们确实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见他好容易停下工作，进卧室睡下了，有时实在不愿再去打扰他。可是，他总是对我们说：“工作要紧，不要因为个人休息，耽误了国家大事。”

从未间断过学习

少奇同志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他的书架子上摆满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还有《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我们经常见他翻阅这些书籍，并在书里夹了许多书签。少奇同志那么忙，那么紧，但是每天的报纸、参考资料以及兄弟党报纸的摘要，他总要认真地看完，才算结束一天的工作。有时工作忙得连轴转，睡觉都顾不上，可是不管怎么样，每天都要坚持读书看报。我们从没见他间断过一天。

凡是毛主席提倡读的书，他一定要找来认真阅读。记得有一个时期，他经常翻看《资治通鉴》，看得十分认真。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个典故，少奇同志为了深刻理解毛主席引用这个典故的现实意义，回来便仔细翻阅原著。

繁忙的工作，使少奇同志没有完整的时间进行学习。有时安排他休息一段时间，往往要政治局常委正式作出决定。他不得已去休息的时候，也还要带着一些文件看。后来保健部门不得不规定：少奇同志休息，必须离开家，并且不准带办公物品和文件。他不好违反这个规定，就把集中休息当成了集中学习的好机会。

早在 1951 年，少奇同志由于工作劳累，身体情况一度很不好。毛主席十分关心他的健康，批准他到杭州去休假。临出发时，他别的东西不带，只把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塞进了皮包。在杭州住了 1 个月，他很少出去游览名胜古迹，而是每天用 10 多个小时攻读《中国通史》。他戴着老花镜，一连

几个小时地坐在屋里看书，读得是那么认真，那么入迷，就象沙漠里的人找到了甘泉，什么事情都难以把他引开。他一边读，一边思考，手里的铅笔不时地在书上圈圈点点，有的书页上还写满了眉批。

1959 年秋天，少奇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落下的肩肘炎犯病了，有时痛得满头大汗。可是，他把胳膊垫在枕头上，坚持工作。

后来，中央决定他到海南岛休息治疗一段时间。当时，“ 大跃进 ”已经搞了一年多，许多方面都暴露出一些矛盾，毛主席为此号召大家“ 学点政治经济学 ”。少奇同志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曾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脑子里装满了丰富的感性材料，于是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四、五、六、六分册，出发到海南岛去了。为了学懂弄通，还请了薛暮桥、王学文两位经济学专家当老师。

一到海南岛，少奇同志就把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组织起来，和他一起学习。广东省一些领导同志也经常参加我们的学习讨论会。11 月 10 日，少奇同志主持了第一次学习讨论会，对学习方法和制度等问题提出了很具体的建议。

少奇同志说：“ 对这次学习，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我们的材论会采取座谈方式，谁有话就讲，会上可以展开辩论；第二，在我们的学习会上，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有拘束，第三，这里学习所讲的话，不要到处去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自己的意见讲，错了自己负责；第四，第五分册内有些内容比较难懂，同志们有看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去请教老师（指薛暮桥、王学文同志）。我们的会议大家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搞得很拘束。 ”

当时，少奇同志已是国家主席。一个国家元首和他的秘书、医生、护士、警卫人员等一起学习政治理论，平等地讨论问题，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虽说平常在少奇同志跟前没有什么拘束，可这一回是学习理论，我们这些人能在少奇同志面前讲出什么道道来呢？特别是一些警卫人员，文化水平大部不高，怕说错了闹笑话。所以，开头心里都象揣了个小兔似的，听少奇同志那么一讲，顾虑才消失了。

由于少奇同志的领导，每次讨论会的发言部很热烈，真正做到了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谁有什么认识都能讲，有什么问题都能提。

少奇同志研究理沦时，和工作一样，思想总是高度集中，认真阅读材料，深入思考问题，时常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在那里一个来月，少奇同志除了洗洗海浴，几乎和上次在杭州一样，大部分时间都用到学习上去了，很少出去参观游览。结果，休息疗养又成了有名无实，而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却得到了不少收获。

要随时注意不脱离群众

一昼夜 24 小时，少奇同志除了很短的睡眠时间，全部都是用来处理国家大事。但是，少奇同志并不因为国务繁忙而忽略身边的事情，更不因为自己是国家主席而强调什么情况特殊。对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他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积极带头，身体力行。比如，机关管理部门的同志提出：“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 ”少奇同志就执行得最好，无论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或寝室，他总是亲自把灯关掉，这已经是“ 习惯成自然 ”了。

少奇同志十分注意参加体力劳动，在群众中总是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1958 年 5 月 25 日，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下午，少奇同志身穿粗布衣服，戴着旧草帽，脚穿圆口布鞋，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乘坐大轿车奔向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工地。他们来到工地指挥部，参观了水库模型。应水库指挥部的邀请，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朱德同志都题了字。少奇同志挥笔写下了刚劲有力的四个大字：“ 劳动万岁！ ”

然后，他们拿上铁锹，来到水库工地现场，和数万民工一起参加劳动。少奇同志先是在小孤山同民工一起平土，休息的时候，看见钢铁突击队的队员们正在打夯，就兴冲冲地走下山去，对突击队员们说：“ 我也算一个好吗？ ”

队员们一看是少奇同志要打夯，高兴极了，都拍着手抢先回答：“ 好啊！欢迎！欢迎！ ”

少奇同志拿起夯绳，和队员们一起唱着夯歌，使劲打起夯来。

平时，少奇同志在生活上非常俭朴，认为讲排场、挥霍国家财产是犯罪行为。我们看到少奇同志年纪大了，办公室和楼道的地挺滑，走路容易摔跤，为了保证安全，有一次趁他外出，就和管理部门商量，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铺了一条地毯。少奇同志回来后很不高兴，让撤掉。我们向他解释了铺地毯的原因，说明不是为了讲排场。他说：“ 不管是不是讲排场，反正铺这个太贵，太浪费。 ”经我们再三说明需要，他才答应弄些便宜的东西铺。后来，我们弄来了橡胶垫条，铺在他办公室门外的走廊里。他走上去试了试，说：“ 这东西便宜，又结实耐磨，走路也不滑，铺这个就行了。 ”

1957 年他到一个省视察时，发现那里修建了一座高级宾馆，心里很不愉快。本来人家打算安排他住在那里的，他很快就离开了，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我们共产党人要注意啊！ ”

又一次，他在某地视察军事设施，当地的同志请他顺路去参观了一座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一处绿树葱郁的山谷里，环境十分幽静，建筑更是豪华，地板都是楠木的，据说这是江青亲自“ 设计 ”修建的，也许有的同志原以为少奇同志看了如此“ 独具匠心 ”的精巧建筑，会大加赞赏，可是少奇同志却心情沉重地说：“ 这样搞，要亡党亡国的啊！ ”话虽不多，却反映了他对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财产行为的深恶痛绝。

为这些事，少奇同志后来还对我们解释说，“ 当前国家还很穷，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吃的都困难，你搞那么高级的房子，和老百姓悬殊那么大，要脱离群众的啊！我们共产党人随时都要注意，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

少奇同志除了在外事场合，从不注意什么形式，总是以节省国家开支为原则。那年在海南岛时，有一天他去一个小岛看望守备部队，途中要乘军舰，按国家礼节规定，国家主席登舰要有一套庄严的仪式，如升旗、列队、奏乐等。少奇同志不让搞这一套，说：“ 又不是接待外国人，搞那个有啥用嘛！ ”就这样，一位国家主席，和随从人员一块儿很随便地登上了旗舰。

由于军舰大，不能直接靠岛上岸，必须换乘舢板。当时海风很大，波涛汹涌，军舰首长考虑到少奇同志的安全，提出要调一只汽艇送少奇同志上岛。可是，少奇同志却指着正在换乘舢拆，的人们说：“ 大家都乘舢板，我也不能特殊嘛！ ”说着，从容不迫地登上舢板，迎着风浪，驶向小岛。

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

1959 年国庆期间，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参加的人有王光美同志，还有几个孩子和亲戚。刘振德也参加了。

少奇同志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要亲自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呢？原来，有些本家和亲戚看到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就到北京来我他为自己办点事：有的不想当农民想当工人，有的不安心农村要进城市，有的想要点东西等等。不给办，还有埋怨情绪。少奇同志认为有必要做些思想工作，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

少奇同志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这个会议室是我主持政治局同志开会的地方。（这个会议室十分窄小，除了一个长条桌子和墙上一张大地图以外，什么摆设也没有。桌子周围坐二十来个人，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从开会人的背后，只能走过一个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点方便，给你们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现在解放了，在农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现在还作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你们现在吃饱了，穿暖了，就该好好为国家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还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富裕，还有许多团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没好这个国家，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随随便便，要为国家争气。”

在这之前，也曾有过一些熟人想靠少奇同志的关系找工作。确实，在有些人看来，帮助安排个合适的工作，这是他一句话的事。然而，少奇同志就是不说这一句话，他说：“这样不好，我们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

对于一个侄女要表的问题，少奇同志说：“你要一块表，我不是舍不得，也不是给不起，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替你革命。古人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要继续革命嘛！我们有了权不能乱用，为自己谋利益。”

当时，上海牌手表刚生产出来，曾作价 60 元送来给少奇同志。只要少奇同志说一句话，侄女的表就解决了，但少奇同志没有这样做。

少奇同志在会上说的话，虽然语气和缓，但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使到会的人受到了深刻教育。大家心悦诚服，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少奇同志意见。从那以后，请求少奇同志办私事的人就少了。

要先想到群众

1956 年以后，少奇同志出去视察的次数特别多，差不多一年当中有 1/3 左右的时间在下面。每次外出，行前他总是找我们谈一次话，除了告诉我们准备会的地方，去的目的和任务，去了要找什么人等等事情外，就是嘱咐我们到外面不准向人家提要求。接受礼物，还特别强调不要让人家接送。他说：“地方上的同志都很忙，不要让人家到车站接送；在那里的活动，一切都听人家的安排。”

那时候，按照国家规定，少奇同志外出要坐专列火车。每到一个地方，人家总是安排他住到高级宾馆去。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经常吃住都在火车上。

1959 年到济南，他要找一些同志谈话，对我们说：“请他们到车上来吧，我不下去了；一下去，人家又要招待、找房子、安排饭，太麻烦，又浪费钱。”

所以，一出去，火车就成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和住房。1961 年去东北大小兴安岭视察林区，前后一个多月，他也一直吃住在火车上。

铁道部门有个规定，遇到专列通过，沿途客货车辆都要让路，以保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少奇同志对此很注意，每次都嘱咐我们转告有关人员，不要影响客运车辆正常运行，以免影响群众的旅行，耽误人家的事情。当少奇同志的专列需要在什么地方停留时，他总是让我们转告铁路部门，把车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去。为此，还闹过一次笑话。

那是在浦口车站。列车到站时，少奇同志已经睡着了。天快亮时，一列火车通过，响声把他震醒了，他突然坐起来说：“哎呀！糟糕！车停在站上，影响别人运输了。”

他忙把吴振英找去询问情况。吴振英告诉他说：“咱们的车是停在车站附近的岔道上，不影响别的车通过。”他这才放心。

1961 年，他在湖南时，曾到家乡花明楼公社去了一次。当时，地方上已把少奇同志的旧居进行了修缮，辟作展览，供人参观瞻仰。房子里还挂上了少奇同志祖父母的照片，一些小牌子上写着哪是少奇同志小时候的卧室，哪是他学习的地方，还特别介绍少奇同志小时候学习如何用功，成绩如何好等等。

少奇同志看了以后，把党支部书记找来说：“贫下中农说没有房子住，你们却搞这么个展览。搞这个有什么用？不要搞这个嘛！要先考虑解决贫下中农的住房问题。这房子还能住人。让贫下中农搬进来住嘛！”

这样，少奇同志的旧居展览只好取消，让一位贫农社员住了进去。正是因为贫农社员住在里面，这所房子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才幸存到今天。

一律称同志

“过去，党中央曾经做过决定，党内不管职位高低，一律不称官衔，而称同志。对这个决定，少奇同志是一直坚持的。解放前不说，解放后，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起，虽然少奇同志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又先后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主席，但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谁也没有称过他的官衔。

少奇同志曾对我们说：“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刚到那里工作的同志，对不称官衔而直唤“少奇同志”，总觉得不习惯、喊不出口，时间长了，见大家都这么称呼，就又感到只有叫“少奇同志”才最顺口，最亲切。

1954 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少奇同志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有一次，秘书杨俊去向少奇同志报告工作，喊了一声“委员长”。开头，

少奇同志好象没听见，根本不理。当叫了第三声“ 委员长 ”时，少奇同志才不高兴地反问杨俊：“ 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 ”因为平时少奇同志很少责怪工作人员，这一问，把杨俊问了个大红脸。亏得当时王光美同志在场，向杨俊解释说：“ 你怎么叫他‘ 委员长 ’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叫‘ 少奇同志 ’嘛！ ”少奇同志也说：“ 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 ”

那时候，别的工作人员也遇到过这种局面：向少奇同志报告事情时，称他官衔，往往也是连叫几声他都没反应，但一改称“ 少奇同志 ”，他马上就答应了。

所以，在少奇同志那里，官衔职务一直叫不起来。

少奇同志为什么坚持不管职位高低，互相一律称同志呢？我们体会，这不仅仅是个称呼什么的形式问题，而是体现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干部之间平等的革命关系。

事实也确是这样，对人称官衔，带上个什么“ 长 ”字，总觉得互相之间有隔阂，一称同志，隔阂就消除了。所以，在少奇同志那里工作的人，不但彼此都称同志，而且对其他领导人，也养成了称同志的习惯，如称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陈毅同志，富春同志等等，都这么叫顺口了。由于互相都称同志，大家的关系就是特别融洽，思想感情就是没有隔阂。

1959 年，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但他只是在公开场合和外事活动中以国家主席身分出现。在办公室，在家里，少奇同志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那样俭朴，那样亲切，那样平易近人。大家对他仍然是称“ 少奇同志 ”，在他面前，仍然是那样无拘无束，仍然是那样既尊敬，又亲近，相处得象一家人。

是啊，在少奇同志那里，国家主席和秘书之间，和警卫人员之间，和保健、保育人员之间，和司机、炊事员之间，始终是真正的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

对孩子的“ 管 ”和“ 放 ”

1965 年夏天，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新城县高镇搞四清。有一天，少奇同志把一位秘书叫去，说：“ 我写了封信，让平平给她妈妈送去，你们不要给她买车票，不要送她上车站，更不要用小车送她，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县委去车站接她，让她自己买票，自己上车。 ”

当时，平平刚 15 岁，还是个孩子，过去没有出过远门。听了少奇同志的话，秘书心里不免有些嘀咕，为避免孩子路上出差错，想谈点意见，可是少奇同志接着说：“ 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总靠大人，要让她自己闯闯，才能得到锻炼。总靠大人帮助，她倒是舒服省心，可是得不到锻炼，将来还是不会做事情。 ”

少奇同志看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在孩子的培养教育上也是这样。

少奇同志接着又说：“ 对小孩子，一是要管，二是要放。什么叫管、管什么？不好好学习，品德不好，要管；没有礼貌也要管。你们自己的小孩子不是也要管吗！我的也一样。当然管也要得法，不是束缚他们的手脚。 ”

说到管孩子，使我们想起 1959 年的一件事。那时侯，平平和源源在实验二小读书。有一天，少奇同志把他们的老师请来，讲了管孩子的事。少奇同志对老师说：“ 你们要把我的孩子当作你们自己的孩子那样管，不要迁就他

们，不要因为是我的孩子就可以照顾，相反，应当对他们更严格地要求。”

对孩子要严加管教，这是少奇同志一贯的思想。那些年，为了配合学校教育孩子，每次开家长会，只要没有特殊情况，王光美同志总是根据少奇同志的意思，骑自行车亲自到学校去参加。

什么叫“放”呢？少奇同志说：“吃苦耐劳的事情，经风雨见世面的事情，要放手让孩子去干。这样可能要跌些跤子，受些挫折，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得到锻炼。”

由于家庭教育严格，少奇同志的孩子都很俭朴，有毅力，有志向，有骨气，从小就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少表现出什么优越感。平常他们在外面从来不提自己是谁的孩子，叫我们某某秘书时，还总要加上“叔叔”两字。我们不让他们去的地方他们不去，不准他们接触的东西，他们自觉躲得远远的。

那一次，平平自己从北京中南海到了河北新城县。当她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的时候，在场的人们都很惊奇，抢着问：“平平怎么来的呀？”“谁送你来的呀？”平平高兴地回答说：“我自己来的，谁也没送。我知道怎么买票了，知道怎么上公共汽车、怎么坐火车了。”

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孩子

少奇同志对子女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尽管工作很忙，也要抽时间做孩子们的工作，从不放过任何能够使孩子得到锻炼的机会。

1962 年前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由于缺乏对旧社会阶级斗争历史的了解，暴露了许多问题。为了提高广大青少年的觉悟，使他们懂得旧社会的苦，知道新社会的甜，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各地共青团组织曾对青少年进行“四史”（家史、厂史、村史、公社史）教育。少奇同志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知道刘振德生在旧社会，是苦出身，就让他给平平他们讲自己的家史。少奇同志说：“我的小孩子不知道过去穷人受的苦，不知道穷人的孩子为什么念不起书，你给他们讲讲吧！”讲过之后，少奇同志还让孩子们谈感想。

1964 年“五一”节后，当年参加过安源罢工的工人代表袁品高同志，应少奇同志的邀请前来北京欢度“五一”。少奇同志在中南海两次接见了他，还让王光美同志带着孩子到他住的地方去看望他，请他给孩子们讲安源工人的斗争故事，向孩子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袁品高同志见孩子们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并且听说他们上学不是走路就是骑自行车时，非常感慨，激　动地说：“少奇同志在安源的艰苦朴素作风已经传给了孩子们。”

1965 年，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许多干部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农村和贫下中农搞“三同”，接受教育。少奇同志决定让儿子允若也去受锻炼。那年 8 月，刘振德去参加“四清”时，少奇同志对他说：“你把毛毛带上。他接触农村情况不多，从上海把他找到后，就送去延安，后来又去苏联留学。这回让他跟你下去搞四清，可以更多地了解农民的情况，向贫下中农学习。下去以后，和贫下中农搞好三同，对他不要有什么特殊照顾。”

毛毛是刘允着同志的小名。30 年代，何宝珍同志被国民党杀害后，允若曾在上海过流浪生活。抗战时期，组织上把他找到后送到延安，后来又去苏联留学，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城市长大的。

在农村，允若和工作队五六个同志住在一间小屋里，睡在一个炕上，在社员家里轮流吃派饭，生活条件比较苦。允若劳动起来很卖力，不怕脏不怕累，得到社员的好评，但始终没人知道他是少奇同志的儿子。

1965 年冬天，“四清”中间刘振德回来一次。汇报情况时，少奇同志专门问他：“毛毛怎么样？”

刘振德说：“还不错，好象对许多事情都感到新鲜。”

少奇同志高兴地说：“这也算一条收获啊！”

为了使允若得到锻炼，在“四清”之前，少奇同志还让他去当过一年兵，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反映也很好，看不出他是高干子弟。

那时候，源源小，还在上学，不能当兵。少奇同志就叫他利用暑假当兵站岗，把守门口，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的优良作风。

少奇同志总是把自己的孩子摆到广大工农子弟当中，让他们从思想上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避免使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特殊的环境里，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少奇同志的严格要求，对孩子们后来的健康成长，产生了很大作用。“文化大革命”中，孩子们被迫离开了父母，独立生活，曾受到一些人的歧视，但他们没有采取“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态度，而是迎着风雨，接受考验。象平平，“文革”开始时，才中学文化程度。那些年一直在济南一个马场劳动，业余坚持学习外语，现在已成了专业翻译。“文革”时潇潇才 6 岁，后来，她不管别人怎样歧视，自己坚持读书，取得了优异成绩，粉碎“四人帮”后，考上了大学。源源插队 8 年，亭亭作工 9 年，由于坚持自学，也都考上了大学。孩子们在与父母隔绝的情况下，都能够独立生活，经受住了各种磨难挫折，并且在学习、工作中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这与少奇同志生前耐心、细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1980 年 3 月作

1887 年 11 月改

少奇同志活在人民心中——日记三则

李平

1980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　晴转多云、傍晚中雨。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主席的最大冤案彻底平反。刘少奇同志治丧委员会决定于 1980 年 5 月 17 日为这位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今天，治丧委员会派王首道、刘澜涛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和她的子女们前往河南省郑州市边取少奇同志的骨灰。

上午 10 点，三叉戟专机到达郑州机场。河南省委领导同志刘杰到机场迎接。一行下榻于中州宾馆。群众已经知道少奇同志的骨灰至今安放于郑州，不少人胸佩白花，臂缠黑纱，表示由衷的哀悼。就宿于中州宾馆的一些外宾，也纷纷索要白花，提出参加少奇同志骨灰迎送活动的要求。

下午，光美同志一行前往开封，凭吊少奇同志逝世的地方。郑州至开封只有 70 多公里。柏油公路两旁一马乎川的麦田，土地干得很，已经露出了旱象。

3 点半钟，先到开封火葬场。少奇同志遭迫害致死于开封后，就在这里被秘密地火化，骨灰一直以群众不知道的另一个名字存放在这里，直至 1979 年 3 月 5 日，被河南省委知晓而接到郑州保存。光美同志和子女们沉痛地翻阅了当时的火化记录和骨灰存放登记簿，并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作了简短的交谈。

离火葬场进入开封市区。开封的老城，面积不大，相当陈旧，没有很多象样的新建筑。少奇同志在 1969 年 10 月 17 日晚 7 点多钟于病中被空运离北京，就“监护”在开封市政府院内。这个院落也是一栋旧建筑，解放前是一家银行的金库，修得象堡垒监牢一般。院四周楼高三层，小小无井，难见阳光。少奇同志住在一层楼的一间斗室，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屋内仅一床一桌。见到少奇同志最后用过的简陋物品，光美同志面色严肃，刘爱琴、刘平平、刘亭亭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哀痛，流下了压抑了十年多的悲忿辛酸的眼泪，扑倒在床上，抱着少奇同志病逝时的枕头，哭喊着：“爸爸，爸爸！”闻者观者，无不为之心酸落泪。光美同志强自抑制着心中的悲痛，劝慰着说：“孩子们，坚强些！”是的，少奇同志长离人间，他是无法被我们呼唤回来了。但是，他的英灵常在，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和深切热爱的十亿人民常在。今天，我们来到这小小的院落，正是要告慰少奇同志的在天之灵：您离去时所背负的难以言说的天大的屈辱，党和人民正在为您彻底洗雪。

少奇同志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 6 时 45 分，在这间小屋里停止了呼吸。距被“押运”到开封，只有 27 天。嗣后，少奇同志的遗体移到同院原金库——另一更小面积的屋中，在帆布担架上停放了两天，然后才去火化。在这间空空如也、屋长不够身长的小金库里，当时只好斜摆放着这具担架。这铁栅围窗的楼房，这铁门深重的小屋，这过于简陋的生活用具，这似乎浸染着血迹的担架，这禁锢了少奇同志的一切物证呀，你们今天也该控诉了！控诉林彪、江青、康生等反革命分子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残酷迫害。

少奇同志最后住过的这个院落，现在仍属开封市委和市革委机关。市委附近的街道上，群众风闻消息，一下子汇聚拢来，形成了自发的夹道迎送。

人们很快认出了光美同志，都热情地鼓起拿来，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深切慰问。

回到郑州，已经六点多钟，晚饭后落起雨，下得很不小，风声雨声，电闪雷鸣……

198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昨晚的雨下了很长时间，下得很透。今天早晨空气清新极了。这场雨惠及全省，有的县最大降雨量达到 93 毫米。省委赵文甫书记眉飞色舞地说，有了这场雨，今年小麦丰收没问题。

上午 8 点半，在郑州人民会堂第一休息室更换少奇同志的骨灰盒。8 点多钟，新旧两个骨灰盒都送了来。旧的盒子很小，很普通，骨灰盒上原无照片，放着写有“刘卫黄”三字的纸签。盒内的骨灰袋是白色的，还印着“移风易俗”四个字。新备的骨灰盒大一些，比较精致，上面贴着人民群众很熟悉的、露着慈祥微笑的少奇同志的半身照片。还准备了红色的绸质骨灰袋。

8 时 30 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王首道、刘澜涛、李步新、高登榜和河南省委书记刘杰、戴苏理、乔明甫、赵文甫同志，陪同光美同志和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走进房间，在屋子中央白布铺围着的长台前一字排开，肃立默哀。然后，河南省长刘杰同志打开旧骨灰盒，取出骨灰袋。光美同志沉痛地抱着骨灰袋，长时间地将自己的险偎依在骨灰袋上。刘杰同志把骨灰袋放入新盒，少奇同志的小儿子刘源将盒盖盖好。在肃穆凝重的气氛中，刘杰同志将骨灰盒捧入骨灰迎送仪式会场，安放在少奇同志遗像下页。所有领导同志和少奇同志的亲人依次上前鞠

躬致意。会场里，陈列着河南省领导同志和各机关、单位献的花圈 150 多个。

正午，郑州市人民会堂至中州宾馆前往机场的金水大道已断绝交通，夹道送行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中小学生一万多名，正在街上列队。举行骨灰迎送仪式的人民会堂门口下半旗。

1 点 10 分，光美同志带领子女进入庄严肃穆的会场。骨灰迎送仪式开始。刘杰同志主持仪式。在乐队吹奏的哀乐声中，专程前来郑州迎取少奇同志骨灰的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河南省党政军领导同志，以及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 1500 多人，肃立默哀三分钟。接着，戴苏理同志代表河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全省人民致词，对少奇同志表示最深切的悼念，然后，光美同志即席讲话，她简略地回顾了少奇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两次在河南工作和建国后多次到河南的情况。她说，少奇同志热爱河南人民，河南人民也培育了少奇同志。骨灰迎送仪式和河南人民怀念少奇同志的深厚感情表明，少奇同志活在河南和全国人民心中。

光美同志讲话时，到会的同志全都哭了。全场向少奇同志遗像三鞠躬。接着，启运少奇同志的骨灰。刘杰等省委领导同志分别把骨灰盒、少奇同志遗像、花圈交给家属。刘源手捧党旗覆盖的骨灰盒，光美同志手持鲜花束陪伴，刘爱琴捧护着少奇同志遗像，刘平平、刘亭亭两人抬着花圈，缓缓地步出会场。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献给敬爱的少奇同志”。

光美同志及子女和陪送骨灰前往北京的刘杰、赵文甫两位书记登上灵车。灵车是一辆大轿车，车身披着黑纱，车前悬挂着少奇同志的遗像和黑白两色的花球，车内素白洁净，骨灰盒安放在车厢前部素纱缠裹的台子上。灵车由 7 辆摩托护卫，车队出人民会堂开往机场。郑州市近两万群众夹道送行，

他们都臂缠黑纱，怀着沉痛的心情，目送缓缓行进的灵车队。

郑州机场的上空，回荡着哀乐。迎送骨灰的行列，绕场一周。光美同志最后登机，在机舱门口的舷梯上向送行的群众，向河南的人民鞠躬致谢。

2 点 50 分，运送少奇同志骨灰的专机飞离郑州。

4 点整，专机抵北京西郊机场。彭真、乌兰夫、韦国清、方毅、倪志福、彭冲、宋任穷、谭震林、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舷梯旁迎接并护送少奇同志的骨灰前往人民大会堂，安放于江苏厅。机场上还有来自全国各省的党政干部的代表和少奇同志的不少老战友与他们的子女亲属。

198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北京晴、青岛阴转晴。

两天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按照少奇同志生前的遗言，将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海里。今天，治丧委员会派出工作人员，陪同光美同志和少奇同志的子女前往青岛散撒少奇同志的骨灰。

早晨 8 点钟，治丧委员会办公室成员和全体工作人员齐集人大会堂四川厅，然后与王光美同志和子女亲属将少奇同志的骨灰从江苏厅启运。人大会堂东正门大开，灯光齐明。臂缠黑纱的礼兵护送手捧骨灰盒的刘源和王光美同志挽臂缓步出行。人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列队在东门外的台阶上致哀。光美同志怀抱骨灰盒坐在第一辆红旗牌轿车中，车头披着黑纱，结扎着黑黄两色的花球。长长的车队经长安街开往北京西郊机场，沿途路人停步目送。

在西郊机场举行了简单的送行仪式。天空明净晴朗，低沉悲壮的哀乐却撩拨着人们沉痛和怀念的心。刘源站在机舱门口，流着眼泪将骨灰盒高高举过头顶。机场上送行的许多同志热泪盈眶，向少奇同志的骨灰作最后的告别。光美同志向同志们鞠躬致谢。

9 点 30 分，三叉戟专机滑行，飞离北京。

10 点 25 分，飞机降落在青岛流亭机场。机场降半旗，哀乐低回。数百名北海舰队的干部战士列队肃立默哀。专程由济南进来青岛的山东省和青岛市、海军司令部、北海舰队的领导同志均到机场迎接。

护送骨灰的车队离开机场，直接开往青岛港第三码头。治丧委员会决定，少奇同志的丧事，要校国家元首的地位，给以最高的规格和礼遇。叶飞同志以党给海军担负散撒少奇同志骨灰的任务而极为激动，重病中命令北海舰队，派出一艘驱逐舰和四艘护卫炮舰执行任务。

青岛是个阴天，满空阴霾。车队到达码头时，还星星点点地弹了几点雨花，无公似乎也体察到了人们沉痛悲哀的心情。码头上，数百名海、陆军指战员和干部、群众，臂缠黑纱，脱帽肃立。扬声器播放着哀乐，半降的国旗在天空中缓缓的飘动。

11 点 45 分，军舰汽笛长鸣，缓缓离港。码头旁停靠的所有舰艇上，着白衣蓝裤的海军官兵列队敬礼，目送军舰开向海口。出港后，四艘炮舰快速跟上，前后左右各一，编队护卫。

海上风大——只是就我们的感觉而言。其实今天没什么风，用水兵的话说，海面可称波平浪静。但一来是阴天，二来船速不慢，海上轻风扑面，阴湿寒冷，侵人肌肤：浓云笼罩大海，水天苍茫，忧郁凝重。

午后 1 时许，治丧办公室工作人员陪同光美同志和子女捧护着少奇同志的骨灰盒来到驱逐舰后甲板。舰上广播室播出哀乐，后护卫炮舰鸣礼炮二十一响。

后甲板上挤满了人。刘源打开骨灰盒，光美同志最后一次亲偎着骨灰袋，

缓缓地打开袋子，看见了洁白如雪的骨灰，泪如泉涌。她，在祖国的黄海大公岛的附近海域，撒下了第一把少奇同志雪白的骨灰。接着，她捧了一把骨灰交给小女儿刘潇潇……她失声痛哭！少奇同志的子女和亲属，以及原来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员和少奇同志老战友的孩子——两位青年代表，依次散撒。随着少奇同志的骨灰和鲜花不断地抛进大海，人们俯身在船舷边，凝望着，呼唤着，哭泣着。哭声和呼喊声，风声和海浪声，震撼着水天茫茫的黄海，响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党和人民郑重地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隆重的治丧活动，这不仅是一种必然，这不只是感情激动爆发的最后时刻，这不光是对少奇同志个人的追念，这是对十年浩劫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少奇同志在受辱临难的时候说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党和人民在这里表达着最坚定的信念和誓言：我们再不会让那样的历史重演。少奇同志，您安息吧。

邓小平同志在给少奇同志平反的追悼会上，以宏亮的声音严肃地对光美同志讲：“是喜事，是胜利！”真的，天似有情天亦喜——下午，青岛天色转晴，疏云艳阳。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

刘平平　刘源 刘亭亭

一

多年来，爸爸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和国家日常工作，日夜为党和国家操劳着……

1966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6 月 1 日，康生、陈伯达一伙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爸爸和小平叔叔，背着政治局，将他们一手炮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突然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各报全文登载，立即在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仅在两三天时间里，学校党委和支部都瘫痪了。6 月 3 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三个工作组。6 月 4 日，由北京新市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许许多多学生听说后，围在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门口，都要求派工作组，希望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爸爸很慎重，他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

运动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几乎所有学校的支部书记、校长、老师都受到了冲击。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多，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出格。爸爸和小平叔叔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委托爸爸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爸爸乘飞机赶回北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

工作组都是临时组成的，匆忙上阵，没有经验。爸爸也在摸索对运动的领导。7 月中旬，爸爸在听取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汇报后，热情地对大家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爸爸对突然兴起的这场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他还是尽力引导群众前进。爸爸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他按照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理解，向我们讲述这次运动的目的，说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全人类当然包括地、富、反、坏。无产阶级毫无自私之心，所以胸怀最宽广。不解放别人，不把一切坏人改造成好人，不把一切消极因素改变为积极因素，无产阶级自己也得不到解放。”爸爸的一席话，使我们明确了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乱冲乱斗，激化矛盾，而是教育改造所有的人。爸爸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应有什么样的伟大胸怀。他对“文化大革命”寄托的美好的希望，多么使我们神往啊！

但在这时，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抓住工作组在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错误，煽起一股反工作组的浪潮，学生中开始出现了对立的两派。爸爸担心地对我们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二

7 月 16 日，毛主席畅游长江。7 月 18 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7 月 24 日，毛主席召开会议，批评爸爸和小平叔叔。7 月 29 日，爸爸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还讲到对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不要揪住工作组不放，要保护少数。8 月 5 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爸爸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爸爸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作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爸爸已经“靠边站”了，但他仍密切关心着运动的发展。一次，在饭桌上，平平和源源议论着晚上要限着同学们去抄家，爸爸立即劝止说：“不要去。”饭后，爸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我们叫到他身边，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爸爸的话，使我们感到宪法的神圣。我们不再去抄家了，许多同学也被我们劝阻住了。

9 月到 11 月，我们都出外串连去了。在外地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批判爸爸检查的大字报；言词激烈，使我们大为震惊。我们匆匆赶回家。回京后才知道，10 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爸爸作了检查。毛主席对爸爸的检查给予肯定的评价，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可是，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时，只印发了爸爸的检查，却删去了毛主席的批示。爸爸的“检查”成了靶子，在全国掀起了“批刘高潮”。

一天，爸爸象往常一样在中南海院内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使他愣住了。这张大字报以尖刻的语言攻击了蔡畅妈妈和康克清妈妈。因为她们看到一位阿姨被剃了阴阳头后，禁不住伤心地流下眼泪。面对大字报上的恶毒的辱骂，爸爸伫立在那里，凝视着。寒风吹乱了他的白发……

狂风暴雨在继续，就在中南海大院内，居然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诬蔑朱爹爹（朱德同志）是“黑司令”、“大军阀”。爸爸愤怒了，身为国家主席，如果容忍这种现象，那就是不可原谅的失职。可是当时爸爸所处的境地，已经无能为力。一连几天，爸爸神情严峻，忧心如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爸爸找了周伯伯说，为了尽早结束运动，使广大干部免受这么大的冲击，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周伯伯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我们开始深切理解爸爸的心情，显然，使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成败荣辱，而是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爸爸对我们说：“只要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国家能富强，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组织处理。”从表面上，我们看

不出爸爸有什么变化，依然那样严肃而镇定，饭量也不减。他正以高度的党性来克制自己，耐心等待着。等待不是软弱的避难所，表示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暂时的现象。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了，爸爸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有一次，爸爸对我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呵……”爸爸说到这里，嘴唇都颤抖了。直到现在，我们心里一直在回响着：“人民误解了你，人民误解了你……”这是什么样的痛苦呵！

三

1967 年的 1 月是严寒而又阴冷的。“全面夺权”的黑风很快扫遍全国。

1 月 6 日，在江青的疯狂怂恿下，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之流以狡诈的手段，把妈妈骗出中南海，却还夸耀什么“智擒王光美”。

斗王光美，他们自然是觉得不够的，江青一伙开始直接批斗爸爸了。1967 年 1 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冲进我们的家，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了大标语。在批斗会上，当爸爸的答辩使质问者理屈词穷时，一个坏家伙突然蹦出来，让爸爸当场背出语录本某一页的某一条。爸爸背不出，那些人大声嘲笑着。我们真想上前去提醒爸爸，但中间隔着一层一层的人。一刹那，仿佛一团火炭卡在我们的喉咙。而爸爸却镇定自若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那个坏家伙被爸爸说得哑口无言，便叫一阵口号，斗争会一哄而散。看到这些人的狼狈相，我们感到快意。但是，爸爸却对我们说：“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

1 月 13 日深夜，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接爸爸去谈话。爸爸郑重地向主席提出自已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主席只是建议爸爸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就在与毛主席谈话以后第四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办公室，要撤爸爸的电话，爸爸一听，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去阻拦，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这一伙人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他们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把电话线扯断。

爸爸久久地站在那里，象座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而我们呢？一直追到门口，望着那伙人大摇大摆走去。

爸爸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每天清早我们几个孩

子就骑上自行车出门，排着长长的队买小报，从墙上揭下传单。挤在人

群中抄大字报，侧耳听着人们的议论。回到家里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

4 月 1 日，各报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爸爸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爸爸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 8 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就凭一个跳梁小丑的一篇谤文，就把一个国家主席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中央下达文件的依据，成为定人罪名的一纸状文，真是荒谬绝伦！

4 月 6 日晚，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办公室，向爸爸宣布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爸爸的习惯是夜里工作，上午睡觉），还就成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要爸爸回答并写出交代。爸爸按照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据理驳斥。当质问到所谓 61 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爸爸一下子发了火。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爸爸发那么大的脾气。爸爸激怒地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 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白区工作经验，有城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又懂得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最宝贵的，怎能把他们统统打倒呢？”

4 月 7 日，爸爸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说明一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的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在斗争会上，每当爸爸用事实进行答辩，他们就用小红书敲打爸爸的脸和嘴，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爸爸讲一句话。爸爸连一个公民的发言权都被完全剥夺了。

四

爸爸继续顽强地承受着沉重如山的压力和摧心裂胆的痛苦。

4 月 9 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说：“听说，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 30 万人大会批斗妈妈……”

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象火山似地爆发了。

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

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爸爸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里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他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哦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着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

爸爸的这些话，刻骨铭心。这是他向党的倾诉，这难道会是一个反对毛主席的人对亲人的遗嘱吗？！对于那些信口雌黄、诬陷好人，而实际上肆意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丑类，历史和人民是不会轻饶他们的！历史不是已经和正在这样做了吗？

4 月 10 日，在清华大学果然举行了 30 万人批斗会。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妈妈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妈妈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妈妈又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永远不反。”妈妈在大会前，作了长时间的答辩。她代表爸爸向群众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同意你们的搞法，但我们决不跟群众对立，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那天晚上，我们回家把批斗的情景告诉爸爸。虽然我们预料到这对爸爸是一个无情的刺激，但我们不愿意向爸爸隐瞒真相。我们必须面对严酷的事实。当我们说到彭真叔叔、薄一波叔叔、陆定一叔叔和蒋南翔叔叔也同时挨

斗，还有 300 人陪斗的时候，爸爸双眉紧蹙，仔细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晚饭一口也未吃。

五

春去夏来，骄阳似火。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就在这个时候，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围攻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一时，中南海墙外，帐篷林立，车水马龙，围得水泄不通。

在爸爸身边工作了 18 年的厨师郝苗叔叔，突然彼诬为“特务”抓了起来，这对爸爸身边工作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他们更不敢再与爸爸接近了。

7 月 18 日清早，我们去中南海职工食堂吃饭，在我们常坐的饭桌旁吊着一张大字报，上面说根据江青、戚本禹“指示”，今晚要开揪斗爸爸的大会，回到家里，我们就告诉了爸爸。爸爸意识到生死搏斗已迫在眉睫。中午，他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我们看，一是毛主席肯定爸爸检查的批语全文，一是毛主席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这是爸爸第一次让我们看中央的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去，他连自己的办公桌都不让我们接近。如今到了最后关头，他认为不能给孩子心头留下阴影，爸爸以期待的目光望着我们说：“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当天晚上，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爸爸和妈妈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我们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爸爸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爸爸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斗争会后，爸爸和妈妈被分别隔离看管，加派了岗哨。8 月 5 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又刻下了深深的刀痕。

江青、康生、陈怕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那天，我们这三个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被特派员命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安排几个战士看守。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妈妈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见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爸爸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质问为什么不喊口号？爸爸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接着，那些人把爸爸、妈妈押到会场一角，离开我们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

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

妈妈最后握手告别！从他们颤抖的双手，从他们深情的目光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互相鼓励，我们看到了无限深厚的情谊。在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传递了自己内心的信念。在近 20 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忙于工作，无暇叙说。但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一往精深。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又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我们多少次看见他们一起去看大字报，但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彼此间有一句怨言。而今，在这耻辱的“刑场”上，他们要诀别了，永远诀别了。有哪个儿女眼见父母在这样狂暴的躁蹭下握手告别，能不肝肠寸断呢？！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然而，暴力终于把他们分开了。那些人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的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爸爸的头上。在这一片谩骂和围攻之中，谁能想到漫画的绞素套中竟是我们八亿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斗争会结束后，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爸爸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神圣的宪法作最后的斗争。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爸爸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8 月 7 日，爸爸给毛主席写信。他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页向毛主席提出辞呈，并问毛主席写明

“我已失去自由。”

六

经过这场非人的摧残，爸爸的腰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拖着，只能双字扶着走廊的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为了不使我们难过，一见到我们老远在望着他，他就放开双手，强伸起腰，那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爸爸每淌一滴汗，我们心上就淌一滴血啊！

妈妈仍关在后院，头破了，还被强迫劳动搬砖。一位站岗的哨兵看到妈妈背一大筐砖很吃力，就大声“训斥”说：“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嘛！”语气是凶狠的，却包含着极大的同情。就因为这产句话，这个哨兵立即彼调走，复员回乡了。

尽管看到爸爸、妈妈惨遭折磨，心如刀绞，我们还是要站在走廊上隔窗远望着。能看见爸爸、妈妈，毕竟是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啊。可是，万恶的林彪、江青一伙连这一点也不容许，他们竟采取了更恶毒、凶狠的手段。

那是 1967 年 9 月 13 日上午 10 点，突然，通知我们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谁知，这竟是我们和亲爱的爸爸的永别！

瑟瑟秋风，抽打着我们嫩稚的脸颊；滚滚车轮，碾压着我们年轻的心……

对于这一天，我们并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们站在空荡荡的车斗里，看着三个小行李卷。爸爸的嘱咐，又在我们耳边回响：“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就是从无数的坎坷中锻炼出来的。”“要记住：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作人民的好儿女。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的叮咛一字一句地镌刻在我们心头。我们铭记着爸爸的嘱咐，离开家，走到人民之中。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同天下午最小的妹妹、年仅六岁的小小和阿姨也被赶出中南海；晚上妈妈被正式逮捕入狱。这，就是我们生离死别的一天。

直到 1972 年，我们用长满茧子的手给毛主席写信，希望看看自己亲爱的爸爸、妈妈。8 月 16 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向我们　传达毛主席批示，说：“可以见见妈妈。”我们一再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他们不敢说，就走了。第二天，他们才又来传达毛主席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口头通知我们，爸爸已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晨 6 时，因肺炎死于开封；他的骨灰由组织上保存，不能给我们。并且不让我们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

听到爸爸不幸去世的消息，我们的心被撕碎了。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三年了。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切齿的仇恨。我们齐声追问：“为什么死于开封？为什么死于肺炎？什么人去抢救的？爸爸什么时候走的？当时是否已经病了？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专案组的人瞠目结舌，神色极为慌张，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只能说这些。”就在同一天，专案组把爸爸的死讯通知了狱中的妈妈。

8 月 18 日，我们第一次去监狱见妈妈。五年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盼望这一天，梦中千百回地呼喊着。头天晚上，我们激动得一夜没睡。深夜里小小梦游，抱着毛巾被跑出来叫着要见妈妈。可是，真见到妈妈的时候，她竟不认得，不会叫，木呆着。我们也都惊呆了：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妈妈仔细端详着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是啊，谁能想到我们会活下来呢，可活下来又是多么不容易呀！我们不愿讲 80 岁的外婆怎样惨死在狱中，也不敢提及爸爸早已离开人间，我们不忍提及我们每个人活下来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尽拣好一点的话来安慰妈妈，讲林彪一家摔死的喜讯来鼓励妈妈，讲我们如何在人民的抚育下长大成人，让妈妈放心……五年的离别之情啊，象滔滔江河奔流不尽，身旁的看守、专案人员的怒目相视，也无法斩断这股情流。过去的一切爱、恨、恩、仇都融化在岁月的巨变之中，埋在心底里，今天才从母女们相视的目光中迸发出来。最后分别的时候到了，看守们强拉着妈妈回去，我们哭喊着：“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呀！”妈妈回过头来，满面泪水，隔着窗户，向我们点着头……

从这天起，我们就为新的使命而斗争：我们要弄清爸爸的死情，爸爸是为党受屈、为人民而死的，他是人民的儿子，他的骨灰也属于人民，我们绝不能让爸爸圣洁的骨灰落到“四人帮”的魔掌里。爸爸呀，我们就是拼掉性命，也要找到您的骨灰，夺回您的骨灰！

多年来我们访踪追影，到处打听。我们找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但他们在爸爸去世时也都撤走了；我们托多少人到开封打听，甚至找到他最后被关押的地方，但也是人去室空。多少年，我们忍耐、等待，小心而又热切地找寻。

1976 年 10 月，党和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人民胜利了！党胜利了！多少年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忍受着时间的煎熬。经过千辛万苦，从许多有关人员那里，从当时的有关记录中，我们把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连在一起，成为一幕幕难忘的画面，清楚地看到了爸爸在最后那些日子里的悲惨遭遇……

七

1967 年 9 月 13 日，就在我们被迫离家后的当天，妈妈也被关进了监狱。起初，爸爸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想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又蹭到妈妈曾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到里面的动静。然百，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每次都是失望地蹭回来。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寂静。一天夜里，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再也不许爸爸出门到后院墙根了。接着，几个战士又奉命来搜查爸爸的房间，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爸爸厉声抗议，话音未落，就被按倒在地，强行把皮带抽去。爸爸发火了，气得浑身打颤，半天爬不起来。

爸爸完全象囚犯一样！不，比囚犯还不如。

之后，迟群跑来，代表“中央”给爸爸的警卫战士训话：“你们×中队负责警卫的人里黑帮出得最多，刘少奇就在这儿。你们中毒最深，要肃清流毒。你们现在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他还恶狠狠地加了一句：“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原来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彼骂为“地道的保皇兵”，下了他们的枪，没收了证件。“看守”爸爸的战士，也加了双哨，层层监视，谁要是有一点“留情”，就要立即被批斗、关押或送回农村老家。这哪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党中央的心脏——中南海？这里，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片封建法西斯的恐怖！爸爸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孤苦伶仃地挣扎着。他要坚持活下去，活到胜利的一天……

当知道妈妈和孩子们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爸爸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再加上不给足够的安眠药，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这种折磨使得爸爸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 30 米距离，竟要“走”上 50 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工作人员去饭堂打饭，被人骂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吃几顿。爸爸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一个年近 70 岁的老人，怎么经受得起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爸爸的身体日益恶化，有时神志不清。可是，那些负责监视看守的人却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1968 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抢救呢？当时中办的

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丸大留活靶子！”谁都知道，对象爸爸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入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了。会诊医生提出离开监护环境住院治疗，被拒绝了；医生请求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以使病人精神不受刺激，也被拒绝了。他们就是要让爸爸这样活受罪，活受折磨。这以后，爸爸虽然没有瘫痪，却再也无力起身活动，每天在严密的监视中躺在床上。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因为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了。他的胳膊和腿由于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爸爸页对着林彪、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残酷迫害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现实，10 月 5 日大哭了两次。他为革命奋斗了半个世纪，面对任何敌人、恐怖，面对任何流血、牺牲，面对任何委屈、误解，他从来没有大声痛哭过。今天，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他失声痛哭！他哭得是那么伤心。他把对祖国、对民族、对党、对事业、对家庭、对自己的所有的情感，一个真正的人的全部情感，从这决开的心堤里喷涌出来……

紧接着，爸爸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引起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爸爸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摸成了两个小“葫芦”。

1968 年 11 月 24 日，是爸爸 70 岁的生日。爸爸从来不让我们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这一天特别加倍工作，引以为最大的欣慰和欢乐。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生日——

据说这天早上，爸爸听到八属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 24 天了。单单在生日这一天让他听到。爸爸气愤已极，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 260/130，体温升到 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眼睛，喷射出怒火……

秋风凄厉，枯木凋零。茕然一身的爸爸，独自承受着这最沉重的打击。

从入党那一天起，爸爸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整整半个世纪，他致力于党的建设和发展，出生入死，艰苦奋战，为了党，他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为了党，他把个人的安危荣辱置之度外；为了党，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为了党，他承担了最大的屈辱和误解……。他相信有一天党会为他说明真相、洗清冤屈、澄清是非，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永远开除出党”！

在党纪国法已经荡然无存，真理和谬误、正义和邪恶完全颠倒的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是，这“词”是什么，爸爸至死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立案审查不知道，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作出决议，从来没有人找爸爸谈过一句话，了解过一个字。既不让看有关材料，又不让说明申诉；既不让爸爸知道开他的会，叉没让爸爸在开除党籍的决议上签字。直到爸爸去世，他们从没有把有关决议正式通知过爸爸。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背着爸爸搞突然袭击。在党的最庄严的代表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竟

抛出一个全部是栽赃、诬陷：用“逼供信”编造的假材料，欺骗全党，愚弄全国人民。谁要是提出一点不同意见，就要招致灭顶之灾。朱爹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因说过“刘少　奇打不倒”，被认为“不识时务”；中央委员陈少敏妈妈也是因为不相信为党奋斗几十年的爸爸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立即惨遭迫害；张志新烈士勇敢地站出来为爸爸辩护而被残酷杀害。在那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下，哪里有真理可言，正义可谈，冤屈可伸呢？！这不仅是对爸爸一个人，也是对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肆意践踏和蹂躏，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奇耻大辱。

从此以后，爸爸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敬爱的周伯伯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来护理爸爸，可是这两位熟练而细心的护士也无能为力啊。

八

1969 年 10 月 17 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爸爸送往开封。爸爸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护士都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来到爸爸房门口瞧了一眼，亲自叫人通知爸爸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爸爸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这张纸拿到另一边，让爸爸看，爸爸又把脸扭了过去。爸爸原卫士长老李同志上前对着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爸爸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晚上 7 点多钟，爸爸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同志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爸爸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天气，爸爸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 39℃，呕吐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 11 月 5 日，爸爸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方降到 37.2℃。当时在爸爸身边的人都说，他特别配合治疗。爸爸虽然不说话，但他的神志还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亲眼看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下场。

就在爸爸退烧的第二天，11 月 8 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但又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原卫士长老李叔叔一回到北京，就要向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汇报情况。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两点，电话铃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赶去。”李叔叔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赶往机场。

13 日凌晨，老李叔叔到开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老李叔叔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11 月 10 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方取出，体温 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到 11 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光反应消失，

体温 40.1℃。第二天 6 点 40 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 分钟后，6 点 45 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

老李叔叔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给爸爸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 12 点，六七个人把爸爸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20 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爸爸曾对我们说过：“我活着是个无产者，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可我们怎么也不曾想到，竟“无产”到这个地步：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死时却成了“无业”；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哀乐，没有哭声，他为党披肝沥胆，死时却没有鲜花，没有党旗……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去。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林彪、江青一伙自以为干得神鬼不晓，人民毫无所闻；他们自以为“胜利”地清除了他们的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但是，党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对于任何人来说，历史自有公论，而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终于公正地落到那些炮制者自己的身上。历史是无情的，民心是不可违背的，真理之光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爸爸，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和尊敬。

我们和亲爱的爸爸分别至今，已经 13 年了。这是什么样的 13 年呀？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四位骨肉先后惨死，六个亲人坐过监狱。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属的苦难，是我们祖国的满目疮痍。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爸爸平反，不仅是为爸爸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眷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爸爸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我们的祖国受够了难，人民吃够了苦，再也不要人为地制造动乱，只需要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好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啊！

自从妈妈去年回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多么幸福，多么亲呢。就在这幸福的笑声中，我们看见爸爸就在我们面前，他正在奋力挣扎，去挣脱那无情的血网，多么想回到人民的中间，多么想回到妻子儿女身边。爸爸，十年了，您的灵魂一直在这样斗争着，一直在我们心中呼喊。爸爸，您安息吧，我们就在您的身边。爸爸，您看看，党和人民终于打破了这血网，洗清了您身上的污渍；您看看，这是全国人民写来的千万封信，大家有这么多话要说给您听！您看呐，成千上万的青年抱着鲜花向您拥来；您看呐，大地回春，冰雪融化了。祖国的千山万岭回响着人民呼唤您的声音，您忍辱含愤的英灵终可得到安慰了吧！

爸爸呀，您那不安的灵魂快快回到您雪白的骨灰里来吧！让我们按照您在任国家主席时的托付，按照您在最艰难时的遗嘱，把您的骨灰洒到祖国的大海里，洒到世界的大洋上，融化在解冻的春水之中，您一生的奋斗和心血已变成世上最为宝贵的财富，永存在世间。

爸爸呀，亲爱的爸爸，您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鞠躬尽瘁；人民并没有忘记您，也为了您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爸爸

呀，您曾为了我们党而抛弃了个人的一切；党没有遗弃您，为了您的昭雪，奋力呐喊，不惜一切代价。今天党和人民又把那应得的光荣还给了您，对于您来说，至高无上的光荣称号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本文是作者应《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杂志之约而作。1980 年 4 月完稿于北京。1988 年 3 月，经作者作了较大的修改，收入本书。）